



周一平 编著

中共党史 文献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GONG
DANGSHI
WENXIANXUE



周一平 编著

中共党史 文献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GONG
DANGSHI
WENXIANXUE

目 录

第一章 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	(1)
第一节 文献和文献学	(1)
一、文献	(1)
二、文献学	(17)
第二节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	(22)
一、历史文献	(22)
二、历史文献学	(35)
第二章 中共党史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学	(42)
第一节 中共党史文献	(42)
一、中共党史文献概念	(42)
二、中共党史文献性质	(45)
三、中共党史文献类型	(51)
四、中共党史文献特点	(97)
五、中共党史文献价值、功能	(110)
第二节 中共党史文献学	(124)
一、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	(125)
二、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目的、任务	(127)
三、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128)
四、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的意义	(133)
五、中共党史文献学是一门新兴的、有待开拓的学科	(135)

第三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	(137)
第一节 类型	(137)
一、单位搜集	(137)
二、个人搜集	(139)
三、专题搜集	(141)
四、无专题搜集	(146)
第二节 原则	(148)
一、历史原则	(148)
二、全面原则	(149)
三、理性原则	(151)
四、保密原则	(153)
第三节 步骤、方法	(154)
一、制定计划	(154)
二、搜集有线索的文献	(155)
三、搜集无线索的文献	(156)
四、常规方法	(158)
第四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	(160)
第一节 有序化整理	(160)
一、文献分类	(160)
二、标题、标引	(164)
三、著录、编目、编制索引	(169)
第二节 内容整理	(175)
一、校正文字	(175)
二、分段	(176)
三、标点	(177)
四、写工作报告	(185)
第三节 原则	(186)
一、历史原则	(186)
二、理性原则	(187)

三、保护原则·····	(189)
第五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勘 ·····	(192)
第一节 校勘的一般理论问题 ·····	(192)
一、校勘·····	(192)
二、校勘的目的、任务 ·····	(193)
三、校勘的内容·····	(193)
四、校勘的原则·····	(194)
五、校勘的方法·····	(196)
六、校勘的步骤·····	(202)
第二节 校勘原件 ·····	(208)
一、校勘文字·····	(208)
二、校勘内容·····	(226)
三、校勘标点·····	(231)
四、校勘目录·····	(232)
五、校勘照片·····	(232)
第三节 校勘抄件 ·····	(240)
一、校勘文字·····	(240)
二、校勘行款 ·····	(243)
三、校勘标点·····	(244)
四、校勘内容·····	(244)
第六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考证 ·····	(246)
第一节 考证的一般理论问题 ·····	(246)
一、考证·····	(246)
二、文献考证的目的、任务 ·····	(246)
三、文献考证的基本内容·····	(247)
四、文献考证的原则·····	(248)
五、文献考证的方法·····	(249)
六、中国传统文献考证的经验·····	(253)

第二节 文献考证的具体步骤、方法	(256)
一、考源流	(256)
二、考著录	(259)
三、考制作	(261)
四、考形式	(261)
五、考印章	(261)
六、考字迹	(262)
七、考文体	(263)
八、考内容	(263)
九、存疑	(266)
第七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	(267)
第一节 编纂的一般理论问题	(267)
一、编纂	(267)
二、文献编纂的目的、任务	(268)
三、文献编纂的原则	(268)
四、文献编纂的体裁	(270)
第二节 编纂的具体步骤、方法	(276)
一、选题	(276)
二、定体例	(278)
三、编提纲	(282)
四、订计划	(283)
五、做准备	(283)
六、选材	(284)
七、整理、加工	(287)
八、标题	(287)
九、注释	(290)
十、按语	(299)
十一、序	(301)
十二、跋	(304)

十三、编排·····	(304)
十四、编写附件·····	(307)
十五、审稿、定稿、出版·····	(310)
第八章 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相关知识 ·····	(312)
第一节 人名 ·····	(312)
一、把握中国人名的复杂性·····	(312)
二、把握人名的翻译·····	(314)
第二节 地名 ·····	(315)
一、把握中国地名的复杂性·····	(315)
二、防止字近、音近、地近等产生的讹误·····	(317)
三、把握地名的翻译·····	(319)
第三节 年季月日 ·····	(320)
一、年·····	(321)
二、季·····	(325)
三、月·····	(326)
四、日·····	(328)
第四节 职官 ·····	(334)
一、清朝政府职官·····	(335)
二、北洋军阀政府职官·····	(337)
三、国民党政府职官·····	(338)
四、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及政府职官概况·····	(339)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	(346)
后记 ·····	(347)

◆ 第一章 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

第一节 文献和文献学

一、文献

1. 文献概念

历史的脚步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向前迈进,时代的车轮每秒每分都在不停向前飞奔、变化、发展,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文献、文献概念,也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人类的语言、文字还未产生、人类的生产力低下、知识积累少,“文献”的概念是没有的。当人类的语言、文字产生并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当社会生产力提高,知识极大地丰富以后,“文献”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根据现存资料的记载,在中国古代,“文献”一词首次见于《论语》。《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文献”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呢?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文,典籍也;献,贤也。”清朝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文献”的含义是典籍与贤才。这说明,当时典籍已产生,数量也相当可观,不过这些典籍都是书写在竹简上,经编连简策而成。同时表明,当时知识的传授、传播,不只是典籍传播一途,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贤才、贤士大夫传播,即上古传统的口耳相传。一部分的知识已在简策上记载下来,还有一部分知识尚未有条件在简策上记载下来,只能由人脑记忆,通过口授耳听流传。先秦有不少重要的“著述”没有能流传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能记录下

来。而一些重要的“著述”，先秦时没有记录下来，直到汉代才记录下来，大概也是因为先秦时人力、物力、财力还不具备，而汉代人力、物力、财力具备了，或者说生产力已向前发展了。有一种说法认为左丘明的《左传》就是到汉代才记录下来的，其原因之一大概就是如此。先秦“文献”的含义尽管与现在有所不同，但“文献”与知识有关，与知识的载体有关（典籍与贤才均是当时知识的载体），这与现在是相同的。

纸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使知识的记录传播实现了一次飞跃。越来越多的知识被记录在纸上，被写成本一本的书，于是口耳相传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文献”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宋元之际马端临编著《文献通考》，他在《总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这里的“文”指经史、历史会要、百家传记之书；“献”指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稗官记录。“文”基本上是公开流传的书。“献”有一部分是公开流传的书，有一些则是国家档案，还有一些是私人手稿，无论公开与否，这些“献”都是记录在纸上的言论。马端临之时，“文献”的含义基本上只指“典籍”了，“贤才”已不成为“献”的内容了，口耳相传基本上成为过去。马端临之时的“文献”概念，用现在的语言来归纳，就是“纸上记录的知识”。知识由文字、纸记录、传播，主导了人类社会很长一段时间。“文献”指典籍，也主导了很长一段时间。白寿彝在1981年第二期《史学史研究》上发表《谈历史文献学》，仍说：“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主要的书面材料。”即“文献”仍指纸上记录的有历史意义的知识。

录音、录像（电影、录像）、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使知识的记录、传播又实现了一次飞跃，知识一律由纸记录、传播的时代成为过去。与此相关，“文献”概念也发展了。当代国际上通用的“文献”定义是：“在存贮、检索、利用或传递记录信息的过程中，可作为一个单元处理的，在载体内、载体上或依附载体而存贮有信息或数据的载体。”（《文献情报术语国际标准（草案）》，ISO/DIS5127）1983年中国国家标准局颁布的国

家标准之一《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对“文献”下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1985年中国国家标准局颁布的《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GB4894-85)也说：“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中国图书情报界的学者对“文献”的定义又有所发挥，如倪波等主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下的“文献”定义是：“记录信息与知识的一切人工附载物。”(第26页)这里加进了“信息”，并强调了载体的“人工”性。李纪友等著的《图书馆专业基本科目名词简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为了把人类知识传播开来和继承下去，人们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和视频等手段将其记录下来：或写在纸上，或晒在蓝图上，或摄制在感光片上，或录制在唱片上，或存贮在磁带上。这种附着在各种载体上的记录，统称为文献。”(第2-3页)就是说，典籍、图书、档案、手稿等是文献，图片、照片、胶卷、录像带、唱片、录音带、磁带、磁盘等等，只要记录了信息、知识，也是文献。文献的含义和种类大大扩展了，当然这是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发展的结果。

从当代“文献”的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知道，“文献”是信息、知识与某种载体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一般是人工合成的。某种信息、知识如果不被载于某种载体，那么这种信息、知识就不能成为文献。另一方面，如果某种载体不载有某种信息、知识，那么这种载体也不能成为文献。载体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载体指能记录信息、知识的具有一定意义的符号，如文字、图形、声波、电波等。间接载体指能承载和传递符号的客体，如纸、胶卷、磁带等。直接载体的文字，已客观存在，这些一个一个的字，不能说就是文献。只有当人们用一个一个的字来记录某种信息、知识时，并且是记录在纸上或磁带里时，这时文献才形成了。间接载体的纸、胶卷、磁带等，如果不记录某种信息、知识，那么它只是白纸、空胶卷、空磁带，它还不是文献。只有记录了某种信息、知识，它才不是白纸、空胶卷、空磁带了，而成为文献了。比如用甲骨文记载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献，是中国现存的较早的文献，它是殷代的文献，历史学家已用它来研究殷代历史。甲骨在河南安阳及其他地方出土，出土时有的甲骨上有字、有符号、有图形，这些甲骨就成为甲骨文献。而

出土时也有不少甲骨是无字、无符号、无图形的甲骨,这些甲骨就不能成为文献了。再如竹简、木牍、缣帛等也是中国古代用来书写的载体,如果出土时上面写了字,或画了图,就可以成为文献,如果上面没有字,也没有别的符号、图形,就不能成为文献,只能算文物。总之,当各种各样的信息、知识与各种各样的载体相结合以后,各种各样的文献才得以形成。

从当代“文献”的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知道,“文献”是包罗万象的,人类社会、宇宙间的一切信息、知识,只要在某种载体上记载下来,都是文献。张君炎等认为“文献”是记录着有一定历史价值或科学价值的知识信息的一切载体。即记录在载体上的知识信息如果没有价值,那它就不是文献。甚至认为档案并非都是文献,那些没有价值的档案,就不是文献,决不能在档案与档案文献之间划上等号^①。这种看法似乎突出了文献的价值,而实际上没有看到文献价值的相对性。此时此地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文献,彼时彼地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中国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文献,外国人会认为是有价值的。那些要被剔除的、已经被剔除的文献,它们曾经有过价值,不能说它们是没有价值的,它们不是文献。文献既然包含知识、信息,就有一定的价值。不管是什么知识、信息,记录在什么载体上,它就形成了文献。形成文献后,其命运如何是另外讨论的问题。文献中知识、信息的价值高低,也是另外讨论的问题了。全世界的文献,不仅已经像堆山一样,堆起了无数座文献“山”,而且每天仍在山一样地产生。文献“家族”的庞大、显赫,可以说在人类社会中是无与伦比的。

2. 文献性质

文献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文献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一般来说文献是人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践中的产物,是人们的劳动创造。文献的各种载体,即使是自然物,也要经过人们的加工,而纸、胶卷、磁带等更是人们生产实践、科学实践的成果。至于各种信息、知识,都是人们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践中的劳动所得、经验总

^① 张君炎等《档案文献编研学》,上海交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结、理论提炼。所以说,文献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凝结、物化,是人类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践及其发展中创造、积累起来的物化的精神财富。

文献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记录了人类的历史,记录了每一社会、每一时代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时代创造一定的文献;一定的文献,是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时代的产物。超时代、超社会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奴隶社会的文献总记录了奴隶们的生产实践、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等。它不可能记录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献总有产业革命、工业文明的特点。当今信息时代,文献带上了高科技的特点。文献有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

在浩淼无际的文献海洋中,有一部分记录了人类社会历史,记录了社会发展中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记录了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记录了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记录了党派的活动及其思想理论……这些文献一般都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产物,是有阶级性、政治性的。而那些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相关的文献,比如自然科学文献,比如社会科学中的语言学、逻辑学文献等,则是没有阶级性、政治性的。

文献有社会性,也有自然性。文献的内容是社会性的,文献的载体则有某些自然性。然而反映文献本质的主要是它的内容,它的社会性。而文献的社会性,可以从文献的知识性、信息性中反映出来,也可以从文献的政治性、阶级性中反映出来。尽管不是所有的文献都有政治性、阶级性,但一定的文献有阶级性、政治性,这是必须承认,必须重视的。

3. 文献类型

文献的类型有多种分法,一般有以下几种:

① 按文献载体形式划分类型,可以分为印刷型和非印刷型两种。印刷型的文献一般是以纸为载体,通过各种印刷或复印,将文字、图表、符号等记录在纸上,有的是单页,有的装订成册。印刷型文献主要有普通图书和连续性出版物等。连续性出版物指报纸、杂志、年度出版物等。非印刷型文献,指印刷型文献以外的各种类型文献。主要包括:第

一,手写型文献。手写型文献的载体是很多的,可以用来书写的材料均可以作为载体,如纸、布、缣帛、竹木、金石、甲骨等。手写型文献主要有手稿、笔记、日记、书信、会议记录等。私人档案、国家档案,有很多是手写型文献。第二,缩微型文献。它以感光材料,如胶片、胶卷等为载体,以缩微照相技术为手段,将印刷型文献、手写型文献等缩小几十倍甚至上万倍记录下来,或者说缩小复制。图书馆、档案馆有很多珍贵的文献都有缩微胶卷,供阅读,供购买。第三,机读型文献。它以磁性材料,如磁带、磁盘、光盘等为载体,以穿孔、打字、光学字符识别装置为记录手段,将文字、图像通过编码、程序设计,转换为数学语言,机器语言,输入计算机,存贮在磁带、磁盘、光盘或磁鼓上,阅读时又由计算机将其转换为文字或图像,显示在终端屏幕上。目前国内外机读型的文献数据库已越来越多地建立起来,数字图书馆也已经诞生了。坐在家里,通过电脑阅读报纸、杂志、图书已成为平常事。第四,视听型文献。它以磁性材料、感光材料,如磁带、录像带、胶卷等为载体,以相应的机械装置为手段,将声音、图像记录下来,视听时,再通过相应的机械装置让声音、图像再现出来。视听型文献主要有唱片、录音带、录像带、光盘、光碟、电影胶卷等。以上各类文献各有其长短。印刷型文献,流通和阅读一般不受时间、地点、设备等条件的限制,缺点则是体积大、分量重、存贮信息密度低,容易破损,给收藏、运送带来不少困难。缩微型文献,体积小、分量轻、信息密度大,收藏、运送方便,缺点则是阅读必须借助缩微阅读器,流通和阅读就没有印刷型文献方便。机读型文献,存贮信息密度大,检索速度快,阅读方便,但也必须借助电脑设备,成本很高。视听、影视型文献,也需要借助放送设备或收听、收看设备,亦需较高成本。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在不断向前发展,社会日益现代化,文献也必然日益现代化,文献的形式必将日趋完美。

②按文献的学科内容划分类型,可以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两大类,这两大类又可各自分出若干类。《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献共分为22类:

- 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B 哲学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林业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安全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这 22 类中又逐级展开分出很多亚类。如 A 类中有：

- A4 毛泽东著作
- A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生平和传记
- A8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

其中 A7 中 A75 为“毛泽东”，A8 中 A84 为“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研究”。A4 则又分 8 类：

- 41 选集
- 419 选读
- 42 单行著作
- 43 书信集、日记、函电、谈话

- 44 诗词
- 45 手迹
- 46 专题汇编
- 48 语录

这 8 类中有些又分若干小类。如 A42 又分：

- 42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1924 年以前)
- 42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 - 1927 年 7 月)
- 42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 年 8 月 - 1937 年 6 月)
- 424 抗日战争时期(1937 年 7 月 - 1945 年 8 月)
- 425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 年 9 月 - 1949 年 9 月)
- 426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 年 10 月 - 1976 年)

又如 D 类中 D1/3 为“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其中 D2 为“中国共产党”。D2 又分：

- 2-1 党的领导人著作
- 20 建党理论
- 21 党章
- 22 党的组织、会议及其文献
- 23 党史
- 24 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 25 党的领导
- 26 党的建设
- 27 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 29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其中 D23 又分：

- 2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 - 1949 年)
- 2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 - 年)
- 235 党的地方组织史料(依中国地区表分)
- 239 党史参考资料

再如 K 类中, K2 为“中国史”, K81 为“传记”。K2 中 K25 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1840 - 1949 年)”,K27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 - 年)。”其中 K25 又分:

- 251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 - 1919 年)
- 252 清后期(1840 - 1911 年)
- 253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1840 - 1850 年)
- 254 太平天国革命(1851 - 1864 年)
- 255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 - 1860 年)
- 256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时期(1860 - 1900 年)
- 257 辛亥革命(1901 - 1911 年)
- 2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 - 1949 年)
- 261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19 - 1924 年)
- 26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 - 1927 年)
- 26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 - 1937 年)
- 264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及全国抗日民主运动
- 265 抗日战争时期(1937 - 1945 年)
- 266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1945 - 1949 年)
- 269 解放区的革命建设和发展

其中 K263 又分:

- 263 · 1 南昌起义
- 263 · 2 秋收起义
- 263 · 3 广州起义
- 263 · 4 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入此)
- 263 · 5 新军阀混战

其中 K266 又分:

- 266 · 1 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入此)
- 266 · 2 旧政治协商会议
- 266 · 3 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联合
- 266 · 4 国民党在谈判期间向解放区进攻
- 266 · 5 国民党政府地区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266·6 人民解放战争各次战役

266·9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其他历史事件

这几类中有些类又分出若干细类。总之,按文献反映的内容分类,可以将类分得很细,便于各类文献的归类、整理,也便于文献的检索。以上的《中图法》,是我国有代表性的分类法,西方国家的文献分类法,主要是十进分类法,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等。

③按文献的加工程度、层次划分类型,可以分为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四类。零次文献,一般指未公开于社会的原始文献。如论著草稿、日记、书信、发言稿、设计草图、实验原始记录以及会议记录、采访记录、电话记录等等,这些大多是手写型的文献,它们并不公开,往往有一定的保密性,都是属于零次文献。即使有些零次文献以后经过整理、加工、完善,公开发表、公之于众,比如日记、书信公开出版,那么这些日记、书信的原始手稿相对于它的正式出版物来说,仍是零次文献。如果这些日记、书信的出版物是一次文献,那么这些日记、书信便有了零次文献和一次文献两种形式,即有了两个版本。^①一次文献,一般指作者本人在实践、劳动中创作的,并且首次公开发表的或者出版的文献。一次文献是作者创造的文献第一次公开亮相,没有他人加工的痕迹,反映、保持了作者创造的文献的原貌。从没有被他人加工过的意义上来说,一次文献也可称为“原始文献”,但它相对于零次文献来说,又不能称为“原始文献”。首次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报告、教科书、档案集、文件集、资料集等等,都是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一般指在一次文献基础上加工后形成的文献。一次文献数量大,涉及的学科多,出版、收藏的地点分散,这给有针对性的阅读、利用造成很多困难、障碍,于是需要将它们浓缩、归类,按一定的体系编排起来,形成一种便于检索的文献,这种文献被称为二次文献。因为这种文献的功用主要是提供检索,所以也被称为检索文献。书目、索引、文摘、题录等

^① 零次文献的概念,有的学者承认,有的学者不承认。这里取承认有零次文献的说法。

等,如《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全国报刊索引》、《十九种影印革命报刊索引》、《新华文摘》、《中共党史文摘年刊》等等,都是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一般指在一次、二次文献的基础上再一次加工后形成的文献。往往是利用二次文献,对一次文献的内容去粗取精,分析、综合,按一定的理论体系进行介绍、评论的文献。如动态、综述、述评、概观类的论文、著作、年鉴等等。三次文献既是对一次、二次文献的加工,是对一次文献创造者的成果的利用,同时也包含了某些三次文献创造者自己的创造。

以上四种层次的文献,零次文献的特点是保密性,不公开性,流通、利用少且不便。一次文献是在社会中流通、利用的基本文献,但数量大、分散。二次文献的特点是报道性、简明性、汇编性、检索性、工具性。三次文献的特点是选择性、介绍性、综合性、参考性。各种不同层次的文献各有其特点,但各类文献都有其各自的价值和功用,这也是无疑的。

按文献载体形式划分类型,按学科内容划分类型,按加工程度、层次划分类型,是文献的三种基本类型,当然还可以用其他标准来划分类型,如以出版形式来划分,以时间、年代来划分,以地域来划分,以语种、文种来划分等等。总之,文献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数量是惊人的,并且在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据报道,现在每年全世界要增加二亿信息单位文献,某些高新技术领域,每二三年文献量就翻一番。因此,对文献及其加工、管理、利用等进行研究,是很艰巨的任务,是举足轻重的课题,也成为一门很深的学问,一门很重要的学科。

4. 文献特点

文献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 客观与主观结合在一起。信息、知识有一定的客观性,人通过实践而获得。人获得信息、知识以后,经过大脑的加工、整理,再经过人工把信息、知识记录在载体上。没有客观世界、客观的实践,文献不可能形成。没有人的主观努力、人的加工,文献也不可能形成。文献的形成,是信息、知识的物化,成为离开人体的客观物质存在,而这种客体有主观的痕迹、印记。不能把文献看成纯客观的东西,也不能把文献看成

纯主观的东西。可以作一个不十分贴切的比喻：文献是一座桥梁，一头连着客观世界，一头连着主观世界。文献中究竟客观成分多呢，还是主观成分多呢？这因文献而异。有的文献可能客观成分多，有的文献可能主观成分多。应该个别分析，区别对待。

②可加工。文献是经过人的加工形成的。文献形成后仍可以继续加工。可以把某种载体、某种形式的文献加工成另一种载体、另一种形式的文献。如印刷型的文献可以加工成机读型的文献，机读型的文献也可以加工成印刷型文献。可以把文献的内容浓缩，可以把文献按照一定的体系编排起来、编纂起来。如一次文献加工成二次文献，二次文献加工成三次文献。文献的可加工，一方面能够让文献更好地为人类的各种劳动服务，另一方面也说明文献可以被篡改、造假。所以文献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鉴定、辨别文献的真伪。

③可毁灭。文献通过载体表现为客观的物质存在。物质是可以销毁的，文献也是可以销毁的。当文献的载体被销毁，那么记录在这一载体上的知识、信息也就被销毁。如果某一文献有多种形式的载体，每一载体的数量又很多，那么一种载体的一件文献被销毁后，其他内容相同的文献还存在，其他内容相同的不同种类的载体的文献还存在，这一件文献被销毁了，并非是这一文献上记录的知识、信息就消失了，这一知识、信息仍通过其他文献、其他种类载体文献而贮存着。只有当某一文献只有一种载体形式，而且只有一件，那么这一文献被销毁以后，这一文献上记录的知识、信息也就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意味着不可复得。如书籍，当一本书的印数很大，世上流传很多时，那么其中的一本销毁，可不足惜。然当一本孤本书被销毁，那么它将是人类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一个大损失。这就提醒人们必须重视文献的搜集、保存、保护，应懂得有些文献是很珍贵，甚至是价值连城的。

另一方面，与万事万物都在新陈代谢一样，文献也不断进行着新陈代谢。即一些过时的、老化了的文献要剔除、销毁。这种销毁，有利文献的更新、发展，增加价值，是合理的、必须的。

④有时效。文献可以长期保存，但文献的内容、信息以及载体会因

时间的向前推移而老化,不断丧失其价值^①。新的文献产生以后,一部分老的文献就减少或丧失其原有的价值,被取代了。各种不同学科的文献,其老化的速度、其时效性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的文献老化的速度快、时效短,社会科学的文献相对来说老化的速度慢一些,时效长一些。当代高科技的一些文献,二三年内就会更新一次,而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文献,数千年后仍被人们广泛研究,不丧失其价值。中共党史的一些文献,数十年后仍被人们分门别类大规模地研究,日增其价值。文献的时效,有的从产生之时起算,有的则从公开发表之时,或被介绍之时起算。因为有的文献一产生就发表了,很快被社会被人们了解。而有的文献在产生之后若干年,甚至数百年、数千年以后才被人发现,才公之于世。有的当年产生的文献,在被第一次引用、介绍以后,第二次引用、介绍就被视为旧文献、旧资料了。而有的若干年以前、数百年以前、数千年以前产生的文献,被今天的学者第一次发现、引用、介绍,仍被视为新文献、新资料,以后再引用、再介绍才被视为旧文献、旧资料。文献有新旧之分、新老之分,新旧文献的价值高低是不同的。文献的新旧更替是不断进行的,文献是有时效性的,文献的搜集、贮存、整理、研究的更新,也应不断进行。

⑤有局限。文献的局限性是多方面的。它要受载体的局限,受社会的局限,受人的局限。文献记录的知识、信息不是整个宇宙、整个社会的所有知识、信息,即使已记录的知识、信息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文献可以有选择地记录、反映客观世界,文献记录、反映的客观世界,一般不是客观世界的完全再现,而总是有或多或少的距离。文字文献不能记录、反映声音、形象。而录像、电影摄影,能记录反映声音、形象,但它们记录、反映一个人,不可能从生到死分秒必录、必摄;它们记录、反映一件事,不可能前因后果整个过程,大小巨细必录、必摄;即使它们录

① 这里讲的文献老化、价值丧失,主要是指文献所记录的知识、信息而言。如果从历史文物的角度来看,年代越久的文献越有文物价值。比如《论语》,今天可以找到很多精美的注释本,知识性高,然唐写本或宋版的《论语》虽然知识性不一定高,文物价值却很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也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下、摄下的镜头,也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拍摄的,而不是全方位的,只能从中看到一个角度的情景,而看不到全方位的情景。这就是说文献中的客观世界,不完全等同于客观世界,不能代替客观世界,如果想通过文献完全了解客观世界,那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正确的看法是,既要通过文献来了解、认识客观世界,更要把文献和客观世界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准确、真实地了解、认识客观世界。

5. 文献价值、功能

文献的价值和功能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 文献是重要的信息知识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献记录、贮存、传递人类社会的所有已被认识的信息、知识,推动人类社会知识的不断积累,日益更新。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更新,推动着人类的生产进步、科技发展、社会前进。文献是推动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人类社会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对文献资源进行有序的整理、加工、组织、布局,有效开发文献资源,充分利用文献资源,把文献资源转化为社会需要的各种能量,社会就将更快地发展,就能更多地造福于人类。文献资源较其他资源的优势还在于可以多次重复使用,可以不受地域限制,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用之不竭的财富。

② 文献贮存知识、信息比人脑有更多的优越性。人脑可以记忆、贮存知识、信息,但它的记忆、贮存功能是有限的,不仅数量受局限,就是质量也受局限,同时还受时间、空间的局限。人脑记忆、贮存的知识信息有时会发生误差,甚至消失,原因就在这里。而文献的载体是无限的,记忆、贮存知识、信息也是无限的。文献记忆、贮存知识、信息在数量上超过人脑,在质量上也超过人脑。人脑无法记忆、贮存的信息、知识,如声波、光波、电波,文献能够记忆、贮存。文献记忆信息、知识,误差小,受时间、空间的局限也小。

③ 文献传递知识、信息有优越性。文献传递知识信息一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从横向传递来说,它可以先后向一个人、几个人传递,也可以同时向无数人传递。它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各个不同地区传播,也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区传播。它可以在同地区先后传递,也可以同时传递。它可以不断地、不知疲倦地复制、重复传递,而

保持知识、信息的原来面貌。它的传递速度极为迅速,能够在一日之内,甚至一小时、一分钟之内传遍全世界。它还可以向地球以外传递信息。从纵向传递来说,它可以将知识、信息一年一年、一代一代不间断地传递下去。它可以不间断地接收、贮存新的知识、信息,不间断地更新知识、信息,从而使传递的知识、信息也不间断地更新。它贮存、传递的知识、信息的更新是自然的、迅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这些超凡的能力,是人体、人脑的能力无法达到的。

④ 文献保存了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文献在贮存知识、信息方面有优越性,所以它能很有效地保存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人类的文化遗产,从纵的方面看,各个时代的知识、信息,从横的方面看,各个学科的知识、信息,都可以由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下来。文化遗产的保存有多种形式,如实物的保存也是一种形式,但实物的保存总是有限的、有选择性的,而且不一定都能永久保存。文献保存形式,可以使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更多更好地保存下来,并且可以永久地保存。历史上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精神财富,很多就是依赖文献的记录、贮存,才流传至今。文化遗产的保存、积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⑤ 文献在人类社会的教育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文献贮存了知识、信息并在传递知识、信息方面有优越性,所以它在人类社会的教育中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人类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都离不开文献。人的思想品德、情操、世界观等方面的精神教育,离不开文献。人的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文化教育,离不开文献。人认识宇宙、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等,离不开文献。人成为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社会的杰出人物,对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社会作出或多或少的贡献,离不开文献。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科学家要创造发明,工人要创造生产奇迹,农民要获丰收,商人要发财,军人要掌握一流的军事技术,乃至警察破案、司机开车、厨师炒菜、裁缝制衣……不经过文献的学习、教育,都是不行的。任何人,只要努力,都可以从文献中获得各类各科知识、信息,都可以通过文献享受一辈子教育。同时,人类的教育普及自然也离不开文献。而教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⑥文献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劳动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文献贮存、传递知识、信息,文献中的一部分有各种科学价值、学术价值。人们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践的劳动中,可以在文献中获得需要的知识、信息、经验、真理,从而使人们在劳动中克服情报障碍,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多创造社会需要的成果,多创造使用价值。图纸、经验等在工人生产中有重要的作用。定理、公式、数据、信息等在科学家的研究中有重要的作用。档案、史料、史书、谱牒、日记等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有重要的作用。商品的原料、产地、厂家、价格、性能、质量、说明书在商业工作者的工作中有重要的作用。医学文献、药品文献、病历档案等在医生的工作中有重要作用。人类社会的各种劳动、实践也离不开文献。

⑦文献有凭证作用。人脑记忆会有误差,甚至失真,而文献记录则能较好保持原貌,所以能有征信的作用。所谓“口说无凭,有字为证”,就是文献征信作用的说明。合同,是经贸活动、社会交往、人际交往必不可少的凭证。票据,是买卖双方等多种场合中必不可少的凭证。诉讼、断案,既需要查证原告、被告的证据,也需要查考法律条文。发明权、专利权的申报、判定,必须据文献记录、发表的先后。研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重要的资料是档案,是原始记录,是照片等。文献的凭证作用,在人类社会中有多种多样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需利用这种功能。

⑧文献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乐趣,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活跃愉快。当文献带给人们知识、信息,带给人们收获、成功时,也就带给了人们快乐。此外,人们必不可少的娱乐生活也离不开文献。文艺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唱片、录音、录像、电影等等,这些文献成为人们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喜欢集邮,有人收集火花;有人嗜好集报,有人收藏各种报刊的创刊号;有人热衷于玩电子游戏机,有人忘形于卡拉OK……这些都有文献在发挥作用。文献不仅可以直接为人们的娱乐活动服务,而且还能对人们的娱乐活动有更重要的作用,即它能提供给人们进行娱乐活动的正确的方法、经验教训、各方面的知识。

⑨文献是劳动的产物,凝结着人类各种劳动,它有价值和使用价

值,它可以交换,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图书凝结着作者的劳动。图画凝结着画家的劳动。录音带、录像带、电影片等等凝结着演员和制作者的劳动。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凝结着记者、编辑的劳动。情报、信息,凝结着生产者、收集者、贮存者的劳动……这些都是有价值,有使用价值的,都可以转化为商品,都可以创造物质财富。文献生产不仅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文献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不仅能给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也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文献的价值和功能是多方面的,以上列举的是主要的几个方面,此外在引导舆论、公关交际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应该指出,文献对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只是一方面的作用,是主要的方面,同时文献也有另一方面的、次要的、消极的作用。文献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光明面、积极面,也记录了它的黑暗面、消极面。那些反映社会黑暗面、消极面的文献,比如那些宣传淫秽、邪恶、荒诞的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电影片等等,就会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反面的影响;比如颠倒是非的、错误的舆论导向,就会给社会造成损失、危害,带来混乱、动乱。一些犯罪分子,正是从那些黑暗的文献中获得“黑暗”的“教育”,学习犯罪的“经验教训”。文献一般是人为的、是人加工而成的,并且可以再次、以至不断加工,因此,别有用心的人可以制作假文献,可以篡改已经形成的真文献,而虚假文献的形成、传递,对人类社会的影晌也是消极的、有害的。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使得文献的消极作用不可避免。不可避免不等于不能控制。对于文献的消极作用,首先要引起警惕;其次要设法加以控制,把有害文献的传递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第三要努力将文献的消极作用向积极作用转化。

二、文献学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及文献工作一般理论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文献的构成、本质、类型等;研究文献产生、发展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研究文献的搜集、贮存、整理、加工、管理、编排、编纂出版等的方法及其规律,从而指导文献的生产、加工、利用,使文献更好地为人类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研究服务。

1. 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

①文献的一般理论。如什么是文献；文献的本质是什么，文献的结构如何、有哪些特点；文献有哪些价值和功能；文献有哪些类型等等。文献与信息知识的关系如何，文献与史料的关系如何，文献与资料的关系如何，文献与图书的关系如何，文献与档案的关系如何，文献与情报的关系如何。文献老化及其规律、周期。文献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等。

②文献的载体。文献直接载体的类型、特点；文献间接载体的类型、特点。文献各类载体的功用及相互关系。文献载体的优化、完善。信息、知识与各类载体的关系。不同学科内容的文献与各类载体的关系等等。

③文献产生、积累、发展的过程及其历史。文献理论认识的发展历史。文献载体的发展历史。文献分类的发展历史。文献流通、加工、利用的发展历史。文献产业发展史。文献学发展史。在历史的研究中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探讨其规律。

④文献生产、搜集、贮存、管理、整理、加工、编纂、编排、出版、流通、传播、利用、增值宣传报道的方法、技术、理论。文献工作的基本原则、理论。文献工作的运行机制、模式、发展规律。文献资源①、文献产业的开发、建设及其统一化、控制化。文献工作的标准化、现代化②。文献工作的现状。文献工作的未来。文献工作的经验教训，方针政策，以及法规建设、制度建设等等。

⑤国内外文献理论的比较研究。国内外文献工作的比较研究，文献工作经验教训的比较研究。国内外文献学研究的比较研究等等。国内外文献学著作的研究、宣传、批评。

⑥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文献学与文献信息学。文献学与信

① 我国文献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可参见肖自力等《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载《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文献工作现代化的内容主要有文献工作计算机化、文献工作网络化、文献存贮高密度化、文献工作视听化等等。

息学。文献学与档案学。文献学与史料学。文献学与目录学。文献学与版本学。文献学与校勘学。文献学与情报学。文献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与图书发行管理学。文献学与文书学。文献学与编辑学。文献学与出版学。文献学与信息符号学。文献学与文字学。文献学与训诂学。文献学与音韵学等等。此外还有,文献学与文献分类学,文献学与文献计量学,文献学与文献编纂学,文献学与文献保护学,文献学与文献检索学,文献学与文献采访学,文献学与文献服务学,文献学与文献系统管理学,文献学与文献机构建筑学等等,及文献学与社会学、文献学与经济学、文献学与教育学、文献学与人才学等等。

⑦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比较方法与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调查方法与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数学方法、计量方法、统计方法与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社会学方法与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等等。

⑧文献工作者、文献学研究者的素养。文献工作者、文献学研究者应有的知识结构及其优化。文献工作者、文献学研究者的人才培养。文献学人才的层次和结构。文献学教育体制。文献学教学、培训队伍和教材建设。

2. 文献学的研究目的、任务

①阐明文献的一般理论,揭示文献的一般结构、特点、本质、类型、功能,揭示文献的价值,使人们对文献有较全面、准确的认识,对文献有足够的重视,从而重视文献的开发、利用,让文献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②阐明文献工作的一般理论。阐明文献运动的规律。指导文献工作按照文献运动的规律,向标准化、系统化、现代化发展,使文献工作的各个环节不断优化。指导文献工作向产业化发展。指导文献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使文献产业、文献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③阐明文献学的一般理论。阐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指导文献学的建设、发展。阐明文献工作者、文献学研究者素养、责任,指导文献、

文献学人才的培养、队伍建设,推动文献学的最基本建设。

④阐明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与各相关学科关系的一般理论。指导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吸取各相关学科中合理的、有用的理论、方法,取长补短,推动文献学的发展,把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建立在更高的层次上,让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也能为相关各学科服务,带动它们的发展。

⑤研究、阐明改革开放时代对文献工作、文献学的要求。总结新时代国内外文献工作的经验教训、文献学研究的得失。指导、推动文献工作、文献学研究的改革,加快改革,不断改革,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

⑥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献和文献学,扬弃各种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体系、理论、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先进的文献学体系、理论、方法。

3. 文献学研究的方法

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文献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从客观存在、客观现状出发,详尽地占有客观对象的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辩证的研究。把探讨客观规律作为首要的任务,把总结实践经验教训作为重要目的,不应从先验的理论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从一成不变的模式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也是科学的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只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去做,才能使文献学研究按照科学的轨道前进,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能建立科学的体系。反之,用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指导研究,那就不会得出科学的结论,不会形成科学的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论,它可以指导,可以改造一些具体的方法。它也可以和一些具体的方法结合起来、糅合起来,在研究中运用。它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不断扬弃、吸收各种各样的新方法,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使这一哲学层次的方法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发展,发挥普遍的指导作用。

②中国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文献的制作、收藏、整理、研究领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文献、文献学的研究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传统的方法中有不少是值得继承发扬光大的,而且有些是今天仍在使用的。比如校勘方法、版本研究方法,这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手写型、印刷型文献的基本方法。古代学者研究版本,强调多看版本实物,多研究版本自身的特点(纸张、墨色、字体、版式、装帧等),多注意各家的著录等,这在今天仍是可以用到的。古代学者校勘文献,强调谨慎,并总结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一套基本方法,这在今天也是可以用到的。今天整理、研究手写型、印刷型文献,应该继续运用传统的版本研究方法、校勘方法,并要加以改造、改进,更好为今天的文献研究服务。再如考证方法、辨伪方法,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在文献研究中必用的方法,强调言必有据,追根寻源;强调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等方面去查考是否符合事实。这在今天的文献研究中仍是可以用到,可以改造、改进的。辑佚方法,也是中国古代学者文献研究的常用方法。这种方法在今天研究革命历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仍是必须的,因为战争年代这些文献的散佚、被毁是很多的,需要通过辑佚的方法,把它们一点一滴重新搜集起来。总之,中国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要开发,要发扬。一方面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发展文献、文献学研究。

③西方新颖的、先进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西方研究文献的传统方法,如实证方法,在今天仍有某些价值。当今西方最盛行的文献研究方法已发展到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是用电子计算机贮存、研究文献、管理文献。这些方法都是20世纪中期开始发展、推广的,并推动了机读型文献的产生、发展。系统论方法有一整套具体方法,而其中的基本方法之一是系统方法。系统方法要求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对事物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考察、研究,找出该事物的系统模式。信息论方法,主要就是信息的产生、获取、变换、传输、贮存、处理、显示、识别、利用的方法。控制论的方法,就是探讨控制规律、理论的方法,并以自动控制、最优效果为目标。这“三论”以文献的电子计算机化为条件,又为文献的电子计算机化奠定理论基础。这些方法是使文

献的管理研究系统化、标准化、现代化的较先进的方法,有效率高很多优越性。但这些方法是有人为色彩,模式确立,程序编制,与人的理论认识是密切相连的。如果理论认识正确,那么模式、程序就有了较好的基础,反之,模式、程序就不一定正确。而人的理论认识是受哲学思维,即哲学方法论制约的。所以,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这些方法,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这些方法结合起来运用,才能真正体现出科学性、优越性。不断吸收新产生的先进的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来改造它、完善它,这样,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就能不断丰富、发展。

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吸收中国传统和西方先进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掌握这个基本原则,一些具体的方法怎么认识、怎么运用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节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

一、历史文献

1. 历史文献概念

什么是历史文献?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一般指历史典籍,即“有历史意义的比较主要的书面材料”。按照当代文献的概念,那么历史文献的定义应是:记录有历史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这样历史文献就不只是局限于书面文献,不只局限于手写型、印刷型的文献,也包括了缩微型文献、机读型文献、视听型文献。

“历史”这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历史文献”这个概念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历史知识”,指有关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知识,也可以说是有关一切事物的知识,包罗宇宙万象。“历史文献”,也包罗宇宙万象,于是就和“文献”的范围差不多了,因为所有的知识、信息及其记录的载体,都可以对其进行历史的研究,都可以成为“历史文献”。这种广义的“历史文献”概念,通常是不用的。通常用的“历史文献”概念是狭义的。狭义的“历史”,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即社会史。“历史知识”

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知识，“历史文献”指记录社会史知识的一切载体。也就是说，“历史文献”一般是历史学这一学科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资料。当然“社会史”的范围仍然是很广泛的，它可以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生活史、教育史、文化史，也可以包括科技史、医史等。不过“社会史”的范围毕竟是和“自然史”有区别的，社会史可以包括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但不包括自然史。具体说，它可以包括人类观测天文的历史，但不包括天体本身的发展史；它可以包括人类征服江海的历史，但不包括江海本身形成的历史。这样，狭义的“历史文献”与广义的“历史文献”就区别开来了，“历史文献”与“文献”也区别开来了。“历史文献”成为“文献”中的一个“局部”、一部分，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资料。

历史文献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对象和资料，不是全部。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其基本依据是历史资料，简称“史料”。史料主要有四种类型：①文字史料，包括印刷型的、手写型的。载体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纸、帛、竹、木、金、石等等。②实物史料，包括遗址、遗迹、各种器物等等。③口碑史料，指通过当事人的口，通过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史料。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都有口碑史料的性质。访问当事人或其后代、同事，实地调查等，可以得到很多口碑史料。四是形象型、视听型史料，包括照片、录像、纪录片、唱片、录音带等等。这里面的实物史料，如果拍成照片、纪录片、就转化成了形象型、视听型史料。口碑史料，如果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印刷出来，就转化成了文字史料。在以上的四类史料中，文字史料、形象型、视听型史料是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而实物史料、口碑史料不是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所以，历史文献只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资料，历史学研究的资料除历史文献以外，还有其他更多的资料。

历史文献是文献中的一部分，是史料中的一部分，其内容、其范围虽较文献、史料小，但其涉及的内容、范围仍然广阔。历史文献涉及到中国历史的内容，也涉及到世界历史的内容，而且包罗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历史文献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仅中国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历史文献，就森如烟海，

计不胜数,更不用说世界历史文献了。而且,历史文献与文献一样,每日每时都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被发现。

2. 历史文献性质

历史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是人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践中的产物,是人们的劳动创造,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凝结、物化。但历史文献的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比其他文献更强,因为它是直接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时代,它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直接的反映。历史文献的政治性也较其他文献更强,不仅大部分的历史文献记录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及其相关内容,而且文献的政治性更鲜明、更突出。历史文献比较集中地记录和反映人类社会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就中国历史文献而言,它主要记录、反映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更替,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各方面情况等等。再就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文献来说,它主要记录、反映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诞生、共产党诞生,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覆灭。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斗争,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国内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主张和实践,世界各国各党各派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实践……以上这些文献的政治性、阶级性显然是十分鲜明、突出的。而这些文献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文献的最重要、最主要的部分。

历史文献的政治性、阶级性是强烈的,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有政治性、阶级性。历史文献记录、反映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但阶级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有阶级性。比如人们的科学技术成果,是没有阶级性的,可以被各个国家、各个阶级采用。再比如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规律、经济关系、管理方法等等,有些也是没有阶级性、政治性的,对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各个阶级都是适用的。不过这些

没有阶级性、政治性的历史文献相对于有阶级性、政治性的历史文献来说,比重是小的。

3. 历史文献类型

历史文献的类型,有以下几种主要分法:

①按文献载体形式划分类型,可以分为印刷型文献和非印刷型文献(详前)。

②按历史学科的分类划分,可以分为世界历史文献,中国历史文献。世界历史文献,又可以按国别、历史阶段分类。中国历史文献则按历史阶段分类,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等。其中还可以按小的历史阶段分类,按历史事件分类,按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生活等分类。详细的分类可参见《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③按文献的加工程度、层次划分,可以分为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一些原始记录,可视为零次历史文献。一些首次公开发表的历史文献,可视为一次历史文献。在一次历史文献上加工的,可视为二次历史文献。在一次、二次历史文献上加工的,可视为三次历史文献(详前)。

以上三种历史文献类型的分类,是参照一般文献类型的分类进行的,是与一般文献类型分类相同的。而历史文献还有一种特殊的分类,对于历史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是按照对史料的加工程度来分类。在历史研究中,把史料分成:原始史料、传抄史料、撰述史料、文艺史料。历史文献是史料的一部分,也可以按这四种类型来分。第一,原始史料类历史文献,可以包括原始记录,手写型历史文献、零次历史文献等。这一类历史文献没有经后人加工改造,往往是片断的,是直接的历史记录,离历史现象的真实最近,是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资料、依据。第二,传抄史料类历史文献,主要指原始史料汇编,即通常说的资料汇编。从中国历史文献来说,中国古代、近代的类书、史钞、文编等就是属于传抄类历史文献。这一类历史文献是“传抄”原始史料类历史文献而成,这种传抄即使是依样画葫芦,也会有误差(如抄误、刊误等),有失真之处,而且传抄者有时作了筛选、加工、剪辑。这一类历史文献,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但研究这一类历史文献时,首先要研究它是否失真,是

否全面,即是否还能反映历史现象的真实,是否还能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这一类历史文献虽然与原始史料类历史文献有一定的距离,但它在保存原始史料类历史文献方面是有重要作用的。比如,中国古代的一些类书流传下来了,而类书中收入的一些文献的原本却失传了。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就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清朝人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佚的古书 385 种,4926 卷。汉刘珍等纂的《东观汉记》24 卷,元郝经纂的《续后汉书》90 卷等已佚的书,就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这表明传抄史料类历史文献的价值是不能低估的。当原始史料亡佚,而传抄史料留存时,传抄史料的价值就高起来了。传抄史料类历史文献一般属于一次文献,它可以是印刷型的,也可以是缩微型的、机读型的。第三,撰述史料类历史文献,是指根据原始史料、传抄史料等编写成的历史著作。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撰述史料类历史文献,《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都是这一类历史文献。《史记》是根据《尚书》、《国语》、《左传》及汉代的官方藏书、档案等编写成的,是一部历史著作,不是史料汇编,但《史记》又成为后人研究先秦、秦汉历史的史料。《史记》中保存的先秦、秦、汉初的一些史料、档案、文献等,有不少在汉以后就失传了。所以《史记》既是历史著作,又有史料价值。这是撰述史料类历史文献的一般特点。如果传抄类史料已对原始史料有所筛选、加工,那么撰述类史料对原始史料的筛选、加工就更多了。历史著作中,会引用一些原始史料,这种引用总是有选择的,不可能整本书都引、整篇文献都引,有时只引一段,有时只引一句。有时不直接引用原始史料的原文,而用作者自己的语言,将原始史料的内容表述出来。《史记》中有很多地方,就是司马迁用自己的语言来概括、表述他见到的一些先秦文献、汉代档案等,而没有注明这条资料出自哪里,哪件事的根据是什么。经过作者选择的史料、重新表述的史料,可能不失原始史料的真面貌,也可能失去原始史料的真面貌,是否能反映历史现象的真实、历史本质的真实,就要看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否科学了。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那么他加工原始史料而成的撰述著作就可能不失原始史料的真面貌,可能反映历史现象和本质的真实。如果立场、观点、方法比较科学,那就比较能反映历史现象、本质的

真实。如果立场、观点、方法不科学,那么就会失去原始史料的真面貌,就会歪曲历史现象、本质的真实。撰述史料已较传抄史料复杂得多,它已加进了撰述者的主观意志。研究撰述史料,必须考察撰述者的立场、观点、方法,考察他如何加工、改造原始史料的,为什么要如此加工、改造。撰述史料类历史文献与传抄史料类历史文献一样也有保存原始史料的功用,同时它的一个最主要的长处就是赋予了史料以理性的认识 and 解释。原始史料、传抄史料,只能反映一件事或几件事,至多只能反映一个或几个朝代的某几个方面,所反映的事往往也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而撰述史料,则把孤立的、互不联系的原始史料、传抄史料联系起来,用某种理论体系驾驭这些史料,从而对整个社会、整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给予多方面的以至较全面的反映和表述。撰述可将原始史料的前因后果、里里外外都进行说明,还可以把这一原始史料与那一原始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于是原始史料的真正面貌才被揭示出来,才被清楚地认识。撰述还可以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分析、研究,抽象出对历史的规律性的认识,对历史的本质认识。撰述史料从认识历史的程度来说是高层次的、纳入了理论体系的、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史料。撰述史料类历史文献,一般是一次文献,也会有零次文献,即印刷型的、手写型的。第四,文艺史料类历史文献,指经过艺术加工的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如反映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小说、诗歌、绘画、电影、电视剧等。这些文艺作品取材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但又高于现实生活、历史生活。这些文艺作品反映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依据的是原始史料、传抄史料及撰述史料,但又有所发挥、夸张甚至虚构。可以把很多人的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可以把很多地方的事集中到一个地方,可以张冠李戴,可以秦事楚地。就如鲁迅谈他怎么写小说时说的: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说明文艺作品中的人和事已距离历史中的真人真事很远了,它不是历史地再现真人真事,而是艺术地再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已与《三国志》(撰述史料)中的刘备、关羽、张飞不同,原因就在这里。文艺作品一般不反映历史现象的真实,但可以反映

历史本质的真实。比如《三国演义》，对于东汉、三国历史的大概线索的反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再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它不是指唐朝某时某地的现象，而是揭示了整个唐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揭示了封建社会剥削、压迫的本质。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文艺作品中了解历史生活也是可以的，不过从文艺作品中了解的历史生活，是带有普遍性的一般的历史生活，而不是某时某地某人的特殊的历史生活。比如《诗经》被誉为史诗，可以从中了解先秦的某些一般的社会生活。杜甫的诗也被誉为史诗，可以从中了解唐代的某些社会生活。又如从唐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可以了解唐宋时代的社会生活，从《红楼梦》中可以了解清初的社会生活，从吴趼人的小说中可以了解清末的社会生活。恩格斯曾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这实际上也是说明文艺作品能反映一些社会生活，可以从中了解社会生活。文艺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文艺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参考的价值，只能用于对历史作某些宏观的、理论的说明，而不能用来作为考证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的资料依据。所以有的学者把文艺史料称为“间接的历史文献”，与原始史料等直接历史文献相区别。文艺史料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原始史料、传抄史料、撰述史料。总的来说，文艺史料类历史文献，在历史研究中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价值是有限的，是不能随意使用的。这一类历史文献一般是一次文献，也会有零次文献，可以是印刷型的，也可以是手写型的。

按照对史料的加工程度，把历史文献分成原始史料类、传抄史料类、撰述史料类、文艺史料类，这种分类方法，是历史文献的特殊分类方法，是其他文献，如自然科学文献，不采用的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方法，对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有了初步的评价，对历史研究的重点、步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4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体例、体系等有了初步的规定,对历史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4. 历史文献特点

历史文献特点与其他文献的特点基本上是不同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来说,一些特点更突出。

①历史文献较其他文献的主观性更强。历史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产物。没有客观世界、客观社会实践,历史文献不可能形成。没有中国便不可能有中国历史文献,没有清朝便不可能有清朝历史文献,没有鸦片战争便不可能有鸦片战争历史文献。同时,历史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都是通过人们的观察、思考、加工、记录,才形成的。没有人的主观努力,历史文献也不可能形成。就主观色彩而言,历史文献较其他文献,如自然科学文献,更浓更强烈。因为:第一,历史文献源头的客观世界是人类社会,包括人的主体在内,包括人的主观世界在内。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文献,可以是该事件的当事人制作的。而自然科学文献的源头客观世界是自然界,可以不包括人的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大到宇宙星球,小到微生物、细菌,可以和人毫无关系。第二,历史文献的制作手段,以人工为主为基础。手写型文献、印刷型文献是历史文献的主要部分。录音、录像也必须依靠人工、人力。而自然科学文献的制作手段,人工的成分已越来越少,因为很多工作已是人工、人力无法做的。如观察星球、细菌,肉眼已无能为力,如声波、光波、光谱的分析、记录,人工已无能为力,只能依靠科学仪器观察、记录。第三,历史文献的内容,少不了主观因素。历史文献的内容是描述历史,所以内容如何,往往取决于制作者的主观认识、主观意愿。同一历史事件,一百个记录者会产生一百种不同的记录,因为他们观察事件的角度、立场、观点、方法、思想感情是不会相同的,他们遣词造句、构思、表述也不会相同。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一百个研究者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结论,甚至同一个研究者研究同一历史事件,会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同、政治形势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自然科学文献的内容是记录信息、知识,如有的科学文献记录的就是数据、公式,而且是依靠科学仪器来记录,主观性较少。观察同一事物,进行同一科学实验,一百个记录者,一般都会产生基本相同的记录,不会产生一百种不同的记录。即使

观察的时间、地点、角度、环境不同,即使观察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不同,而记录的内容还是基本相同的。比如月球的运行轨道,古代、当代的科学家,中国、外国的科学家,各党各派的科学家,无论何时何地用何种手段观察、得出的结论都是大致相同的。这么一比较,就很清楚了,历史文献较自然科学文献的主观性大得多。

②历史文献较其他文献的可加工性更强。第一,历史文献的主观性更强,这自然决定了历史文献的可加工性更强。手写型加工成印刷型,印刷型加工成机读型;一次文献加工成二次文献,加工成三次文献,这是历史文献与其他文献相同的。原始史料加工成传抄史料,加工成撰述史料,其他文献也可以有相类似的加工。而原始史料、传抄史料、撰述史料加工成文艺史料,其他文献,如自然科学文献,就很少能进行类似的加工。这是历史文献较其他文献可加工性更强的一点。第二,历史文献的制作手段、记录的内容,主观性较大,可加工性自然也大。如文字的删改,是可以随意进行的。而自然科学文献的制作手段、记录的内容,客观性较大,可加工性自然也就小。如光波、光谱用科学仪器分析,人为加工的可能性就小。因为历史文献的主观性、可加工性强,所以历史上历史文献的伪造、篡改的事是屡屡发生的。所以研究历史文献,辨别历史文献的真伪,向来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共识。

③可毁灭性大。任何文献都是可以毁灭的。历史文献毁灭以后,便不可复生,因为历史、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同时同地同样地重演的。而某些自然科学的文献,如科学实验的数据、结果,万一毁灭了,可以重新实验,重新获得相同的数据、结果,即自然科学的文献,有一部分是可以重新获得的。历史文献以孤本形式存在的不少,如个人的信件、日记,只要不发表,它就是以稿本、孤本的形式存在,一旦毁灭,不可复生。而且信件、日记等,一般由私人保存,个别的由档案馆保存,基本秘不发表,发表的只是极少数,制作者一般是不想发表的。而自然科学文献以稿本、孤本存在的不多,一般的科学家有发明创造,都想发表,以获得发明权、专利权,甚至可以冒杀头的危险发表自己的记录、研究成果,如哥白尼发表他的“日心说”那样。科学文献一发表,就不成为孤本,就不

易“毁灭”。如哥白尼虽死,他的《天体运行论》仍在世代流传下去。总的来说,历史文献的可毁灭性较自然科学文献大些。正因为如此,历史文献的保存特别受到重视,一般的档案馆主要保存的就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的散佚、毁灭,历来受到批评。如中国历史文献便有“十三厄”、“十四厄”之说。即秦始皇焚书,是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厄,先秦各国的历史记载基本被毁,只有《秦纪》保存下来。西汉末年,赤眉军与更始军攻入都城长安以后,互相攻伐,汉宫被毁,近200年积累的历史文献被毁,是中国历史文献第二次厄运。第三次厄运是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宫中文献散失殆尽。第四次厄运是西晋末年,汉刘聪攻入洛阳和长安,西晋亡,典籍荡覆。第五次厄运是西魏周师攻破南朝萧梁都城建康(今南京)、江陵,梁元帝命人将藏书全部焚毁。第六次厄运是隋末隋藏书被毁。第七次是唐“安史之乱”时唐藏书被毁。第八次是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藏书再次被毁,所谓“内府烧为锦绣灰。”第九次是北宋末年,金兵攻入开封,宫廷器物包括图书被劫掠一空。第十次是南宋末年元军攻入临安(杭州),南宋藏书被毁。第十一次是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在征集图书以后,乾隆帝下令将有损清朝统治的书一律禁毁。十余年间,前后禁毁书24次,毁书13862部,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第十二次是近代。太平天国灭亡后,太平天国的典籍大部被清廷禁毁。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永乐大典》副本一部分被劫掠,一部分被焚毁。第十三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中国图书馆损失2118座,图书损失在一千万册以上。第十四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大批大批的历史文献被毁。中国历史文献的“十四厄”所以被载于史,足见人们对历史文献损失之巨的痛惜,对历史文献的可毁灭性提出了严重警告。这样重视历史文献的保存,是自然科学文献不能相比的。

④时效性长。历史文献的时效性一般比自然科学文献的时效性长。因为自然科学领域知识更新的速度快,文献更新的速度也快。当新的文献取代旧的文献以后,旧的文献便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只有人们研究科学史时,才会去找那些陈年文献,而科学史的研究已属于历史研究了。历史文献中的原始史料文献、传抄史料文献,则时效性很

长。如某一社会的原始史料历史文献,在千百年以后研究这一社会时仍是必备的资料。秦朝的原始史料历史文献,在二千年以后的今天来研究秦朝,仍是第一手的资料、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一些原始史料的历史文献,往往会历年越久越珍贵,因为它越久越会成为孤本,越久越难得。原始史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永远不会“过时”的。历史文献中的撰述类文献,其中保存的史料不会“过时”,而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会因为有了新的史料发现、新的结论的产生而“过时”,而“老化”、变陈旧。历史文献中的撰述类文献,与自然科学中的撰述类文献一样,是容易老化的。但历史文献中的撰述类文献老化的速度一般比自然科学中的撰述类文献要慢一些。因为历史文献的撰述文献生产周期一般比自然科学撰述文献长一些,而知识更新的速度相对来说慢些。此外,历史文献除了有一个生产过程,还会有一个被发现的过程。数千年前的历史文献,今天发现,就会被当成“新史料”、“新文献”,亦可见其时效之长了。

⑤局限性大。历史文献的主观性强、可加工性强,自然它的局限性就大。任何文献都要受社会的局限,受人的局限,历史文献受社会、受人的局限就更大。历史文献要受社会形态的局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社会的历史文献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特点。而自然科学文献,有的可以不受社会形态的影响,不同社会的自然科学文献,可以有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特点。历史文献要受阶级的局限,不同阶级制作的历史文献会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特点。而自然科学文献,有的可以不受阶级的影响,不同阶级的自然科学文献,可以有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特点。对于历史文献进行社会形态的、经济形态的分析、阶级的分析是很重要的,而对自然科学文献,不一定要进行社会形态的、经济形态的、阶级的分析。历史文献还要受人的世界观影响,因为不同世界观的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是不同的,所作的记录、介绍、论述是不同的。历史文献还要受人的思想感情及性格脾气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因为人的思想感情及脾气、情绪等也会影响人对事、对人的看法,影响人作出的记录。而自然科学文献,有的可以不受人的世界观、思想感情等影响。所以对某些历史文献进行思想分析、心理分析,也是有必要的。

5. 历史文献价值、功能

①保存人类社会文化遗产。人们了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历史,主要得自于历史文献。人们了解中国各民族的状况、历史,了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状况、历史,也主要得自于历史文献。就是了解去年发生的事,了解昨天发生的事,也主要得自于历史文献。人们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过去,可以从历史遗迹、遗物中了解过去,但一个人能占有的时间、空间是极有限的,不可能占有所有的时间、空间,所以亲身经历的事、亲自考察过的地方总是有限的,了解的事总是有限的。了解过去、了解世界,主要通过历史文献。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为什么呢?因为历史文献将过去历史记录下来,保存起来。历史文献保存了人类社会文化遗产。所以人们能通过历史文献了解、继承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文化遗产。如果没有历史文献,很多文化遗产就要自然消失、失传。历史文献的毁灭,就是文化遗产的毁灭。(文献保存人类社会文化遗产的作用,前一节中已有所论述,可以参见)正因为文化遗产赖历史文献而保存,而传给后人,各国各民族都把历史文献看作是民族的生命,极为珍惜,以至认为历史文献的毁灭就等于民族的灭亡。

②历史文献是历史科学建设的基础,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献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劳动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历史文献在人们的历史研究中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要把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离开历史文献,就是一句空话。历史研究是人类的一项科学研究,是一种科学劳动,它开展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史料,没有史料就无法研究。如果凭空想象地进行研究,那就背离了科学,如果凭很少的史料或者一部分史料,而不是全部史料,进行研究,那也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而历史文献是史料中量最大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实物史料、口碑史料都可以转化为文献史料。历史文献包含了人们对历史的某些理论的、深层次的认识,这是实物史料无法比的。历史文献的内容广泛、应有尽有,时间、空间跨度大,这也是实物史料无法比的。历史研究要充分、详细地占有资料,首先就是要充分、详细、全面地占有历史文献资料,然后以历史文献为线索,去占有实物史料、口碑史料等。总之,历史

研究,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如各种科学技术史等的研究,如各国史、各民族史等的研究,没有历史文献就寸步难行。特别像思想史等学科的研究,基本的研究对象就是历史文献,离开了历史文献,根本无法研究,根本无法建立起一个学科。

③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文化遗产有很多组成部分,其中的精华是什么?是民族精神、历史传统、历史经验教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继承发扬民族精神、优良传统,推动社会前进。古人云: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这说出了历史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作用。历史文献的内容广泛,种类繁多,各科各类的历史文献,各代各段的历史文献,各事各人的历史文献……无论何种历史文献,无不包含着各科各类、各代各段、各事各人的历史经验教训。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做什么事,都可以从历史文献中获得某些历史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之,从而少走弯路。文献在人类社会教育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历史文献在人类社会教育中的作用,不只是提供了各种历史知识,不只是为文化教育服务,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历史经验教训、民族优良传统,为人们的思想品德情操、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服务,为治国强国的教育服务。比如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等,都是离不开历史文献的。从这一点来说,历史文献较其他文献有更特殊的价值和功用。可以说,历史文献哪怕是古老、陈旧的历史文献,都会有某些现实意义,都会有教育作用,因为里面或多或少包含着某些历史经验教训,包含着民族的优良传统。

④文献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发挥娱乐的功能。这一点,历史文献特别突出。历史文献可以加工成艺术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影视作品等。某些艺术作品,本身就具有文艺史料的价值,本身就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转化成各种艺术作品、各种艺术形式,其教育作用往往很大,因为历史文献中包含的民族精神、优良传统、经验教训,会借助艺术形式更典型更生动更通俗地表现出来。

⑤历史文献的凭证作用是较突出的。得出一个历史结论必须有证据,不仅要有本证,还要有旁证、他证。这些证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历史文献。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需要有历史文献作证据。国

与国之间的边界谈判等,需要有历史文献作证据。解决任何历史问题,都离不开历史文献的凭证作用。

⑥可以成为商品。历史文献和文献一样,包含着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作为商品买卖、交换。不仅印刷型的一次文献可以买卖,就是手写型的零次文献也可以买卖。比如有的手稿、档案,直接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有的则转化成缩微胶卷文献,再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有的则转化成印刷型文献,再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越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使用价值越高,商品价值也越高。

历史文献的价值、功能是多方面的,以上是较突出的几点。至于其他文献拥有的价值、功能,一般历史文献都有。历史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是人们生活、劳动不可缺少的精神和物质的东西,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历史文献资源应充分地开发,历史文献产业应充分地发展,使历史文献更多地造福于人类。

历史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而消极的作用也是存在的。那些记录、宣传历史黑暗面、消极面的历史文献,那些为历史上的反动力量歌功颂德的历史文献,那些宣传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的历史文献,一般来说,它们的直接作用是消极的,当然也可以设法将某些消极作用转化成积极作用。历史文献的伪造、篡改常常发生,这产生的是消极作用,但把历史文献的伪造、篡改揭露出来,进行批判、澄清,这产生的便是积极作用了。控制、转化历史文献的消极作用,是社会的责任,是每个正直的人的责任。

二、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一门专科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研究历史文献及历史文献工作一般理论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文献的构成、本质、类型、特点等。研究历史文献产生、发展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研究历史文献的搜集、贮存、整理、研究、加工、管理、编排、编纂、出版等的方法及其规律、经验教训,从而指导历史文献的生产、加工、利用,使历史文献更好地为人类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研究服务,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历史文献学本身也有很多分支,如中国历史文献学、世界历史文献学、美国历史文献学、英国历史文献学等;如政治历史文献学、经济历史文献学、军事历史文献学、文化历史文献学、思想历史文献学、教育历史文献学、科技历史文献学等;如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中国近代历史文献学、中国现代历史文献学等;如太平天国历史文献学、辛亥革命历史文献学、中共历史文献学、国民党历史文献学等等。足见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很多的,每一个分支学科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当然这些分支学科的层次是有区别的。如果文献学是一级学科,那么历史文献学是二级学科,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三级学科,中国近代历史文献学是四级学科,太平天国历史文献学是五级学科……

1.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

①历史文献的一般理论。如什么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的本质是什么,结构如何,有哪些特点,分哪些类型;历史文献有哪些价值和功能,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如何等等。历史文献与史料的关系如何,历史文献与档案的关系如何,历史文献与文献的关系如何等等。

②历史文献的载体。历史文献直接载体的类型、特点,历史文献间接载体的类型、特点。历史文献各类载体的功用及相互关系。历史文献载体的优化、完善。各国历史文献载体的比较研究。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文献载体的比较研究等等。

③历史文献产生、积累、发展的过程、历史。历史文献理论认识的发展史。历史文献载体的发展史。历史文献分类的发展史。历史文献传播流通、整理、研究、加工、利用的发展历史。历史文献产业发展史。历史文献学发展史。在历史文献诸方面、诸分支的历史研究中,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探讨其规律。

④历史文献生产、搜集、贮存、管理、整理、加工、研究、编纂、编排、流通、利用等的方法、技术、理论。历史文献工作的基本原则、理论。历史文献工作的运行机制、模式。历史文献资源、历史文献产业的开发、建设及其统一化、控制化。历史文献工作的标准化、现代化。历史文献工作的现状。历史文献工作的未来。历史文献工作的经验教训、方针

政策等等。

⑤国内外历史文献理论的比较研究。国内外历史文献工作的比较研究。国内外历史文献工作经验教训的比较研究。国内外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比较研究等等。国内外历史文献学著作的研究、宣传、批评。

⑥历史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文献学与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学。历史文献学与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档案学。历史文献学与目录学、史部目录学。历史文献学与版本学。历史文献学与校勘学。历史文献学与辑佚学。历史文献学与方志学。历史文献学与情报学、信息学。历史文献学与图书馆学。历史文献学与编辑学。历史文献学与出版学。历史文献学与金石学、甲骨学。历史文献学与文字学。历史文献学与训诂学。历史文献学与音韵学。历史文献学与文献分类学。历史文献学与文献计量学。历史文献学与文献编纂学。历史文献学与文献保护学。历史文献学与文献检索学。历史文献学与文献采访学。历史文献学与文献系统管理学。历史文献学与文献机构建筑学等等。

⑦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比较方法、调查方法与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数学方法、计量方法、统计方法与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与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研究。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论的继承、发展等等。

⑧历史文献工作者、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素养。历史文献研究者、工作者、历史文献学研究者应有的知识结构。历史文献研究者、工作者、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人才培养。历史文献研究者、工作者、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人才层次和结构。历史文献学教育体制。历史文献学教学、培训队伍和教材建设。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基本如上。历史文献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还有各自的特殊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研究对象、内容。

2.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目的、任务

①阐明历史文献的一般理论,揭示历史文献的一般结构、特点、本

质、类型、价值、功能,使人们对历史文献有较全面、较准确的认识,对历史文献有足够的重视,从而重视历史文献的开发、利用,让历史文献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②阐明历史文献工作的一般理论。阐明历史文献运动的规律。指导历史文献工作按照其内在规律,向标准化、系统化、现代化发展,使历史文献工作的各个环节不断优化。指导历史文献工作向产业化发展。指导历史文献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使历史文献工作、历史文献产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③阐明历史文献学的一般理论。阐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指导历史文献学的建设、发展。阐明历史文献研究者、工作者、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素养、责任,指导历史文献研究者、工作者、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指导、推动历史文献学研究及教学工作的基本建设。指导、推动历史文献工作研究及教学工作的基本建设。

④阐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的一般理论。指导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指导历史文献学吸取各相关学科中合理的、有用的理论、方法,取长补短,推动历史文献学的建设、发展,把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建立在更高的层次上。让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也能为各相关学科服务,带动、推动各相关学科的发展。

⑤研究、阐明改革开放时代对历史文献工作、历史文献学的要求。总结新时代国内外历史文献工作的经验教训、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得失。指导、推动历史文献工作、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改革,加快改革,不断改革,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

⑥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扬弃各种历史文献学、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各个学科的科学方法,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学的体系、理论、方法,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先进的历史文献学的体系、理论、方法。使历史文献学的体系、理论、方法不断发展。

3. 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然而,因为历史文献与自然科学文献的特点有所不同,所以历史文献学的

研究方法在某些方面也与自然科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某些方法对历史文献学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

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历史文献学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历史文献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要使历史文献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如何,与历史发展、历史阶段的关系如何,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系如何,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如何,与阶级、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与政治、政治斗争的关系如何,历史文献产生、发展的规律如何……要正确地回答、解决这些问题,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不行的。怎样对历史文献进行社会形态的分析,进行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分析,进行阶级分析,进行本质和现象的分析,也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哪些历史文献是积极的、进步的,哪些历史文献是消极的、反动的;如何发挥历史文献的积极作用,如何转化历史文献的消极作用,这也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以上这些都是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自然科学文献来说,以上这些问题并非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历史文献学是无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而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行。如果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些理论问题,那就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且其中的很多理论问题,历史唯心主义方法是反对进行研究的,是回避的。

在论述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时,谈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从客观存在出发,详尽地占有客观对象的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辩证的研究,而不是从先验的理论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从一成不变的模式出发。这个基本要求对于建立科学的历史文献学也是适用的。又谈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论,它可以指导、改造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可以和一些具体的方法结合起来、糅合起来,在研究中运用,可以不断地扬弃、吸收新方法,这一点对于历史文献学也是适用的。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中,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运用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扬弃一些旧方法,从而推动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推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总之,必须对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历史文献学才能成为科学,才能在科学的基础上建设、发展。

②中国传统的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方法要借鉴、改造、完善。中国传统的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比如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辨伪方法、校勘方法、训诂方法、辑佚方法、版本研究方法、目录学方法等等,是中国古代的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近代,“文献”与“历史文献”的概念、含义是一样的。中国传统的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方法,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改进,取得不少成绩,包含有一定的科学性,所以在今天的、现代的历史文献研究中仍值得借鉴,并可以改造之、完善之。在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中,仍需要考证历史文献的真伪,仍需要校勘、改正历史文献的讹误,仍需要对历史文献进行注释、解释,仍需要辑佚、编目、研究版本等等,因此传统的文献研究、整理、加工的方法,仍有参考、使用的价值。孔子主张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多闻阙疑”(《论语·为政》)。颜之推主张的“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诸如此类学术界的传统信条,在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中仍然是需要遵守的。很多具体方法、原则,今天也仍然是要遵守的。只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改造、完善中国传统的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的方法,仍能在现代的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研究中大放光彩。在文献学研究方法中也论述了中国传统方法,可以参见。

③引进、改造西方新颖、先进的方法。随着文献贮存、检索、管理的计算机化,一些新颖、先进的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在西方的文献研究中普遍使用。中国的自然科学文献检索、研究,也已开始采用西方的新方法,已建立了一些数据库,已与欧美一些国家联网。中国的历史文献检索、研究,还没有完全计算机化,还没有完全采用西方的一些新方法,只是在某些领域进行了一些尝试。中国今天的历史文献贮存整理、研究,采用了一些新的手段,如缩微、制作光盘、静电复印

等,但大量的工作仍然是手工劳动,效率不高,有些计量方面的研究,手工无法进行,只得搁置一边。这与西方历史文献检索、研究电子计算机化相比,显得落后。中国的历史文献学界,应该加快向电子计算机化发展。应该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改造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运用到历史文献的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中来,这不仅将使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焕然一新,也将使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研究别开生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关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的一些具体内容及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在论述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时已有论述,可以参见。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传统的和西方新颖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普遍可采用的方法,也是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普遍可采用的方法。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不断新陈代谢,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也不断更新,不断发展。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只有不断吸收本学科领域、他学科领域的一些新方法,吸取各学科领域的新方法,才能实现方法的更新,才能不断发展。方法的更新,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否则,方法的老化、退化,就是学科老化、退化的先兆。

◆ 第二章 中共党史文献和 中共党史文献学

第一节 中共党史文献

一、中共党史文献概念

“中共党史文献”的全称应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它是历史文献的一部分,更具体地说,它是中国历史文献,是中国现代、当代历史文献的一部分。什么是中共党史文献?按照当代文献的概念,中共党史文献的定义应是:记录有中共党史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这就是说中共党史文献不只是局限于书面资料,不只是局限于手写型、印刷型的文献,也包括了缩微型文献、机读型文献、视听型文献等。如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录音,中共会议、事件的实况录像、纪录影片及电影等,都是中共党史文献。

“记录有中共党史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从这个定义出发,中共党史文献的包容面是十分广泛的。从纵向来看,中国共产党虽然是1921年7月宣告成立的,但共产党的筹备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就成立了,而它的酝酿还更早一些。所以记录有中共党史知识和信息的文献,至少在1920年就产生了。如果说中共产生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如果说中共产生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那么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的文献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1917年。如果说中共产生的主观条件、组织上的基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产生,而这些知识分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是有个过程的,记录这些

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过程的文献,或者说记录中共早期领袖人物成长过程的文献,可以追溯到更早。比如毛泽东思想转变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1910年。陈独秀思想转变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他1901年留学日本。记录中共领袖人物思想转变、成长过程的文献,自然是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早期中共领袖人物至少有数十人,这方面的文献是很多的。一般来说,中共党史文献产生的上限,可定在20世纪初前后。那么它的下限呢?没有下限。因为党史还在发展,党的文献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都有上限、下限,有关的原始史料文献也有上限、下限。而中共党史的原始史料文献没有下限,中共党史文献的数量将要超过中国古代史文献、中国近代史文献,这是无疑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涉及到方方面面,那么记录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信息、知识的文献也就涉及到方方面面。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是在野党,一段时期还被国民党政府视为非法的,但中共实践活动的面已是很广泛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思想文化斗争、经济斗争以及外交斗争等等,中共都领导人民进行了,领导这些斗争及其他方面的斗争,是中共的日常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国家的一切行政工作,上至大政方针,下至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以至国土上的一草一木,都成为中共的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国内的各项战线、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个基层的工作,国际交往方面的各种工作,都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的,都是中共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而记录中共这些活动、这些工作的信息、知识的文献,都是中共党史文献。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共党史文献,已与中国当代历史文献包含的内容,涉及的面差不多了。这也不奇怪,中国当代史就是中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足见中共党史文献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了。

中共党史文献,决不能理解成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中共党史文献选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献选读”,这些课程中的“中共党史文献”,基本上只是中共的一些文件,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论著。不过这些课程的“文献”,指在党的历史上起指导作用的、影响特别大

的文献,而不是指普通的,比如反映基层党组织活动的一些文献。这些课程中的“文献”含义与文献学研究的“文献”含义,在内容和层次上都是有区别的。加之这些课程以“选读”命名,所以收集的“文献”数量并不多。实际上中共党史文献的数量是极多的,计不胜数。决不能将“中共党史文献学”要研究的“文献”,与“中共党史文献选读”等要研究的“文献”等同起来。“中共党史文献选读”研究的主要是中共重要文件、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论著,是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中共党史文献”中的很小一部分。“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是记录有党史知识、信息的所有文献。

中共党史文献虽然涉及的面很广,它还只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分对象和资料,而不是全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中共党史史料的一部分。中共党史史料主要有四种类型:1. 文字史料,包括手写型的、印刷型的。这种文字史料的载体主要是纸,不像中国古代的文字史料,载体类型较多,有金、石、木、竹甚至甲骨等。2. 实物史料,如遗址、遗迹、各种器物等等。这部分史料,因为党史离现实最近,且还在发展,所以比起中国古代的实物史料来,党史的实物史料要多得多。3. 口碑史料。这部分的史料,也因为党史离现实近,且还在发展,当事人、目击者、耳闻者大量存在,所以这方面的史料特别多。4. 形象型、视听型史料。这方面的史料,民主革命时期部分,照片是主要的,数量不少,而录音带、唱片、纪录电影片数量是极少的。录像片则没有。社会主义时期部分,照片仍是最多的,同时录音带、纪录电影片,数量也多起来,录像片也多起来。形象型的史料,中国古代的史料中只有画像,没有照片。视听型史料,中国古代的史料中是没有的。这表明,在很多方面,中国古代的史料是无法与中共党史的史料相比的。在以上四种类型的史料中,文字史料、形象型、视听型史料是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实物史料、口碑史料则不是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但中共党史中的实物史料,如遗址、遗迹、器物等等,有不少拍了照片,拍了电影、录像,即转化成形象型、视听型史料。中共党史中的口碑史料,不少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印刷出来,有的被录音,即转化成文字型、视听型史料。也就是说中共党史史料中的实物史料、口碑史料,它们在存在的同时,有不少已

转化为中共党史文献了。这么一来,中共党史文献在中共党史史料中的比重就大了,是中共党史史料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二、中共党史文献性质

中共党史文献的性质,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文献性质是相同的,在某些方面则有其特殊的地方。党史文献也是人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践中的产物,是人的劳动创造,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凝结、物化。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较强,这些方面党史文献与历史文献也是相同的。历史文献的政治性、阶级性较强,党史文献一般来说政治性、阶级性更强。此外,在历史文献中,可以说中共党史文献的革命性、现实性是很突出的。中共党史文献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产物,是现实斗争、现实历史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中共党史文献的很强烈的政治性、阶级性以及革命性、现实性。

1. 现实性强

①中共党史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较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更贴近现实,而且本身就是现实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各国的现代史,也是现实史,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以外的史,中共党史则是中国国内,在中国人周围发生、发展的史。中共党史是最贴近中国人现实的历史。比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最贴近中国人现实的历史,是还在发展的历史。这决定了中共党史文献是最贴近中国人现实的历史文献。

②中共党史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很多人还活着,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涌现。即使有些历史人物不在了,但他们的子女还在,他们的同事、同学、朋友、老师、学生等还在,他们的社会关系、社会影响还存在。比如中共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去世不到30年,他的社会关系、社会影响还存在。中共当代最杰出的领导人——邓小平,去世只有几年,他的思想理论,对中国当前的建设、今后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正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四化”建设。历史人物是

现实的,是最贴近现实的中国人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历史人物无法比拟的,是世界现代人物无法比拟的。记录中共历史人物活动信息、知识的文献,是中共党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历史人物的现实性,决定了中共党史文献的现实性。

③中共党史的见证人,即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见证人,很多人都活着,而且还在不断产生。中共党史的见证人,即中国广大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世界上党派人数最多的,中国的人民是世界上国家人口最多的。这些众多的人,不仅是中共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见证人,而且是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的见证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人很多,“文革”史的见证人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史的见证人很多,中国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史的见证人也不少,就是中国大革命史的见证人,“五四”运动的见证人,也仍有人在。历史见证人,是历史文献产生的源泉之一。众多的中共党史的见证人存在,决定了中共党史文献的数量将是巨大的,也决定了中共党史文献就在现实的人群中产生,并且是最贴近现实的中国人的。

④中共党史文献中记录的信息、知识对中国的现实有最直接的借鉴作用。历史文献中包含着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包含的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虽然对中国的现实仍有用,但毕竟是远了些。中国近代史文献中包含的中国近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现实有用,但也远了些。而中共党史文献中包含的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现实最贴近、最有用,很多就是现实的经验教训。比如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比如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比如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抗风险的经验教训等,就是现实的、最有用的经验教训。中共领导民主革命的一些经验教训,也是现实的、有用的。比如关于实事求是,关于独立自主,关于群众路线等,正是现实中极有用的。又如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正是当前国内、国际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必须借鉴的。总之,中共党史文献是今天中共领导人制定路线、政策、方针,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四化”建设,少走弯路,解决新问题,取得新成就,创造新经验

的重要依据之一。

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历史与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发展着的历史。“昨天”与“今天”比较,“昨天”是历史,“今天”是现实,“今天”与“明天”比较,“今天”将是历史,“明天”将是现实。“昨天”是“今天”变成的,“今天”也要变成“昨天”。“明天”是“今天”的发展,“明天”也要变成“今天”、“昨天”。可以说“昨天”、“今天”、“明天”都是“现实”。了解这一点,对中共党史文献的现实性,可以有更深的了解,可以懂得中共党史文献是“现实”的产物。“昨天”的党的实践活动,很快被文献记录,“今天”党的实践活动,很快被文献记录,文献记录着党的现实,记录着中国的现实。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可以作实地调查、考察。但偌大的中国,事事实地调查、考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文献中了解现实、国情,仍是需要的。调查报告、情况反映、群众来信、实况录像、纪录电影片……这些记录现实的中共党史文献,是了解中国现实和国情的重要资料。就是党的领导人到基层调查、考察,他总要作记录,总要写成调查报告,有的调查报告会印刷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传阅。就是说实地调查的结果,会以文献的形式反映出来,党的文献记录现实,这又是明证。了解国情、现实,对于今天的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了解离不开中共党史文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战略,必须从国情、现实出发,这也离不开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的现实性极为突出,它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革命性强

①中共党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记录,这决定了中共党史文献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在这基础上产生的人民解放战争文献,就有强烈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是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这就决定了中共党史文献的革命性,比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近代历史文献强,也比中国现代其他党派的历史文献强。

②中共党史中的杰出人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革命的人物。他们是中国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领导的党是中国最革命的党。这决定了记录中共党史中的历史人物活动的中共党史文献,比记录其他历史人物活动的中国历史文献的革命性要强。比如中国共产党的最杰出的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历史人物、其他革命家,都不能和他们相比。记录他们历史活动的文献,革命性自然比其他人物活动的文献强。

③中共党史文献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革命历程、革命事迹,可以向广大的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从而培养革命情操,树立革命理想,大长革命志气,大鼓革命干劲。中共党史文献可以宣传革命,批判反革命;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理论;可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小康战略目标,批判各种错误的倾向,总之,可以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革命的作用。

④中共党史文献记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现实的革命和建设有最直接的借鉴作用。这是中共党史文献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革命作用的又一个方面。(关于经验教训的借鉴,谈现实性时已谈到,可以参见)这方面的革命作用,也是其他历史文献无法相比的。

记录有中共信息、知识的文献都是中共党史文献,这种记录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人作的,也可以是其他人作的。民主革命时期,国民党政府也编写过、印刷过有关中共情况的文件、小册子、理论论著、文艺作品。这些文献,都是国民党政府站在反共反革命的立场上制作的,攻击、污蔑中共,歪曲中共的情况,篡改中共的历史。按照中共党史文献的定义,这些文献也可以作为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但这些文献的内容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他们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这些文献的性质与出自中共人士、革命人士之手的革命的中共党史文献是截然不同的。这些文献在中共党史文献中不占主导地位,只

是次要的、附属的。这些文献,可以进行分析批判,驳斥其中的错误、反动论调,从而使这些文献成为反面教材。这些反面教材在革命的宣传中也是需要的,可以在革命的宣传中,用它们来揭露反动派的罪恶用心、手段,揭露反动派的反革命行径。

因为中共党史文献的革命性、现实性很强,所以它的社会价值很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全中国人民的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它不仅受到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者的重视,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重视,也受到全中国人民的重视。另外,它还受到世界上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的重视,也受到求解放的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重视。

3. 政治性、阶级性更强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决定了中共党史文献的强烈的政治性、阶级性。历史文献的政治性、阶级性较其他文献强(见前),但历史文献中也有一部分文献是没有政治性、阶级性的(见前)。而中共党史文献,基本上都有阶级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并且采用了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文献,政治性、阶级性无疑是十分强烈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过去了,但阶级斗争仍存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仍有激烈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色彩。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也是有阶级斗争色彩的。当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逐渐消灭以后,中国大陆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斗争逐渐平息了,即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逐渐平息。但中国大陆阶级差别仍存在,如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就仍有差别,仍存在着矛盾,当然这种矛盾和斗争是非对抗性的。在中国大陆以外,如香港、台湾,剥削阶级仍然存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仍存在,这要影响到大陆的矛盾和斗争。从世界范围来看,剥削阶级仍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仍存在,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中国人民与世界剥削阶级的矛盾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这些矛盾和斗争也要影响到国内的矛盾和斗争。以上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

文献政治性、阶级性仍是十分强烈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港商、台商、外商到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其中一部分人把剥削阶级的经济剥削、压迫的手段也带了进来，引起劳资冲突，甚至很尖锐，这实际上有某些阶级斗争性质。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也随着经济的引进一起进来，这影响了一部分中国人，甚至是共产党员。有人变成了犯罪分子。这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人民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的产生，也决定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党史文献的政治性、阶级性仍是十分强烈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些工作看起来似乎没有阶级性、政治性，也不必去分“姓资姓社”，但政治色彩、阶级色彩，总免不了或多或少有一些。比如深圳建设很快，经济发展很快，口号是“把深圳建设成社会主义的香港”。所以强调“社会主义”，这就有政治色彩、阶级色彩。经济规律、管理方法，有些是没有政治性、阶级性的，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强调“社会主义”，这也是有政治色彩、阶级色彩的。研制原子弹，原子弹爆炸成功；研制火箭，送卫星上天……诸如此类的科学技术工作，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政治性、阶级性，但如果把这些工作看成是国家实力的象征，看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工作成绩的象征，看成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象征，那么这些工作就有政治色彩、阶级色彩了，这些工作的成功、失败，都会产生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再如文化教育，某些内容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如果把这些教育与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起来，看成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组成部分，这就有政治色彩、阶级色彩了。中国大陆的小学、中学、大学，某些教学内容与香港、台湾、日本、美国差不多，那么是否中国大陆的学校与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的学校就一样了呢？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大陆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内都设有共产党的组织，具体领导学校的各项工作，或者是进行原则上的领导，对校长的领导起监督、保证作用。这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学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和阶级色彩。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共党史文献基本上都有政治性、阶级性。

共产党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产物,只要阶级没有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从事的一切工作难免会有政治和阶级色彩,中共党史文献也总有政治和阶级的色彩。

三、中共党史文献类型

中共党史文献是历史文献中的一部分、一个分支。中共党史文献的类型与历史文献的类型是差不多的,有以下几种主要分法:

1. 按文献载体形式划分类型

可以分为印刷型文献和非印刷型文献。印刷型文献主要有图书、报纸、杂志等。非印刷型文献主要是手写型文献、缩微型文献、机读型文献、视听型文献。手写型文献主要有手稿、笔记、日记、书信、个人填写的表格、批语、批示、题字、题词、题诗、发言提纲、会议记录、文件起草稿、修改稿等等。缩微型文献,主要是缩微胶卷等。档案馆、图书馆将一些比较珍贵的党史文献制成缩微胶卷,或者为了保护原件,将原件制成缩微胶卷,供阅读,也供购买。机读型文献,主要是将党史文献输入电脑,由电脑来贮存处理,或制成光盘。视听型文献,主要有录音带、录像片、电影片等等。以上各类文献,机读型的党史文献,如《邓小平文选》光盘,如《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光盘等,目前还很少。缩微型党史文献目前有一些。视听型党史文献,目前有不少。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录音保存下来不少,中共领导人活动的录像片、电影片保存下来不少,中共“七大”以来的重要会议的电影片、录像片也保存下来不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重大事件、历次运动的电影片、录像片也保存下来不少。当然,中共党史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印刷型文献、手写型文献。这两类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档案。这是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中共党史文献。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个部门、各个系统、各个单位都产生、保存了大量的档案。如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档案,中共地方组织各部门的档案,党领导的军队、工会、妇联、青年团及其各部门的档案,中共领导人、地方领导人、著名社会活动家、作家、艺术家、理论工作者的档案等等。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方面。

其种类有会议记录、决议、宣言、报告、总结、通告、通知、告示、指示、命令、批示、批复、信函、电报、图片、录音、录像、电影片以及手稿等等。这些档案由中共中央档案馆及各地方档案馆保存。仅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已有二百多个全宗,近六十万卷,八百多万件。而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少档案,因为当时环境的原因,已散失、毁灭不少。这些档案文献,有一部分已陆续整理、编纂、出版,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等等。

此外,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档案,在大陆以外保存的档案中,也有不少有关中共党史的文献。如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是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档案,有1912年-1949年的档案八百多个全宗。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有一部分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些涉及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档案,是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这些旧政权的档案也在陆续被整理、编纂、出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过油印本《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等都已分册、分辑陆续正式出版。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档案馆,以及蒋介石的个人档案馆——“大溪档案”,陈诚的个人档案馆——“石叟文库”等等,也都有很多档案涉及中共的历史活动,特别是“石叟文库”中有不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及以前的中共各方面文件。这些台湾的档案,有一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供购买、收藏、阅读,也有一部分已整理、编纂、出版。

苏联保存的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有不少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保存的档案中,也有不少涉及中共活动的档案。这些外国档案、外文档案,有一部分也已整理、编纂、出版,有的已译成中文出版。如《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等。

②文件。这是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中共党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有的是作为档案保存的,成为档案的一部分,有的则印刷出来,或内部传阅,或公开发行。党的文件主要指党的纲领、章程、宣言、决议、

工作报告、计划、总结、指示等。也包括受党的委托,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报告、著作、文章以及信函等。其中中央及其各部门的文件是党的文件的主干,地方党及其各部门的文件,军队、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系统的文件,是党的文件的分支。这些文件的内容也很广泛,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方面,较集中地反映党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理论。这是中共党史文献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已陆续公开出版。民主革命时期编印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是在党内流传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两部党的文件集便公开出版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及其修订本也公开出版。社会主义时期的党的文件,有的已公开出版,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有的则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社会主义部分)”等名义内部出版发行。此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国工会历史文选》、《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等工会方面的党的文件已出版。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方面的党的文件有的也已出版。

③中共领导人及各方面活动家的文集。这是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中共党史文献。中共的领袖人物、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言论对党的活动、党的发展、党的成就影响很大,他们的实践活动,是党的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他们的生平、实践、思想,是研究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汇集他们思想言论的文集,也成为中共党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一些著作、文章,有的就是党的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其在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毛泽东的文集,就是中共党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文集除了《毛泽东选集》五卷外,还有《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论文艺》等。毛泽东是中共最著名的领导人,他的思想言论资料整理、编纂出版的最多。此外还有很多中共领导人的选集、文集出版,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彭湃、恽代英、张闻天、

董必武、瞿秋白、任弼时、李维汉、胡乔木、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还有《陈独秀文章选编》等等。江泽民《论科学技术》、《论“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等也已出版。此外,军事人物方面,刘伯承、彭德怀、陈赓、彭雪枫等人的文集也出版了。文化人物方面,郭沫若、艾思奇、何干之、李达、茅盾、范文澜、胡绳等人的文集也出版了。这些文集,不仅是研究这些人物的原始资料,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原始资料。

再有孙中山的文集,民主党派人物的文集,大陆也出版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涉及到中共的实践活动、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也可以作为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台湾出版了蒋介石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的文集,其中有一部分也涉及到中共的实践活动等,也是可以作为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的。研究这些文集资料,对于研究中共党史也是很必要的。

中共人物的文集一方面具有原始史料价值,另一方面有的也具有撰述史料价值,因为有些人物留下了研究党史的论著,有些人物的文集甚至主要就是研究党史的。如《邓中夏文集》收入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本来就是一本工运史专著,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史著作。如《胡华文集》,收入的文章除自传以外,都是研究党史的文章,有的是就具体的党史问题、人物进行研究,有的是就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等进行研究。诸如此类的文集,显然既具有原始史料价值,也具有撰述史料价值,可以进行分别的研究。

④报刊。即报纸、杂志,各种刊物。可以是公开出版物,也可以是非公开的出版物;可以是铅印的,也可以是油印的,或者手写的。中国共产党办的报刊,首先它是关于中共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中共党史文献。其次它的新闻报导及发表的各种文章,也真实地记录了党的各方面工作,记录了党的斗争历史,也是重要的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办的报刊,一般说是1921年7月以后的事,但1921年7月以前,一些中共的早期领袖人物就办了一些报刊,这些报刊是研究这些中共领袖人物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中共建党准备时期情况的重要资料。如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陈独

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创办的《觉悟》，瞿秋白创办的《新社会》，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等等。在1921年7月以前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创办了一些报刊，作为机关刊物。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15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广东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3日创办了《劳动者》周刊。这些报刊显然与中共建党有密切的联系，是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1921年7月，中共成立以后创办的主要报刊有：《向导》周报、《前锋》月刊、《政治生活》、《政治周报》、《布尔什维克》、《红旗》周刊、《红旗周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斗争》周刊、《解放》周刊、《群众》周刊、《新华日报》、《大众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等。以上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党组织办的一些报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求是》杂志等，各省市党组织也都有报纸、刊物。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军队系统办的报刊主要有：《工农兵》报、《右江日报》、《红军日报》、《红星》、《红军报》、《红星报》、《革命与战争》、《政治工作》、《红色战场》、《铁拳》、《火线》、《猛进报》、《战士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前线月刊》、《抗敌三日刊》、《战友报》、《抗敌报》、《子弟兵报》、《自卫报》、《学习》杂志、《华东前线报》、《前线生活》、《人民前线报》、《子弟兵报》、《前进》、《人民军队报》、《华北解放军报》等。以上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军队办的一些报刊。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军军委办有《解放军报》，各大军区、各兵种也都办有自己的报刊。

此外，中共的各部门、各地还创办了一些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等方面的报刊。如：《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中国工人》月刊、《工人日报》、《中国农民》月刊、《妇女声》、《妇女日报》、《中国妇女》旬刊、《中国妇女》杂志、《先驱》半月刊、《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等等。

除了中国共产党各部门办的报刊以外，一些非中共办的报纸，记录中共的各方面活动的情况也不少。如《申报》、《晨报》、《新闻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以及国民党系统办的报刊《中央日

报》、《扫荡报》、《大晚报》、《文化建设》、《文化先锋》、《三民主义半月刊》，还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办的报刊《益世报》、《字林西报》、《顺天时报》、《大美晚报》等。

世界各国的报刊报导中共情况的也有一些。特别是在前苏联出版的，由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等，记录有关中共的情况最多。

以上主要说报刊的一些原始史料价值。此外，有些报刊也刊登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有的报刊就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报刊，这些报刊也具有撰述史料价值。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史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大发展，中央办的有《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等，各省市的党史研究室、党校，也都各自办了杂志及报纸，如上海有《上海党史党建》、《党史信息报》、《党政论坛》等。上海有些区、县也办了杂志，如《闸北论坛》等。

⑤回忆录。这是既带有原始史料性质，又带有撰述史料性质的中共党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活动是众多的共产党员进行的，是与人民群众一起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广大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一起创造的。为党的事业做过工作，做过贡献的人，他们写下的为党工作的经历的回忆录，无疑是党史的重要文献。这方面的回忆录是很多的，有的已写出草稿，有的已经公开出版，也有的制成了录音带，有的编进了历史纪录片。从已经发表、出版的回忆录来看，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本人生平、经历的回忆。中共的一部分杰出领导人留下了自己的个人经历的回忆。如《西行漫记》中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即是毛泽东自述青少年时代至红军时代的经历，也以《毛泽东自传》行世。《彭德怀自述》，为“文革”期间彭德怀写的自传，对青少年时代至庐山会议均有记叙。其他已出版的著名中共人物的回忆录有：乌兰夫、王首道、叶飞、许世友、刘伯承、吴玉章、李维汉、何长工、肖华、肖劲光、杨成武、耿飚、聂荣臻、徐向前、杨得志、师哲、黄克诚、董必武、薄一波、粟裕、程子华、夏衍、阳翰笙、茅盾、胡乔木、胡风、侯外庐，等等。以上这些中共各方面人物的回忆录，不仅是研究这些人物的最重要的资料，也

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当然,很多中共杰出人物还没有留下自己的回忆录,有的虽然留下回忆录,也很简略不全。如毛泽东的回忆录只涉及前半生。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没有留下回忆录。一些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很早为革命牺牲,更来不及留下自己的回忆录,如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等等。这对党史文献来说,是无法弥补的大损失。

第二,回忆中共人物的集子、著作。很多中共杰出人物,有的是领导,有的是普通党员,受到广大干部、党员、人民群众的怀念,人们写下了回忆文章、回忆著作。这些回忆某一个中共人物的文章、集子、著作,是研究这个中共人物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如回忆毛泽东的集子、著作就有多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著)、《在毛主席身边》(翟作军著)、《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吴吉清著)、《在毛主席周围》(蒋秦峰著)、《警卫毛泽东纪事》(阎长林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著)、《跟随毛泽东纪事》(武象廷等)、《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王鹤滨著)、《毛泽东的晚年生活》(郭金荣著)、《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毛泽东——在陕北》(贺清华)等等。回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罗荣桓、贺龙、陈毅、彭德怀、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粟裕等很多中共各方面杰出领导人的集子、著作,也有很多都公开出版了。其他各界的人物,如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中共人物的回忆集子、著作,也出版了很多。一些普通的中共党员中的英雄人物,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向秀丽、张志新以及雷锋等等的回忆集子、著作也出版了不少。

第三,回忆历史事件的集子、著作。历史事件的内容很广,会议、运动、战斗、案件等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事件,中央及各部门、地方及各部门等等的事件都包括在内。当事人回忆事件的经过、结局的资料,显然是研究该事件的重要资料。这方面的回忆录出版了很多。如《五四运动回忆录》、《“一大”回忆录》、《二七回忆录》、《五卅运动回忆录》、《八一革命》、《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回忆中央苏

区》、《回顾长征》、《一二九回忆录》、《皖南事变回忆录》、《解放战争回忆录》、《平津战役回忆录》、《解放宁夏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回忆红七军》、《回忆红十四军》、《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新华日报的回忆》、《人民日报回忆录》、《新华社回忆录》、《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左联回忆录》……一般来说，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事件回忆录发表、出版的多，而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事件的回忆录发表、出版相对少些。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全国及各地方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等，所收人的事件和人物的回忆录，大都限于民主革命时期。当然，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事件的回忆录将会越来越多地发表、出版，这是无疑的。

以上诸种回忆录都是中共人士，或站在中共一边的群众撰写的，立场、观点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正面的中共党史文献。另外，有一些中共党员晚节不好，这些人写下的回忆录，立场、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人的回忆录，记叙他们在中共的经历，发表他们对中共的看法，甚至污蔑、攻击中共，这些可以作为中共党史文献的一部分，但这些都是反面的文献。如张国焘《我的回忆》、《张国焘夫人回忆录》、王明《中共五十年》、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等等。

此外，国民党政府人士的一些回忆录，其中涉及中共人物、中共活动的，也可以作为中共党史文献的一部分，其立场观点要分别研究分析。如《顾维钧回忆录》、《白崇禧回忆录》等。如《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光荣的抉择——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回忆录》等等。

民主党派人物的回忆录，有不少是涉及中共活动、中共人物的，而且不少是赞扬中共的，这些可以作为正面的中共党史文献。如《史良自述》、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张治中回忆录》、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程思远《政坛回忆》、臧克家《怀人集》、黄炎培《八十年来》等等。

来华的外国人，特别是与中共有接触的外国人，也有关于中共人

物、中共活动的回忆,也可以作为中共党史文献的一部分。其中的内容,其中的立场、观点需要分别研究、分析。

回忆录文献,史料价值是高的,但其史料价值受到人的局限。一是人的记忆会因为时间的推移产生误差,比如时间、地点、人物会记不清。二是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人对事观察的角度不同,所以会对人对事有不同的记叙。三是每个人的立场观点不同,对人对事的价值评价会不同。四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爱好,这也会造成对人对事的记叙、评价不同。回忆录文献要与档案文献、报刊文献结合起来研究运用才行。

⑥研究著作。这是撰述史料类的中共党史文献。这类文献有资料,也有某种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论著,在1921年已经产生了,如瞿秋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1921年6月),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6月10日)等。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5年底至1926年初),是中共党内较早的较有深度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已有一些成果出版,但很少,而社会主义时期,成果的出版就很多很多,这些成果,主要可分为通史型、专史型、阶段型、地域型、单位型、事件型、人物型等类。

第一,通史型著作,主要指对中共党史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的研究的著作,指纵向研究的“通”。如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等。这类著作、讲义、教材等,已有数百种之多。“中国现代史”类的著作,也与中共党史有某些相同的内容。如魏宏运等《中国现代史稿》等。这类著作、讲义、教材等已出版了数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著作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著作内容差不多。如朱建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陈明显等《新中国四十年研究》等。这类著作、讲义、教材,已有数十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类的著作,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著作内容差不多。如王学启等《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胡华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

义》、郭彬蔚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纲》等。这类著作、讲义、教材已有数十种。以上这些著作都对中共党史进行了多个历史阶段的总的研究,可谓“通古今之变”,都可以作为通史型撰述史料类的中共党史文献。此外,大陆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著作、国民党史研究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论述了国共关系史,涉及到了中共的历史活动,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共党史文献。如李新等《中华民国史》、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肖效钦等《中国国民党史》、宋春等《中国国民党史》等。这类的著作、讲义、教材,有数十种。

第二,专史型著作,主要指对中共党史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如胡之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林之达等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刘继增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史稿》、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刘继增等的《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刘子玉等《党的经济思想研究》、张静如等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曹润芳等《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魏明铎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史》、卢先福等《中国共产党建设80年》、王一帆等《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范平等《中国共产党党章研究》、殷浩然等《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等等,再如早期的蔡和森的《党的社会主义史》等,都是就中共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都是专史型的党史著作。还有吴传焯等《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费云东等《中共秘书工作简史》、程延文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七十年》、叶笃初《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等。中共党史的专题研究,范围是很广泛的,不只限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很多专史研究,都与中共党史有关,甚至就是中共党史的专史。比如人民解放军是中共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史的研究可以视为中共党史的一种专题研究。这方面的著作已出版很多。再如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史、农民运动史、妇女运动史、青年运动史(学生运动史)的研究也是中共党史的一种专题研究,这些方面的著作也都出版了一些。此外,中共从事的经济史、外交史、法制史、文化史、文学史、新闻出版史、教育史、科技史、体育史、卫生史等的研究,也是中共党史的一种专题研究,这些方面的著作也出版了一些。还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关系史的研究,也是中共党史的一种专题研究。如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孙武霞《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纲》等等。再如集体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也是中共党史的一种专题研究。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可以视为中共党史的一种专题研究,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其内容已十分广泛,分科已越来越多。如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及其发展史的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发展史的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及其发展史的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及其发展史的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此外,还有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毛泽东民族理论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毛泽东建国思想研究,毛泽东领导思想研究,毛泽东法律思想研究,毛泽东统战思想研究,毛泽东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毛泽东美学思想研究,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等等。这些方面都有著作出版。邓小平理论研究也有多种分类研究的著作出版。

专史型著作,就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来说比通史型著作广,有些方面是通史型的党史著作没有涉及的;就所研究的某一方面来说又比通史型著作深,因为通史型的著作对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只能作一般的研究,不可能都很深入。

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史型著作不仅专题很多很细,而且有些专史的研究,还有阶段型的、地域型的研究成果。

第三,阶段型著作,主要指对中共党史进行分阶段、分时期研究的著作,或者说是对其某一阶段、某一时期的党史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从大阶段分,可以分为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从小阶段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又可以各分成几个阶段。比如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或者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解放战争时期,或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文化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以上各时期、各阶段的党史,都有专门的研究著作出版。除了以上这些涉及某一阶段中共各方面情况的阶段型著作外,党史的各类专史研究,也有很多阶段型的著作。如工运史方面,军史方面,统战史方面,经济史方面,都有阶段型专著出版。此外,地方党史研究及地方党史专史研究中也有很多阶段型的著作出版。

阶段型的著作,就该阶段的研究来说,一般是较全面、较有深度的。可以对通史型的著作进行某些补充。

第四,地域型著作,或称区域型、地区型著作,主要指对某一地区的党史进行研究的著作,即地方党史研究的著作。地方党史的研究,80年代以来有长足的发展,各地的党史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在地方党史的研究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至2001年,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地方党史的民主革命时期部分已经出版,有的省市还出版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地方党史。还有很多地区、县也出版了地方党史。有的还出版了地方党史的专史型、阶段型的著作。

地方党史研究著作,就该地区的党史研究来说,是有深度的,对全国党史研究是极好的、极大的补充。还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各省市卷,实际上也是地方党史的研究著作。

第五,单位型著作,或称团体型著作,主要指对某一单位的党史进行研究的著作。随着地方党史机构的建立,很多单位也建立了党史机构,于是单位党史研究与地方党史研究一起发展起来,成果越来越多。单位也有不同的类型,有的层次高属大单位,有的层次低属小单位。如军队方面有红军各部队史、抗战时期各部队史、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史、新中国各兵种史等,甚至还有团史、连史出版。农村方面有合作社史、人民公社史、村史、乡史等出版。工业方面有很多厂史、公司史、港史。商业方面有很多店史。学校方面有很多校史出版。校史中有抗大史、人民大学史、各省党校史等出版。新闻出版方面有很多报社史、出版社史、书店史等出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提倡编写“三史”,即厂史、村史、家史。当

时出版了一些厂史、村史,也出版了一些家史。80年代以来,则主要围绕党的组织史资料征集、整理,编写、出版了一些各单位的党史。

此外,某些群众团体、某些群众组织,如新民学会、“左联”等等,也有一些研究著作出版。这些研究显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第六,事件型著作,主要指对党史上一些事件进行研究的著作。所谓“事件”,一是有大事件、小事件之别,二是事件的范围很广,一次会议、一个战役、一次战斗、一次游行、一次运动、一次罢工、一次请愿、一次事变、一次惨案、一次谈判、一场论战,乃至一种思潮产生、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发表等等,都可以成为一次事件。这就是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大大小小的事件是不计其数的,自然,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也很多。已经出版的运动、起义、战役、战斗、会议、事变、事件等著作有二百种左右。

第七,人物型著作,主要指对中共党史上的人物进行研究的著作。中国共产党从最早的数十人发展到现在的六千多万,人物很多,有的是杰出的领导人,有的是普通党员,有的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献身的模范人物、英雄人物,有的是犯错误的人,甚至是背叛党的叛徒。对于党史人物的研究,当然最多的是对党的杰出领导人的研究成果。比如对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已有数百种之多,主要分两大类:一是研究毛泽东生平的;二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的。此外中共的重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等的生平和思想研究成果都不少。近年来,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已有数套丛书出版。中共军事人物,如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粟裕以及叶挺、杨靖宇等等很多将领,都有研究成果出版。中共文化人物,郭沫若、茅盾、田汉、孙冶方、夏衍等等很多人物,都有研究成果出版。中共普通党员,如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张志新等等,也都有研究成果出版。那些叛离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的人,如陈公博、张国焘、王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版。

中共人物的研究著作是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中共人物以外的一些人物,有的也与中共活动有密切关系,他们的研究著作也有一些

是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如民主党派人物谭平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的研究著作,国民党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李宗仁、张学良、冯玉祥、傅作义等的研究著作,外国来华人物鲍罗廷、斯诺、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的研究著作,以及对斯大林、赫尔利、马歇尔、尼克松、田中角荣、胡志明、西哈努克等人的研究著作,以上这些人物研究著作,显然都会涉及到中共的活动,都有一部分属于中共党史文献。

第八,国民党政府、港台、海外的研究著作。以上列举的是中共学者、大陆学者研究中共党史的各种类型的著作,在此之外,1949年10月以前的国民党政府,1949年10月以后台湾、香港学者,以及二三十年代以来其他国家的学者,都有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也有以上各种类型,只是立场观点不尽相同,需要分别分析、研究。1949年10月以前的国民党政府及1949年10月以后台湾地方当局,以及他们的学者,撰写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立场观点都是反共的,对中共多污蔑、攻击之词。关于1949年10月以后台湾、香港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的情况,可参见郭铁钺主编的《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国外的研究著作,数十年来也很多,如张注洪等《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可见一斑。

⑦研究论文。这和研究著作一样是撰述史料类的中共党史文献。从数量来说,论文的数量是著作的几十倍、几百倍。从内容的类型来看,与著作差不多,也可以分为专史型、阶段型、地域型、事件型、单位型、人物型等等,只是通史型的论文是很少的,论文毕竟容量小,不可能对整个党史进行全面的论述,至多论述党史的概要,论述党史的理论问题。论文的发表形式主要是两种:一是报刊;二是论文集。全国数千种报纸、杂志,有的是党史的专业报刊,如《中共党史研究》等等,这是极小一部分,只有数十种,其他都是非党史专业的报刊。党史专业的报刊,主要发表党史论文,其他非党史专业的报刊,无论它是综合性的、文

艺性的、科技性的,无论它是哪类报刊,也都会或多或少发表一些党史的论文,特别是党的诞生日前后。在党的诞生日前后,论文集会集中出版一批。如中共建党80周年纪念活动中,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学术讨论会,都出版了论文集。党史学会或者与党史相关的学会,如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等等,在举行年会以后,也会出版论文集。再有纪念某历史事件,纪念某人诞辰、逝世等,也会出版论文集。有些书,甚至有些丛书,基本上就是论文集。人物类的书、丛书,有胡华等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温济泽主编的《革命烈士传》,星火燎原编辑部《解放军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英雄传》等等。此外,《上海英烈传》、《北京烈士传》等各省市、地、县的英烈传、党史人物传,也都是论文集。这些集子的每一卷,或每一集、每一册,一般都收入十多人甚至数十人的传记,与一传一书的人物研究著作是不同的。

国外、港台发表的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论文也很多,有关中国问题的刊物、论文集也不少,从论文看,专史型、阶段型、地域型、事件型、单位型、人物型等等都有。这些论文和研究著作一样,立场、观点不尽相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的态度不尽相同,需要分别地分析、研究。

⑧图。这主要指图片、地图、图表等。图片主要是照片、图画等。照片,一般是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中共党史文献,是当时情况的真实记录。图画,是美术作品,有的可以作为撰述史料类,有的则属于文艺史料类。地图,如果是作战时用的地图,上面反映了作战计划,战斗、战役进展情况,是作战的实况记录,那么它可以作为原始史料文献。如果是事后对历史的描述,是再现战争的场景,像某些研究战史的著作后面附录的地图,它就属于撰述史料类文献。图表,主要指统计图表等,一般属于撰述类史料文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照片、地图资料、图表资料很早就有了,不少已成为档案馆、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图画,特别是宣传画,也很早就有了,有的画在壁上、山上,有的印在报刊、书籍中,也出版过美术作品集。如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过《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历史连环画》四册。其中有不少也已成为档案馆、博物馆的珍贵

藏品。以下主要介绍照片、地图、图表类的中共党史文献。

第一，照片。照片有发表和不发表之别。私人或单位拍摄的照片，可以说绝大部分没有发表，发表的只是少数。没有发表的照片，由私人或单位收藏了，有一部分会送到档案馆等处收藏。发表的照片，有的是在报刊上发表，有的作为书籍的插页，有的则编纂成集出版。报刊、书籍发表照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不少，但较零散。编纂成集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照片专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还没有见到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一批一批陆续出版，如果就其内容来分，也可以分出通史型、专史型、阶段型、事件型、地域型、单位型、人物型等类。

通史型：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志》、湖北教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典》等。

专史型：解放军画报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学联编《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中国学生运动历史图片集）》、全国总工会编《新中国工人的生活》、朱波编《新中国妇女》、农业部编《中国农业四十年（1949 - 1989）》等。

阶段型：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图片集》、军事博物馆编《夺取全国胜利图片集》、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等。

事件型：上海教育出版社《开天辟地》、《井冈红旗》、画册编委会《八一南昌起义》、上海教育出版社《伟大长征》、陈元方等《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大生产运动》、辽沈战役纪念馆《辽沈战役图片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处《淮海战役图片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平津战役图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开国大典》等等。

地域型：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人民革命史画册（1840 - 1949）》、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北京出版社《北京人民革命斗争（1919 - 1949）》、《北京》等等。

单位型：画册很多。如《大江南北——新四军抗日战争革命史料画集》、《大庆》、《大寨》、《北京大学》等等。

人物型:画册也不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及其他一些中共著名领导人、将领都有画册出版。民主党派人物,也有画册出版。

除以上种种照片集以外,还有很多图片集、影集也是与中共党史相关的,如吴印咸《吴印咸摄影工作六十年影展作品集》、辽宁美术出版社《〈晋察冀画报〉影印集》、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选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部分)》、文物出版社《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史画选辑》、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1842-1919)》、胡志川等《中国早期摄影作品选(1840-1919)》、沈伟一等《九一八事变图片集》、新华社《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新军影集(1937年8月1日-1945年10月)》等等。

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陆编纂、出版的画册、影集以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画册,如陆步洲《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傅润华《抗战建国大画史》及其他国民党政府的出版物,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出版的一些画册,其他国家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画册,也与中共党史有某些关系,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参考资料。

在以上种种类型的照片集以外,器物型的专集也有一些。如马飞海等《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第11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编《江苏革命货币》、上海市钱币学会编《人民币图录(1948-1988)》、中国集邮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等等。这些照片集,显然也是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中共党史文献。

第二,地图。地图有原始史料类和撰述史料类之别,有发表和不发表之别。一些原始史料类地图多由档案部门收藏,大多没有发表。发表的地图大多是撰述史料类的,大致有这几种形式:一是书籍插图,有些中共党史书、解放军军史书及其他各种现代史、当代史的书都附有地图。二是地图册。三是教学挂图。四是展览会用的地图。下面主要谈谈地图集及挂图。

地图集:亦即地图册,收集了各个阶段或各事件、各专史等等的地

图。如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印的《中国近代现代史地图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九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第十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杨牧等编《中国革命史教学地图集(1840-1949)》,军事博物馆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地图选(1927-1949)》、《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图集》、高庆达《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参考简图》等等。

挂图:一般是一个题目一幅地图。这一幅地图的大小,手绘的地图可以随意定大小,印刷的地图一般是2开、全张、双全张等。有的挂图是布质,有的则为纸质。测绘出版社曾出版过双全张的布质近现代历史挂图,其中有《五四爱国运动形势图》、《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示意图》、《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示意图》、《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及工人运动的发展示意图》、《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示意图》、《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分布示意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示意图》、《百团大战示意图》、《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形势示意图》等等。其他历史地图挂图有军事博物馆编制、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多种。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等也出版过一些革命历史挂图。

第三,图表。图表的形式有:一是书籍中的插图,为了形象地说明某个问题,附录了一些图表。二是图表集。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些统计资料,很多都采用了图表的形式,如《中国统计年鉴》等。三是一些宣传、教育用的图表挂图。四是展览会用的各种图表。

图表集:除了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图表资料以外,还有唐绍华等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学图表》等等。曾凡光《中国革命史表解(1840-1956)》、张攀学《中国革命史表解(1919-1984)》等,也可以视为图表集。

挂图:五十年代末数家出版社,如上海人民出版社、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等均出版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图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过《建国三十五年来伟大成就统计挂图》、《建国四十年伟大成就统计挂图》等等。其他各地出版社

也出版了一些图表挂图。

2. 按文献内容划分类型

可以按不同的历史时期、阶段来划分,可以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不同社会活动内容来划分,还可以再按事件、地域、单位、人物等来划分。

①按时期、阶段划分:这与中国现代史的划分差不多。是一种纵向的分类划分。主要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其中前一时期又可分为: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可分为: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以上这些时期,阶段里还可以分得再细一些,还可以按事件、地域、单位等再分类。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可以分: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

黄麻起义

弋横起义

湘南起义

闽西起义

平江起义

吉安起义

百色起义

龙州起义
宁都起义
第一次反“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红军长征
西安事变
“八七”会议
中共六大
古田会议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遵义会议
巴西会议
瓦窑堡会议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中共白区党组织的斗争
文化战线的反“围剿”
……

此外,还可以作:二战时期中共上海党组织、北京党组织、江西党组织、湖南党组织、福建党组织、广东党组织、江浙党组织、东北党组织、西北党组织等的划分。还可以作出:二战时期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王明、博古、张国焘以及瞿秋白、李立三、陈独秀等的划分。

足见每一个时期、阶段都还可以分出很多小类、细目。

②按社会活动内容划分,主要可以分为:

政治
经济
军事
哲学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文学
艺术
历史
地理
卫生
.....

其中政治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政治活动,又可以分为:

路线、方针、政策、思想、理论

党的组织和建设

中国革命和建设

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

国家行政管理

政治体制改革

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运动

阶级和阶级斗争

法制建设和法律

工人运动和组织

农民运动和组织

青年、学生运动和组织

妇女运动和组织

政治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

与各民主党派关系
一国两制
国际关系与交往
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治
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言论、活动
地方党和行政领导人及其言论、活动
党和国家的文件
政论、报刊社论
会议
……

这里的每一类中又可分出若干小类、小目。

军事类,指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所有军事活动,可分为:

建军路线、思想、理论
军事理论
军事技术
军事制度
军事教育与训练
军事科研
各种武装力量(各军、兵种)
司令部工作
政治工作
后勤工作
生产建设工作
军事建设(国防建设)与战备
地方军事
民兵
军队领导人及其活动
中外军事交往
敌我军事交往
战争、战役、战斗

.....

这里的各种武装力量,至少可以分为:

陆军
海军
空军
公安部队

陆军可以分为:

步兵
骑兵
坦克兵、装甲兵
炮兵
防化学兵
工程兵
通讯兵
铁道兵

其他各类也可以分出很多小类小目。如政治工作可以分为:

政治思想工作、理论、条例
思想工作
宣传工作
文化工作
部队基层建设工作
群众工作
保卫工作、保密工作
对敌军政治工作
俘虏管理

.....

以上代表性地介绍了一下政治、军事活动的内容,足见按内容分类是可以分出很多类的。党的活动、工作是十分广泛的,这自然就决定了记录党的活动的文献是包罗万象的,可以分为很多类。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把图书分了很多类,把“党史”分在“政

治、法律”类,而其他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等等与“政治”不是同一个类,与“党史”、“历史”不是同一个类,这样一来,似乎“党史文献”中是不包含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这是一种误解。“中图法”分类,与中共活动、中共党史文献的分类,不是一回事,是不同范畴、不同学科的分类。党史文献的分类可以借鉴“中图法”,但不能照搬。如“中图法”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生平和传记”,与“马列主义”合为一类,与“政治”不相关,与“中共党史”不相关,这是从图书储存、管理出发的。而中共党史文献的范围,自然要包括“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生平和传记”的。再说,按照“中图法”的分类“中共党史文献”应在“政治”类,实际上“中共党史文献”是历史文献的一部分,应在“历史”类。总之,“中共党史文献”的分类,应按自己学科的实际内容决定,不能完全照搬“中图法”,不能受“中图法”的束缚(关于中共党史文献分类不能完全搬用《中图法》的问题,可详见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理论问题初探》,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4期)。

《中图法》与《中档法》的分类不同,而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发展是必然趋势,所有文献的统一分类无疑也是必然趋势。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提出,详见黄宗忠主编《文献信息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六章第一节第四小节《建立一个统一的文献信息分类体系》。

3. 按文献的加工程度、层次划分

可以分为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

①零次文献,一般指一些会议记录稿、文件草稿、发言草稿、提纲及一些手稿,如日记、书信等等。这些文献往往是不公开发表的,需要的话,也可以进行整理、加工,然后发表。档案文献中的手写文献,一般属于零次文献。如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的表格,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大纲,“八七”会议记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修改稿等等。如《毛泽东书信选集》、周恩来《旅欧通信》、中国革命博物馆《老一辈革命家书信选》、《杨闇公日记》、《恽代英日记》、《林伯渠日记》、《谢觉哉日记》、《陈赓日记》、《赖传珠日记》、《陈伯钧日记》、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肖锋《长征日记》、童小鹏《军中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红军长征日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陈中

日记(1946.11-1948.11)》等等,在没有发表以前,一般都可以作为零次文献,发表以后,原稿仍可以作为零次文献,发表本可以作为一次文献。档案文献中的零次文献,整理发表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没有整理发表。

②一次文献,一般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献,如首次发表的论文、著作、出版的资料集、图片集及其他图书等等。这些文献中有的原始史料文献,有的是撰述史料文献,有的是文艺史料文献。以上介绍手写型、印刷型文献时谈到的公开出版的档案、文件、文集、报刊、回忆录、研究著作、论文、图等等,都是一次文献。此外,如公开出版的一些党史资料集,也是一次文献。这些资料集,是原始史料类文献,已经公开出版的资料集内容很广泛,主要有:

通史型或综合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等等。

专史型:人民出版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三联书店《共产国际文件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王清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张国琦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沿革(1927-1949)》、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中国工运资料汇编》、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文件汇编》、《中国工人运动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等;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文件》、《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等《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等;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人民公社参考资料》等;人民出版社《民族政策文件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国家

统计局《中国工业发展统计资料(1949 - 1984)》、《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农业部《中国农业统计资料》、财政部等《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财政部《中国财政统计(1950 - 1988)》、国家统计局《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 - 198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 - 1985)》、《中国供销合作社统计资料(1949 - 1988)》、财政部《中国国家财政收支统计(1950 - 198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商业部《民族贸易经济资料汇编》、社科院经济所《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赵昆坡等《中国革命根据地案例选》、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教育科学出版社《老解放区教育资料》、国家教委《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教育法规汇编》、中央文献研究室《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1940 - 1949)》、学林出版社《出版史料》;陈寿立《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1976 - 1985)》;武衡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料》……

地域型:云南党史资料征委会《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云南现代史料丛刊》、云南总工会《云南工人运动史资料汇编》;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 - 1987.10)》、《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5 - 1987.10)》、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经济(1949 - 1982)》……有一些地区、县等也编印了党史资料,如:牡丹江市委党史工委《牡丹江党史资料》、集体编《延吉党史资料》、何秉权等《中共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史料选编》、连江县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福建省连江县组织史资料(1925.9 - 1987.12)》、永定县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福建永定县组织史料(1926.夏 - 1987.12)》……此外,各省市的政协都编印了《文史资料》,有的地区、县也编印了《文史资料》。各省市地县还成立了地方志的编纂机构,各省市以及地县的地方志陆续出版。这些各地的《文史资料》、省志、市志、县志等等,有很多篇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及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中共党史文献的有机

组成部分。

事件型：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研委《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广东革命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省港大罢工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五卅运动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央档案馆《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等《八七会议》、中央档案馆《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等《遵义会议文献》、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谈判资料》、《停战谈判资料》、《政治协商会议资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淮海战役》、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各省市均一卷）、三联书店《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重庆人民出版社《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海瑞罢官〉问题参考资料》、书目文献出版社《责任制与体制改革资料选编》……有些事件型的资料集还分了地区，如长征资料就有《红军长征过广西》、《红军长征过云南》、《红军长征在贵州》、《红军长征在四川》、《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等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各省市都独立出一卷。还有些地区性的事件、比较小的事件，也出版了资料集，如：《皖北阜阳四九起义》、《万县九五惨案》等等。

单位型：中国革命博物馆等《新民学会资料》、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文献汇编》、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肇庆市叶挺独立团纪念馆《叶挺独立团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东北抗日联军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黄美真等《上海大学史料》、南开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贾植

芳等《文学研究会资料》、饶鸿竞等《创造社资料》、上海经济研究所等《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随着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的展开,随着地方志编纂的展开,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整理了本单位的历史资料,有的已编纂成书出版。

人物型:遵义会议纪念馆《毛泽东与遵义会议》、天津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的青年时代》、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辽宁省社科院《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彭湃研究史料》、《苏兆征研究史料》、《冯白驹研究史料》、《叶挺研究史料》、军事博物馆、《朱德元帅丰碑永存》、《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贺龙元帅丰碑永存》、《陈毅元帅丰碑永存》、《名将粟裕》、王训昭等《郭沫若研究资料》、孙中田等《茅盾研究资料》、会林等《夏衍研究资料》、关山《杨献珍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吴晗和〈海瑞罢官〉》……此外,还有人民出版社《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③二次文献,一般指在一次文献基础上加工成的文献。如根据一次文献编成的书目、论文目、索引、文摘等等。这些检索性的文献都是二次文献。这些二次文献,有些是综合性的,涉及到各种学科内容的文献,其中包括了中共党史文献;有些是中共党史专科的。

书目:平心《生活全国总书目(1911-1935)》,开明书店《全国出版物总目录(1935)》,重庆市图书馆《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1937-1945)》,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民国时期总书目》(分类分册出版,其中有“史地”分册)。《全国总书目》,一般每年一册,也有个别册是数年为一册,至2000年底,已出至1996年卷。《中国国家书目》,每年一卷,已出数年。中国版本图书馆《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著录新出版图书的则有《全国新书目》月刊,反映出版情况较《全国总书目》快。国家和各省市的图书馆,各高校、各研究所的图书馆也都编有馆藏书目,有的是图书馆自印,

有的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很多出版社也编辑出版了本社出版的图书目录……以上这些书目一般都是综合性的,囊括各个学科或多种学科的图书,其中也包括了中共党史方面的图书,是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必备的检索工具书,是中共党史文献的二次文献的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的《七十六年史学书目》、《八十年史学书目》,为历史类的书目,收入中国学者研究中外古今各个历史学科的著作,其中也包括了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书。

北京图书馆编的《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书目》,则完全是中共党史文献检索的工具书。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书目初编》,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的《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的《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北京图书馆《学习毛主席著作书目》……这些基本上都是与中共党史文献有关的检索工具书。

杨诗浩等编的《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1949-1978)》、北京图书馆等编的《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目索引》等等,也是与中共党史文献相关的。

文目。文章目录,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性的。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著录近代各种期刊的各期篇目,如《新青年》各期的篇目。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1906-1949年总目录》、《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1950-1966年总目录》、《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1977-1979年总目录》……1980年以后一年为一卷。三联书店《东方杂志总目》,新华月报社《新华月报总目(1-194期,1949-1960)》……以上这些文章目录,为综合性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与中共党史有关的文章。此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目录(1988年新闻联播国内部分)》等,也可以视为文章目录,并且与中共党史密切相关。

论著目、资料目。这是书和文章等结合在一起的目录。这类目录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性的,有的还以“索引”的名称出现。徐炯等《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目录总汇(1980-1990)》,魏建猷等《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北京图书馆社科参考组《革命烈士传记资料目录》,周元正《抗

日战争史参考资料目录》，苏爱荣等《孙中山研究总目》，社科院《毛泽东研究目录》，丁景唐等《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这些目录，都是把书和文章结合在一起著录的。这些目录，反映的是研究的情况及研究的资料。此外，还有一些人物的著作、著译目录，也是把该人物撰写和翻译的文章、书结合在一起著录的。如：丁景唐等《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另外，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处编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 - 1989)》，也是书和文章结合在一起著录的。

报刊目。北京图书馆《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 - 1949)》，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社科院新闻所等《当代中国报纸大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当代期刊总览》，人民邮电出版社《中国邮发报刊大全》、《中国报刊大全》(每年出版一次)，胡兆明等《中国高等院校校报名录》，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企业报大全》，李永璞等《中国史志类内部书刊名录(1949 - 1988)》，北京图书馆报刊编目组《北京图书馆馆藏报纸目录》，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藏建国前中文报纸目录》、《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以上这些报刊目是综合性的，包括各类各地的报刊，其中也包括了中共办的各类各地的报刊，中共党史的专业报刊。人民出版社《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等，则是与中共党史文献密切联系的。

索引。形式和内容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书籍索引，有的是文章索引，有的是书籍、文章以及各种资料的综合索引。就报刊索引而言，有的是多种报刊的综合索引，有的是一种报刊的索引。就主题而言，有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索引，有的是中共党史的专题索引；有的是某一历史阶段的索引，有的是某一历史事件的索引；有的是某一地区的历史的索引，有的是某一单位的历史的索引，有的是某一个人物的索引。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为1900 - 1949年中国报刊杂志的论文索引，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的论文索引。张海惠等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建国以来中国史学论文集篇目索引初编》，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史及中共党史论文集的论文索引。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论文目录索引》，荣天

琳等编的《中国现代史论文著作目录索引》，李光一等编的《中国现代史论文书目索引》……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专题索引，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索引。上海中共党史学会编的《中共党史论著目录索引》，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专题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的《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是与中共党史研究有密切的关系的。

曹鹤龙等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回忆录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论著目录索引》，上海历史学会编的《抗日战争史论著目录索引》，周元正编的《台湾出版抗日战争史著作论文索引(1950 - 1987)》，中科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编的《关于我国人民公社的图书报刊资料索引》……为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的历史事件、阶段历史研究的索引。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北京现代革命史资料目录索引》，黄定天等编的《东北史论文资料索引》，李树玫等编的《青海地方史报刊资料索引(1870 - 1989)》，广西通志馆旧志整理室等编的《广西文献资料索引》……为地区性的资料索引，其中有中共地方党史的资料索引。

魏蒲等编的《新四军研究资料索引》……为单位型的资料索引。

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等编《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索引(1910 - 1986)》，民族出版社编印的《民族工作重要资料索引》……可以视为专史型的资料索引，其中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文献及研究资料。

就人物索引而言，有众多人物的综合索引，也有单个人物的索引。邵延森《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是古今中外众多人物的综合索引，只有一小部分涉及中国现代人物、中共党史人物。王继祥等编《中国近现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王明根等编《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其中大部分为中国现代人物、中共党史人物。金华英等《传记文学篇目分类索引》，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的篇目索引，实即人物传记索引。其中的人物大都是现代人物，也涉及到中共党史人物。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编的《解放日报人名索引(1941.5 - 1947.3)》，也是一种人物资料的索引。社科院马列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编

的《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索引》，北京图书馆等编《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等编《张学良将军资料索引》等，则是一个人物的资料索引。

报刊索引。1950年以前的报刊索引有，《人民日报》图书馆编的《十九种影印革命期刊索引》，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二十六种影印革命期刊索引》，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印革命期刊索引》，《人民日报》图书馆还编有《解放日报索引》、《新中华报索引》、《人民日报索引》等。此外，《申报》索引已编纂出版了一部分，其中1919年以后各卷的《申报》索引，涉及到了中共党史中的很多历史事件。解放以后的报刊索引，主要是上海图书馆编的《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全国报刊资料索引》、《全国报刊索引》，该索引自1956年创刊以后，除了“文革”时期曾一度停刊外，一直出版着，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一种报刊索引。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的《复印报刊资料索引》，也是一种重要的报刊资料索引。此外，《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也都编有本报刊一年或数年的索引。中宣部图书资料室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主要报刊书评资料索引(1979.1 - 1985.6)》，则是一种专题性的报刊索引。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编的《国内内部期刊索引》，则是一种专类性的，即内部发行的期刊类的报刊索引。以上都是1950年以后出版的报刊索引，1949年以前出版的报刊索引主要有：岭南大学图书馆编印的《中文杂志、索引》(为清末至1929年百余种杂志的论文索引)，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编的《期刊索引》、《日报索引》等。当代港台海外的报刊索引则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国外社会科学论文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的《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辑录专题索引》等。台湾、香港也各自出有报刊索引。

文摘。摘录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或主要观点或主要资料等，都是文摘。有些报刊文章的辑录，即从一份报或一期刊物中辑出一篇文章，也类似于文摘。文摘有的以报刊形式出版，有的以书的形式出版。

文摘类的报刊，全国已有很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新华文摘》月刊，为综合性的文摘，也摘录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章。中国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行《复印报刊资料》月刊,分很多学科,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史”、“毛泽东思想”等专刊。期刊类还有《读者文摘》、《青年文摘》、《海外文摘》等等。报纸类则有《光明日报》社办的《文摘报》、《解放日报》社办的《报刊文摘》等。以上是综合性的文摘报刊。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该编辑部编)双月刊,上海师范大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河南省社科院情报所《社会科学文摘》等等,是社会科学类的文摘报刊。

廖盖隆等主编的《中共党史文摘年刊》,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专科文摘。

书的形式的水文摘出版物有:王天奖等《中国近代史文摘》,刘惠吾等《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傅绍昌等《中国现代史新论点》,山东大学《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1946-1986)》,翟作君等《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1911-1949)》、《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研究荟萃(1949-1987)》、《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朱敏彦等《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荟萃》、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等等。此外,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争鸣录》、《中国现代史争鸣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分“政治学、法学卷”、“历史卷”等多卷)……也属于文摘类。

以上列举的二次文献主要是书和报刊的形式,至于以文章的形式出现的书目、文目、论著目、资料目、报刊目、索引、文摘等也很多,不胜枚举,这里从略了。

④三次文献。一般指在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基础上加工成的文献。如一些综述、概述、述评类的文章、著作,还有手册、年鉴、辞书等等的工具书,都可以作为三次文献。很多三次文献也是有工具书的性质,有的还有论著的性质。

综述、述评:综述、述评的文章很多,报刊上经常发表此类文章,一些年鉴、文集等里面也会有一些此类文章,《中共党史文摘年刊》中就有综述类的文章。这类文章也有很多类型,如有的对通史型的中国现

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作综述、述评；有的对专史型的研究（军史、工运史、青运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作综述、述评；有的对阶段史、时期史（“一战”、“二战”、“抗战”……）研究作综述、述评；有的对地区史（北京、上海……）研究作综述、述评；有的对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研究作综述、述评。在以上类型的综述、述评中，有的就一个长时期的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七十年……）作综述、述评；有的就一个短时期的研究（社会主义时期、新中国建立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来……）作综述、述评；有的仅就一年的研究作综述、述评。

综述、述评类的书有一些，不很多。如宫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张新京等《改革十年社会科学重要理论观点综述（1978 - 1988）》、石仲泉等《毛泽东研究述评》等。《毛泽东研究述评》收了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述评四十余篇。其中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述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回顾。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研究述评。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研究述评。

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研究述评。

《实践论》、《矛盾论》研究述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述评。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述评。

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

……

此外，还有《周恩来研究述评》、《刘少奇研究述评》、《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等。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史学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等等，是史学史类型的著作，又有某些综述、述评的性质。史学史类型的著作，是在史学著作等基础上加工成的，即在一次文献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同时也借助了二次文献，可以视为三次文献。又因为它们有著述的性质，它们也可以视为一种一次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次文献又转化成了一次文献。

手册、年鉴、辞书、百科全书等等的工具书,都是很多条目合在一起组成的,一般来说一条条目就是一篇文章的内容或一篇文章中某一段内容或一本书中某一部分内容的概括,而辞书条目的编制和编写一般是要借助于检索工具书的,所以这类条目型的工具书,一般可以视为三次文献。条目型工具书的种类不少,数量也很多。以下扼要介绍一些。

手册:钱宗范等《简明历史手册》、刘宗华等《中学历史自学手册》、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龚书铎等《中国近代史学习手册》……是历史类手册,有一部分涉及到中共党史。邢国华等《中国革命史学习手册》、何沁等《中国革命史学习参考手册》、金东和等《中国革命史手册》……是中国革命史类手册,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共党史手册。何沁等《中共党史学习参考手册》、刘孝良等《中共党史教学手册》、郑福林等《中共党史知识手册》、倪忠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手册》……是中共党史类手册,是党史通史型、综合型的手册。

黄德渊等《党的基本知识手册》、茹作斌《党的基本知识手册》、车书栋等《党的知识手册》、陶锐等《党员基本知识实用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党风知识手册》、王作成等《党的建设实用手册》、田绍义等《农村建党工作实用手册》、张天荣等《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工作手册》、尚文等《党的工作方法手册》……都是有关党的各方面知识的手册,都是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此外,寿孝鹤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1949-1985)》、《中国省市自治区资料手册》、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知识手册》、中国统计出版社《统计资料手册》、储瑞耕等《改革开放新知识手册》、王积业等《经济体制改革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手册》、李一宁等《爱国主义教育手册》、桂自力等《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手册》、吴英增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手册》、李斌等《地方人大人事工作手册》、程辑雍等《人民代表知识手册》、李进法等《乡镇人大手册》、杨永峰等《政协委员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民族工作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政府法制工作手册》、王立斌等《统战工作实用手册》、唐尧《宗教工作手册》、王和芹等《当代妇女工作实用手册》、彭图远等《利用外资实务手册》、赵启正等《干部人事工作手册》、张书才等《档案工作实用手册》、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研究会《乡镇工作

手册》、王概等《村委会干部工作手册》、白益华等《居民委员会工作手册》、张云清等《人民调解员工作手册》……滕荣宗等《工会会员知识手册》、王家扬等《工会工作实用手册》、张植信等《当代军人知识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简明军事百科手册》、朱意达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手册：海军分册》、向旭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手册：陆军分册》、辛明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手册：空军分册》、民政部安置司《军队离休干部安置手册》、贾毓秀《民兵工作手册》、团中央组织部《团员手册》、《共青团支部工作手册》、共青团山东省委《共青团干部工作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工作手册》、李尚松等《青年政治常识手册》……以上这些手册也都包含着党的各方面工作的知识、党的历史知识，都是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五十年代也出版过一些手册，如云南人民出版社《减租退押手册》、《土地改革手册》，中南人民出版社《农村信用合作工作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农村供销合作工作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人民公社工作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公安人员手册》……这些手册在五十年代是一种工具书，而在今天看来则是反映当时历史的资料，可以作为资料书来看。无论作为工具书或作为资料书，这些书中都反映了党的各方面工作的知识，都是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

年鉴：种类、形式很多，有的是百科性的，有的是专科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地方性的，各行业、各领域也有各种年鉴。

1950年中国国内出版的一些年鉴，如社会调查所《劳动年鉴》、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文艺年鉴社《中国文艺年鉴》……虽然并非是中国共产党所编印，也有一些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资料。

1950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年鉴的编印空前繁荣起来。《中国百科年鉴》开始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按年度出版。中国工业方面的年鉴有《中国轻工业年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中国机械工业年鉴》、《中国机械电子工业年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中国钢铁工业年鉴》、《中国煤炭工业年鉴》、《中国纺织工业年鉴》。中国农业方面有：《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等。经济方面还有《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科学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各行业的年鉴也出版了一些。科

学文化教育方面的年鉴有：《科学年鉴》、《自然科学年鉴》、《中国卫生年鉴》、《中国医学科学年鉴》、《中国内科年鉴》、《中国外科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中国文艺年鉴》、《中国音乐年鉴》、《中国体育年鉴》、《中国摄影年鉴》、《中国新闻摄影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版画年鉴》、《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戏剧年鉴》、《中国印刷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中国集邮年鉴》……各地方的年鉴，基本上每省市都编印，并且有“年鉴”、“统计年鉴”、各系统各行业等种类。有些地区县市及一些大单位也编印了年鉴。这些年鉴反映了国内各方面各地的工作，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工作，都是中共党史文献的组成部分。

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其中自然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针政策、各方面工作等。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有“中国历史”、“军事”、“哲学”、“文学”、“法学”、“民族”等很多卷，而这些卷实际上都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知识、各种工作。汝信等《简明中国百科全书》、王照琨等《中华百科知识辞书》、张锋等《当代中国百科大辞典》、韩健青等《现代百科最新辞典》、胡惠林等《读书百科辞典》、谢圣明等《中国青年百科全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国学生百科全书》……这些综合性的百科全书都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知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历史百科全书》、《民族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宋占生等《中国公安百科全书》、张跃庆等《经济百科辞典》、余士雄等《工会百科词典》、汝信等《中国工人阶级大百科》、杨友吾等《中国公务员百科辞典》、冯文彬等《中国当代干部大百科》、宋德慈等《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百科全书》……这些有一定范围的百科全书，其中涉及到的中共党史知识就更多一些。而何竹康等《中国共产党百科要览》、张守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百科之最大辞典》……这些书基本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知识百科全书。

辞书。辞书的种类也不少，有字典、词典、辞典、事典、名词解释等等。以下介绍一些与中共党史有关的词典、辞典、事典、名词解释等。

词典、辞典。陈旭麓等《中国近代史词典》、李华兴等《近代中国百年历史辞典》、刘和平等《中国近现代史大典》、李盛平等《中国现代史词典》、杨力强等《简明中华民国史辞典》、陈旭麓等《中华民国史辞典》、尚海等《民国史大辞典》、朱建华等《中国革命史辞典》、马洪武等《中国革命史辞典》……以上是中共党史关系十分密切的辞典。彭承福等《中国革命和建设史辞典》、上海中共党史学会《中国革命与建设史词典》，则基本上是中共党史类的词典。

中共党史类的词典、辞典很多。通史型、综合性的有：景彬等《中国共产党大辞典》、王东等《中国共产党大辞典》、廖盖隆等《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盛平等《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等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朱建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张晋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王维澄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典》、柯明中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词典》等等。

专史型。王虹生等《工青妇大辞典》、常凯等《中国工运史辞典》、田明等《工会大辞典》、张静如等《中国青年运动辞典》、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贾若瑜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词典》、乔明甫等《中国共产党建设大辞典(1921-1991)》、孙维本等《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辞典》、赵博等《中国共产党章程辞典》、中纪委《党纪党风词典》、张公新等《党规党法辞典》、罗景一等《廉政建设辞典》、夏明等《党的群众工作大辞典》、敬永和等《现代思想政治工作辞典》、孙庆祥等《组织人事工作辞典》、谭方之等《党的统战》工作词典、陈元等《中国统一战线辞典》、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人民政协辞典》、郝一等《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辞典》、崔乃夫等《中国民政词典》、江平等《中国司法大辞典》、中央党校出版社《毛泽东思想辞典》、向洪等《四项基本原则大辞典》、陈家骥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用词典》、王书文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简明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简明中国新文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简明辞典》等等。

地域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湖南革命史词典》、中国文史出版社《安徽近现代史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共上海党史大典》、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大辞典》等等。

人物型。人物型的辞典很多,有的是综合型的,有的是分部门、分行业、分专业、分学科的,也有分地域的。综合型的有范宝俊等《中华英烈大辞典(1840-1990)》、李盛平等《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石肖岩等《中国现代名人辞典》、蔡开松等《20世纪中国名人辞典》、宋德慈等《二十世纪中华爱国名人辞典》、廖盖隆等《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王乃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物辞典(1949-1989)》等等。专门、专科、专业型的:何东等《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李侃等《中国革命史人名大辞典》、盛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1921-1991)》、郑福林《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人物辞典》、吴如嵩等《中华军事人物大辞典》、袁韶莹等《中国妇女名人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当代青年名人大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团结出版社《当代中国青年学者辞典》、长春出版社《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人事部《新中国留学归国学人大词典》、梁桂芝等《中国博士人名辞典》、袁宝华等《中国知名企业家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当代企业家辞典》、湖北科技出版社《中国厂长经理人名辞典》、李兢之等《中国现代银行行长人名辞典》、张品兴等《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王均镇等《中国当代教育名人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社会科学人物辞典》、陈荣富等《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杨犁等《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李宁等《当代对联艺术家辞典》、佟韦等《中国现代书法界人名辞典》、姜东舒等《中国硬笔书法家辞典》、李润新等《中国艺术家辞典·现代分册》、山东大学出版社《中国摄影家辞典》、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雷正民等《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辞典》、山东科技出版社《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分册》、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中国专家人名辞典》、徐志春等《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现代分册》、董智勇等《中国林业专家大辞典》、史宇广等《中国中医人名辞典》、民政部等《中国残疾名人辞典》等等。地域型的:辽宁人民出版社《东北人物大辞典》、马尚瑞等《北京古今名人辞典》、皮明庥等《湖北历史人物辞典》、广东科技出版社《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苏英博等《海南名人辞典》、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山西当代实业家人名辞典》、《江西当代实业家人名辞典》、《四川当代实业家人名辞典》……梁自洁等《山东社会科学人名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界人名辞典》等等。民族型的：宁夏大学回族研究所《回族当代文艺人物辞典》等等。个人型的：广西人民出版社等《毛泽东大辞典》、中国工人出版社等《刘少奇风范词典》、《周恩来风范词典》、《朱德风范词典》、迟福林等《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邢贲思等《〈邓小平文选〉大辞典》、林建公等《邓小平思想理论辞典》、红旗出版社《李大钊研究辞典》、林建公等《雷锋辞典》等等。

此外，张首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辞典》、刘国新等《中国政治制度辞典》、张成福等《现代政府管理大辞典》，以及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名胜辞典》等等，都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知识、各方面工作有关的辞书。

事典。类型不少。通史型、综合型：季平等《中国共产党大事典》、朱敏彦等《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廖盖隆等《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何彦才等《新中国大事典》、段永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光辉的历程：中共党史百事要览》。

专史型：廖盖隆等《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1949-1990)》、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国改革开放事典》、高尚全等《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事典》、李志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1949.10-1987.1)》、刘英杰等《中国教育大事典》……

人物型：王充闾等《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事典》……

张宏儒等《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1900-1991)》、吉林人民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陈兴唐等《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也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大事相联系的。

名词解释、名录、事录：这些体裁的书，实际上与词典、辞典、事典等相类似，只是名称不同。

名词解释：姚守中等《党史名词简释》、张广信等《中共党史事件、名词、人物简释》、国家计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名词解释》、王泉森等《“七五”计划名词解释》等等。

名录、事录：有些书是名录、事录结合在一起的，有些书是分开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事事件人物录》、《八路军军事事件人物录》、《新四军事事件人物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事件人物录》、《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湖南大学出版社《中国革命史事件与人物》、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事件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简介》等等是事录、名录结合在一起的。

事录：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1919 - 1949）》、《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1949 - 198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冯登岗等《新中国大事辑要》、刘鲁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邓礼峰《建国后军事行动全录》……

名录：有地名录、人名录、单位名录等种类。地名录有全国性的，也有分省市的。单位名录有全国性的，有分省市的，有机关名录、学校名录、企业名录等等。如新华出版社《中国政府机构名录》，经济管理出版社《全国图书情报系统名录大全》……

人名录的书，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出版，有综合型的，也有各种分类型的。实际上与人名辞典相似。

综合型：施伟达等《现代中国著名人物录》，京声等《新中国名人录》、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中华群英录（1979 - 1990）》……

党派型：裘之倬等《中共党史人名录》，汪新等《中国民主党派名人录》，刘继增等《中国国民党名人录》……

单位型：张振华等《抗日军政大学名人录》，湖南省档案馆《黄埔军校同学录》，汪新等《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全国政协历届负责人人名录》，中科院干部局《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人名录》、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中国农业科学院科学家人名录》……

事件型：姚仁隽《南昌、秋收、广州起义人名录》、党德信等《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雷作林等《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英名录》、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管理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谭铮《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录》等。

专史型、专业型：星火燎原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薛

维维等《中国妇女名人录》、曾志等《长征女战士》、全国妇联宣教部等《当代女企业家》、李攸良等《中国专利发明者名录》、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知名企业家》、张光斗等《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王树凯等《科技名人录》、广东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录》、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知名中青年中医药师名录》、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系统优秀教师名录》、龚继先等《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中国音协《中国音乐家名录》……

民族型：张声作等《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录》……

地区型、地区专业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自治区优秀企业家名录》、《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名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内蒙古人名录》、上海科技出版社《上海普教系统高级专家名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高等教育系统教授录》……

别名录、笔名录：张静如等《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陈玉堂《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典》、曾健戎等《中国现代文坛笔名录》、徐迺翔等《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周家珍《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

人物志类似于人名录，人物志的书也出版了一些。如：丁新钧等《中国共产党英烈志》、王健英《红军人物志》、马洪才《新四军人物志》、谭译等《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姜廷玉等《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人物志》、清华大学校史组《人物志》等等。

人物谱也类似于人名录，人物谱的书也出版了一些。如：吴景榕等《社会主义英雄谱》、上海文艺出版社《“脊梁”礼赞、共和国群英谱》、文物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谱》、江苏人民出版社《新中国科技精英谱》、广西师大出版社《青少年英雄群星谱》、石油工业出版社《大庆油田英雄谱》、辽宁人民出版社《鞍钢英雄谱》等等。

有些书名没有“录”、“志”、“谱”等字样，但也类似于人物志，人物谱。如：中组部知识分子工作办《理想·奉献·奋进：共产党员专家赞》、中国经济出版社《九十年代新雷锋》、山东科技出版社《齐鲁科技精英》、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国博士精英》、吉林省民政厅《吉林革命英

烈》、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英烈》、四川人民出版社《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等等。

年表、大事记类的书,也是一种工具书。这种工具书与辞书不同,但也有类似之处。年表、大事记虽不立辞目,但也是一日一条,或一日数条,也有条目的性质。大事记、年表,大多也是根据各种文献资料,如根据一次文献,借助二次文献,编纂而成,所以也可以视为三次文献。年表、大事记有工具书的性质,也有论著的性质。年表与大事记名称不同,形式差不多。有的年表画成表格,这与大事记形式不同。但有的年表并不画成表格,而是按日记事,这与大事记就没什么两样了。

在介绍印刷型文献时,介绍了一些地域型、单位型的党史著作,其中有一些大事记著作。以下介绍一些年表,也再介绍一些大事记。

年表:贾新民等《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1890-1988)》、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璞玉霍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月表》、人民出版社《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湖南省党史资料征研委员会《湖南党史大事年表》、四川省委党史工委《中共四川地方党史大事年表(1921-1949)》等等。

大事记:通史型:知识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1840-1980)》、周树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事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1919-1949)》、《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梁寒冰等《中国现代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等等。

阶段型:雷德昌《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事记》、盖军等《改革开放十四年纪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等等。

专史型: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大事记》、邓智英等《党风党纪建设七十年》、刘华峰等《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唐玉良等《中国工运大事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解放军总政群众工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群众工作大事记》、朱企泰等《统一战线大事记(1921.7-1990.12)》、陈崇龙等《海峡两岸关系大事记》、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关系纪事(1919 - 1943)》、民族出版社《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大事记(1949 - 1988)》、洪承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沿革大事记(1949 - 1978)》、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大事记(1954 - 1987)》、社科院经济所现代经济史组《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37 - 1949)》、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张塞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大事记》、北京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王和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大事记》、李发胜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大事记》、郑德荣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纪事》、农业出版社《中国农业大事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 - 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 - 1949.9)》、刘光等《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 - 1987)》、欧阳璋等《成人教育大事记(1949 - 1986)》、张应吾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大事记(1949 - 1988)》、王亚夫等《中国学术界大事记》、邹华亭等《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吴宝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纪实(1949 - 1981)》、钱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大事记(1949 - 1990)》等等。

地域型、地域专史型:李鸿文等《东北大事记(1840 - 1949)》、丁晓春等《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黑龙江省档案馆等《黑龙江历史大事记》(有“1912 - 1932”,“1931 - 1945”,“1945 - 1949”等卷)、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在吉林活动大事记》、赵庚奇等《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大事记》、北京出版社《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 - 1989)》、张俊南等《陕甘宁边区大事记》、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山东四十年纪事》、济南市委党史资料征研委员会《中共济南党史大事记》、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委办《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湖北省委党史征研委《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19.5 - 1949.10)》、卢志高等《湖北青年工作大事记(1949 - 1988)》、湖北总工会《湖北工运大事记》、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研委员会《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政协浙江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百年大事记》、《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广东省委党史征研委等《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

《新海南纪事(1950-1992)》、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地方党史大事记(1919-1950)》、张山克《台湾问题大事记(1945.8-1987.12)》等等。

单位型:重庆出版社《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李志宽等《八路军总部大事纪略》、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解放军大事记》、《中共淄博矿区党史大事记》、东北工学院院志办《东北工学院大事记(1950-1989)》、于广华等《中央电视台大事记(1955.2-1993.3)》等等。

事件型:郑理等《红军长征大事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整党大事记》等等。

人物型:人物型的大事记即人物的年表、年谱等,也有以“大事记”名的。以下介绍一部分:全国妇联《邓颖超革命活动七十年大事记(1919.5.4-1989.5)》、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年谱有: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李大钊年谱》、周永祥《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周恩来年谱》、《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董必武年谱》、王树盛等《乌兰夫年谱》、尚明轩等《宋庆龄年谱》、周国全等《王明年谱》、盛仁学《张国焘年谱及言论》……陈锡祺等《孙中山年谱长编》、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中央教科所教育理论研究室《陶行知年谱稿》……此外,王进等《毛泽东生平纪事》、外交部外交史室《周恩来外交活动事记(1949-1975)》等等,也是一种人物的大事记。

工具书的工具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国内工具书指南》,分“手册部分”、“辞书部分”等;赖伯年等《社会科学工具书七千种》,伍杰等《中国辞书辞典》,朱天俊等《文科工具书简介》,北京图书馆工具书室《台港工具书指南》等等,以上是综合性的有关工具书书目介绍的图书,其中也介绍了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工具书。朱天俊等《文史工具书手册》、涂宗涛《常用文史工具书简目》、李昭恂《文史书目手册》、南京大学图书馆等《文史哲工具书简介》等等,以上是文史类、文史哲类

的工具书的介绍图书,其中也介绍了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工具书。林铁森等《中国历史工具书指南》等等,是中国历史类的工具书介绍图书,其中也介绍了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工具书。以上这些工具书的书目,是检索工具书的工具书,从书目的角度看,这些工具书属于二次文献,从工具书的工具书角度看,这些工具书是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的工具书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有三次文献或四次文献的性质。

4. 按史料的加工程度分类

可以分成原始史料、传抄史料、撰述史料、文艺史料。

①原始史料,一般指最早的、直接记录的史料。如会议记录,事件原始记录、报道、书信、电报、日记、档案资料等。手写型党史文献、零次党史文献,大多是原始史料类的党史文献。书信、日记、档案资料等,前已介绍,此不再赘。

②传抄史料,一般指抄录、翻印原始史料而成的史料。如原始史料的汇编。中共党史资料汇编,包括人物资料汇编、报刊资料汇编等等,都是传抄史料。各种资料汇编,前已有介绍,此不再赘。

③撰述史料,一般指论著。依据原始史料、传抄史料撰写的党史各类著作,各类论文等,都是撰述史料。关于撰述史料的特点,在《历史文献类型》一节中已有论述。中共党史的论著,也在前面有所介绍,此不再赘。

④文艺史料,一般指经过艺术加工的一些中共党史题材的作品。文艺史料类的文献的特点在《历史文献类型》一节中已有论述,可以参见。文艺史料类的党史文献也不少。比如电影:《开天辟地》、《四渡赤水》、《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英雄儿女》、《南征北战》、《林海雪原》、《洪湖赤卫队》、《智取华山》、《永不消逝的电波》、《陈毅市长》、《芙蓉镇》、《天云山传奇》、《共和国第一大案》、《抉择》等等。电视剧:如《长征》、《忠诚》、《红色康乃馨》等等。

小说如《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红日》、《林海雪原》、《红岩》、《在烈火中永生》、《暴风骤雨》、《上海的早晨》、《长征风云》、《皖南事变》、《雁飞塞北》、《艳阳天》、《金光大道》、《红卫兵

日记》等等。

诗歌如《毛泽东诗词选》、《陈毅诗词选》、《革命烈士诗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留下了很多诗词创作,很多诗歌创作者也留下了大量歌颂革命、歌颂党、歌颂人民的作品。

音乐舞蹈如《黄河大合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等。

戏剧如歌剧《江姐》、《党的女儿》。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等。

四、中共党史文献特点

中共党史文献是历史文献的一部分,历史文献具有的特点,中共党史文献一般都具有,同时,中共党史文献又有自己的一些与其他历史文献不同的特点。

1. 中共党史文献与历史文献一样,主观性是很强的

中共党史文献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产物。没有中国近现代社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共党史文献。没有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文献;没有解放战争,就没有解放战争的历史文献;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文献;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文献。这是中共党史文献的客观性。同时,中共党史文献又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其他社会人士等的主观观察、思考、加工、记录、整理等形成的。离开中国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其他社会人士等的主观作用,也不会有中共党史文献。这决定了中共党史文献有很强的主观性。关于历史文献的主观色彩很浓,在论述历史文献的特点时已有说明。关于中共党史文献的主观色彩,只想强调以下几点:①中共党史文献的形成受文献制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思想感情的影响和制约。一些原始史料文献的形成受制作者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影响,撰述史料文献的形成更如此。比如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等书对毛泽东是肯定的,而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对毛泽东是攻击的。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就是因为蔡和森与张国焘在写作时,在

制作文献时,立场、观点、方法、思想感情是不同的。再如,“文化大革命”时,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工贼、内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发了文件,报刊上发了文章,还有一些批判刘少奇的书出版。粉碎“四人帮”以后,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中央发文件,报刊发文章,出版社出书,重新肯定刘少奇,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为什么截然相反呢?因为文献制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思想感情是截然相反的。②中共党史文献的制作手段,以人工为主。如手写型文献是人工制作的,印刷型文献也是依靠人工制作的。正因为是人工制作,所以文献的形成、产生必然受制作者的主观意识制约,以至出现随心所欲制作文献的现象。如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工贼、内奸”的一些证言材料,就是被授意编制的。再如“文化大革命”中盛传林彪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这也是故意编造的。③中共党史文献的传播流通渠道是人为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工作的,制作的文献是有益于党的工作、利益、前途的。这些机构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为了党的宣传工作能展开、搞好,才建立这些机构的。这些机构的建立及其展开工作,都是人为的。国民党的报刊、电台、出版社,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成立、工作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时,它的宣传机构专门制作一些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他们的宣传机构只允许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传播、流通,而不准或阻止赞颂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流通。国民党政府为此还颁布了一些法律、条例。共产党则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国民党散布的攻击、污蔑共产党的言论、文献,进行批判,不准或阻止这些言论、文献扩大影响。国民党政府把赞颂中国共产党的图书列为禁书,甚至查封销毁。共产党自然也要把攻击、污蔑共产党的图书列为禁书。就是在共产党内部,由于正确思想、正确路线与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进行斗争,也会形成两种不同文献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献制作与传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文献制作与传播,形成的鲜明对比,正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有些中国共产党文献因为机密性而不允许传播或限制传播,这也是传播的人为性的表现。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传播中,

一般是很少的。今天很少限制这种或那种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传播。

2. 中共党史文献与历史文献一样,可加工性是很强的

党史文献的主观性很强,某些方面超过其他历史文献,这就决定了它的可加工性是很强的。党史文献的制作者可以这样制作,也可以那样制作;党史文献的传播者可以保持党史文献的原貌,也可以删改、加工之。“文革”期间党史文献的伪造、篡改屡屡发生,正说明了这一点。“文革”期间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诬陷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很多都是伪造的。再如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删改之处不少,特别是原文或注释中提到刘少奇的,都被删去了(详见197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载黄少群《请不要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等文)。即使不是“文革”时期,伪造、篡改、加工党史文献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如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报刊、图书、文件中记载的稻、麦等“亩产万斤”,都是失实的,是编造的。“报喜不报忧”,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场陋习,这种陋习、腐败作风也影响到了新中国的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大跃进”时代盛行“报喜不报忧”,“文革”时代盛行“报喜不报忧”,至今在某些地区、某些政府部门、某些工作人员、党员干部中也仍然还有这方面的影响存在。某些人为了邀功升官,便编造“政绩”,虚报各种数字,出现“口中出数字,笔下出成绩”的现象。这种情况,报端时有披露、批评。这就是伪造或篡改文献。关于原有的党史文献被加工、修改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出版某些人的文集,常常可以见到“□□□”、“×××”等符号,这不是因为原文文字不清而加的,而是将某些内容隐去、删去。蔡和森的《党的社会主义史》,有《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等不同的版本。文中有一句“后来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卅万农民于五月卅日进攻长沙,李维汉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此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用“□□□”隐去“李维汉”(该书第115页),而《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本则没有隐去“李维汉”(该书第78页)。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最初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四卷五期,以后收入《蔡和森文集》等,也收入《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版)。文中第一节开头有“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以至鲍罗庭主义……”一句,此句的“谭平山主义”,《陈独秀评论选编》下作“谭××主义”。这些将党史文献原来的某些内容,在传播过程中隐去、删去的做法,说轻一点是加工党史文献,说重一点就是篡改党史文献。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也有《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等版本。这些版本都是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油印本印的,而油印本是个记录稿。《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较忠实于原油印本,原油印本中的错讹之处,仍其原样,只是随后加“〔 〕”,注明正确的字。而《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本则将原油印本中的错讹之处改正了,文句欠通之处也顺通了,就是说作了一些修改,这样就与文献的原貌有了一定的距离。这是党史文献的加工、修改。党史文献的可加工性,及其文献加工现象的存在,告诉党史文献的整理、研究者们,辨别党史文献的真伪,校勘党史文献的讹误、衍漏,是一项很重要、很繁重的任务。

党史文献的可加工性还表现在大量的原始史料被加工成传抄史料、撰述史料,还被加工成文艺史料。党史资料书,党史著作在大量出版,党史方面的文艺作品也在大量问世。很多党史纪实文学作品、小说作品、电影、电视剧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当然也有一些文艺作品受到批评。所以受到批评,主要原因在于在加工原始史料时,偏离了史实,失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甚至失去了历史现象的真实。这告诉党史文献的加工者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站在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去加工党史文献,是党史文献加工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保证党史文献不走样、不被歪曲篡改的前提,是保证党史文献加工时克服主观随意性,做到客观性、科学性的前提,是党史文献的加工能被社会承认、接受,实现社会效益的前提。

3. 中共党史文献与历史文献一样,可毁灭性是最大的

“文革”期间有很多历史文献被毁,也有很多党史文献被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纪实》(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披露,“文革”期间,河南省档案馆销毁了65个单位的三万余卷档案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州市档案馆销毁了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档案文献,足见

被毁灭性之大。在历史档案中有一种“烧黑档案”，即档案被焚烧以后掩埋起来。发现这些焚烧后的档案时，档案已炭化，无法再利用。但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这些“烧黑档案”已有一部分通过托裱、照相翻拍、复印等手段，复制出白底黑字与原件一致的档案了。^①当然这些能够复原的“烧黑档案”，首先是原件烧黑后尚未灰化，其次烧黑的年代还不是很远。这一方面说明现代历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的可毁灭性是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被毁灭的文献再生的可能性也在越来越大。

党史文献的可毁灭性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要对党史文献的可毁灭性尤其是人为的毁灭有足够的重视，认真对待文献的毁灭。对于有价值有用的文献决不能人为地随意销毁，销毁一些无价值无用的文献则是合理的，必需的。比如档案部门销毁一些无用的档案，这是常规工作，但这项工作必须十分谨慎。档案有无价值，该不该销毁，必须严肃鉴定，必须请专家研究，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这方面，中国政府发过文件，制定过很多规章制度。如1956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就指出：“很多机关的同志对档案工作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大多数机关的归档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鉴定和销毁还缺少一定的标准和制度……甚至发生无人管理、遗失文件、泄露国家机密和任意销毁文件等现象，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对于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还只是进行了一部分集中管理的工作，绝大部分仍由有关机关代管，由于管理不严，损坏、散失或任意销毁的现象还很严重……”针对这种情况，《决定》中规定：“各机关的档案和代管的档案，非依规定的批准手续，不得任意转移、分散或销毁……”198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中第十七条规定：“机关应定期对已超过保管期限的档案进行鉴定。鉴定档案必须在机关办公厅（室）主任的主持下，由档案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组成鉴定小组共同进行。鉴定工作结束后，应提出工作报告，对确无保存价值的档案进行登记造册，经机关领导人批准后销毁。”第十八条规定：“机关销

^① 详见《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374页。

毁档案,应指定两人负责监销,防止档案遗失和泄密。监销人要在销毁清册上签字。”1983年4月国家档案局颁发的《档案馆工作通则》第十四条规定:“档案馆对无需继续保存的档案,必须经过鉴定,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报请主管领导机关批准,方能销毁。未经鉴定和批准,不得销毁任何档案”(以上文件详见《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的附录四、五、七)。党和政府机关的档案,是党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有价值的。从保存党史文献,从提供更多的党史文献让研究者研究的角度来看,档案文献最好不要销毁,一销毁便不可再生。档案管理部门如果确要销毁,必须严格鉴定,必须请专家研究、经领导批准。那些被列入将销毁的档案,也可以将其中的重要部分或全部转化成机读性文献,以便今后仍有检索、利用的机会。相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原始档案销毁的现象无疑会越来越少了。从195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可以看到,建国初期任意销毁档案的情况严重存在,档案损失严重。从1983年的两个关于档案工作的文件中,也透露出任意销毁档案的情况仍存在,当然主要是针对“文革”中任意销毁档案而言的。国家不断颁发档案工作的文件,也说明国家的档案文献制度在不断健全起来,对档案文献的可毁灭性日益重视。

4. 时效性长

中共党史文献的时效性在历史文献中,比其他历史文献一般来说要长些。①中共党史文献将被人们长期研究。中国共产党存在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一天,中共党史文献就会被研究一天。即使将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大同境界,国家消失了,政党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仍将被人们研究,人们将永远记住为人类大同社会作出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中共党史文献将成为中国历史文献中最珍贵的一部分被人们保存、研究。②中共党史文献中包含的经验教训将长期发挥作用。比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那么这一方面的经验教训,这方面的知识一百年都有用。即使一百年以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较现在有了变化,路线方针政策需要重新制定,当前基本路线的经验教训仍是制定新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仍有借鉴的作用。百年以后,千年以后,只要中

国共产党仍领导着中国,那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方向,就仍不会变。再比如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经验教训,也将长期发挥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已将近80年的历史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这些经验教训今天仍有用。只要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没实现,那么第一次、二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就仍将有用,仍可借鉴。只要中国仍有多种政党存在,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经验教训就仍然有用。而且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展,经验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积累,增添新的内容。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很多经验教训将长期有用,并且会不断发展。这说明很多中共党史文献将在很长时期里发挥作用,将长时期地被研究、利用。③中共党史文献中有很多思想教育、理想教育的文献将长期发挥作用。对青少年,对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道德品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理想前途教育,有很多历史文献可用,而中共党史文献是其中最贴近现实、最有价值、最有积极作用、最有效的部分。这些中共党史文献,今天在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百年后仍将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人们仍需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社会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精神,仍可在那时的社会教育中发挥作用。而且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优秀事迹是不断发展的,先进思想、先进人物是层出不穷的。这也说明很多中共党史文献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会被人们研究、利用。④中国古代、近代历史文献中,有很多原始史料文献、撰述史料文献转化、加工成文艺史料文献,中共党史文献中会有更多的原始史料文献、撰述史料文献转化、加工成文艺史料文献。就目前而言,已经有很多中共党史人物、事件出现在小说、银幕中。可以断言,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共党史人物、事件写成小说,搬上银幕,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新人新事写成小说,搬上银幕。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人和事的文艺作品就会不断产生。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人和事的文艺作品也将会产生。这又说明中共党史文献将会被人们长期的研究、利用。

5. 中共党史文献和历史文献一样,局限性是大的

中共党史文献要受社会的局限,受人的局限。所谓受社会的局限,①是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样,经济条件不一样,人们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就不一样,形成的文献也会不一样。②受社会政治形势的局限,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会不一样,形成的文献也不一样。③受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的局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人们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会不一样,形成不同的文献。④受时代的局限,国际大时代,国内小时代,对中共党史文献的形成都会有影响,不同的时代,会形成不同的中共党史文献。比如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社会对斯大林的看法,对毛泽东的看法,对刘少奇的看法,对彭德怀的看法,对林彪的看法,包括对蒋介石的看法,都会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谓受人的局限,①是受阶级的局限,不同阶级的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不同的,不同阶级的人制作的中共党史文献,观点、内容是不一样的。②受思想路线、思想观点的局限,不同思想路线、思想观点的人,对中共的人和事的看法是不同的。比如,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对中共的某些人和事的看法是错误的。再如“四人帮”一伙人对中共的某些人和事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路线执行者制作的中共党史文献,是错误的。③受人的思想感情、心理因素的局限,每个人都有自己性格、脾气、思想境界,每个人的心理因素也不会相同,所以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人们看人看事,会受到与自己相关的利害关系的影响,受到与自己亲疏关系的影响,于是看法不一、说法不一。比如李维汉说自己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而萧三则根据自己的日记,说李维汉没有参加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萧三有日记为证,当是较可信的。为什么李维汉要说自己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呢?这大概一是记忆上有误差,二是有某些利害关系的缘故。④受人所处地域的局限。在不同地域出生的人,在不同地域工作的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会有差异。不同国籍的人,不同省市的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会有差异是自然的。⑤受民族的局限。不同民族的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会不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利益,看问题会受到本民族利益的影响。⑥受人所处地位的影响。人的社会地位是

不尽相同的,看问题的出发点会不同,看到的内容也会不同。国家领导人看问题从国家利益出发,注重国际、国内大事,省市领导人看问题会从省市的利益出发(当然也会注意国家利益),注重本地区的大事;某单位的领导人看问题会从自己单位的利益出发,注重本单位的大事;基层群众看问题会从自己眼前利益出发,注重自己身边的大事。掌握全局的人,往往能看到全局,但每一局部的小问题不一定都能看到;处在局部地位的人,往往能很清楚自己局部的事情,但对其他地方,对全局不一定都很清楚。这些都造成处在不同地位的人会对事情的看法有差异,于是制作的文献,也会有差异。⑦受年龄的局限。不同年龄的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样。一般来说,青年人看问题较少保守,老年人看问题较保守;青年人看问题看得较浅薄,老年人看问题较深沉。所谓“代沟”,就是指因为年龄不同、阅历不同,对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

中共党史文献的主观性强,可加工性大,自然局限性也大,会受时、地、人的影响,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这就告诉人们,对中共党史文献进行社会分析、阶级分析、思想观点分析、心理分析及其他多种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不能掉以轻心。

6. 可增殖性强

中共党史文献不仅已经数量浩繁,而且还在不断产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文献自然也在不断产生、发展。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一天,中共党史文献就会产生一天。即使将来政党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还会存在,还会发展,这样,中共党史文献就仍将不断产生。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已经结束,中国古代史文献、中国近代史文献、原始史料文献的产生已经终止,只存在对已经产生的文献,如何更多地发现、发掘的问题。当然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撰述史料文献、文艺史料文献仍在产生,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文献的增殖量已不能和中共党史文献相比了。撰述史料文献、文艺史料文献的增殖数量是小的、有限的,原始史料文献的增殖量是大的、无限的。中共党史文献,不仅撰述史料文献、文艺史料文献在不断增殖,原始史料文献更在不断增殖。党史文献的增殖性大,这提醒人们,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是中国历史文献工作中最重

要、最繁重的工作,是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的工作,是大有前途的工作。

7. 政治性强

政党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工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产物,是在中国现代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成长、发展的,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斗争中成长、发展的。中共党史文献就是在这些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无疑,中共党史文献的政治性是很强烈的。中共党史文献的制作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会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路线的拥护者,这就造成中共党史文献不同的政治色彩,有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也有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一般来说民主革命时期的正反面中共党史文献的政治性是很强烈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正反面中共党史文献政治性也是强烈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中国大陆上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中共党史文献中会有一些文献的阶级色彩较少,但政治的色彩一般总会有,因为这些文献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都会有政党的色彩,这就使这些文献都带有政治色彩。此外,中共党史文献中有很多文献阶级性很强烈,这强烈的阶级性也是强烈的政治性的表现。很多中共党史文献的革命性也很强烈,这强烈的革命性也反映出强烈的政治性。很多中共党史文献的科学性往往是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联系的,这也是有政治色彩的。很多中共党史文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历史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是进行理想前途教育、传统教育的好材料,这些文献的政治性显然很强烈。中共党史文献中的很多原始史料文献、撰述史料文献,都反映了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一定的理论体系,这是政治性的反映;其中有一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现象和历史发展本质进行了描述,有的描述是正确的,有的描述是错误的,这种差别是政治性的反映;其中有一部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方向进行了研究、揭示,这种研究、揭示的正确与否,也是政治性的反映。中共党史文献中的很多正面的文艺史料类文献,有的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人和事,有的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人和事,这些文献的政

治性是很强烈的。中共党史文献中的很多,都是可以为政治服务的,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效益,是其他一些历史文献不能相比的,这也是中共党史文献政治性的反映。中共党史文献的政治性强烈,提醒人们对中共党史文献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进行一些政治分析是必要的。关于中共党史文献的政治性,在论述中共党史文献性质时,也有论述,可以参见。

8. 现实性强

中共党史文献的现实性强,①表现在文献的本身就是现实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不过数十年的历史,中共党史文献的产生只有数十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还在发展,中共党史文献还在产生。中共党史文献可以说是“昨天”产生的,“今天”产生的,“明天”还要产生。社会发展着、中国共产党发展着,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中共党史文献总是现实的产物,总是最贴近现实的。②中共党史文献中反映的人和事,大都是现实的,或最贴近现实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逝世了,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但他们是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现实人物,他们对现实仍有很大影响。至于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等等,他们是现实人物,在现实中发挥很大作用。其他现实中的各界杰出中共人物,对现实社会作用、影响大的人物,不计其数。从事来说,民主革命中的很多事,仍是最贴近现实的,如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仍然是个现实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很多事,仍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有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事,都与今天的现实有直接的联系。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比如改革开放的决策和实践更是活生生的现实。③中共党史文献中反映的经验教训、思想理论大都是现实的,或最贴近现实的。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大都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经验教训,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都是很现实的、很有作用的。至于思想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比如邓小平理论,比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理论,比如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理论,都是现实的思想理论,都在现实中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④中共党史文献在现实中发挥的效用较其他历史文献大，可以直接为现实服务，直接被现实借鉴。中共党史文献中反映的经验教训、思想理论，直接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并将在今后发挥作用，就是最好的说明。总之，中共党史文献，比起其他历史文献，如中国古代史文献、中国近代史文献，显然是有很强烈的现实性的。

中共党史文献是现实的产物，最贴近现实，所以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还刚刚开始，还要不断做很多工作。中共十五大以来的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刚刚开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基本上也是刚刚开始。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基本上也是刚刚开始。就是中共“一大”以来的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也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中共“一大”的文件中文原件，至今没有发现。1957年苏联将原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全宗的档案文件移交给中国，从中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三个有关中共“一大”的文件。这些文件是俄文本，译成中文后，发表在1958年9月25日出版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上（这是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看的一个不定期刊物）。此外，“一大”代表陈公博1924年1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这两个中共“一大”文件是英文本，内容与俄文本相同，但文字略有差异。这个英文本到八十年代才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关于中共“一大”的文件，目前只发现这些。而且俄本文、英本文的来龙去脉，现在并没有搞清楚。这表明，中共“一大”的史料还有待于发掘。再如，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央发了文件征集毛泽东的有关资料，至八十年代末征集到了数千件毛泽东的手迹及其他资料。如湖南发现了毛泽东1926年2月28日《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演说》、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两篇讲话稿。这表明毛泽东的有关资料文献还需要发掘、收集。至于毛泽东一生资料的整理、研究、编纂更有待于进行。如编纂《毛泽东全集》的工作，国外已经开始，而国内则还没有开始。

关于中共党史文献的现实性,在《中共党史文献性质》一节中也有论述,可以参见。

9. 机要性

中共党史文献是现实的产物,最贴近现实,所以有不少文献还不能开放、公开,特别是档案文献,那些不满30年的档案不能开放,那些满30年的档案,也还不能全部开放。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档案,还不满30年,不能开放,而“大跃进”、“庐山会议”的档案已满30年,也没有开放。毛泽东逝世还不满30年,毛泽东的档案没有开放,有些中共领导人逝世距离今天已30年多,如任弼时等,他们的档案也没有开放。档案文献所以不能开放,自然是因为党和政府从各方面需要出发,认为这部分档案还要保密。这就反映了这些档案的机要性。而中国古代史文献、中国近代史文献,一般都开放了、公开了。中共党史文献的机要性还在于,不少文献牵涉到新中国党、政、军等各部门的机密。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单位,都有很多文献是机密性的文献,还有的是绝密性的文献,根据保密制度,这些机密文献也是不能泄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也都有很多文献是机密文献、绝密文献,根据保密制度,这些机密文献也是不能泄露的。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组织,也有不少机密性的文献是不能泄露的。就是基层单位,有些工矿企业是保密单位,有些工矿企业不是保密单位,单位中也有某些部门是保密的。保密单位的某些文献是保密的自不必说,就是非保密单位,也各有自己的机密文献、绝密文献。航天工业有自己的机密文献,钢铁工业有自己的机密文献,化学工业有自己的机密文献……各工业部门,或其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机密文献。再如某些普查性资料,也有一部分是机密的。如中国的地名资料、地名档案,有一部分就涉及到军队的军事部署,涉及到国家未公布的重要自然资源、经济建设基地等,这些资料是机密资料,也是不能泄露的。如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人口档案,有一部分涉及到国家的机密,是不能泄露的。总之,中共党史文献有不少是涉及现政府、各单位的各种机密。而中国古代史文献、中国近代史文献,一般已不涉及现政府、各现单位和各种机密。中共党史文献的机要性还在于不少文献牵涉到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

题,牵涉到一些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有的牵涉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有的牵涉到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有的牵涉到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的牵涉到国内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有的牵涉到中共党内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这些重大问题,有的中共中央已作了决定,作了处理,有的还没有作出决定,还没有处理。没有作出决定的问题要作出决定,已经作出决定的问题如果要重新作决定,那么在作出决定或重新作出决定以前,牵涉到这些问题的文献资料是要保密的,也不能公布。比如朱德的人党时间,一般定在1922年,这是经过文献资料的研究、组织的调查下的结论。而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某同志,未经许可就把偶然发现的、未经详实查证的朱德1924年以后人党的一些材料公布出来[详见1979年版《朱德同志早期革命活动资料》(三)],结果受到批评。一方面因为违反了组织纪律受到批评,另一方面也因为资料并不可靠,在学术上也受到了批评。有些人物即使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有些事即使不是党的重大事件,但牵涉到党和国家的利益,这些人物和事件的文献还是要保密的。比如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中共的秘密党员、特别党员,这种党员身份,即使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也不能随便公开的。民主革命时期的秘密工作关系、秘密工作机关、秘密斗争事迹、中央特科工作的情况等等,也是不能随便公开的。总之,不利于党的利益的文献,损害党的形象的文献,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相符合的文献……都是不能随便公开的。

中共党史文献的机要性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是很突出的。这提醒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者,要遵守保密制度,要遵守组织纪律。

五、中共党史文献价值、功能

1. 保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遗产

①中共党史文献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各方面的知识。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人,参加中共“一大”的人,都去世了。大部分的中共党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党的历史、党的知识,必须通过中共党史文献。今天的人们了解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现实生活、社会实践,同时也离不开党史文献。今天的人们了

解“昨天”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依赖于党史文献,因为“昨天”的事,今天的人不可能去亲历。“明天”的人们了解“今天”、“昨天”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依赖于党史文献,因为他们不可能亲历“今天”、“昨天”的事。没有中共党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各方面的知识就无法传播,就会被人们忘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党史文献的丧失、毁灭,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毁灭。党的历史及其各方面的知识,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中共党史文献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包含着集体的智慧,也包含着个人的智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的是集体智慧,毛泽东思想体现的是集体智慧,邓小平理论体现的也是集体智慧,同时,集体智慧中包含着许多个人的智慧。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智慧,很多理论工作者的个人智慧,很多革命与建设实践者的个人智慧,很多普通共产党员的智慧,很多非中共人士的智慧,很多普通群众的智慧等等,都融进了集体智慧。集体智慧与个人智慧的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是在斗争中发展、更新的,它的主流是正确的。作为集体智慧结晶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是先进的、科学的,是宝贵的中国共产党文化遗产,也是宝贵的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遗产。这部分宝贵的文化遗产——集体和个人智慧的精华、先进科学的理论、思想,都依赖中共党史文献得以保存、积累、传给后来人。③中共党史文献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高尚品质、可贵精神。比如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作风和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团结——批评——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尚和精神;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品质;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极端民主化,不搞家长制、不搞个人崇拜的作风;团结奋斗,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反对分裂的作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敢探索,大胆实践的创新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愿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公德,不搞特殊化的品质、精神等。这

些优良传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它们的闪光,可以在优秀的共产党员身上看到闪光,同时也在中共党史文献中保存下来,并通过中共党史文献广泛传播,向更多人灌输,向后人灌输,影响今天的社会,影响明天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们必须靠中共党史文献保存、积累、传给后人。④中共党史文献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都创造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也积累了很多深刻的教训。比如,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走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既要反右也要反“左”,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经验教训,正是通过中共党史文献总结、传播。中共党史文献使今天的中国人了解、运用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也将使明天的中国人了解、运用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共党史文献也使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比如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在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比如改革开放,比如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也在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们正在、也将不断地通过中共党史文献保存、积累、传给后人。

以上主要说明的是中共党史文献中保存的精神财富。那么中共党史文献是否也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物质财富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共党史文献是以物质形式出现、存在的,它和历史文献一样是可以作为商品的,它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是一种物质财富。特别是一些珍贵的党史文献,比如中共早期文献的孤本、珍本,比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手

稿,比如重要档案资料等不少将是价值连城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将日益提高。另一方面,中共党史文献的利用以及价值,可以不断进行开发,可以使中共党史文献的社会效益日益增加,也可以使它的经济效益随之日益增加。中共党史文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宝贵的物质财富。是中华民族可以引以为荣、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是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一代一代积累、增殖的文化遗产。

中共党史文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和中国现代社会密切相联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就都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于是中共党史文献基本上就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文献。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理论、中国当代社会的优良传统、中国当代社会的经验教训……都在中共党史文献中反映出来。自然的,中共党史文献也保存了中国现代社会、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中共党史文献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思想理论、优良传统、经验教训等等,这样中共党史文献也就保存了当代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比起中国古代史文献、中国近代史文献保存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共党史文献中保存的遗产是更有价值的,更能在将来的社会中产生效益。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共党史文献还将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就像马克思主义文献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文化遗产一样。

2. 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中共党史科学和学科建设的基础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历史资料,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是党史资料。没有党史资料,无法进行党史研究;党史资料缺乏,不充分,也无法进行党史研究。如果没有或缺乏党史资料仍要研究党史,那么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结论。中共党史文献则是中共党史资料中数量最多、最重要

的一部分。比如要研究中共“一大”，就必须依据、掌握中共“一大”的资料。正是在全面掌握、研究中共“一大”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邵循正提出了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说（详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纠正了长期以来1921年7月1日召开说。如果没有中共“一大”的文献资料，就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不可能提出新说。又如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很长时期没有搞清楚，只知道是1935年1月开的。邹爱国根据一些新发现的电报等档案资料，写了《新发现的遵义会议史料》（载《瞭望》1984年第10期），提出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开的，其最主要的依据是：1月13日中央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而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的手稿中写道：会议“经过了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就很难确证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后又发现了一些长征日记，也证实遵义会议是1月15日至17日开的。再如要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形成的过程，就必须搜集、掌握它提出、形成过程的全面资料。“双百”方针是毛泽东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的，稍前1956年4月28日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再前，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8月毛泽东谈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时，指示要“百家争鸣”。这些资料就清楚地展现了“双百”方针提出、形成的过程。不去搜集、掌握这些资料，就无法研究“双百”方针提出、形成的过程。要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也必须搜集掌握有关的资料。比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还是以前就开始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掌握和研究有关资料。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中看到，那时已经开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了。还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都在整理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并陆续出版，这项工作如果没有中共党史文献作基础

就寸步难行。如山西省为了配合这项工作进行,做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根据1987年的统计,党史资料征集的专职人员上千人,兼职人员上万人,投资百万余元,一年内查阅文献资料2036846件、档案141030件,访问老干部89159人次,做访问记录53602件。一省如此,其他省市可想而知。又如《当代中国丛书》中《当代中国的商业》卷的编写,仅利用商业部档案处提供的档案就有四万多卷,复印档案文件32万张。这些都充分说明进行中共党史各方面的研究,必须以中共党史文献为基础。无论是中共党史的通史研究、专史研究、专题研究、人物研究、事件研究等等,都是如此。

中共党史学科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就是要在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引出结论。违反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就谈不上历史学科、党史学科的科学性。再者,中共党史学科的科学性是建立在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性上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只有建立在中共党史资料的基础上才可能是科学的。不从研究党史资料出发,随心所欲地提出一些结论,这种“研究”决不会是科学的,决不会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相符。所以说,中共党史文献也是中共党史学科实现科学性的基础。

中共党史学科的学科建设,面是很广的,它包括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建设,也包括中共党史学科相关学科的建设。比如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建设、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建设、中共党史史学史的建设、中共党史学概论的建设等等,都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学科建设内容。这些学科的建设,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基础,要进行理论研究,同时也要有中共党史文献作基础,要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不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这些学科就建立不起来。中共党史文献是中共党史研究科学性的基础,也是中共党史学科相关学科建设科学性的基础。

3. 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多种作用

以史为鉴,是社会常识。历史文献的借鉴功能,是社会公认的。中共党史文献,在现实社会中不仅可以发挥直接的借鉴作用,而且可以直

接为现实的政治实践、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等服务,在其中发挥其价值。

中共党史文献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作用的表现:①平反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以后,“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中共历史上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都进行了重新审核、纠正、平反。进行这项工作的重要依据就是中共党史文献,比如档案资料、证言资料等等。为了平反刘少奇、瞿秋白的冤案,至少查阅了中央机关等的档案七千九百卷。如“文革”期间,刘少奇被诬陷在1930年4月向敌人提供情报,使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文革”后在重新审查刘少奇的历史时,辽宁省档案馆提供了《中共满洲总行委12号通告》原件,证明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是由于杜兰亭叛变造成的,从而洗刷了对刘少奇的诬陷。各地平反冤假错案,也查核了大量的资料。天津一地,从1980年到1982年为平反冤假错案,查核天津档案馆的档案就有12000卷,使很多人得到平反(详见《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页)。②打击各种罪犯。如在审判江青等“四人帮”时,档案等各种文献资料发挥了巨大作用。直接向江青等人出示、播放的文件、日记、笔记、录音、录像等档案文献就有651件。江青否认对刘少奇的迫害,法庭出示她批过的文件及讲话录音,她便无言以对。在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时,会计档案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从清查会计账簿、凭证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破案。一些被举报的大案要案,也需要查证会计档案等各种资料,才能定案。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也依靠了各地各级机关的大量历史档案资料。③制定党的文件,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等。中共中央、国家政府部门制定文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等,都要大搞调查研究,形成大量的新文献资料,同时也要查阅、参考大量的旧文献资料,研究新形势,也研究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中共党史文献既能反映历史状况、历史经验教训,也能反映新形势、新情况。如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而这个文件的产生,是在毛泽东等很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才形成的。仅毛泽东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很多部门的汇报,翻阅了很多文献资料。

如20世纪80年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件，奠定了新时期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这个文件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经历了两年时间。在起草过程中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机关的档案二万多卷。组织了四千人参加的特大型讨论会，广泛征求了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吸收了理论界、学术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进行了多次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又进行了讨论，反复修改无数次，才最后定稿。邓小平前后看了很多材料、很多简报，听了很多汇报，作了很多指示。可以说新产生的党史文献与以往的党史文献，在《决议》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没有党史文献便没有《决议》。同时，《决议》既是党史文献研究的新成果，又是新的重要的党史文献。《决议》发表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组织了三十多个单位近百位理论工作者、党史研究专家，编写了《决议》的注释本。1983年注释本出版。1985年注释本的修订本出版。《决议》的注释本有一百余条条目注释，这些注释文字，更是中共党史文献研究的新成果。再如制定国家建设计划，必须了解清楚国家的“底子”，清楚过去的状况，也必须了解现在的状况，这就必须调查研究，搜集、掌握、研究方方面面的文献资料。制定战略目标，如“翻两番”是如此，制定五年计划是如此，制定年度计划也是如此。例如国务院在制定1985年的预算时，从对历年国家财政决算报表的对比分析中发现1984年行政经费支出比往年增长过快，于是决定1985年的行政经费比1984年压缩10%。足见文献资料在国家计划中的决定性作用。④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科学的思想理论。中共党史文献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那么传播中共党史文献自然就可以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比如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陈云文选》、《邓小平文选》等，这些都是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需要搜集、整理档案文献、报刊文献、论著文献、录音文献等。这些集子的出版，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科学的思想理论。比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就成了新时期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最好教材。它宣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宣传了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集子的出版,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军事理论、文艺理论、党建理论、统战理论、教育理论等等,同时也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中共党史文献可以宣传正确的科学的思想,也可以批判错误的反动的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宣传科学思想与批判反动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⑤宣传革命传统、共产主义精神。中共党史文献保存了中共的革命传统、革命精神,保存了雷锋精神等的共产主义精神,传播中共党史文献,也就可以传播革命传统、共产主义精神。比如,报刊上发表毛泽东1937年给表兄文运昌的信,发表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发表邓颖超遗嘱等,就宣传了革命传统、共产主义精神。比如出版《革命烈士诗抄》、《雷锋日记》,出版革命烈士的传记、中共杰出人物的传记,出版《红岩》等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放映《江姐》、《雷锋》、《焦裕禄》等电影、电视剧,比如报刊、广播、电视宣传、表扬新人新事、好人好事等等,都宣传了革命传统、共产主义精神。这些对于教育青少年,移风易俗有巨大的作用。

⑥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方向。旧的中共党史文献中包含着以往的经验教训,包含着以往对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探索,对今天的现实有直接的借鉴作用。而现实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今天对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探索,一般的也通过党史文献实现。比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是改革开放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探索,提出了要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又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作出了全新的总结,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对执政党建设的规律作出了新的论述。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纲领。翻看一下报刊,每天都有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文章发表。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也不断出版一些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规律、方向的书。这些党史文献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党的文件的制定有直接的作用,或者本身就是党的文件,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党史文献对全体中共党

员,全中国人民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信心,树立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再造社会主义事业辉煌的信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⑦为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国内外关系建立基础。党内关系是多重的,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单位与单位的关系、组织与组织的关系,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等等。党外关系也是多重的,如党和政府的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共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国内关系是多重的,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基层单位关系,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基层单位与群众关系,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关系、省市关系、地域关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大陆与香港、台湾关系……国外关系是多重的,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与其他党派关系,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以上的很多关系要处理好,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的,是要进行宣传教育的。而中共党史文献记录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历史,记录了处理这些关系的经验教训、方针政策、思想理论,并且可以有利于对现实的工作,现实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可以向各方面直接进行宣传。这为正确处理好党内外、国内外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也直接推动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总之,中共党史文献在现实政治实践、政治活动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以上只是扼要说明了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共党史文献不仅受到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重视,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甚至也受到外国党、外国政府的重视。

中共党史文献在现实生产实践中作用的表现:中共党史文献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政治性的文献、生产性、经济性的文献、科技性的文献等等都可以包括在内。政治性文献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对生产起指导和保证作用,生产性、经济性、科技性等文献则对生产活动、生产实践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第五章《科学技术档案工作》论述科技档案的作用时,提出以下几点:一、为企业管理工作服务。二、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服务。三、为资源开发服务。四、为城市改造和企业技术改造服务。五、为检修设备、恢复生产提供依据。六、为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提供参考材料。七、为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交流提供必

要的条件。八、在对外经贸交往中维护国家和单位的利益。书中还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这八条显然充分说明了科技文献在生产活动、实践中的作用。当然文献对生产活动、实践的作用还有很多,如制定经济计划、生产计划,如制定经营战略、策略,作出经营决策等等。在这些经济生产计划、经营决策的制定中,不仅生产性、经济性、科技性的文献,如科技档案、会计档案、经营情报等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政治性的文献,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否则政府不会答应,人民群众也不会允许。

中共党史文献在现实科学实验中作用的表现:中共党史文献中的政治性文献对科学实验有指导和保证作用,中共党史文献中的科技文献等则对科学实验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科学实验可以分社会科学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两大类。社会科学实验,比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有个试验阶段,需要搞几个试验点,然后总结经验教训,提炼出方针政策、思想理论,接着便推广。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搞股份制,搞经济特区,搞证券交易所,各地搞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等,都是先试点然后推广。这些试点、试验就是社会科学的实验。进行社会科学实验,需要了解、掌握现状、历史经验教训,形成一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提出计划、方案,然后才能进行实验。在实验过程中,需要随时总结经验教训,随时修改计划、方案。实验出现问题,或者失败了,需要找出原因,提出对策。实验成功,需要总结经验,研究实验如何深化,如何推广。这里的现状、历史经验教训、计划、方案、实验经验教训的总结,都通过文献形式反映出来。这说明社会科学的实验是离不开文献的,是有赖于文献的。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科学实验是离不开中共党史文献的。

自然科学实验,有的是理论性的实验,如物理、化学的理论实验。通过理论实验可以发现、提出新的理论、定理、定律。有的是应用性实验,如新产品的研制,解决技术难题等。通过应用性的实验,可以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无论什么科学实验,它首先需要掌握的是有关实验的经验教训、有关的数据,需要了解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当前研究的状况,否则,就无法很好地展开新的研究、新的实验。在新的研究、新

的实验中又需要随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积累数据。失败了,总结一下教训,制定新对策。再失败,再总结教训,再制定新对策……直至成功。在实验过程中,新文献会不断产生,并代替旧文献。这说明在科学实验中文献的开发和利用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科学实验是离不开文献的。美国学者跟踪一项科学实验的始末,将科学实验与文献的关系,画成了图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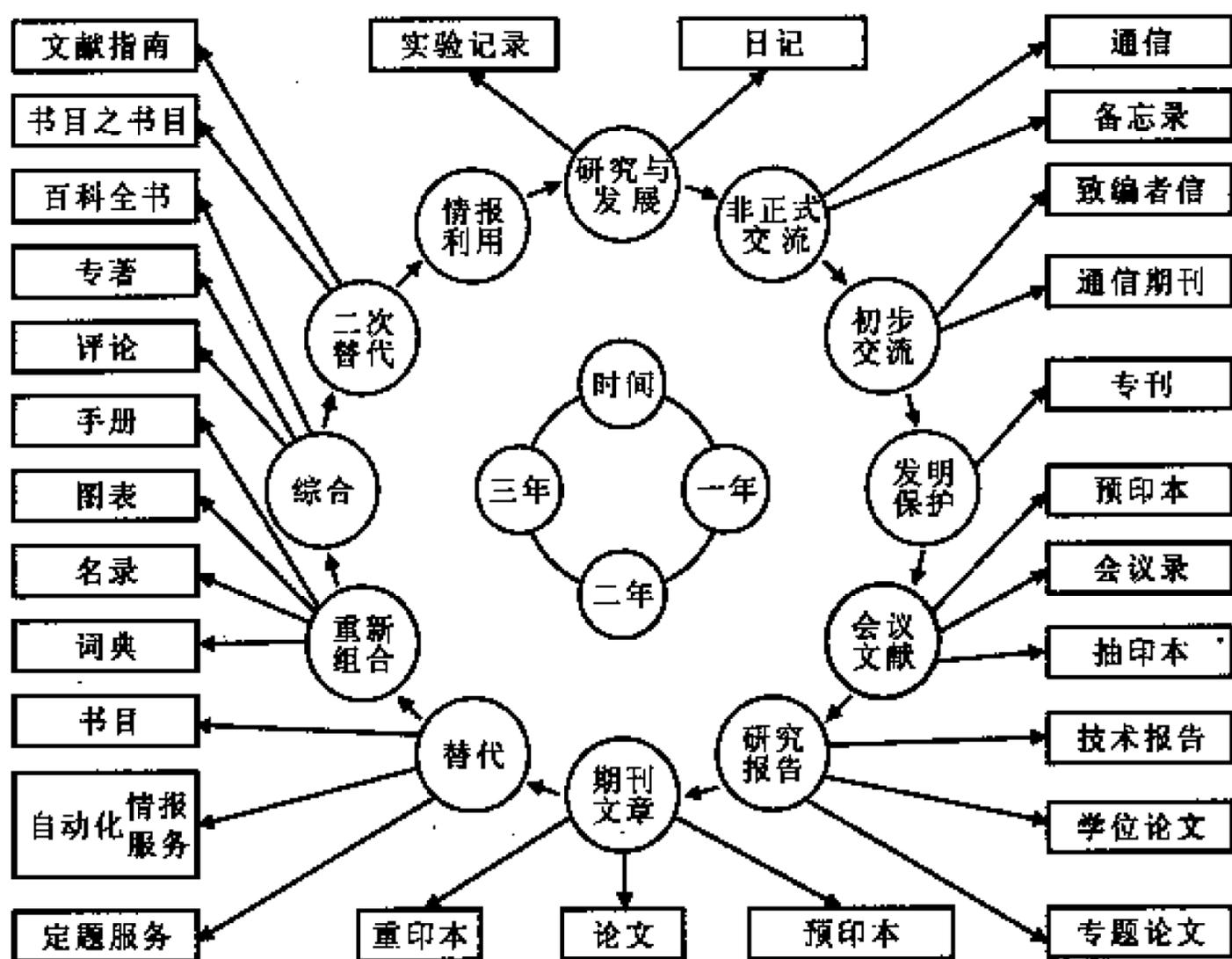


图1 科学实验与文献关系

这表明科学实验自始至终都要利用文献,科学实验的各阶段,都会产生、形成相应的文献,科学实验不断发展,文献也不断发展,科学实验完成了,与之相关的文献也就产生,并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科技战线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学实验成果,如原子弹爆炸成功、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上天……每一项成果的研制始末,其搜集、利用的文献,其产生、积累的新文献都是不计其数的。各行各业的科学实验都是如此。

在为现实的政治实践、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的服务中,中共党史文献的作用、价值是极为重大的。在现实社会中,中共党史文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妨举两个小例子:1982年,在设计大同——秦皇岛的铁路线时,因为利用国家测绘总局资料馆提供的航摄像片进行地质判释,缩短了原设计线路45公里,少设三个火车站,节省投资约1.3亿元。1985年,辽宁丹东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经过多年试验、培育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玉米优良品种——玉米自交“303”,在全国24个省区推广,种植面积达5273万亩,增产幅度20%至30%,一年为国家增产粮食400多亿斤(详见《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第273页,153页)。

4. 凭证作用

中共党史文献的凭证作用,也是它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的一种重要作用。在政治活动中平反冤假错案,它可以发挥凭证作用。打击各种犯罪分子,它可以发挥凭证作用。在国际的政治或经济的交往中,它可以发挥凭证的作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它可以发挥凭证作用。比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他1924年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被捕后,如何“英勇”,在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而《历史档案》杂志1981年2期发表了《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披露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证实张国焘在被捕后变节,出卖了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也出卖了李大钊。档案文献的凭证作用一下子就戳穿了张国焘的自我吹嘘。比如瞿秋白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是否被捕,有人说被捕了,有人说没被捕。查这天被捕人名单,并无瞿秋白名字,且5月5日又记载瞿秋白参加了北京各校学生代表会,在会上提出罢课以迫使当局释放5月4日被捕学生。这证明瞿秋白5月4日并未被捕,被捕说无证据,不能成立(详见叶楠《瞿秋白生平考辨四则》,载《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1993年1期)。比如韦拔群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几届学员,有人强调韦拔群是“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讲所的学生”,意即韦拔群是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而查检广州农讲所学员名单,无韦拔群名字,只是在第三届学员名单前言中说明有广西籍学员二人。《中国农

民》第二期所载 1927 年《广西省农民部工作报告》，谈到：“十四年二月（按：1925 年 2 月），韦、陈毕业于农所……”民国十四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 日是第三届学员的学习时间，韦拔群当是第三届学员，并因为是提前毕业，所以毕业名单没有名字，只是在前言中说明有广西籍学员二人了。这表明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第三届学员是证据确凿的，而第六届学员说是不确实的（详见王保山《对左右江革命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学术论坛》1979 年第 2 期）。

5. 有艺术鉴赏的价值，有娱乐功能

这是中共党史文献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的又一种重要作用。很多文艺史料类的中共党史文献，如诗歌、小说、电影、电视剧、戏剧、歌舞以及美术作品等，不仅在政治上能起教育作用，在艺术上也能起鉴赏作用。这些文艺、美术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创造的环境，往往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令人回味无穷。比如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比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等，有政治教育的作用，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再如读毛泽东的诗词，看毛泽东的书法，也能得到艺术的享受。并可以由毛泽东的诗词、书法想到毛泽东的为人，缅怀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称颂他伟人的气魄和胆略。又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纪念邮票、特种邮票中，有很多反映了中共党史，反映了新中国的成就，也有很多反映了中共党史人物，其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也有杨开慧、刘胡兰、冼星海等等。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发行的邮票，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见证。这些方寸之间的艺术品，既能给人以美学上的鉴赏，也能使人得到邮学上的鉴赏。翻翻集邮册，看看邮集，参观邮展，往往能使人心情开朗，忘却烦恼。还有些中共党史文献，已成为历史文物，或者成为孤本、珍本，那么这些文献还有文物鉴赏价值、版本鉴赏价值。

6. 有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流通

这一点在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功能时已有说明，在论中共党史文献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遗产时，也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只想强调一点，虽然中共党史文献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但就目前的时代、形势来说，是不是所有的中共

党史文献都立刻商品化,是不是所有的中共党史文献都进行商品化的管理,这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那些尚不能公开的档案,显然就不能作为商品买卖,不能进行商品化的管理。再如一些机密文件、机密情报,也不能作为商品买卖的。目前作为商品流通的中共党史文献,主要是图书、报刊杂志等。当然,如何使更多的中共党史文献商品化,让更多的中共党史文献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是应该不断努力的。

中共党史文献的价值和功能是多方面的,以上列举的只是较突出的几点。总之,中共党史文献是中国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劳动不可缺少的精神和物质的东西,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力之一。中共党史文献的资源应充分地开发,中共党史文献的产业应充分地发展,中共党史文献的价值和功能应充分地利用,这样才能使中共党史文献更多地造福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

中共党史文献的制作者众多,有革命者,有不革命者,有反革命者,所以中共党史文献也有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之分,或者积极、消极之分,进步、落后、反动之分。这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中共党史文献所发挥的作用是消极的,这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对那些起消极作用的中共党史文献进行批判,把他们的消极作用转化成积极作用,这是革命的、进步的中共党史文献工作者的责任,是在开发积极的中共党史文献价值和功能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的。

第二节 中共党史文献学

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全称应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学”。中共党史文献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中国历史专科文献学。它也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共党史文献学是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及文献工作、一般理论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中共党史文献的构成、本质、类型、特点等。研究中共党史文献产生、发展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研究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贮存、整理、研究、加工、管理、编排、编纂、出版等的方法及其

规律、经验教训。从而指导中共党史文献的生产、加工、研究、利用,使中共党史文献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服务,更好地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为中共党史研究服务。

中共党史文献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说得再细一点,它是中国现代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而它本身也有很多分支。如中共政治史文献学、中共经济史文献学、中共军事史文献学、中共思想史文献学、中共文化史文献学、中共文学史文献学、中共教育史文献学、中共科技史文献学、中共组织史文献学、中共建党史文献学等等。又如理论党史文献学、应用党史文献学、党史文献工程学等等。这些分支学科都可以进行独立的研究。只是中共党史文献学尚处在草创之中,这些分支学科的建设,还没提到议事日程上,还需要逐步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一、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

1. 中共党史文献的一般理论。如什么是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的本质是什么,结构如何,有哪些特点,分哪些类型;中共党史文献的价值和功能是什么等等。中共党史文献与中共党史史料的关系如何,中共党史文献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档案关系如何;中共党史文献有哪些组成部分,是否包括文艺方面的文献、科技方面的文献;中共党史文献与文献的关系如何,与中国历史文献、中国现代历史文献的关系如何等等。

2. 中共党史文献的载体。中共党史文献直接载体的类型、特点,中共党史文献间接载体的类型、特点。中共党史文献各类载体的功用及相互关系。中共党史文献载体的优化、完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共党史文献载体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文献载体与中国历史文献载体、中国文献载体的比较研究。中国中共党史文献载体与外国中共党史文献载体、外国文献载体的比较研究等等。

3. 中共党史文献产生、积累、发展的过程、历史。中共党史文献理论认识的发展史。中共党史文献载体的发展史。中共党史文献分类的发展史。中共党史文献传播、流通、整理、加工、研究、利用的发展史。中共党史文献产业发展史。中共党史文献社会效益的发展史。中共党

史文献学发展史等等。在中共党史文献诸方面、诸分支史的研究中,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探讨其规律。

4. 中共党史文献产生、搜集、贮存、管理、整理、加工、研究、编排、编纂、出版、流通、宣传报道、增值、利用等的方法、技术、理论以及其中的规律、经验教训。中共党史文献资源、文献产业的开发、建设及其统一化、控制化。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运行机制、模式。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基本原则、理论、方针政策以及法规建设、制度建设等。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标准化、现代化。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现状、未来。

5. 国内外中共党史文献的比较研究。正、反面中共党史文献的比较研究。国内外中共党史文献理论的比较研究。国内外中共党史文献工作及其经验教训的比较研究。国内外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比较研究。国内外中共党史文献学论著的研究、宣传、批评。

6. 中共党史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中共党史文献学与文献学、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现代历史文献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学科。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史料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目录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校勘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版本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注释(训诂)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辑佚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与中共党史情报学、信息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档案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方志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文献分类学、文献计量学、文献编纂学、文献出版学、文献保护学、文献检索学、文献采访学、文献系统管理学。中共党史文献学与文献机构建筑学等等。

7. 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计量方法、统计方法与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与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比较方法与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方法论的继承、发展等等。

8. 中共党史文献工作者、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者的素养、知识结构及其优化。中共党史文献研究者、工作者,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者的人才培养。中共党史文献研究者、工作者、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者的层次和结构。中共党史文献学教育体制。中共党史文献学教学、培训队伍和教材建设。中共党史文献工作、中共党史文献研究工作的领导者和领导工作、管理者和管理工作。

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主要是以上这些。此外,对于具体的中共党史文献,如对中共党史某个历史时期、某个历史事件的文献,对某些、某个中共党史人物的文献等,也进行研究,研究这些具体文献的真伪、价值、产生和积累过程、整理加工和利用的情况等等。

二、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目的、任务

1. 阐明中共党史文献的一般理论,揭示中共党史文献的一般结构、特点、本质、类型、价值、功能,使人们对中共党史文献有较全面、较准确的认识,对中共党史文献有足够的重视,从而重视中共党史文献的开发、利用,让中共党史文献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使中共党史文献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更好地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服务、为中共党史研究服务。

2. 阐明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一般理论。阐明中共党史文献运动的规律。指导中共党史文献工作按照其内在规律,向标准化、系统化、现代化发展,使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各个环节不断优化。指导中共党史文献工作向产业化发展。指导中共党史文献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使中共党史文献工作、中共党史文献产业为社会创造更好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 阐明中共党史文献学的一般理论。阐明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指导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建设、发展。阐明中共党史文献研究者、工作者、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者的素养、责任,指导中共党史文献研究者、工作者、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者的培养、队伍建设。指导、推动中共党史文献学和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研究、教学工作的基本建设。

4. 阐明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与相关学科关系的一般

理论。指导中共党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指导中共党史文献学吸取各相关学科中合理的、有用的理论、方法,取长补短,推动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建设、发展,把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建立在更高的层次上。让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也能为各相关学科服务,带动、推动各相关学科的发展。

5. 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学。扬弃各种历史文献学、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各个学科的科学方法,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文献学的体系、理论、方法,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先进的中共党史文献学的体系、理论、方法。使中共党史文献学的体系、理论、方法不断发展。

6. 研究、阐明改革、开放时代对中共党史文献工作、中共党史文献学的要求。总结新时代国内外中共党史文献工作、历史文献工作、中共党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成败得失。指导、推动中共党史文献工作、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改革,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

三、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也有某些特殊性。

1.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解说,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反之,用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就不能成为科学。中共党史文献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当代社会的关系如何,与社会形态变化、时代变化的关系如何,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系如何,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如何,与阶级、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与政治、政治斗争的关系如何,中共党史文献产生、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各种各类的、正面反面的中共党史文献怎样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要正确地回答、解决这些问题,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不行的。对中共党

史文献进行社会、时代的分析,进行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分析,进行阶级分析,进行本质和现象的分析……这在中共党史文献的研究中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而要正确进行这些方面的分析,要引出科学的结论,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行。哪些中共党史文献的作用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反动的;如何发挥中共党史文献的积极作用,如何转化中共党史文献的消极作用,这也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以上列举的问题,都是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进行研究,或者研究无法深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是无法正确解决以上这些理论问题的,而且不会去研究这些问题,是反对研究这些问题的。

在论述文献学研究方法、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时谈到的一些问题是可以参见的。如从客观存在出发,详尽地占有客观对象的资料,而不是从先验的理论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从一成不变的模式出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这对于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是完全适用的。又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论,可以指导、改造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可以和一些具体的方法结合起来、糅合起来运用,可以不断地扬弃旧方法、吸收新方法,这对于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总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是要发展的,是不能包罗一切方法的,是要不断吸收新的科学的方法的。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这一点对于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中共党史文献学的方法论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2.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是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政党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的组成部分,后者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和方法的组成部分。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带有政党的属性,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用政党的理论、方法来研究,而要使这种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政

党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什么是政党,政党是怎么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长、壮大、无产阶级政党内政党、领袖、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应怎么产生,无产阶级政党的接班人应怎样培养,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制度应是怎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政府应是什么样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相互间的关系应怎样,无产阶级政党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应怎样,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政党内的斗争,怎样分析、评价中共党史人物的功过、作用、怎样评价中国的政党制度……这些问题在研究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时是必然要遇到的,是无法回避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认识,就影响到对中共党史文献的价值判断。比如,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必然的产物,与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俄国人强加的,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产物,是偶然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在评价中共创建时期的文献时显然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再如,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与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实行集权制,或者应松散,这些不同的认识在评价中共党建文献时显然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那么怎样才能对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作出正确的解答,这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认为政党是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产物,不是少数人主观愿望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在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中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等等。只有用这样的政党理论、方法去分析中共党史文献,才能对中共党史文献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才能分辨什么样的中共党史文献是正面的、积极的,什么样的反面的、消极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方法去研究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使这门学科成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方法,也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停滞不前,就背离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就会脱离科学的轨道。

3. 中国传统的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方法可以借鉴、改造、完善。比如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辨伪方法、校勘方法、训诂方法、辑佚方法、版本研究方法、目录学研究方法等等,包含有一定的科学性,在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中可以借鉴,在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也可以借鉴。只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改造、完善中国传统的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的方法就可以在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中大放光彩。比如韩荣璋等《一场巧破狡敌毒计的斗争——关于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问题的真相》一文,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辨明所谓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上接连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伪造(详见《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第12-13页)。这里就借鉴了某些传统的辨伪方法。比如廖正本曾用革命文物、文献校勘《毛泽东选集》初版本,发现正文和注释都有讹误之处,于是写了《建议用文献文物校订〈毛泽东选集〉》一文(载《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廖正本借用的就是某些传统的校勘方法。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在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首先就收集了《农村调查》的多种本子。比如关于《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找到了1934年1月发给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们的两个调查的油印单行本,分别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两个油印本的正文前还印有调查的日期,提供材料人的姓名、职务和所在的村名或任职的时间等。将这油印本与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本校勘,发现1941年延安本缺少两段文字,于是按照油印本作了补充。还发现了其他讹误,也作了订正。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传统的版本研究方法、校勘方法。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在注释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如《寻马调查》中“奴古”一词,最后查证清楚是客家话,意为“男奴仆”,于是作了准确的注解。又如《才溪乡调查》中谈到“青黄不接时要吃‘羊蹄子’”,“羊蹄子”是何物?经过查证,是一种蕨科植物的根茎,于是作了科学的注释。这里借鉴并发展了传统的训诂方法(详见1983年2月

12日《光明日报》文《文献编辑和调查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编辑记事》)。再比如,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长期以来只能见到残本,因为此文的最早发表在《顺直通讯》第2期上,《顺直通讯》已经残缺了。中央档案馆在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时,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保存的俄文本(当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编辑的《中国问题》1929年第1期发表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译出了所缺的前半部分,这样《党的机会主义史》的中文全本得以重新问世。这是一种辑佚的方法,也是传统辑佚方法的发展。中共党史的早期文献中已佚或残缺的文献不少,往往通过辑佚的方法,使一些已佚、残缺的文献重见天日,如中共“一大”的有关文献就是如此。从以上事例足见中国传统的一些文献研究方法,在今天的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仍然可以借鉴,可以发展,可以完善之。

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借鉴、改造、完善,在论述文献学研究方法、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时,已有所论述,可以参见。

4. 引进、改造西方新颖、先进的文献研究方法。西方国家的文献贮存、检索、管理、研究已电子计算机化,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此同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也在西方的文献研究中普遍采用。这些方法,中国的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可以引进、改造、运用,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也可以引进、改造、运用。中共党史文献正以极快的速度增加。新文献增加之快,自然不必说。旧文献的增加,也随着党史资料工作的展开、深入,速度很快。在天文数字的文献面前,如只靠手工进行贮存、检索、管理、研究,无异于蜗牛爬行,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且有些计量项目的研究,手工根本无法进行。这说明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手段亟需更新。如果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能电子计算机化,能引进、改造、运用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方法,那么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也将在很多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比如1994年7月18日《中国教育报》报道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研究员杨少俊与人联合,研制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软件,称为“特色理论”系统软件,共有总论、体系继承发展、检索查询、量化统计、研究文献等

六大部分、50 个分题。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搜集、整理、研究的一个新成果,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为这方面的文献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新文献的产生、搜集、整理贮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显然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这个软件系统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解为 100 个思想论断,这又是邓小平思想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此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软件也研制成功。这些软件已投放市场。中共党史文献由印刷型转化为机读型,电子计算机化,并公开投放市场,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文献大概是首例。又如,近年来,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各部门,包括党史研究工作部门、档案馆等,纷纷建立、开通了各自的网站,已经通过这些网站阅读、搜集党史资料、文献。这些都是中共党史文献采用现代化手段、方法的一个良好开端。随着电子计算机在中国社会的日益普及,相信不久的将来,更多的中共党史文献,甚至所有的中共党史文献都将实现电子计算机的贮存、检索、研究利用。到那时,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将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关于引进、改造西方新颖、先进的文献研究方法,在论述文献学研究方法、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时已有所论述,可以参见。

人类社会在向现代化迈进,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而且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所有学科,包括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都在不断更新,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自然也要随之不断更新。方法的更新,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只有在方法上跟上科学研究方法更新的步伐,学科建设才不至于落后,才有无限的前途。

四、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的意义

1. 普及中共党史文献知识,推动中共党史文献工作发展。不懂得中共党史文献的一些基本知识,是不能做好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从前面论述的中共党史文献的研究对象、内容、目的、任务中可以看到,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及学科建设,将使人们了解、懂得中共党史文献、

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一些基本知识,从而更好地展开中共党史文献工作,把这项工作提高到一个理性的高度。

2. 从事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人员及领导者,可以提高素养,做好中共党史文献工作。通过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懂得和掌握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贮存、整理、加工、编纂、利用等等的方法,就可以使中共党史文献工作进一步优化、标准化、进一步现代化,使中共党史文献工作更好地为各方面的工作服务,使中共党史文献工作实现更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使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日益增值。

3. 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人员及领导者,可以更好地研究、利用中共党史文献,使中共党史研究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是中共党史文献。一个中共党史研究者,如果不懂中共党史文献怎么搜集、怎么整理、怎么辨别真伪、怎么校订讹误、怎么运用、怎么解释,就无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共党史研究者。而懂得了中共党史文献的一些基本知识,那么就如鱼得水、驾轻就熟、研究工作就能做得扎实严谨,有深度有高度,成绩自然就大。

4. 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共党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文献几乎包罗了各行各业的历史文献。从事政治领导工作的人、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懂得一些中共党史文献及其工作的基本知识,就可以更好地用党史文献为政治工作、理论工作服务。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懂得一些中共党史文献及其工作的基本知识,就可以更好地用党史文献为文学艺术工作服务。从事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科技工作、教育工作,总之,各行各业的人,只要懂得一些中共党史文献及其工作的基本知识,都可以更好地用党史文献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服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具体文献,各行各业也都离不开,但是,如果连这些文献怎么去找,哪里去找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利用这些文献呢?所以,各行各业的人都懂一点中共党史文献的基本知识,是有必要的。

5. 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共党史文献工作、中共党史研究工作,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工作,反过来就会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建设。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自然会推动中共党史文献学

的建设。而各行各业的人,如果都懂了一些中共党史文献及其工作的知识,都来推动中共党史文献工作,那么也将大大推动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大家都重视中共党史文献工作,中共党史文献学建设的社会需求就更大、更迫切,就会为中共党史文献学开辟日益广大的市场,日益广阔的前途。

五、中共党史文献学是一门新兴的、有待开拓的学科

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但就目前而言,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理论研究,几乎还是个空白。对于具体的中共党史文献进行研究、考证、校勘的文章有不少发表,但对中共党史文献学进行理论研究的文章极少。郭军丽《党史文献学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是第一篇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理论问题的文章。

但此文对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很多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作深入的探讨、论述。文章谈到党史文献学说:“党史文献学是以党史文献资料(不包括实物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讲究搜集、鉴别、校勘、考证、编纂党史文献资料为中心内容,以立好、立准党史文献资料,推进党史学研究为直接目的的一门学问。它属于党史研究法的范围,是党史学基础性的辅助学科。”^①这里对党史文献学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眼光似乎狭窄了些。因为没有看到中共党史文献的范围广大、包罗万象,所以只把中共党史文献学看作是为党史研究服务的辅助学科,没有看到它能为现实社会服务、为各行各业服务的作用。以后周一平发表《中共党史文献学理论问题初探》(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4期),对中共党史文献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有了系统的研究。但这个研究领域的著作还未见出版过。应该说,中共党史文献学是一门新兴的、有待开拓的学科。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还有待于探讨、建设。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著作,近年来已陆续出版了10余种,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者们仍认为:“从学科体系上看,历史文献学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23页。

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其理论建设还是初步的、不成熟的。”^①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建设如此,一本著作还没有出版的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建设只能说处在萌芽状态了。

中共党史文献学是一个新兴的、有待开拓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建立还需要很多有志于这门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努力。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在这项宏伟工程的建设中添一块砖,并为这项工程的建设呼吁一下,以引起更多的人来重视、投入这项工程的建设。

^① 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 第三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

第一节 类型

搜集中共党史文献,从搜集的主体来分,可以分为单位(机构)和个人。不同的主体搜集中共党史文献的内容、范围会有所不同。从搜集的内容、范围来分,可以分为专题搜集和无专题搜集。专题搜集和无专题搜集,涉及党史文献的范围,所需要的工作量是不同的。

一、单位搜集

从事中共党史文献收集的单位、机构,在中国国内是很多的,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中央和地方的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各行各业中的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像军队系统的党史、军史研究机构,工会系统、工业系统的党史、工运史研究机构……),各地的革命纪念馆(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井冈山革命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毛泽东故居纪念馆、周恩来故居纪念馆、刘少奇故居纪念馆、瞿秋白故居纪念馆……),各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机构等等。不同的单位搜集中共党史文献的范围、内容会有所不同。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搜集、贮藏的中共党史文献的面是很广泛的。中央和国家级的一些单位和机构搜集、贮藏的党史文献也较广泛,特别注重于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文献、有全国影响的文献、特别重要的文献的搜集、贮藏。一些地方单位机构,一些行业单位、机构,一些各地的革命纪念馆,一般注重于与本单位有关的党史文献的搜集,当然也不排除搜集与本单位无关的文献。了解单位的性质、特点及其搜集、收藏文献的范围、特点,对于单位和个人的文献搜集都是必需的,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文献到什

么地方去查找。比如查找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献资料,自然首先要去的地方是中央档案馆。比如查找社会主义时期的印刷型党史文献资料,这方面资料收藏较多较全的要数国家版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全国所有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包括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都要上交数册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的图书来源即各出版社上交的图书,自然收藏的党史文献出版物就较多较全了。北京图书馆因为经费多、设备等条件都很好,所以收藏的党史文献出版物也较多。尽管国家版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出版物多,但并非就能包罗全国所有的印刷品、所有的印刷型党史文献资料。有些党史文献资料,由单位自行印刷,作为内部资料收藏、交流、上交上级机关,并非通过出版社出版,这样的党史文献资料,如果不是单位赠送,版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不一定能收集到。比如近年来各地都在编写党的组织史资料,编写地方革命史、地方党史。其中基层单位的一些成果,某些县的成果,就自己单位铅印了,没经过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献资料版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就未必能收集到了,而县的、地区的、省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党史研究机构,可以由文献印刷单位的赠送,收藏之。还有各地编写的地方革命史、地方党史的油印文献资料,中央、国家级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未必能收集到,而地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则有可能收集到。一般来说,非正式出版的铅印、油印党史文献,哪个单位编写、印刷的,就到那个单位去查找,较有把握。

中央和地方档案馆是收集、贮存中共党史文献的重要单位。档案馆不仅主动收集档案文献,也接受单位、机构、个人赠送、移交的档案文献。建国初,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过《征集革命文物令》,1951年7月,中共中央发过《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195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过《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又要求各地各单位广泛收集党史资料。在收集党史文献资料方面,档案馆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各级档案馆收集、保管档案文献的范围,国家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如1960年4月,国家档案局发的《关于集中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的通知》,规定凡属中共中央和中央局一级机关的档案和书刊、照片等由中央档案馆收藏。省市级机关以

及省市以下各级革命组织的档案资料,1937年7月以后形成的,由各省级档案馆收藏,1937年7月以前形成的,由中央档案馆收藏。已故革命活动家的著作文稿、日记、笔记、信件、照片等,中央委员以上的由中央档案馆收藏,其余由省市级档案馆收藏。80年代以来,国家档案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85年国家颁布了《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仍规定中央机关的档案由中央档案馆收藏,地方机关档案由地方档案馆收藏,但收集的对象已大大扩大了。比如各行各业的有长久利用价值的档案,比如典型个体户、专业户的具有长久利用价值的档案,比如各级民主党派委托保管的档案,都可以由相应级别的档案馆收藏。中央和地方的一些专门性的档案馆,则分别收藏相应级别的专门性档案。如中国照片档案馆收藏有全国意义的照片档案或复制件。地方照片档案馆则收藏有地方意义的照片档案或复制件。了解各级各地各行各业档案馆收藏档案文献的范围、特点,对于各级各地各行各业档案馆做好本职工作是必要的,对于单位和个人有的放矢地搜集档案资料也是必要的。

二、个人搜集

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是必须搜集中共党史的各类文献的,否则就无法进行研究和教学。这类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人员在全国的数量是很多的。这类人员搜集中共党史文献的数量、质量相当可观。比如胡乔木生前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导者、专家,全国各出版社出的有关中共党史的图书都送给他,他收藏的中共党史出版物不亚于某些图书馆,甚至可以超过某些图书馆。再如叶永烈写过一些纪实文学类的党史著作,写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人的传记,他搜集的这些人物的文献资料数量、质量都很可观。

有些藏书爱好者,会搜集、收藏中共党史方面的图书。一些革命老干部、军队老干部,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是与党一起成长的,他们是党的历史的创造者、见证人,他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对有关中共党史方面的图书有特别的爱好,喜欢收藏中共党史方面的图书。他们收藏中共党史的图书,可以引起美好的回忆,可以寄托对已牺牲的战友的思

念,可以寄托对党的事业的希望,也可以有助于撰写回忆录,对中共党史研究作一些贡献,也可以用来教育子孙后代。比如有的老同志,购买了全部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并把它作为珍贵的遗产传给后代。有些藏书爱好者,会从文物价值、版本价值来收藏一些珍贵的、有价值的党史图书,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已经不多见的中共党史图书。如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就被一些收藏者收藏。

有些人爱好集报,这些人会收集中共党史方面、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报刊杂志。有些人收藏的报刊,甚至会孤本,在图书馆都无法找到。

有些人爱好集邮,这些人会搜集中共党史方面的各种邮品。比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发行的邮票、邮寄的实寄封,已经成为集邮爱好者搜集的珍品。再比如中共党史人物的邮品,也成为集邮爱好者搜集的热门,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为题的邮票、实寄封、原地封、极限明信片等等邮品都是抢手货。有些以党史人物命名的地方邮戳也成为集邮爱好者搜集的对象。比如中共党史的事件,也成为集邮爱好者搜集的热门。有的编制抗日战争史邮集,有的编制红军长征邮集。红军长征邮集,甚至在全国邮展上获银奖。再比如中共党史人物邮票的该人物后代、亲属、好友的签名封,当代名人的签名封,也成为集邮爱好者的搜集热门。

有些人爱好集票证,这些人会搜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各个时期发行的票证,比如粮票、油票、布票等等。

有些人爱好集火花,这些人会搜集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各种火花。

……

以上列举的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收藏,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些中共党史文献不仅有收藏价值,也有研究价值,甚至还可以起宣传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也有人爱好收集某个历史时期的党史文献资料,如搜集“文革”时期的党史文献资料。有些个人搜集的“文革”时期的党史文献资料,数量、质量已相当可观,甚至超过某些图书馆的收藏。

三、专题搜集

先确定一个专题,然后围绕这个专题搜集党史文献,是专题收集。比如专门搜集某一个中共党史人物的文献资料,搜集某一中共党史事件的文献资料,都是专题文献资料搜集。中共党史研究者个人的文献搜集,大多是专题搜集。因为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者研究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往往进行一些专题研究,这样可以使研究深入,所以文献资料搜集以专题为多。单位进行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也有搞专题的。一些地方、行业的党史研究机构,往往进行与本地、本行业有关的党史研究,所以也就进行这方面的党史文献的搜集,这也是专题搜集。一些中央、地方的档案馆、博物馆,要编某党史人物的文集、研究文集、回忆文集等,要编某党史事件的资料集,要编一些专题资料集、专题照片集等等,都要进行专题文献资料的搜集。咨询业在当代很发达,党史文献的咨询、中共方针政策等的咨询,是咨询业务中不可缺少的,这需要被咨询的单位做好党史专题文献的搜集、贮存工作,建立党史专题文献信息库……可以说,中共党史文献的专题搜集,在党史文献搜集是一种普遍的搜集方法。

专题搜集在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很重,很有意义的。首先,专题文献资料是整个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题文献资料能搜集得好、整理得好,整个中共党史文献也能够搜集得好、整理得好。如果全部党史文献是一座大厦,那么专题文献便是一块砖、一块石,没有砖、石就没有大厦。其次,专题文献资料对中共党史的专题研究来说是基础,是前提,没有专题文献资料,也就无法进行党史专题研究。专题文献资料搜集工作做得如何,也决定着党史专题研究的水平、成果如何。最后,中共党史文献专题搜集,很多是党史研究迫切需要的,也有很多是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的。专题党史文献的搜集能更好地为中共党史研究服务,也能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

中共党史文献的专题搜集,确立专题的题目是关键。题目对于搜集工作的成败,往往有重大的影响。如何选题、定题,各个单位、各个个人可以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各方面的需要来决策。但一般来说应注意

以下几点：

1. 符合社会需求，有社会意义

进行中共党史专题文献资料的搜集，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钢要用在刀刃上，力量投向哪里总有轻重缓急之分。什么是“重”？什么是“急”？首先要从社会需求出发。所谓社会需求，应是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比如中国所处的改革开放时代、四化建设时期，需要总结改革开放、四化建设的经验教训，那么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文献资料的搜集、研究就成为迫切的任务。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中共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文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文献……这些专题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正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又如当前反腐败斗争是社会的紧迫任务，那么反腐倡廉经验教训文献、党内的有关文件、领袖们以身作则的风范的文献等等的搜集、整理、出版，就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再如中国海峡两岸关系是当前的紧迫问题，那么国共合作经验教训的文献，“一国两制”理论的文献等等的搜集、整理、出版，就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再有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多变，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中共与各国各党派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举足轻重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文献等的搜集、整理、出版，也是时代和社会所需要的。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并且可以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需求，可以由各行各业的社会需求组合而成。中共党史专题文献的搜集可以从社会总需求出发，也可以从社会的某方面的需求出发。比如党的教育工作、党的文艺工作，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是亟待深化改革的，教育工作、文艺工作经验教训文献等的搜集、整理、出版，也是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的需求又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分，党史专题文献的搜集一般应主要从社会效益出发，只要是符合社会需求的、有社会意义的专题文献，那怕暂时经济效益差，也应搜集、整理、出版。一旦产生社会效益后，经济效益也就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反映出来。有社会效益的中共党史文献的出版，可能出版社得不到很多经济效益，但全社会能得到经济效益。比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出版社能得到的经济效

益可能并不大,但出版后产生的社会效益转化成经济效益,中国全社会获得的经济效益,将是出版社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无法比拟的。

2. 符合中共党史研究的需求,有学术意义

中共党史文献的专题搜集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为中共党史研究服务。专题的确立也可以从中共党史研究的需求出发。中共党史研究的需求,有的会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出发,也有的会从现实社会的需求出发。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来说,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一些重要人物,首先需要研究,这方面的专题文献资料首先需要搜集、整理、出版。近年来已经搜集、整理、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但还需要再搜集、整理、出版更多的资料。从现实社会的需求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史最迫切需要研究,这方面的专题文献资料急需搜集、整理、出版。近年来,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出版了一些,但不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文献资料出版的多,所以这方面文献资料的专题搜集、整理、出版需要进一步努力,并加快速度。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需求与社会需求,在某些方面是统一的。比如加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既是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需求,也是社会需求。又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历史上、“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要进行重新审查、纠正,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重新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有很多既是党史学科体系建设需要的,又是现实社会需要的。比如“富田事件”研究、西路军研究,刘少奇研究、彭德怀研究、张闻天研究等等,都是现实社会需要的,也是党史学科体系建设需要的。像张闻天研究的深入,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重新确立,一部分党史重新改写,这推动了中共党史的整体研究和学科建设。张闻天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张闻天文集的出版,特别是张闻天晚年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其经验教训的一些理论思考的文章重见天日,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从整个党史研究来说,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研究、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有一些问题有待于研究、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有更多问题有待于研究、解决。中国共产党还在发展,党的历史还在不断续

写,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还会不断涌现。党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党史文献专题搜集的题目。

3. 有新义

有社会意义、学术意义的中共党史主题文献,首次搜集、整理、出版,其社会价值、学术价值都是大的。但是相同的文献重复出版,其价值就大打折扣了。特别是某个专题文献资料已经出版,再去搜集这个专题的文献资料,再整理、出版,这种重复劳动毫无意义和价值。这说明在确立专题时,既要考虑社会意义、学术意义,也要考虑是否有新义。所谓新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有新的价值。新题目有新价值,这是有新义。新题目无新价值,这就无新义。旧题目有新价值,这也是有新义。旧题目无新价值,这自然无新义。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新需求,党史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新需求,围绕这些进行党史文献的专题搜集,那么这些专题的题目是新的,也有新价值,有新义。党史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是从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转化来的。比如偶然发现新文献资料,而其中反映的问题是从未遇到过的、是从未有人提起的,于是这条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便提出了新问题,便围绕这个新问题再专门搜集有关文献资料。这样的专题文献搜集无疑是有新义的。这是新题目有新义。那么旧题目有新义怎么理解呢?比如某个专题的文献资料已经出版过,后来又发现了这个专题的新文献资料,于是出版“补编”、“续集”。这种“补编”、“续集”,题目虽旧,文献资料却是新的,有新价值,自然有新义。又如某些出版过的文献是残缺的、不全的、有遗漏的、有讹误的,后来发现了全本、精本,可补以前出版本的不足,可订正出版本的讹误,于是出版“修订本”,出版“第二版”、“第三版”……这种修订本、再版本,虽然题目仍旧,但文献资料有了新东西,这样仍有新价值,有新义。

有没有新义,应成为专题文献搜集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只有不断求新,专题文献搜集才能向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党史文献的搜集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党史研究的发展。如果不追求新的价值、新义,那么党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就不会发展,党史研究也没有发展的基础了。

4. 量力而行,统筹安排

量力而行,就是立专题要从现有的条件出发。对单位来说,首先应从本单位已经收藏的文献出发,而不要舍近求远。比如地方单位,可以从本单位收藏的地方党史文献出发,进行地方党史专题文献的搜集,而不必进行全国党史专题文献的搜集,也不必进行跨单位的专题文献搜集。比如山东省的有关单位,可以搜集、整理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解放战争、山东改革开放等等的专题文献,而不必去搜集、整理其他省的党史专题文献,也不必去搞全国性的党史专题文献。对个人来说,一方面可以从自己已有的研究题目、文献积累出发。比如研究某一个题目已很长时期了,有关文献已有一定的积累,可以继续搜集文献,继续研究。像硕士学位获得者、博士学位获得者,可以在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或加深文献的搜集,作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从本人所处的单位出发。在军事单位,可以从事党的军史方面的文献资料搜集、研究。在经济单位,可以从事党的经济史方面的文献资料搜集、研究。单位在江西,不妨搜集、研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五次反“围剿”的文献。单位在陕西,不妨搜集、研究陕甘宁边区、延安保卫战等等的文献。从单位出发,就可以发挥、借助单位的优势,从而在专题文献的搜集、研究方面占优势,反之就会劳而无功,或劳而功少,或得不偿失。试想在江西单位的人去搜集、研究延安文献,在陕西单位的人去搜集、研究井冈山文献,不利用可以利用的优势,自然会劳而无功、得不偿失。

量力而行,还要注意题目的大小。对于单位来说,如果几个单位联合搜集、整理一个专题文献资料,那么题目不妨立得大些,规模、篇幅也不妨大些。如果一个单位独立搞一个项目,题目不妨立中型的。如果时间要求紧,那么题目可小些。如果时间要求不紧,那么题目可大些。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几个人合作搞一个项目,题目不妨大些。如果一个人单独搞一个项目,题目不妨小些。如果打算十年、廿年搞一个项目,题目可以大些,如果打算一二年搞一个项目,题目可以小些。

统筹兼顾,是量力而行的保证。统筹兼顾,首先是全国范围内的计划性与统筹安排。要把全国范围内的党史专题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

定出一个全面的长远的规划,使各地各单位的计划、各地各单位各人的计划与之相适应、相配合。哪个单位搞哪个专题,哪个人搞什么专题,作出全国性的统一计划、统一安排。这可以避免各单位各人的盲目性、重复性,提高党史文献搜集整理的整体工作效率。其次是各单位要有自己的全面、长远计划,统筹安排本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像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党史文献多,先搜集、整理哪方面的文献,哪个题目的文献,后搜集、整理什么,要有长远计划,要统筹安排。一些地方党史机构,要研究的地方党史的课题也不少,要搜集的专题文献的数量也不少,轻重缓急,怎么统筹安排,是必须考虑的。只有统筹安排好,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最后,个人也要有长远计划、统筹安排。一个人的能力、财力、时间都是有限的,要研究的项目也不少,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计划,作好统筹安排,自然可以提高效率,多出成果。

四、无专题搜集

专题搜集是一种有限的、重点搜集,无专题搜集是一种广泛的、相对全面的、相对无限的搜集。档案馆收藏档案,可以根据本单位的收藏范围,广泛地搜集、接受相应级别的档案,可以多多益善,不必立什么专题去搜集、去限制搜集。这相对于专题搜集来说就是“全面”、“无限”的搜集。但档案馆接受的档案文献,又必须是有长久保存价值的,这样它接受的档案文献又有所限制。此外,只接受相应级别的档案,也是一种限制。还有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有分工,收藏文献有各自的特色,这也是一种限制。再有档案馆分综合性档案馆、专科性档案馆,各种性质的档案馆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这也是一种限制。这说明无专题的搜集是一种相对“全面”、“无限”的搜集。图书馆收藏图书、报刊,除了国家级图书馆可以尽量全些,地方图书馆一般都受到财力、物力、人力、设备的限制,很难“全”。即使中央、国家级的图书馆,也未必能搜集、收藏所有基层单位自行印刷的图书、自办的报刊。有些藏书爱好者、集报爱好者等等,他们搜集的文献资料,可以很广泛,可以无专题地搜集,但他们个人的财力、设备、库房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搜

集、收藏。

无专题搜集中共党史文献,在党史文献搜集中,也是一种常见的办法,是一些单位和个人常规搜集方法。

无专题搜集在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中也是不可缺少,很重要、很有意义的。1. 无专题搜集是保存中共党史文献的必要手段。只有广泛地搜集、贮存党史文献,党史文献才能尽可能地得到保存。2. 无专题搜集党史文献,是整个党史文献工作的基础工作,是基本建设。基础工作做好了,基本建设搞好了,整个的建设才能搞得更好,重点建设才能搞得更好。3. 无专题搜集,是专题搜集的基础。专题文献的搜集,少不了要去档案馆、图书馆等处,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专题文献可以在里面找到,因为档案馆、图书馆等收藏了很广泛很丰富的文献资料。档案馆、图书馆搞专题文献搜集整理项目,往往从自己单位的馆藏出发,如果没有广泛搜集文献的基础,没有丰富的馆藏,也就没有搞专题文献搜集、整理的可能。无专题搜集为专题搜集建立良好的基础,反过来,专题搜集,又可以丰富、带动无专题的搜集,可以成为无专题搜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 无专题搜集为中共党史的全面广泛研究奠定基础。专题文献为专题研究服务,全面广泛的文献才能为全面广泛的研究服务。从而也可以全面广泛地为现实社会服务。广泛、无专题搜集党史文献,是党史文献建设的需要,是中共党史研究全面建设的需要,是现实社会多方面需求的需要。5. 无专题、广泛搜集中共党史文献,有助于发现新史料、新文献。比如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在接受这些档案以后,进行整理时便发现了中共“一大”的有关文献。再比如20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征集党史文献资料的活动,发现了很多新史料、新文献。20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征集党史资料活动,也发现了很多新史料、新文献。有很多新史料新文献会在广泛的文献搜集中无意之中发现。比如彭明到莫斯科访问,想了解莫斯科藏有哪些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资料,在一资料目录中无意看到了吴玉章的著作《八一革命》,于是设法找到该书稿,并复制一份带回国内交出版社出版。吴玉章是南昌起义的亲历者,他1927年12月22日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作了关于南昌起义经过的报告,以后又

修订补充,1928年5月30日写定为《八一革命》。吴玉章的这本书不仅有党史史料价值,也有党史研究价值。彭明的这个新发现,对党史文献建设、对党史研究工作是一个大贡献。

无专题搜集,要不要注意轻重缓急呢?回答是肯定的。比如老同志、老干部和年轻同志相比较,应先搜集、整理老同志、老干部的回忆资料、访问资料。这就是所谓抢救活文献资料。在老同志、老干部中,有的是党内重要人物,有的是一般人物,应以抢救重要人物的文献资料为先。比如民主革命时期的文献资料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献资料相比较,从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原则出发,应先搜集、整理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献资料。社会主义时期各个阶段的文献资料相比较,应先搜集、整理改革开放时期的文献资料。再比如历史事件文献资料,有重要历史事件和次要历史事件之分,有民主革命时期事件和社会主义时期事件之分,一般来说,应先搜集、整理重要历史事件、社会主义时期事件的文献资料。

无专题搜集,要注意轻重缓急,但注意了“重”、“急”,也不能忘了“轻”、“缓”。不能只搜集“重要”、“急迫”的文献,而不去搜集不重要、不急迫的文献。否则,文献搜集的面就不广泛了,就不能做好文献的基本建设了。这就需要在考虑孰轻孰重、孰缓孰急的同时,也要考虑轻重缓急的统筹安排,做到突出重点,又兼顾全面。有时在搜集“轻”、“缓”文献时,也能发现“重”、“急”文献。

第二节 原则

无论是单位或个人进行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无论是作专题搜集或无专题搜集,有一些基本原则是应该了解、懂得、掌握、遵循的。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是:

一、历史原则

历史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历史分析法的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党史文献搜集中的具体运用。历史原则的主要

之点是尊重历史,从客观历史出发,还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1. 这就要求在搜集党史文献时实事求是,客观历史形成什么文献资料,客观历史存在什么文献资料,就搜集什么。没有形成的文献资料、不存在的文献资料,决不能在搜集过程中编造。这方面的反面例子如“文革”时期为了要打倒刘少奇,就用强制的手段迫使某些人编造了一些刘少奇的“历史罪证”。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原则的。这些“搜集”到的编造文献是伪文献。2. 为了尊重历史,最好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能得到文献的原件最好。不能得到文献的原件,就应设法复印、拍照、设法得到文献原件的复制品。如果用手工抄写文献原件,抄写完毕后应当场校对,以免有抄误之处。3. 为了尊重历史,要在搜集文献的同时,把每一件文献的制作者及其情况搞清楚,把文献的来源、背景搞清楚,把文献的形成、流传情况搞清楚,并作好尽可能详细的记录,把这些记录作为文献的附录。这对于以后考证该文献的真伪将有很重要的作用。4. 只要是历史形成的文献,不管现在看上去是否顺眼、是否有悖今日之常理,都不能遗弃之,都要搜集。文献真伪的辨别是搜集完成以后的事。文献价值的评价,也要待研究之后进行。

二、全面原则

全面地详尽地占有历史文献资料,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文献资料搜集工作的基本要求。这是文献资料工作、历史研究工作避免片面性,实现科学性的基础和保证。中共党史文献工作、中共党史研究工作也要遵循这个原则。

从党史文献的总体工作来说,要全面建设,有关中共党史的所有文献资料都要搜集,不能有某些遗漏、忽略。这也是无专题文献搜集的全面性原则。中共党史文献的基础工作、基本建设实现了“全面性”,也就为专题搜集等的“全面性”创造了条件。

搜集文献资料的全面性在多方面都可以得到体现、贯彻。比如搜集文献资料既要注意纵向的全面性,也要注意横向的全面性。纵向的全面性就是从头至尾的文献资料、来龙去脉的文献资料都要搜集。横向的全面性就是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角落的文献资料都要搜集。

还要注意文献资料类型的全面性。即印刷型文献、手写型文献、缩微型文献、机读型文献、视听型文献、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原始史料文献、传抄史料文献、撰述史料文献、文艺史料文献等都要搜集。比如搜集某一党史事件的文献资料,那么既要搜集这一事件从头至尾如原因、背景、结果、影响的所有文献,也要搜集所涉及的人物、团体、党派的文献,党的方针政策、社会反映等各方面的文献;既要搜集有关的档案文献、报刊文献、图书文献,也要搜集视听文献;既要搜集原始史料文献、传抄史料文献,也要搜集撰述史料文献、文艺史料文献。比如搜集某一历史人物的文献资料,就要搜集他的档案文献,他的著作、文章、日记、书信,他的照片、录音、录像,他的思想文献资料、工作文献资料、生活文献资料、家庭文献资料,社会、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回忆等的文献资料等等。就是搜集他的著作、文章,也要搜集已经发表的和尚未发表的,搜集著作、文章的原稿、修订稿、草稿、清稿、发表以后的批改稿等等。比如搜集某一次会议的文献资料,就要搜集会议筹备、召开过程的各种文献资料,搜集会议的工作报告、决议案、小组讨论记录、大会发言稿等等,搜集会务方面的文献资料(如通知、报到证、出席证、签到簿、财务账据等),还可以搜集与会人员的文献资料及社会宣传、反响、影响的文献资料等等。

搜集文献资料的全面性,不仅要注意文献种类的全面性,也要注意文献资料形成的全面性。文献形成有一个过程,有的文献形成较快,有的形成较慢。如电报,虽形成较快,也有起草、修改、审定、签发、发报、收报、存档等过程。一个会议文件、一本著作,形成较慢,要经历草稿、初稿、二稿、三稿、四稿……定稿、印刷、讨论、修订等过程。全面搜集文献,就要把一件文献在形成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搜集起来。不同形成阶段的文献,都有其各自的价值。把各个形成阶段的文献形式都搜集起来,对于研究这一文献的形成、发展是必要的、有帮助的,并且可以从中了解、研究文献制作者思路、思想的发展变化。比如“文革”时期批评刘少奇 1949 年 4 月前后的“天津讲话”鼓吹“剥削有功”、“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文革”后对“天津讲话”作了重新评价,而重新评价“天津讲话”的基

基础就是把“天津讲话”的全部内容都搞清楚,把全部文献资料、背景资料搜集齐。“天津讲话”,是由 17 次不同场合的讲话、包括插话组成的,至少要将这 17 次讲话的全部记录稿都搜集到,才能进行重新的研究、评价。

全面搜集文献资料,还要注意文献间的联系性,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献。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联系,文献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互相联系。文献的联系性,可以提供查找文献的线索,使文献的搜集更加全面。如见到某批示,就要继续找批示的对象报告、简报等。见到复文、回信、回电,就要设法找到来文、来信、来电。见到计划,就要去找总结……

全面搜集文献资料,还要力求每件文献的完整性。完整无缺的文献资料比残缺的文献资料,其资料价值自然高。找到了残缺的文献,就要设法去找完整无缺的文献,或设法将其补全。文献的外在形式,或许无法补全,但文献的内容、文字,是有可能补全的。

全面搜集文献资料,一方面要将已经有线索的、旧文献资料搜集齐全,另一方面要努力搜集尚未有线索的、尚未与世人见面的、尚未被利用的文献资料。有些文献是个人的制作品,保存在私人手中,从未公开过。有些文献是单位、机关的制作品,被单位、机关束之高阁,从未有人问津。有些未公开过的文献,甚至会被当成废纸遗弃。这类从未公开过的文献,一旦挖掘出来,就是新文献资料,就有各方面的价值。文献搜集得全面与否,是否能在旧有的文献范围内有所突破,是否发现了新文献,是衡量的标准之一。搜集旧文献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搜集新文献更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一般来说,新文献资料是不会很容易就被发现的,不会很容易就能到手的。

三、理性原则

无论从事什么样的文献资料搜集工作,只有对所搜集的对象资料有理性认识,文献资料搜集工作才能做得好,反之,就做不好。

对于中共党史文献的理性认识,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工作,看起来是一种资料工作,不是理论研究工作。

作,但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不同阶级、不同世界观的学者,都在从事资料工作,但他们从事资料工作的思路、思想、方法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党史文献学,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就是要阐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加工、利用等。马克思主义要求从事资料工作的人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这样搜集文献资料的思想、方法就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这方面理论修养,搜集文献资料的思路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搜集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文献资料,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么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会去搜集中国工人运动及其对中共诞生产生影响的文献资料,搜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对中共诞生影响的文献资料。这样展开搜集,就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而有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承认中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认为是俄国人搞的,是几个知识分子搞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会去搜集俄国人、知识分子成立共产党的文献资料。这样展开搜集,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这说明,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工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只有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才能不偏离科学的轨道。

对于中共党史文献的理性认识,其次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搜集中共党史某一阶段的文献,搜集某一党史事件的文献,吃透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做好文献搜集工作,否则,就做不好。比如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事件的文献资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文革”,如何在理论上、宏观上认识“文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应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去认识。《决议》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从《决议》出发,“文革”及其事件的文献资料应怎么搜集就“心中有数”了。西方的一些学者,把“文革”看成是个人的权利之争,甚至认为“文革”是两个“文革”,一个是共产党内争权夺利的“文革”,另一个是群众反对共产党的“文革”。他们从这方面去搜集、挖掘文献资料,自然就走进了歧途,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了。

河北省唐山市委党史办陈平,是四十年代在冀热辽“无人区”坚持抗日斗争的老同志,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党史研究人员,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无人区”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出版了专著,填补了党史研究的空白。他为什么能在“无人区”的文献资料搜集工作、研究工作中取得卓越成绩?他在谈体会时认为,首先要提高理性认识。他在“无人区”坚持斗争过,对“无人区”有感性认识,但缺少理性认识,缺少对“无人区”的宏观、全面的认识。于是他首先研究中央和分局的一些重要文件,吃透中央的“精神”,搞清楚敌人为什么要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在“无人区”进行斗争。理性认识提高了,宏观认识清楚了,于是如何搜集、整理文献资料的思路、线索就清楚了(详见陈平《撰写专题资料的几点体会》,载《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4期)。这是党史文献搜集、整理的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以上说明,提高理性认识,对于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是极为重要的。理性认识的正确或错误,深或浅,直接影响文献资料搜集的思路、范围、专题的设立等等。

四、保密原则

在搜集中共党史文献时,会涉及到非机密文献资料和机密文献资料。如果见到了、搜集到了机密文献资料,那就要遵守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严格保密,不能泄密。得到的一些机密文献资料,也应送交有关部门保管。文献资料的解密、公布权在党和国家,任何个人无权公布属于党和国家机密的文献资料。198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曾转发《关于“中央特科”历史宣传问题的报告》,规定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央特科”的文献资料不准随便发表。198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了一个文件《关于编辑出版回忆地下斗争读物应当注意问题的通知》,强调凡是中共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的白区工作和地下斗争、历史上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的重大问题及特殊案件、涉及民族纠纷、对台工作、外事工作等的有关文献资料,必须报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审核后,再决定取舍、是否发表。这些都强调了搜集、整理党史文献时的保密原则。

党和国家的机密文献资料必须保密,某些非机密文献也有某种程度的保密问题。比如发现了一些文献资料与现行的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符合,或者与党和国家的某些历史结论不相同等,这些文献资料并非是机密的,但公布以后会使党和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失,那么这些文献资料也不能随便公布。如果搜集到此类文献资料,应上报中央有关部门。比如关于朱德 1924 年以后入党的资料,就是不能随便公布的(详前)。

第三节 步骤、方法

一、制定计划

任何工作要做得好,都要事先制定计划,党史文献的搜集工作也是这样。无论是单位搜集、个人搜集、专题搜集、无专题搜集,事先制定一个计划,工作就可以进行得顺利些、效率高些。制定计划,就可以明确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对于一个单位或多人的搜集工作来说,就可以明确分工,明确谁做什么工作。

搜集党史文献的目的只是贮存,那么就制定搜集和贮存的计划,明确搜集什么、贮存什么、怎么搜集、怎么贮存、什么地方贮存什么。搜集党史文献的目的是整理,比如要整理、出版某种资料集、某种文集,那么需要制定搜集和整理的计划,明确搜集什么、怎么搜集、怎么整理。搜集党史文献的目的是研究,比如要写一篇论文、写一本著作,那么就制定搜集、整理和研究的计划,明确搜集什么、怎么搜集、怎么整理、怎么研究。

要定好计划,就要搞好调查研究,要集思广益,要向有关专家请教。还要充分利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充分利用各种工具书,并可以编制一些有针对性的、实用的工具书。

有了一个好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可以说文献资料的搜集已成功了一半。一个不好的计划实施时会不顺利,一个好的计划实施时也未必一帆风顺,修改计划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时时的检查,发现新问题、未预料到的、计划外的问题,要及时讨论对策解决

之。如果需要修改计划,也应果断决策,修改、调整计划,以保证计划能继续顺利实施,圆满达到预定目标。

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一般是可以如期、保质保量完成的。当然由于工作的努力,计划提前完成也是可能的。计划的提前完成,自然是好事。如果计划不能如期完成,或者延迟了,或者迟迟不能完成,这就需要检查、反省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找到症结,设法解决之。决不能因为没有如期完成计划,就气馁、丧失信心、甩手不干了。还是应该恢复信心、勇气,齐心协力,坚持下去,无论如何一定把计划完成。否则,将在各方面都是个大损失。在党史文献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订了计划而结果半途而废的事也是有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吸取。

二、搜集有线索的文献

在制定党史文献的搜集计划时,已经了解和掌握了一些文献的线索,那么这些已经有线索的文献自然应先搜集。在搜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查找文献和实地考察之别。查找文献,一般就是到图书馆、档案馆查找旧文献。实地考察,可以通过调查、访问,记录口碑史料,发现一些新文献。一般来说,可以先查找文献,然后再实地考察。查找文献,也是先查找有线索的文献。

搜集已有线索的文献资料,一般步骤和方法应是:

1. 从地理位置上考虑,应先近后远,由近及远

即先从本单位的馆藏搜集起。无论是单位或个人搜集党史文献资料,都应从本单位的馆藏出发。本单位已有的文献资料,就不必到其他单位去搜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本单位的馆藏文献资料搜集完毕,再设法搜集本单位没有的文献资料。到外单位搜集,也应先本地区、本省市,然后再外地区、外省市,先国内,然后国外。

2. 先查检索工具

制定计划需要先查些工具书,实施文献的搜集仍需要先查工具书。比如到图书馆找书,就要先查目录,一是查查有没有,二是如有,就记下分类号、登录号,以便借阅。找报纸、刊物,也需要先查目录,查查有没

有及其分类号、登录号。到档案馆查档案,也要先查档案目录、案卷目录。到一个单位,无论是图书馆、档案馆等,可以先咨询一下该单位的文献资料有哪些现成的工具书或检索工具。有的单位可以通过计算机检索,就不必去查卡片了,不必去查目录书了。有的单位没有计算机检索,有目录书,就可查书,不必去翻卡片。就是查卡片,也要了解一下卡片的类型,书名卡、文件卡、作者卡、分类卡都有吗?查哪种类型的卡片方便。有的单位有读者目录、公务目录之分,普通图书目录、内部图书目录、特藏图书目录等类别,了解这些目录,自然便于按图索骥。到一个单位搜集文献资料,了解了该单位的检索工具,不妨有目的或无目的的,有重点或无重点地通过检索工具大致浏览一下该单位的馆藏文献目录,或许会有意外发现。到一个单位搜集文献资料,既能把预定要搜集的文献搜集到手,又能把未预定要搜集的或打算到别的单位去搜集的文献也搜集到手,那就真正不虚此行。每个单位的馆藏都在发展、变化的,有意外的发现是自然的,也是意料中的事。

3. 按一定的顺序搜集

各类文献的搜集不可能同时进行,总有先有后,那么孰先孰后呢?大致如下:

①先搜集与专题有直接关系的文献,再搜集与专题有间接关系的文献。

②先搜集原始史料文献,再搜集传抄史料文献,再搜集撰述史料文献,再搜集文艺史料文献。

③先搜集主要的、重要的文献,再搜集次要的、不重要的文献。

④先搜集正面的文献,再搜集反面的文献。

三、搜集无线索的文献

一般来说,通过各种检索工具能查到线索的文献,是有线索的文献,查不到的文献,是无线索的文献。各种检索工具能检索到的文献是有限的,有很多已形成的中共党史文献是没有公诸于世的,或是没有被各种检索工具记录的。文献搜集工作要做得好,做得有深度广度,就需要在搜集无线索的文献上下功夫。在这方面下了功夫,搜集到了一些

无线索文献,使一些无线索文献变成有线索文献,这样资料工作就向前发展了,否则,等于停留在原地。

无线索的文献是否就无法搜集了呢?不是的。无线索的文献并非是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只是还未被发现、未被发掘罢了。搜集无线索的文献,一般是进行实地考察、访问有关人物。比如某一党史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就到那里去考察一下,访问一些当地的人,或许能发现一些新文献资料,至少可以将当地的口碑史料记录下来,转化成文献资料。对于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及其后代,也可以去访问一下,或许他们能提供一些新的文献资料,提供一些文献资料的线索,也能提供一些口碑史料。比如《茅山地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的编纂者们,就到茅山地区访问了群众,并访问了曾在那里坚持斗争的老同志43人。群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老同志们有的献出了他们珍藏的日记、会议记录等,有的撰写了回忆录。这就使这本资料集有广度深度,质量也高。

要搜集到一些无线索的文献,一定要做个搜集文献的有心人,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一个搜集文献的有心人,才会千方百计、孜孜不倦地去“钻”,有一点线索、一点信息就会去“钻”。一个无心之人,哪怕文献送上门来,也会蒙在鼓里,失之交臂。比如要搜集一个人物的无线索的文献资料,他的家属、后代现在在哪里,他的同事、部下等现在在哪里,他在哪些地方、哪些部门、哪些单位工作过,这些都需要去了解,而且有些是要费一番周折才能了解到的,不做个有心人是了解不到的。无心之人,就是和某些党史人物的后代坐在一起开会,也不会知道搜集资料的良机已到。报刊、广播、图书等有时也会有某些党史人物家属、后代的消息,有心之人,就会时时处处留心,一有信息就跟踪追迹。无心之人,会连党史人物家属、后代的名字都不知道,哪里还能捕捉转瞬即逝的信息呢?搜集无线索的文献资料,还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持之以恒,不断积累。这样信息、线索就会越来越多。否则,得到一点线索、信息,查不到什么结果就放弃,不再继续努力,这样最终就不会有什么收获。很多线索需要由甲及乙,由乙及丙,由丙及丁……辗转查找,才能有所收获,没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往往半途而废。当然,一个搜集文献资料有恒心的人,也是一个有心人,不是有心人,也就没有恒心,反过

来,没有恒心,也谈不上是个有心人。

四、常规方法

1. 复制、复印

为了保持文献资料的原貌,搜集文献资料最好复制、复印。复制、复印,都需要在复制、复印后校对一下,看看是否有复印不清楚之处、复制错讹之处。

2. 拍照、缩微

有些年代稍久的文献,纸质发脆,或者纸质原来就不好,如果复印,就会损坏原件,收藏单位只允许拍照、缩微。拍照缩微后,只需要检查是否漏拍、重拍,内容、文字一般可以不校对。

3. 抄录

即手工抄写。将所需要的文献资料抄写在纸上。手工抄录速度慢,效率低,且会有误差。如果雇人抄写,其代价也不低。为了更多保持原件的原貌,抄录应注意:甲、按原件行款抄录。原件竖排,抄录时也竖抄。原件横排,抄录时就横抄。原件一页几行,每行几字,抄录时也如此。原件抬头或换行,抄录时也抬头、换行。原件低一格、低二格……之处,抄录时也依样低格。原件有标点符号就照抄。原件没有标点符号,抄时也不加标点符号,以免随意标点出差错。这样可以保持原件的格式、气息。乙、按原件的字体抄录。原件是繁体字,抄录时就用繁体字。原件是简体字,就用简体字抄。丙、严格校对。无论是自己抄或雇人抄写,都要将抄件与原件从头至尾仔细校对。任何人抄写,都难免出差错。有时会有笔误,有时会多一字,有时会少一字,甚至少一行、二行,少一页,还会窜行、错页等等,只有严格校对,才能保证抄件与原件的文字完全一致。

4. 记录

调查、访问当事人需要做记录,开座谈会也需要做记录。记录的方法有多种。最好的方法是录音,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这样形成的文献较能保持提供时的原貌。手工文字记录,有速记和不速记之别。速记,记录的内容多一些。速记以后,要进行整理。不速记,记录的內

容少一些,一般只能记录大概内容,提供资料时的文字、字句,可能也会有所变动。记录以后也需要整理。无论是录音以后整理成文,或者手工文字记录以后整理成文,都必须交提供资料的本人审阅。只有本人审阅认可以后,资料才能作为文献可以适当使用。本人审阅时提出要修改,就要根据他的要求修改。本人提出某些内容不能公开,那么就得尊重本人的意愿。

5. 做搜集文献目录、笔记

每个文献搜集者到一处搜集文献,都要随时做笔记、目录。如果到某处没有搜集到某文献,记下一笔,可以供以后搜集、别人搜集参考。如果搜集到某文献了,也可把经过情况、遇到、发现什么问题记下来,供以后整理参考。如果是实地考察、访问,时间、地点、人物、经过都要记一记。人物的大概情况也可记一记。供整理时用。已搜集到什么文献,要随时编目录。有了目录,一便于随时检索;二可以避免重复搜集;三可以有助于发现各种版本,互相校勘;四如果是多人搞一个项目,或单位搞某个项目,每个人搜集到的文献都编好目录,及时交流,有利于搜集工作的统筹兼顾;五有目录便于文献的分类、存放、整理。

以上列举的是搜集文献资料的最常用、最常见的方法。此外,购买图书资料、报刊资料,购买缩微胶卷等,也是一种搜集文献的方法。购买文献资料,到书店、图书馆、档案馆等去购买。只要消息准确,在本地可以上门购买到,在外地,可以通过邮购的办法购买到。购买到的文献资料,只要没有质量问题,不需要退换,做好购买文献目录就行了。

有人把搜集的方法归纳为“即类以求”(求同类文献)、“旁类以求”(求相关类的文献)、“因代以求”(求某一时代的文献)、“因地以求”(求某一地区的文献)、“因人以求”(求某一人物的文献)、“因家以求”(求某一流派的文献)、“求之公”(求之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求之私”(求之个人)等^①,也是可以参考的。

^① 张君炎等《档案文献编研学》,上海交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4页。

◆第四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

无论是单位或个人搜集中共党史文献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或搜集了一个阶段以后,就要将搜集到的文献进行整理。搜集的目的是贮存,搜集到文献必须按照贮存的要求、体系进行整理以后,才能贮存。搜集的目的是整理、编纂、出版文献资料集,自然要将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搜集的目的是研究,写论文、著作,也必须把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然后才能排比、研究。把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一方面是为了以后更方便、更有效地利用它,发挥它应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搜集工作的检查、小结,如果发现搜集工作的不足、发现有的文献还没有搜集到,就可以弥补之。

文献的整理,一般分两步:第一步将各种各样的、零散的、杂乱无章的、甚至是堆积如山的文献有序化,即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或者说使之体系化、系统化,即按一定的体系、系统排列起来。这一步的整理,首先有助于文献的存放、贮存,其次有助于文献的检索。第二步对文献的具体内容进行整理。比如要整理、出版文献资料集,要在文章、著作中引用文献,就必须对文献标点、分段等,甚至对文献作一些校勘、考订等。这一步的整理,使文献由原始状态进到规范状态、标准状态,有助于文献的利用,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第一节 有序化整理

一、文献分类

文献的有序化整理,主要是将文献按一定的顺序、体系排列起来。按什么样的顺序、体系排列文献,可以根据文献的特点,根据收藏单位的特点,根据文献搜集的目的、任务等决定。文献通常的排列顺序、体

系有以下几种：

1. 以文献制作者分类

哪个单位制作的文献归在那个单位的名下,什么人制作的文献归在这个人的名下,而不论文献的内容、载体、年代等,这是以文献制作者分类的文献整理法、分类法。档案文献的整理,一般采用这种方法,并称为“全宗”原则和方法。对某个单位或某个人物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也可采用这种方法。

以文献制作者分类的整理,是一种大分类、大体系。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物的文献很多,杂乱堆放在一起还是不行的,还需要进一步整理,还需要再分类。这进一步的整理分类,对于一个人物的文献来说,一般按时间顺序分类,即按年月日的先后将文献排列起来。如果是同一时间的文献,再按内容或问题分类。如果有不同载体的文献,那么可以在时间分类之下、问题分类以下,再按载体进行分类。这样整理,一个人物的文献资料一般可以条分缕析各有所归。对于一个单位来说,也可以按时间顺序,按问题,按载体进一步进行文献分类整理。同时还可以按组织机构分类。一个单位有很多机构、很多部门,比如中共中央就有很多部、局,那么中共中央的文献,还可以按部门、机构分类,按部、局分类,按处、科分类,进行整理。至于先按机构分类,还是先按时间、问题分类,可以根据文献的特点、机构的特点等决定。比如某机关已经撤销,那么一般应先按机构分类整理文献资料,然后再按时间、问题分类整理这一机关的资料。人物和单位文献资料进一步分类的问题分类,也是一般分类,其中具体的分类还可以有很多,可以根据文献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分之。总之,最终的整理结果,要使每一件文献都各归其位,每一件文献都有序化、系统化。

2. 以文献内容分类

文献属于什么内容,就归在那个内容的名下,而不论文献的制作者、制作年代等,这是以文献内容分类的文献整理法、分类法。图书馆整理图书、论文等一般采用这种方法。对于某个事件、某个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也可采用这种方法。

以内容分类,是文献分类的一个大系统,其具体的分类办法,已经

有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对于中共党史文献的分类,是先按历史阶段分类,再按历史事件分类,党史人物另外分类(详前)。那么相同内容的文献怎么再分类,“《中图法》”一般按制作者分类。这是便于图书馆收藏文献、检索文献的方法。而作为专题文献的整理者、研究者,对于相同内容文献的再分类,可以按制作时间分类,即制作、形成年代早的文献排在前,年代晚的文献排在后。这样分类,有助于研究文献之间的联系。

《中图法》将中共党史文献分在政治类,而不是分在历史类,把中共党史文献与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文献截然分开,这对于图书馆管理文献也许有用,但对于专题文献的整理者、研究者未必适用。比如把解放战争的文献,分成“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两类,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很难分的。把“文化大革命”的文献,分成“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两类,更没有必要,更难分。进行专题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文革”文献自然应当全部归在一起整理、研究。

《中图法》对中共党史文献的分类,分到大事件为止,同一大事件的文献再怎么细分,自然可根据具体内容而定。某些专题文献的整理、研究,是小事件,甚至是很小的事件。这种小事件的文献资料怎么再具体分类整理,也要根据具体内容而定。

3. 以文献制作、形成时间分类

文献什么时间制作、形成的,就归在那个时间的名下,而不论文献的制作者、文献的内容等,这是以文献制作、形成时间分类的文献整理法。地方党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党的组织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等,一般采用这种方法。比如编写地方党史、地方革命史,编写地方党史大事记,就需要将有关的资料先按年代进行排列。要编写编年体的各类党史,包括全国党史,也需要将搜集到的资料先按年代进行排列。编年体党史著作的编写,有一件必须做的工作是编“资料长编”,所谓“资料长编”,就是将搜集到的所有文献资料,按时间的先后排列起来。对一个党史人物作编年体的研究,首先的工作也是将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这就是所谓一个人物的“年谱长编”,也叫“资料编年”。

以时间分类,一般按年、月、日分类。年代不同的文献,按年代先后分类。年代相同的文献,按月份的先后分类。月份相同的文献,按日期的先后分类。日期相同的文献,可以按时辰的先后分类,也可以按问题、内容分类。因为一般的文献资料的形成,时辰或上午、下午、晚上是不记录的,事后也就遗忘、无考。只有少数的文献资料记录了形成时辰,比如电报,有的就标注了时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再比如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逝世的。有明确时辰的文献,在文献分类和排列时可以考虑时辰的先后。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是1949年10月1日下午二时召开的,总要排在开国大典前面,而不能排在开国大典后面。日期相同的文献以问题、内容再分类,这对于一个人物的文献资料来说比较简单,一个人在一天里从事的工作、活动不会很多的。对于地方党史、对于全国党史来说,就复杂得多。比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文献的分类,比如工业、农业、商业、外贸文献的分类,比如各单位、各层次文献的分类等等,都是需要统筹安排的。

4. 以文献类型分类

不同类型的文献各分一类,而无论文献的制作者、制作年代、内容,这是以文献类型分类的文献整理法。比如视听型文献为一类,机读型文献为一类,印刷型文献为一类,手写型文献为一类等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献,贮存的方法是不同的,如果不分类型,将不同类型的文献堆放在一起,这给收藏、贮存带来不便。所以单位收集文献以后,首先会以文献类型分类,将不同类型的文献放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箱、柜、架上。个人搜集文献以后也会将不同类型的文献分开存放。

以文献类型分类整理文献,对于不同类型的文献分别整理有利,但对于专题文献的统一整理就不便了。

以上是整理文献的一些主要分类方法。此外,还可以按地域来分类。但这种分类一般配合其他分类进行。还可以按文种分类,如汉文文献一类,各少数民族文字各一类,英文文献一类,俄文一类、日文一类等等。

二、标题、标引

党史文献只有分类才能有序化,怎样才能进行分类,怎样才能组织和实现分类,这就必须将文献标题、标引。文献没有标题、标引,就无法分类、归类,有了标题、标引,分类、归类就方便了。

1. 标题

文献没有题目、题名、名称的,需要加一个题目、题名,这就是标题。文献原本已经有题目,比如图书、论文等都已经有了题目,就不必再标题了。有些档案文献、有些调查、访问文献,有些书信、电报等等,原本没有题目,就需要标题。

标题有两种基本类型:单份文献标题和多份文献组合标题。无论哪种类型的标题,其基础就是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然后进行准确的概括、提炼,给文献定一个恰如其分的题名。

如何标题,一般可以从这几方面去考虑:文献制作者、文献内容(问题)、文献形式(类型)、文献制作时间、文献制作地点、文献的接受者等。一个文献的题目,能将以上六个方面都反映出来,就比较完美了,这样无论将文献怎么分类,都比较方便,既可以按制作者分类,也可以按内容分类,也可以按时间分类,也可以按文献类型分类,甚至还可以按地域分类。如果不能将以上六个方面都反映、都概括,那么一般应将前四个方面反映出来,这样也便于将文献进行四种主要类型的分类。比如毛泽东曾填写过一份《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那么这份文献的题目可定为:“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1925年11月21日)。”这个题目就将文献制作者、文献内容、文献形式(类型)、文献制作时间反映出来,实际上也将文献接受者反映出来。这么一标题,这份文献无论怎么分类都很方便。当然这份文献已成为档案文献,自然首先归入毛泽东档案全宗。有了这个标题,这份文献归入毛泽东全宗以后再怎么分类,也很方便,比如可以按制作时间分类。又如1992年春,邓小平到武昌、上海、深圳、珠海视察,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这一组文献组合起来,可以定题目为:“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春)”,也可以具体一点定题目为:“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

海、上海等地的讲话(1992年春)。”这个题目将文献制作者、文献形式、文献制作时间、文献制作地点反映出来,实际上也将文献接受者反映出来,只是文献的内容没有反映出来。邓小平讲话的内容主要是谈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要反映文献的内容,就需要加“关于改革开放”等字。当然,这一组文献,如果只按文献制作者分类,那么文献内容不反映也无妨。如果要按文献内容分类,那么文献内容就必须反映出来才行。

文献标题的诸方面内容,长期以来已形成一定的规范。主要是:

①文献制作者标法:制作者是单位、机关,标明单位、机关的全称。制作者是两个以上的机关、单位,一般应将全部机关、单位标出,也可以标出领衔机关、单位后加“等”字。制作者是一个人,标出制作者真实姓名,而不标字、号、笔名等。真实姓名无考,则标笔名等。制作者的职衔,在某些文献上也可以标出。制作者是多人,可以将每一个人都标出,也可以标出领衔之人后加“等”字。

②文献内容(问题)标法:文献内容是一件事,将这一件事概括、提炼,然后标题。文献内容是多件事,这些事又有主次之分,可以标出主要事件的内容,然后加“等”字。如多件事无主次之分,则可将多件事均概括、提炼标出。

③文献形式(类型)标法:文献是视听型文献,可以标明“录音”、“录像”等。文献是手写型的,可以标明“信”、“日记”、“电报稿”、“会议记录”等。文献是印刷型的,可以标明“书”、“论文”、“报告”、“计划”、“图”、“表”、“通告”等。档案文献,还可以标明“档案”。

④文献制作时间标法:一般应标出年月日。时辰明确的,可以标出时。年月日应以公元纪年标之。阴历要换算成公历标之。1949年以前的民国纪年,也应换算成公元纪年标之。原文献缺年月日,应考之。考出年者,标年。考出月者,标月。考出日期者,标日期。考出大概日期,可标“约……”或“不迟于某年月日”、“不早于某年月日”等。考不出日期,缺之。凡标出的年月日是经过考订的,应加注说明。年月日无考,亦应加注说明。决议、法令、布告等文献应标明通过日期、公布日期等。一般公务文件,应标明发文日期,缺发文日期,可标出收文日期,并

加注说明。

⑤文献制作地点标法：地点应尽量详细标出。能标出省份，就标省份。能标出县，就标县。能标出乡、村，就标乡、村。地名有变动，应标文献制作时的地名，然后加注说明地名变动情况。比如可以先标出旧地名，然后再注明今地名。如地名相同，容易混淆者，除详标省县乡之外，可再加注说明。

⑥文献接受者标法：电报、信函等一般应标明文献接受者，如“某某致某某电”、“某某致某某信”。接受者是单位，标明单位。接受者是个人，标明个人。其具体注意事项可参见文献制作者的标法。

文献标题的基本要求是：

①准确。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概括要准确。二是文字使用准确。分析、概括准确，就是要对内容、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然后作准确的概括。制作者，制作日期、地点，制作形式，接受者都要搞清楚、搞准确。不要望文生义，张冠李戴。文字准确，就是要字、词达意，可信、真实。

②客观。党史文献是历史的产物，一经形成以后，又要被长期地利用，这需要文献的标题尽量客观。一件党史文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不仅供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也供社会各阶层、供全世界人使用，这也需要文献的标题要客观。标题的客观，首先是尊重历史。文献是怎么样的、文献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标题。文献中的一些有历史特征的语言、词汇，不用把它们现代化，而可以一仍其旧。其次，褒贬得当，尽量使用一些中性字、词。第三，感情色彩不能太浓。比如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就称“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或“蒋介石政府”、“蒋介石军队”即可，不必称“伪政府”、“伪蒋政府”、“蒋匪军”。对蒋介石也不必加上“卖国贼”、“窃国大盗”等字。

③文字精炼。标题不能冗长。能省的字、词尽量省之。最后要做到不能增省一字。精炼就是要简明扼要。就是要抓住文献内容的关键、实质、突出重点。表述时，揭示出主要内容，揭示出主题即可，不必叙述过程，不必作形象性描写。精炼和准确是互相联系的。要精炼就

要用字准确,用字准确才能精炼。

④文字质朴。标题不能过分修饰,要质朴无华,而不能华而不实。给文献标题,不是报刊上作宣传。报刊文章的标题、新闻报道的标题,要求生动活泼,富于艺术性、趣味性、鼓动性,可以用成语,用诗句,用对联的形式等。文献标题讲求质朴,实实在在。只有质朴才能精炼,要精炼非质朴不可。

2. 标引

标题,是给文献分类打一个基础。标引不仅给文献分类打基础,而且与文献分类直接结合起来。

标引,主要是对文献的内容特征进行分析以后,给文献加上一定的标识符号。这个标识符号既是分类的标识,也是检索的标识。

标引,最常见的是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分类标引,一般是依据一定的分类法,给文献标上分类号码。主题标引,一般是依据一定的主题词表,给文献标上主题词。

从图书、论文的分类来说,国家标准就是《中图法》,应按《中图法》进行图书、论文的分类标引。比如《中图法》中“党的会议及其文献”的标引是“D22”,“党史”是“D23”……(详前)就应该参照标引。档案的分类,国家标准就是《中国档案分类法》(简称“《中档法》”)。《中档法》分类与《中图法》略有不同。共分19个大类:

- A 中国共产党党务
- B 国家政务总类
- C 政法
- D 军事
- E 外交
- F 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
- G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
- H 科学研究
- J 计划、经济管理
- K 财政、金融、保险、审计
- L 商业、旅游业、服务业

M	农、林、牧、渔业
N	工业
P	交通
Q	邮电通讯
R	城乡建设、建筑业
S	环境保护
T	海洋、气象、地震、测绘
U	标准、计量、专利

其中“A 中国共产党党务”又分为：

1	会议
2	组织
3	纪检
4	宣传
5	统战
6	对外联络
7	文献研究
81	党史
82	党校
83	政策研究
84	政治运动
9	其他

其中“81 党史”再按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等分类。档案文献的分类标引应该参照《中档法》进行。

主题标引的国家标准是《汉语主题词表》、《中国档案主题词表》等。党史文献的主题标引可以参照之。

标引的具体方法，一般是先对文献内容、主题进行分析，提炼出主题概念，然后按照预定的标引类型，依据国家标准，选择和组配恰当的标引符号。进行分类标引，可以按照《中图法》或《中档法》，选择、组配恰当的标引符号。进行主题标引，可以按照《汉语主题词表》、《中国档案主题词表》等，选择、组配恰当的词语。最后将选定的分类标引符号

或主题词语,标在文献上,标在文献袋上,或将符号、词语标在签条上,再把签条贴在文献上或文献袋上。标引的基本要求是准确。首先,是对文献内容、主题分析、提炼要准确。其次,选择、组配标引符号、词语要准确。标引不准确,出差错,分类也就出差错,接下去编目、储存也会出差错,于是给检索造成困难、麻烦。

党史文献完成标引以后,文献的分类已经确定,文献的排列顺序已经确定,文献的贮存顺序已经确定,这样文献就可以有序化地排列和贮存了。

三、著录、编目、编制索引

文献的有序化整理,不仅是为了让文献排列、贮存有序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文献的检索有序化。党史文献的搜集、贮存,重要的目的、任务在于利用。而要方便利用,就必须检索方便。要使检索方便,就要使检索有序化。怎样才能使检索方便、有序化呢?这就要在完成文献的分类、标引以后,再进一步做些工作,比如著录、编目、编制索引等,也就是编制检索工具。

1. 著录

要编制文献的检索工具,首先要将文献进行著录。对文献的各种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并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上,这就是著录。通过著录,可以将文献的各种特征反映在一定的载体上,然后方可组合、编制成各种检索工具。

党史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著录的标准和方法也多种多样。文献著录的国际标准有《国际标准文献著录》、《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等。中国国家标准有《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普通图书著录规则》(GB3792.2-85)、《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GB3792.3-85)、《非书资料著录规则》(GB3792.4-85)、《档案著录规则》(GB3792.5-85)、《地图资料著录规则》(GB3792.6-86)、《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GB3793-83)、《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87)等。进行文献著录时,可按文献的类型,参照相应的标准。图书文献的著录,一般要记录图书以下几项特征:书(题)名、副题名、责任者(作者)、版本、文

文献特殊细节、出版发行、载体形态、丛编、附注、文献标准编号及有关记载、提要、获得方式等项。已经分类、标引的图书,要记录标引号码,比如分类号码。档案文献的著录,一般要记录档案以下几项特征:题名、并列题名、副题名及说明题名文字、责任者、文件编号、密级、保管期限、形成时间、载体形态、数量及单位、规格、附件、附注、提要、分类号、档案馆(室)代号、档号、缩微号、主题词等项。如果档案的形式是卷、册、袋,即多份文献的组合,著录时除了对数量要有详尽的说明外,还要对案卷内文件的起止时间作详尽的说明。以上列举的著录项目是比较完整的,完成以上的项目著录后,文献的特征就基本上反映出来了。以上的图书著录项目中又可以分为主要项目和选择项目两种。主要项目指:题名中的正题名、责任者中的第一责任者,版本,出版发行中的出版地或发行地、出版者或发行者、出版日期或发行日期,载体形态。其他项目就为选择项目。在著录时只著录主要项目,通常称为简要级次;著录主要项目外,还著录部分选择项目,称为基本级次;著录全部项目,称为详细级次。档案文献也可相应比照定级。

文献著录的方法又分为基本著录、综合著录、分析著录等。基本著录,就是详细级次的著录,对文献的特征作全面记录。基本著录后形成的款目是通用款目,成为各种类型编目的基础。在通用款目上加上题名标目,就可以编制题(书)名目录,加著者标目,可编制著者目录。综合著录,主要是指对丛书、多卷本书、期刊及其他系列性出版物进行整套著录。综合著录,一方面要对多卷本、连续性、大型的出版物作总体特征进行记录,另一方面也要对各分卷、分册的特征作分别记录。分析著录,主要指对一套文献的某一部分或一本文献的某一部分作特别的著录。比如丛书中的某一本书,比如文集的某一篇文章,比如一本书的某一章。这种著录是为了将特别重要、极有价值的文献揭示出来。比如解放社1938年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一本文集,收入毛泽东《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张闻天《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等10篇文章,那么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文章就可以分别作一分析著录款目。基本著录、综合著录、分析著录的项目、格式略有不同。

著录的载体形式主要有卡片、书本、磁带、磁盘。著录在卡片上,将卡片整理后按一定的分类编排起来,就成为卡片式的检索工具。著录在书本上,再编制适当的目录、索引,就成为书本式检索工具。通过电子计算机著录在磁带、磁盘上,就成为机读型检索工具。而且著录在磁带、磁盘上以后,还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的打印系统,打印卡片、书本,这就使卡片式检索工具、书本式检索工具的制作电子计算机化了。机读型检索工具,检索速度快、效率高,是著录、检索的发展方向。

著录工作是文献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做好它,就必须严格按国家标准进行。著录时不要漏略某些项目。著录要准确。为了保证著录的准确,每件文献完成著录后,应该进行校对。关于著录的标准和原则等,可以参见刘苏雅《中文文献编目》第三章《文献著录标准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等。

2. 编目

文献经过标引、著录,各种特征都已经揭示、记录下来,一件文献的记录,便形成一条款目。按照一定的分类,将这些款目有序地编排起来,编成一定的目录,形成目录式的各种类型的检索工具,就是编目。编目是在著录、标引基础上进行的编制文献检索工具的工作。

中共党史文献的种类很多,收藏单位很多,分类方法也有不同,所以可以编制各种不同文献类型的目录。以各种不同内容的文献,还可以编制各种专题目录,如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目录、毛泽东著作目录等。同一类文献、同一单位收藏的文献,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检索需要,编制不同类型的目录,比如书名目录、分类目录、主题目录、作者目录等。又如公务目录、普通文献目录、内部文献目录、机密文献目录。机密文献,还可以根据保密级别,编制密级不同的文献目录。

在图书馆还可以看到一个地区图书馆或全国图书馆的联合目录。联合目录的最大特点是揭示出某一本图书、某一件文献收藏的地点,收藏单位。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逐步普及,图书馆、档案馆等的文献管理,逐步电子计算机化了,于是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编目,已逐步推开。1988年北京图书馆中文采编部开始采用计算机编目。1990年开始试生产、发行《中国机读目录》。1991年1月开始正式出版发行《中国机读目

录》。这个《中国机读目录》是中国国家标准机读目录。其中著录的中国出版物包括图书、连续出版物、地图、乐谱、音像文献等。虽然不是中共党史的专题文献目录,但其中包括了中共党史文献。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中国的出版物都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反映,那么《中国机读目录》著录的文献都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文献。《中国机读目录》的问世,实现了编目的自动化、检索的自动化,效率高、速度快,同时也为中国文献数据库的建立、为国际书目信息交换奠定了基础。这自然也推动了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目自动化工作,推动中共党史文献数据库的建立。

编目应向联合编目、集中编目发展,以利于最终实现书目控制。

编目使用的载体,即目录载体,主要有卡片、书本、磁带、磁盘。以磁带、磁盘为载体的机读目录正方兴未艾地发展。

3. 编制索引

目录和索引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如著者目录和著者索引就很相似,但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目录一般记录文献的表面特征,索引则可深入到文献的内部,揭示文献内部的各种特征。编目一般将各种书、各种报、各种杂志、各件档案编成各种类型的目录。索引不仅可以将各种书、各种报、各种杂志、各件档案、编制成各种类型的索引,还可以将各种书中的某些内容、各件档案中的某些内容、各报刊中的文章,编制成各种索引。从题名来说,编目一般只编书名目录,而索引不仅可做书名索引,也可以做书中的篇名索引。目录,一般书目、报刊目、档案目等都各为一类,互不混合,即使联合目录,也是书的联合目录、报刊联合目录、档案联合目录各为一类,互不混合。索引可以只就书,只就报刊文章、只就档案各做一种索引,也可以将书、报刊、档案中的共同内容做联合索引。目录,是一种检索工具,也是一种文献贮存工具,可以指导文献的贮存,可以指导文献的提取。索引,是一种检索工具,但一般不能作为贮存工具,比如,通过索引知道某书中有某内容,某刊中有某文,但该书分在什么类,藏在何处,该刊分在什么类,藏在何处,还需要查目录,查了目录才能提取到所需要的书、刊。索引的基本功能主要是揭示文献较深层次的内容,对文献查找起指引作用,而文献的具体提取

还要依靠目录。不过,如果不知道某文献中有某种内容,那就不会去设法提取该文献了。这样看来,索引是第一检索工具,目录是第二检索工具。

根据各种需要,可以编制文献的各种索引,常见的索引有:

①人名索引。人名索引有多种,主要是著者索引、文献中涉及的人名索引两种。著者索引,可将一个著者制作的所有文献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可供整理、研究某一个著者文献使用。文献中涉及的人名索引,可将文献中涉及到的所有人名,或重要人名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有助于通过文献查找某个人物的线索,也可以从中研究文献制作者与某个人物的关系。人名索引应以人物正名为主,人物的字、号、别名、笔名等可以加括号附于正名之后。正名缺,则以其他名标目做索引。

②题名索引。题名索引主要有书名索引、篇名索引等类。书名索引可将搜集到的书的书名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篇名索引,将文献中的篇名(书中的篇名、档案中的篇名等)搜集起来,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还有一种引用书索引,即将文献中引用过的文献题名,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这有助于研究某些文献的影响,或文献制作者与被引用文献的关系等。

③地名索引。将文献中出现的地名搜集起来,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有助于整理某地区的文献资料、某地区的党史文献资料。地名索引一般以现地名为主,旧地名则可括注于现地名后。一些基层地名所从属的县、省要搞清楚,以便把异地同名区分开来。

④主题索引。将文献各个部分涉及到的同一个主题的有关问题、名称、概念、关键词等摘出,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有助于整理某个问题、某个主题的文献资料。主题、问题有大小之分、等级之分。主题索引,可以以大题为纲,以小题为目。大题下可以有一系列小题,小题下还可以有一系列更小的题。主题、问题可以逐级分解。做索引时要抓住大题、小题,抓准关键词。有些词,有些名称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应作一些规范化的处理。可以用规范化的名词标目,将不规范的名词附注于规范名词之后。

⑤分类索引。将文献的主要内容概括出来,按一定的分类法排列

起来。其编制方式与编分类目录相似。分类目录一般以一件文献为单位编制。分类索引,可以以一件文献为单位,也可以一件文献中的一篇为单位编制。如果按照《中图法》、《中档法》编制分类索引,那么中共党史部分的索引,也与党史阶段索引、党史事件的索引、党史问题索引相似。分类索引与主题索引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同。分类索引分的类不会很细小,主题索引分的类可以很细小。分类索引严格按一定的分类法排列,主题索引则按词语的笔划或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分类索引,可供搜集、整理、研究党史专题文献用。

以上是中共党史文献索引常见的类型。此外,像语词索引,在中共党史文献编制的索引中就比较少见。

编制索引,事先须进行总体设计,决定索引类型、标目结构、索引的广度、深度等。制作索引款目,一般要记录以下诸项内容:索引标目(包括主标目、副标目、说明语)、索引注释、出处(如书、档案文献中的页码,报刊中的版码、栏码等)、附加代码等。其中出处一项特别重要,一定要注得明白、准确。索引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文献的出处,指导查找。出处不清楚、不准确,就失去意义了。款目制作完成,按总体设计将款目排列起来,就形成一定体系的索引。索引制作完成后,还应该编写一份索引编制体例、如何使用的说明。比如索引中的号码、代码表示什么、何意,总要说明清楚,索引才可供人使用。如果是书本式的索引,还要做些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等工作。为了使索引准确无误,款目索引完成后,都须仔细校对。

索引的载体有卡片、书本、期刊、机读等。机读索引正在日益发展。有的机读索引是人机合作编制的,即先由人工完成标目的选取及其他组成款目的数据,然后由计算机按格式进行款目编辑、排序、校验输入、排版打印等。有的机读索引是计算机依靠一定的软件自动编制,即计算机自动识别文献中表达主题内容的语词,自动标引,实现了索引编制的现代化。机读索引,是发展方向,相信会日益完善,逐步取代卡片、书本、期刊等载体的索引。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共党史文献能建立起与国际、国内著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检索系统,如 DIALOG 系统、OPBIT 系统等媲美的检索系统。

第二节 内容整理

党史文献的整理有较多的内容,比如校正文字、划分段落、标点,比如校勘、考证、辨别真伪,比如写研究报告、写工作报告。以下先谈校正文字、划分段落、标点等,校勘、考证将专章论述。

一、校正文字

中共党史文献中的手写型文献、档案文献,原件上的文字讹误是不少的。图书、报刊等文献,1949年以前的,文字讹误不少。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图书、报刊文献,文字讹误也有。比如错字、别字、漏字、衍文、文字颠倒等,都是文字讹误。此外,有些文献因为年久破损,或其他原因破损,使文献的字迹不清或文字残缺。这些都使文献文字的校正、修补成为文献整理不可缺少的一环。通过文字的校正、修补,使文献恢复原貌,更加规范化。

校正文字,1. 必须准确辨认原文。文字模糊不清,要设法辨认,比如放大辨认,比如与同类文字比较辨认。文字潦草,要研究潦草的规律,要与规范的草字进行比较。文字随意简化,可将各处相同的字,从语句、词汇中去比较。如果辨认不出,应缺之,或存疑,而不要猜定。2. 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上的流行语、用词习惯等要有所了解。比如新旧社会中使用的同义反序词是不少的:(新)斗争—(旧)争斗,命运—运命,决议—议决,介绍—绍介……以前常用的、习惯用的字词,不能因为与现在习惯不合就视为错误。以前同音通假的现象也较多,如贡献—贡献,竖立—树立等等。以前使用异体字也不少,如碁碁—棋,梨—契,寔—实,甞—氓等等。有些通假字、异体字,可能现在不流行了,但不能以为那些字就是错别字。3. 确系文字错讹衍漏等需要校正,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加注说明,指出为什么错,正字是什么,指出衍漏、颠倒等。二是在需校正之字后加括号注出正字、正词。可以用不同的括号,表示不同的校正。如用尖括号〈〉注正字,表示改错字。用六角括号〔〕括衍字,表示去衍字。用方括号[]注漏字,表示补漏

字。方框号□，是虚缺号。辨认不清之字，可用□，几字不清，用几个□。残损处，缺几字，也可用几个□。模糊不清、残损之字不可数，则加……并加注说明：“此处文字不清楚”，“此处残缺”等。模糊之字，最终辨认出来，则不必加□。残损之处所缺之字能恢复，则可在□中注上所补之字。除虚缺号的用法有统一规定外，其余各种括号的用法并无统一规定，必须在文献整理中事先确定体例，说明各种括号的具体用法。

二、分段

旧时，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前，行文多不分段。手写型文献不分段如日记、信函不分段，印刷型文献如报刊上的文章亦多不分段，一篇就是一段；如书本不分段，一节就是一段。为了使文献的层次、条理清楚，整理文献时应该给文献分段。

分段最要者是体现原文献制作者的原意。不能把整理者的想法、意愿强加给原文献制作者。分段也应该宜粗不宜细。可分可不分段的，就不分段。分段无十分把握的，就不分段。分段要根据文献种类、结构、内容层次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定。

分段是为了把原文献的条理层次准确地反映出来。原文献的条理、层次，行文中会有所体现的。比如一件文献分开头、中间、结尾三部分，那么至少可以把文献分成开头、中间、结尾三段。至于这三段中还要不要再分段，可视其条理、层次斟酌。比如一件文献先提出问题，再分析、论证，最后引出结论，那么至少也可以分成三段。如果分析、论证又分成几个层次，那么还可以分出几段。比如一件文献分别记述几件事，那么至少可以将一事分为一段，一事中是否再分段，可酌定。比如一件文献分别反映几个地区的情况，那么至少可以按地区进行分段。比如一件文献按时间顺序叙事，那么，可以按适当的时间段落分段。如果分日叙事，可以按日分段；如果分月叙事，可以按月分段；如果分季叙事，可以按季分段；如果分年叙事，可以按年分段。比如一件文献，原文中就有“一……”、“二……”、“三……”，就可以按“一……”、“二……”、“三……”分段。比如一件文献大段转引其他文献，那么被转引

的文献可以单独成一段。总之,文献中的条理、层次准确把握住,分段也就能把握住了。

一般来说,内容多、篇幅长的文献,可以适当多分些段落。内容少、篇幅小的文献,可以适当少分些段落,甚至不分段落。比如一些很短的电报、信函、新闻稿等,就不必分段。

分段要领会文献制作者的原意、领会整个文献的原意,才能进行。所以在分段前,一定要将整个文献通读几遍,领会原意,把握文献的条理、层次,通盘考虑可以分成几段,应该分成几段。不能不通读,看一段分一段。否则,就难免出现分段错误。

总之,分段应该因文制宜、因义制宜,实事求是,分得恰如其分、准确、妥帖。

三、标点

中国古代作文、刻书、印书都不加标点。读书时则可加简单的句读符号,进行简单的断句。这种习惯一直影响到民国时期。1915年上海的一些留美归国学生创办《科学》杂志,率先采用西方通行的文字横行和标点符号。该刊1916年第1号发表了胡适提倡使用标点符号的文章《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以后《新青年》等很多报刊就是否应采用标点符号问题及文字横行、竖行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大论战。北京大学一些教授还联名提案,请教育部在全国推广标点符号。提倡、采用标点符号,成为“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1920年2月2日,民国政府教育部曾发文提倡使用12种标点符号。直到1930年5月21日,民国政府教育部才颁布了《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规定教育机关公文应采用14种标点符号。这些文件只在教育系统内有影响。1933年10月2日民国政府颁布第500号《训令》,公布了《公文采用简单标点办法》,规定全国各机关自1934年1月1日起公文应先采用句号、逗号、引号、省略号、括号、专名号等七种标点符号,将来再过渡到采用教育部规定的14种标点符号。这些文件只在全国各级机关中发生影响。1934年以后形成的民国政府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到有标点符号了。但仍有很多报刊等没采用标点符号。比如老牌的《申报》,直到40

年代,仍未采用标点符号。民国年间的一些手写型文献,有很多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比如书信、电报稿、日记等有很多是没有标点的。我们可以从《纪念毛泽东》收入的一些照片上看到,罗学瓚 1917 年的日记手稿、谢觉哉 1921 年日记手稿是没有标点的。1929 年红四军的布告没有标点,只有断句。毛泽东的诗词手稿,包括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手稿都是没有标点的,当然书法作品不加标点,这也是一种传统习惯。因为传统的影响,旧时人写信多不加标点,特别是受旧传统影响深的人更是如此。据说,写信加标点会被认为是不尊重收信人,把收信人看成不会断句之辈了。这样一来,旧时留下来的文献,自然有很多是不加标点的了,包括中共党史文献也有很多是没有标点的。没有标点的文献,会给阅读、使用文献造成障碍、困难,甚至会将文献的文义理解错而错用文献。鲁迅曾指出过,有人把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点成:“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一翻《唐书》,就不免觉得魏征实在射杀得冤枉。”“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六)》)。这说明,对文献进行正确的标点是很重要的。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进行正确的标点(包括对一些已经有标点,但标点不规范、不准确的文献重新标点),也是很重要、很必要的。

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有 14 种,怎么使用,都有规定,但在具体标点文献时,什么地方应用什么符号,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研究,而首要的就是要把文献的文义搞懂。要搞懂文义,就必须将文献中涉及到的人、事、物、地等搞懂。文献中只要有一个问题没弄懂,那么就可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标点出现错误。比如《近代史资料》总 10 号 130 页 10 行有:

谭延闿……把黄兴、蔡锷两人哄得喜笑颜开,都支持他继任总统,黎元洪更不消说早已勾结好了。

谭延闿没有当过总统,怎么会“继任总统”呢?显然文献中的人、事没有搞清楚。谭延闿要继任的实是督军兼省长,黎元洪则是总统。所以应点为:

……都支持他继任。总统黎元洪……^①

比如《近代史资料》总6号158页下19行有：

即扎营祇陀地，绅皆拥护之。

这里的“地”字何意？实是“当地”的意思。下文有“地民暗约金钱”句，“地民”即当地人民之意。所以应点为：

即扎营祇陀，地绅皆拥护之。

这也是人事没有搞清，出现标点错误。又《近代史资料》总4号47页5行有：

续请客，居四家。

这么标点，“居四家”，不知何意。通观上下文，前面说请了本地住户十四家，然后说“续请客居四家”，所以“客居”指非本地住户，即又请了非本地住户四家。“客居”是一词，应连读，不能点断。这又是因为没有搞清文献中的人、事，所以标点错了。又如：

迨七〇五号车行至石老娘胡同口后面，电缸突然冒火，乘客争相跳车……这一句的正确标点应是：

……行至石老娘胡同口，后面电缸突然冒火……

这一句是因为不知道旧式有轨电车前后两端均有电缸，均可驾驶，所以点错。这是没有弄懂“物”而错。又如1919年5月5日教育部的一篇咨文谈到“五四”学生游行等：

……学生约二千人，齐集天安门外，对于青岛外交问题开会演说，继复游行街市，麇聚赵家楼、曹宅地方，纷扰滋事。

这里的“赵家楼”、“曹宅”，不能点断，两者是一地，是从属关系。一点断、成为两地了。这是因为地点、地理没有搞清楚而标点错。

要标点正确，除了要搞懂文义，还要搞懂文献、语句的结构、语气等。如：

容有奸人从中煽惑，其不演成俄国过激派者，几希众商等心所谓危不敢为安……

^① 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标点》，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引《近代史资料》例子均见此。

这一句的正确标点应是：

……其不演成俄国过激派者几希？众商等……^①

这一句是因为没有仔细体会语句的结构、语气而点误。又如《近代史资料》总 18 号 15 页末行有：

我们全国工人们呢！便要用种种方法帮助汉冶萍工友。

这里没有感叹的语气，不应该用感叹号，用逗号就可。又如《近代史资料》总 18 号 69 页 12—13 行，是“五卅”运动时，上海私立中学校校长苏颖对学生说的话：

岂有学生干涉校务？你们要知道这个学校是我私人开的，我要怎样就怎样，不是那别个公立学校呢？

这里用了两个问号，其实两句都非疑问语气，而是愤恨挖苦的语气，两个问号应改为感叹号。旧时公文的结构及其标点法，应有所了解。如旧时公文或信函开首常用“××钧鉴”、“××台鉴”、“××公鉴”等词，这里表示尊敬的称谓，与“××阁下”相似，所以“鉴”字后一般应加冒号。正文的开首，往往用“为……事”引出事由。“事”字后一般应加冒号。^②公文中也往往有层层照转的文句，如“函开”、“函称”等，这都表示转述其他文件的内容，所以后面都应加冒号。如：

内务部为咨行事：准国务院函开：准外交部函开：准日使照称：“近来抵制日货运动又复激烈……请根本取缔。”等语。

这种公文的事由是说内务部咨行之事，是根据国务院函中所说的，国务院是根据外交部函中所说的，外交部则根据日本大使照会中所说的。这里的照转文句后都用冒号。而日本大使照会的原文还要加引号。旧时书信、电报开首用“敬启者”、“径启者”、“径复者”较多，这可以视为一种提示语，“者”字后一般加冒号。^③如：

陆军部台鉴：敬启者：……

① 以上三例，详见曹喜琛等《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0—241 页。

② 曹喜琛等《档案文献编纂学》第 235 页认为“为……事”后应加句号，似误。

③ 曹喜琛等《档案文献编纂学》第 235 页认为“敬启者”等后应加逗号，似误。

不能点成：

陆军部台鉴：敬启者，……

旧时公文、信函、电报的格式、用词等还有不少规矩，了解得越多，整理、标点这些文献就越妥当，越不会出差错。

文献中每一个字、词、俗语、土语搞懂，对于正确的标点也有重要的作用。如

阿招张本并山东人，傅信三儒在庄上住。

这一句的“三儒”何意要搞懂。“三儒”是“三个人”的意思，所以这一句应点为：

阿招、张本并山东人傅信三儒在庄上住。

又如：

己丑秋，孟访一亲旧，出示古物数种，皆所未见。

这里的“己丑秋”可通，但“孟访”费解。通观上下文，“秋孟”当连读。“秋孟”何意，乃“孟秋”之意，即秋初之意。所以应点为：

己丑秋孟，访一亲旧，出示古物数种……

以上两例均是一些词语未搞懂而点误。

在中共党史文献的标点中，还有些问题应当注意。

1. 文献标题，要尽量少加标点，一般可以不加标点。特别是标题的末尾一般不要加标点。比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有毛泽东写的三段话，加的标题是：

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稿时加写和改写的话

这里的《人民日报》及其社论题目都加了书名号，是必要的。又如毛泽东的一则批语和复电题为：

对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这里的“关于广西剿匪工作报告”，是可以加书名号的，但省略了，也很好。又如毛泽东的一则通知题为：

中央关于印发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的通知

这里“中层”、“内层”加了引号，强调了是一种专门名词。如果不加引号，一般也可以看懂这是两个专门名词。所以不加引号也可以。

可加可不加的标点符号,最好不加。

2. 对于反面文献中污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字词,既不必删改,也不必加引号,可以在整理、标点文献的体例中加以说明,或者加按语、加注释说明之。如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提到:“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这里的“匪”、“剿匪”没有加引号,而是加注说明:“蒋介石匪帮把革命人民叫做‘匪’,把他们自己用军队进攻和屠杀革命人民的行为叫做‘剿匪’。”(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65页)

3. 贬义的“左”和“左”倾加引号。关于这个问题,1982年2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给胡乔木写了请示报告,强调了五十年代以来的通行用法,褒义的左和左倾不打引号,贬义的左和左倾都打引号。胡乔木批示:“同意。”(详见《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8期12-13页)贬义的左和左倾加引号,既然已经约定俗成,自然可以仍之。如王明“左”倾路线,“四人帮”极“左”路线,这些“左”倾路线的“左”,都要加引号。

4. 整理文献,如有删节,或者节录文献,应该加省略号,并加注说明。整理文献,以保持原貌为上,最好不要删节。如果作了删节,就一定要在删节之处代之以省略号,并注明“上略”、“下略”等,甚至可以注明省略了多少字。现在出版的一些文献集、资料集、文集等,有些作了删节的地方,不加省略号,也不作任何说明,这是不应该的。

5. 书名、篇名的简称要加书名号。书名、篇名自然要加书名号,其简称也应加书名号,而不能加引号。如:

《毛泽东选集》——《毛选》,而不能点为“毛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处》,不能作“正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不能作“决议”。

但一个名词是不是书名、篇名的简称,要搞清楚。不是简称加书名号,就不对了。比如“决议”、“讲话”、“报告”、“指示”等词,有可能是

简称,也有可能不是简称,要仔细分析。

党史文献中引用中国古书也不少。中国古书汗牛充栋,能了解一些最好,了解得少,遇到古书名、古书篇名,就必须设法去查一查。有些古书名、古书篇名的简称一时查不到,还应该请教专家。有些最基本的古书书名及其简称应该作为常识了解。如:

《书》——《尚书》

《诗》——《诗经》

《史》——《史记》

《汉》——《汉书》

《通鉴》——《资治通鉴》。

又如“四书五经”,如果指四书、五经的合刊本,应加书名号。如泛指四书、五经则不必加书名号。有的党史书上出现“《三纲》”、“《五常》”、“《六艺》”等类的标点。三纲、五常、六艺并非是书名、篇名,不应加书名号。

6. 专名号可适当加。专名号用以标人名、地名。在古籍整理中是要标的。专名号是14种常用标点符号之一。中共党史文献、中国现代文献,离现实近,一些人名、地名大家都熟悉,可谓众所周知,所以党史文献、现代史文献的整理、标点中,一般都不加专名号。但从长远考虑,把中共党史文献作为历史遗产来考虑,从为子孙后代着想考虑,那么还是加专名号较好。因为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中国人,对现代的人名、地名都不熟悉了,能给人名、地名都加上标点,自然有利于后人阅读文献,继承遗产。如果留给后人来加专名号,自然就会增添很多麻烦,就如现在我们标点前人的文献一样。如果前人已把文献整理、标点得很好,我们今天利用前人文献自然省事许多。

中国的人名,除本名外,有字、号、别名、笔名等,少数民族的人名也较复杂,旧文献中一些外国人的译名也与现在并不相同。中国的地名,古今变化大,有简称、别称,少数民族地名较复杂,旧文献中一些外国地名的译名与现在也不尽相同。如果在整理文献时,人名、地名都严格加标点,自然在利用时就较妥当、方便了。如:

毛君、泽东、润芝等人。

这样标点显然是错的。今人容易知道是错,后人未必能知道是错。如果改成:

毛君泽东润芝等人。

人们一看就知道毛君泽东润芝是一人。又如:

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

这样标点,是说四个地方下了冰雹。地理知识少的人看不出错。实际上安肃是保定府(地区)的辖县,丽水是处州府(地区)的辖县,即只是两个地方下了冰雹。所以点成:

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

这样既指出了四个地名,又指出了其中的从属关系。看起来很清楚,不会发生误解。又如1941年延安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收入的《长冈乡调查》有一句“货从茅店直接办来”。《斗争报》发表时作“货从茅店直下办来”。“直接”、“直下”孰是?查1934年1月的油印本作“货从茅店、直下办来”。加了顿号,加了专名号,表示“直下”是地名。再细查之,“直下”果真是地名。于是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将“直接”改为“直下”。这说明中共党史文献标点时,用专名号是有必要的,有好处的。^①

7. 文献残缺要尽可能表达清楚。残缺之字可用虚缺号□表示。残缺之字可数,缺几个字,用几个□。残缺之字不可数,用“……”省略号,并加注说明(详前)。有些文献的原文中就有□,是文献制作者加的,表示隐去某些内容,不是残缺,应该加注说明。一定要使文献原有的“□”和文献整理者加的“□”,都分别说明清楚,能使人明白才好。

8. 标点符号一般不要重叠。现代文献中会看到一些标点符号重叠的现象。如:

往哪里去?! (鲁迅《一点比喻》)

这种问号、感叹号并用的情况,很多语言学家是不同意的。如果句子中既有疑问的语气,又有感叹的语气,可以根据何种语气为主,即根

^① 详见《文献编辑和调查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编辑记事》,载1983年2月12日《光明日报》。

据疑问和感叹部分的轻重,选择主要的语气,用一种符号标之。又如:

这样的中国人,呸!!! (鲁迅《并非闲话》)

这里用三个感叹号,有人认为这样可以增加感情色彩,有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你用三个感叹号,那我用六个、九个如何?再如省略号,如果你用十二点,那么我用二十四点、四十八点如何?标点符号的运用,要在达意、简明,复杂化是没有必要的。特别是文献的整理者,搞清原文献的文义、语气,用最简明的标点符号标点之就可以了。作者自己用标点符号,是否可以重叠就有争议,整理者更不必重叠使用标点符号了。再说整理者体会制作者的原义、语气也不一定那么准确。这个整理者可以这样理解文义、语气,那个整理者可以那样理解文义、语气。整理者标点文献应尽量客观些,让众多的人都能接受,让社会承认。否则,把标点搞复杂化了,引起争议,并非是上策。总之,文献整理者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整理文献加标点,不是自己写文章,要怎么标点就怎么标点。

文献标点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笔者曾写过这方面的讲义,给研究生讲过课。要注意的问题很多,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多说了。总之,要做好文献标点工作,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面,要有党史、历史、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要加强文学修养。同时要克服主观武断,勤查勤问,把文献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搞懂才行。

四、写工作报告

一件党史文献经过校正文字、分段、标点以及校勘考证以后,它就由原始状态进入了规范状态,可以利用了,文献的内容整理工作就初步完成了。文献的有序化整理和内容整理完成以后,剩下的最后一项整理工作就是将整个文献整理工作进行总结,即写工作报告。

在工作报告中,要对文献整理的前后过程、总体情况进行说明。在整理中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要进行说明。文献经过整理还存在什么问题,还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进行说明。经过整理后,对文献的真伪、性质、类型、价值等问题已有了了解,这也要进行说明。这样一份类似于文献鉴定书的工作报告,一方面可以宣告文献整理工作

的完成,另一方面也是对文献作了全面的说明、评价,极大地方便了文献的利用。同时对于文献的进一步搜集、整理也有极大的参考作用。不论工作报告的一些说明、结论正确与否,总为人们进一步的整理、研究文献提供了便利。

工作报告也可以写成研究报告。不仅可以对一份文献作一些研究性的报告,还可以对多份文献、一系列文献作比较的、总体的研究报告。这样可以使人对多份文献有总体的了解、把握,同时也可以加深对某一份文献的了解。这样的报告,对人们利用文献更有帮助。

工作报告完成以后,可以附于文献后,也可以另外分类、另外贮存。如果工作报告另外贮存,要做好目录,做好索引,同时在原文献后附注一笔:有工作报告在某处。这样,查阅工作报告就很方便了。

第三节 原则

中共党史文献整理的原则,与搜集文献的原则是差不多的,可以互相参照。以下就文献整理时要特别注意的几条,再强调一下。

一、历史原则

中共党史文献是历史的产物,必须用历史观点去审视,去整理,而不能只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去整理。从历史观点出发,整理党史文献最重要的是保持文献的原貌。如何保持文献原貌? 1. 文献的文字不要改动。需要校正的文字,加括号注于后。2. 资料不要改动,不要删节。3. 观点不要改动。4. 标点、分段忠于原文原义。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党史文献,都要这样去做。如果随便改动文献,失去文献历史面貌,这就违反了历史原则,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从历史观点出发,还要对历史文献做些历史分析、历史评价。比如两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提法、评价,与解放战争时期是有所不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对蒋介石的提法、评价,也是略有不同的。不能简单地把骂蒋介石的文献视为正确的、评价高些,把不骂蒋介石的文献视为不正确

的、评价低些。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些文献，有极“左”路线的烙印。有些“检查”、“交待”、“揭发”材料，在内容上、思想观点上、语汇上都反映了“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气息，都有极“左”路线的烙印。在整理这些文献时，要历史地分析、历史地评价、历史地处理。这些文献中的文字、资料、观点不必改动，但可以将其中不合理的成分，通过说明、注释等指出来。在对某个党史人物的资料进行整理时，不能因为他在“文革”中有错误、不光彩，就把他“文革”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删略。要做到对党史人物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首先就要对他的文献资料作历史分析、历史评价才行。

为了反映文献的历史原貌，在整理文献时要努力做些文献的复原工作。有些文献残缺了，要设法把它补全。有些文献的制作者不清楚，要设法搞清楚。有些文献是代作的，即由乙代甲作的，那么搞清后，应署乙名，而去掉甲名。有些文献的制作时间不清楚，要设法搞清楚。有些文献的制作时间，原来署的时间有误，要设法纠正过来。有些文献的注释等搞错了，或是有某种局限，就要把它改正。有些同一份文献分在两处，如能缀合应设法缀合之。

多份文献往往会有一些历史联系，保持和反映文献间的历史联系，是保持和反映多份文献总体历史原貌必需的。不要割裂或破坏文献间的历史联系。

二、理性原则

整理文献资料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按一定的体系进行的。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更需要理论指导。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有没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修养，整理文献的方法、思路、达到的水平是不一样的。用资产阶级的理论指导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那么所用的方法、思路，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更不一样了。这个问题在谈党史文献的搜集原则时已谈及，可以参见。以下要谈的是党史文献在整理时会体现出理论指导的一些主要方面。

党史文献的分类，特别是按文献内容分类，就是有理论指导、体现理论体系的。比如把中共党史文献分成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建党时

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种历史阶段的划分就体现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观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是不会这样划分中共党史的历史阶段的,而且不会用“革命战争”、“解放战争”的词语来命名历史阶段。再比如,在《中图法》、《中档法》中对中国共产党会议、文献、理论等类的文献分类,是排在中共党史文献前面的,党的领导人及其著作是排在最前面的,这种分类也体现出一种理性思维,体现出革命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袖关系的理论。而西方国家、台港等对中共党史文献的分类,就不是这样分的,他们有另一种理性思维。

在同一类中共党史文献中,正面文献、反面文献的关系怎么处理,怎么排列,这是体现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学者,把中国共产党人制作的党史文献,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党史文献,看作是最重要的中共党史文献,把他们排列在同一类中共党史文献的首位。而把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和建设的文献,看作是次要的文献,排列在次要的地位。一些西方学者、台港学者则不这么看,他们中的有些人会把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看成是最重要的文献,排列在首要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喜欢猎奇,会把一些来路不明的,甚至是伪造的中共党史文献,当成宝贝,给予特别突出的地位。立场、观点不同,自然处理不同文献的关系也不同。

在整理文献时需要对文献进行一些分析,包括理论分析,这是要有理论指导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人,会对文献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分析,进行背景分析,进行阶级分析等,从而对文献作出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判断。有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修养的人,会对文献进行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分析,区分哪些文献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哪些文献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人,没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修养的人,自然不会作这些分析。有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修养的人,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理论修养的人,会对中共党史文献进行历史唯心主义的、三民主义的分析。对于社

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文献,有社会主义理论修养的人,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修养的人,就会进行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分析。没有这方面理论修养的人自然就不会作这方面的分析。有资本主义理论修养的人,则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文献作一些资本主义理论的分析。理论指导不同,对文献的理论分析自然不同。

对于中共党史文献的价值评价更体现出理论思维、理论指导的不同。哪些文献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哪些文献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哪些文献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哪些文献不符合;哪些文献是正面的,哪些文献是反面的;哪些文献有价值,哪些文献没有价值……要进行这些价值评价,显然会鲜明地体现出理论指导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与用历史唯心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作指导,对同一文献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是不同的。

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最后要写工作报告、研究报告,写这样的报告更是集理性思维、理论指导之大成。对于文献分类、排列的理论思考,对于文献分析、评价的理论思考,都要在这最后的总结性报告中体现出来。一般说来,写工作报告、研究报告,理论思维更强烈些,更要体现出一定的理论体系。

总之,理性思维,一定的理论原则,是贯穿于中共党史文献整理的始终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工作者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修养,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修养,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方面的理论修养越深厚,就越能在整理文献时把握这些方面的理论原则,整理的水平也就越高。文献整理工作看起来是一种资料工作,实际上没有理性思维,没有理论指导,是做不好的。

三、保护原则

文献是可以毁灭、损坏的,要使文献不毁灭、不损坏,就要设法保护之。一些手写型的文献,一些年代较久的印刷型文献的珍本、孤本,不仅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这些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在文献的管理、保护方面是有一整套措施的。有些文献定为

善本,有些文献定为珍本,作“特藏”处理。这些文献的原件往往不供阅览,只能阅览这些文献的缩微胶卷。这些文献不允许复印,可以允许拍照。档案馆的档案原件一般不允许复印。图书馆的手写型文献以及1950年以前的一些印刷型文献,一般也不允许复印。只有1950年以后的有复本的印刷型文献才允许复印。这些都是保护文献采取的一些措施。文献整理者该如何保护文献呢?首要的一条是,整理文献特别是进行内容整理,一般不要在文献原件上进行。整理文献,标题、标引、标点、分段、校正文字等,都不能在文献原件上进行。如果都在文献的原件上进行,那么这份文献就会受到破坏、损坏。整理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修改、补正的事是常有的,如果在文献原件上涂涂画画,最终会毁了原件。更有甚者,如将原件剪贴,这样原件就不复存在。在搜集文献时,如果同一件文献搜集了好几份复本,如同一种书买了好几本,同一份报纸、杂志买了好几本,计划在整理文献时要消耗一二份文献复本的,那么在文献原件上进行整理工作也无妨。这种在文献上直接进行整理工作的情况,一般只有在年代较近的印刷型文献上才有可能。手写型文献、档案文献,一般没有复本,或者不可能搜集到、买到复本,是没有条件在原件上进行整理的。不能在文献原件上进行整理,那么怎样整理呢?在复制件或抄件上进行。复制件,一般是复印件或照片。允许复印的文献,复印之;不允许复印的文献,可以拍照,然后放印。这些复印件、照相本,一般需要几份就可以得到几份,在上面进行整理,对文献原件无妨碍。又可以一份整理坏了,再要一份。抄件,就是手抄本。抄件可以复印,所以在抄件或者它的复印件上进行整理也无后顾之忧。抄件,对于整理文献出版来说,是较方便的,全部的稿纸可以统一,编辑加工也较方便。只是抄件在整理前一定要仔细校对才行。还可以在打印件上进行。打印,可以油印好几份,在打印件上整理,也无后顾之忧,对于出版也是较便利的。不过,也需要校对后才能进行整理。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将文献输入计算机,在计算机上进行整理,是很方便的,修改起来也方便。计算机可以进行编辑排版,对于文献的出版更方便。而且以后检索文献、利用文献也方便了。运用计算机整理文献是较理想的,是发展方向。对文献原件进行保护,将文献输入计算

机是一个好办法。

无论是文献原件还是整理件,无论是整理时,还是整理完成后,都
要注意保护,要防止其破损、霉变、虫蛀等。

中共党史文献整理工作中应特别遵守的原则,主要是以上几条。
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原则也要遵守的,比如保密原则。这个问题在搜集
文献的原则中已经论述,可以参见。

◆第五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勘

第一节 校勘的一般理论问题

一、校勘

什么叫校勘？校，指的是校对，校订，校正。勘，意思是比勘，查勘，勘正。校勘，就是进行校对、查考，修正错误。校勘，中国古代称“校讎”。汉代人刘向《别录》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讎。”讎，即“仇”字，冤家、仇人之意。可见，中国校勘源远流长，很早就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了。校勘有校对之意，但与今日之校对不完全相同。今日之校对，如将原稿校清样，总用不同的两种本子互校，而校勘可以用两本互校，也可以不用两本互校。今日之校对，只要两本相校就行，不必去查考，一般以校文字、标点、行款等为主，不必去辨析原文内容如何，而校勘需要进行查考，不仅校文字、标点、行款，也校内容。

为什么要校勘？任何文献，包括中共党史文献，在制作、流传的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讹误之处。如果贮存、流传不当，文献还会污损、残缺。那么文献中的讹误、残缺如何恢复原貌，这就需要校勘。正因为校勘能使文献恢复原貌，所以校勘是文献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使文献由原始状态进入规范化状态的一项重要工作。文献经过校勘以后，原貌恢复了，文字流畅通顺了，错误没有了，于是阅读便利，理解正确，利用方便，不至于一误再误、以讹传讹。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勘，不仅可以恢复党史文献的本来面貌，还有助于党史文献的效用的充分发挥，而且对于中共党史文献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校勘，不仅是对文献的一种整理工作，也是对文献的一种研究工

作。不同版本的文献互相校勘以后,发现文字上的异同,就要去研究为什么会有异同,是文献制作者的修改,还是他人的篡改,为什么要修改,为什么要篡改,背景如何,哪个版本是对的,哪个版本精些。这样不仅可以作一些文字上的校正工作,也推动了对版本,以及对文献制作者思想变化情况的研究。对文献进行研究,离不开校勘,进行思想史、理论史、史学史等的研究,也离不开文献的校勘。校勘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手段。很多大学者、著名史学家,都精于校勘,在校勘方面成绩卓著。

二、校勘的目的、任务

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勘的目的、任务,就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按照校勘的规律、原则,对中共党史文献进行校勘。在校勘的过程中,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恢复中共党史文献的原貌,使中共党史文献规范化。既要订正中共党史文献中已经存在的错误,也要使中共党史文献在新的流传过程中不再产生新的错误。给中共党史文献的阅读提供正确的本子,避免阅读中的误解。给中共党史文献的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建立可靠的文献基础,推动各方面研究工作的发展。给中共党史文献各方面的利用,创造良好条件,有助于中共党史文献各种积极作用、功能充分发挥,实现尽可能多的社会效益,包括经济效益。使中共党史文献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整理、继承。

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校勘,最主要的一条是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校勘规律进行校勘,就是要按照校勘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的步骤和方法进行校勘。这两条,对于是否能完成校勘任务、达到校勘目的,是至关重要的。

三、校勘的内容

1. 校标点

文献原件有标点的,校勘标点正确错误。文献原件没有标点,整理过程中加了标点,校勘整理标点的正确错误。校标点的范围,是整个文献中的所有标点,包括标题、正文、注释中所有标点。

2. 校行款、分段

校行款有没有改变。行款如果改变了,应按文献原样改正。文献原件行款如果没有必要保留,应加注说明,或写入校勘记中。文献原件分段了,一般应以原件所分之段分段,发现有不同,应照原件改正。文献原件没分段,整理时分了段,校分段之正确错误。

3. 校文字

校文字正确错误,发现错误,改正之。文字的错误有错字、别字、脱字、衍字、颠倒、重字等类,或者误改。此外,因文献残缺致使文字残缺,也校之,补正之。校文字的范围,是整个文献中的所有文字,包括标题、正文、注释中的所有文字,包括数目字,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外国文字,包括注音字。

4. 校内容

校内容的变化、改动。发现内容改动了,查考其原因,写入校勘记中。至于以未改动的文献为主,还是以改动了的文献为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定。发现错简、缺页、他文窜入、正文与注释混淆等,改正之。校内容的范围,包括标题、正文、注释。

5. 校照片

校照片有没有改动。发现改动,查考其原因,写入校勘记中。能找到未改动的照片,即以未改动者取代已改动者。校照片说明文字、内容的正确错误。彩色照片,还可校色彩的真假及其程度,发现失真,写入校勘记中。

6. 校视听文献

校视听文献的内容有没有改动、剪辑。发现改动、剪辑,查考其原因,写入校勘记中。校文字记录稿、文字整理稿与视听文献的异同。发现有异,应以视听文献为准,改正文字记录稿、文字整理稿。

四、校勘的原则

1. 实事求是

客观地搜集文献的各种版本,搜集的版本越多越好。不能根据主观判断、个人的偏爱,就认定哪个版本好,哪个版本差,就决定以哪个版

本为主。通过校勘来判定版本的优劣、主次。实事求是校勘，文献原貌是怎样的，就说是怎样的，就设法保持原貌，恢复原貌。实事求是是一个总原则、根本原则，它与以下的一些原则是有内在联系的。

2. 注重证据，反对臆断

在校勘过程中发现异同，何者对，何者错，不能臆断，不能武断，要作一些查考，找证据。找一条证据，不行，找二条、三条证据。根据确凿的证据，判断孰是孰非。没有证据，不下结论，不作改动。切忌先入为主，切忌穿凿附会。比如《毛选》第二版改正了《毛选》第一版的不少错误，而每改一处都是有足够的证据的。如《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一九三四年三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而1933年12月1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道：“十二日我红军之一部，在黎川之东山团村附近，将白军第五、第六、第九十六三个师全部击溃。”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亦把团村地区作战定在1933年12月12日，说：12月12日敌“第八纵队两个师进至团村地区，向我军第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我军遂从东西两方面反击。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的一本《战史》亦说：1933年12月，第八纵队“周浑元指挥官……以期先行夺取团村，乃于十二日十时四十分，下达攻击命令……”三种文献，正反两方面文献都说团村一仗是1933年12月12日打的，于是《毛选》第二版将第一版的“一九三四年三月”，改正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又如《毛选》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第一版提到：“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而《大公报》1936年12月27日发表此《训词》，署“中央社南京二十六日电”。并刊载消息称这篇《训词》是“二十六日在洛京途中亲笔起草及校正”。即洛阳至南京途中起草。又《陈布雷回忆录》记载：“二十六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即到南京后，《训词》又经陈布雷整理，才最后发表。于是《毛选》

第二版将第一版的“在洛阳发表”加注作了订正^①。

3. 多闻阙疑

多闻,就是搜集的版本要多,查考的内容要多、范围要广,多查资料,多请教专家。阙疑,就是不能判断是非之处,存疑俟考。下不了结论的,就不下结论。可以加注,说明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并声明这不是结论,这有待于进一步的查考。遇到两说、三说无法判断是非,可以两说、三说并存。可以将诸说都作一介绍,并说明尚不能判断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查考。比如《毛选》第一版中《我们的经济政策》署“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据《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三期报道,毛泽东作报告的日期是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而这一部分是二十四日还是二十五日作的报告,已无法查考,所以《毛选》第二版,这篇文章只署“一九三四年一月”。具体日期不清楚,干脆不署,这就是存疑。

4. 敢于探索

学术研究要敢于探索,校勘也是如此。校勘,反对主观臆断,反对随意改动。但如果发现错误,且有确实的证据,也不能胆小保守,见错不改。有错就改,有错必改,这种勇敢精神是需要的。在校勘的过程中,得出某些结论与名家的看法相左,也要敢于提出来,不要缩手缩脚,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各项内容的校勘中,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校勘理论、方法方面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敢于进行探索性的实践。提倡勇敢探索,反对依傍盲从,并不等于提倡好高骛远、好标新立异、好压低别人抬高自己,这些不良倾向是要反对的。勇敢探索,是指踏踏实实的实事求是的探索,是科学的探索。

五、校勘的方法

关于校勘的方法,陈垣《校勘学释例》总结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谈校勘者均宗之。陈垣《校勘学释例》原名《元典章校补释

^① 关于《毛选》第二版校正第一版的情况,均详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同。

例》，是校勘《元典章》的总结。《元典章》是元代文献。学者校勘古代文献，一般以文献校文献，很少用实物校文献，用实地考察的结果校文献，所以陈垣的校勘四法校勘中国古代文献是够用的。但中共党史文献，离现实近，不仅可以用文献校文献，还可以用实物校文献，用实地考察的结果校文献，所以陈垣四法以外，至少还可以加两法：用实物校文献——物校法，用实地考察结果校文献——实校法。以下分别论述之。

1. 对校法

“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称对校法。即以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相互校对。这是校勘应首先用的方法。中共党史文献中，同一文献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情况是不少的。比如毛泽东的文章、著作，同一文章、著作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要校勘毛泽东的某一论著，首先就要将这一论著的不同版本搜集一下，相互校勘之。比如《毛选》第二版编辑时，《毛选》中的很多文章都找到了不同的版本，进行校勘。例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选》第一版有一句是“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女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而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34年1月31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五期，这句话为“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于是第二版时，将“青年壮年男女”改为“青年壮年男子”。再如《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选》第一版有一句：“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垂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这篇文章在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二十三期上首次发表时，“垂手而得”作“唾手而得”。以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毛选》收入此文均作“垂手而得”。建国后编《毛选》第一版，毛泽东校阅这篇文章时，亲笔将“垂”字改为“唾”字。但不知怎么《毛选》第一版出版后，此处又是“垂”字。因为此文首次发表时为“唾手而得”，以后毛泽东又亲笔改为“唾手而得”，所以第二版《毛选》将“垂手而得”，改为“唾手而得”。以上都是通过对校的方法，改正了一些文字的讹误。

2. 本校法

“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页，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

异本也”。就是说,同一文献中的内容,或前、后文互校,或正文、目录、注释、题解互校,也可以校正某些错误。在没有得到文献不同版本以前,本校是一种必要的方法。《毛选》第二版编辑时,采用本校法,校正的讹误也不少。例如,《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该会议1941年11月6日开幕,11月21日闭幕。《毛选》第一版署该文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而该文的一开头就说:“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说明是开幕会上的讲话,而不是闭幕会上的讲话。所以《毛选》第二版署时间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3. 他校法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即用不同文献中的相同内容互校。同一文献不同版本互校,没发现什么问题,不同文献中的相同内容互校却往往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校正一些错误。《毛选》第二版编辑时采用他校法,校正了不少讹误。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第一版有一句说第一次反“围剿”,“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此文1937年5月的油印本及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单行本均同此义。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说,第一次反“围剿”,第一仗是1930年12月30日龙冈战斗,第二仗是1931年1月3日东韶战斗。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的《战史》,谈第一次“围剿”的起讫日期,也说是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东方杂志》当时记载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及其失败,也是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于是《毛选》第二版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改为“(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再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五节《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引用了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段话:“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

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查各种版本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其中“航空”二字，有的作“航路”，有的作“航业”。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的《革命文献》第八辑所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作“航业”。而1924年1月30日刊印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号》第三特号所载的“一大”宣言作“航路”。1924年4月国民党中央根据国民党“一大”决议案校订的“一大”宣言校正本，也作“航路”。于是《毛选》第二版，将“航空”改为“航路”。这是《毛选》中引用了国民党文献，用国民党文献的可信本校勘的他校实例。

4. 理校法

理校法，是以是否合理，是否有理，来判断校勘的是非。“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鹵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此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理校需要勇气，需要踏实精神，同时理校难度大，必须谨慎从事。《毛选》第二版编辑时，以理校法校正的讹误也不少。例如，《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一版题解说：毛泽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文章“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这样的提法把党内路线分歧的原因，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实际上路线分歧，不仅有阶级根源，也有认识论方面的根源。所以这样的提法是不全面的。第二版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修改为“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这样就避免了片面性。再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有一条关于张国焘的注释说：“张国焘，中国革命的叛徒。早年投机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错误极多，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张国焘晚节不好，但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出席中共“一大”，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在中共历史上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对他背叛革命以前的经历应该客观评价。《毛选》第二版就把这条注释作了修改。把“早年投机革命”一

句删去,改为介绍他担任过的主要职务。这样就比较客观了。以上两例,并不是用文献校文献,而是以“理”校文献。

5. 物校法

以实物校文献为物校法。中共党史文献离现实近,为以实物校文献创造了条件。《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2期发表廖正本《建议用文献文物校订〈毛泽东选集〉》文章,就是提倡物校法的文章。只是文章中没有举出用“文物”校《毛选》的实例,所举的例子都是以文献校《毛选》,当然有些文献是可以视为“文物”的。《毛选》第二版编辑时,有些地方就用实物校文献。例如,《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选》第一版提到“黄伯韬兵团”,而有很多文献“黄伯韬”作“黄百韬”。后发现淮海战役中黄毙命后,在战场上收缴到的黄的军装上佩戴的胸章,胸章上写“黄百韬,5941,三十七年度用,戡字第一号”。这胸章自然是黄名字的有力证据。于是《毛选》第二版将“黄伯韬”改为“黄百韬”。此外,《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的两处“黄伯韬”改为“黄百韬”。这可视为以文物校文献。再例如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碰到一些物品费解,就需要查证实物。如《寻乌调查》中提到“圆炷”、“扇火带”,不知为何物。到实地调查后,才弄清火带是旧时点灯用的灯芯,一种圆的灯芯称“圆火带”,一种扁的灯芯称“扁火带”。“圆炷”是“圆火带”之误,“扇火带”是“扁火带”之误。于是在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将“圆炷”改为“圆火带”,将“扇火带”改为“扁火带”。这是以实物校文献。

6. 实校法

以实地考察的结果校文献,称实校法(当然这个命名还可以斟酌)。实地考察是很多科学研究的必要手段,也是历史研究、党史研究的必要手段,对于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勘来说,也是必要的手段。中共党史文献的形成不过几十年,很多从文献到文献搞不清楚的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是可以搞清楚的。在编辑《毛选》第二版过程中,进行实地考察是不少的,有些《毛选》第一版中的讹误,就是通过实地考察改正的。例如,《井冈山的斗争》第一版中有一句“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八十里”。这里的“八十里”,不少本子作“百八十

里”。40年代的《毛选》，只有晋冀鲁豫本作“八十里”。建国后的《毛选》第一版以晋冀鲁豫本作底本，所以也作“八十里”。究竟是多少里？于是实地考察，结论是180里。第二版遂将“八十里”，改为“百八十里”。这篇文章的第一版还有“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等句。而其他本子均是“茶油”，不是“茶、油”。孰是孰非？于是实地考察，当地人都说应是“茶油”。当地虽产茶叶，但不是主要出口产品，不能与大米、木材相提并论，只有茶油可以与大米、木材并提。第二版遂将“茶、油”，改为“茶油”。一个数字、一个标点的校正都进行实地考察，足见实地考察在校勘中的作用了。再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过程中，“学习毛泽东同志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沿着他当年进行农村调查的足迹，访问了位于赣江两岸、武夷山区的寻乌、兴国、吉安、吉水、上杭等县市，向三十五个单位和十四户家庭作了调查，召开了八次座谈会，并作了多次个别访问。这次实地调查历时五十一天，行程近五千里，总共核对了八百多处，收集和整理了三十多万字的调查材料”^①。再如，《斗争》报发表的《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即《长冈乡调查》），在“合作社运动”一节，将村社的社长和采办的姓名都印成了“李奎应”。1941年延安出版《农村调查》前，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将采办的姓名改为“李某”。当时无法去查考，只能这样处理。此次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在实地调查时，为“李某”的名字走访了很多人，众说纷纭，最后由兴国县委的人找到了当年的合作社社长李奎应及“李某”的堂兄，才弄清楚了“李某”的名字是“李其尚”。于是作了修正。又如《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有“占名”、“打屠股”等词，不知何意。在调查时找到了一位老红军，才搞清楚“占名”是“点名”之误，“打屠股”是“打屁股”之误，于是作了修正。这说明，有些以文献校文献搞不清楚的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是可以搞清楚的。校勘文献是离不开实地考察的。

以上所述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物校、实校诸法，是校勘的主要方

^① 《文献编辑和调查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编辑记事》，载1983年2月12日《光明日报》。

法,并非已将所有的校勘方法囊括无遗了,校视听文献等,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而且校什么文献,用何种方法,要根据文献的具体情况来定,要灵活运用。再有,以上诸种校勘的方法,各有长短,在校勘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校勘以校正讹误、补正残缺为上,并不强求用何种校勘方法。不要把某一种方法孤立起来,割裂开来,各种方法应互补互益,以完成校勘的任务,达到校勘的目的。

六、校勘的步骤

1. 广搜版本,确定底本

校勘某一文献,首先就要调查了解这一文献的流传情况。掌握流传的线索后,便设法搜集文献流传过程中的各种版本。比如文献的手稿(草稿、清稿)、文献的油印本、文献的铅印本、文献的抄本、文献的第一次发表本、文献的第二次发表本、文献的第三次发表本……文献的转载本等等。能搜集到越多的文献版本,一般来说对校勘越有帮助。广搜版本告一段落后,就可以将搜集到的版本作一粗略的对校,以分析一下各种版本的源流、系统,看看它们与原稿的关系如何。清楚了各种版本的源流、系统,就可以初步掌握什么版本离原稿最近,什么版本离原稿远些,什么版本精些,什么版本粗些。这样就可以确定校勘用的底本了。一般来说,应以比较好的本子作底本。如果原稿在,可以用原稿作底本。原稿没有了,可用离原稿最近的本子作底本,比如用第一次发表本做底本,用抄本作底本。如有作者修订的修订本,可用修订本做底本。在与原稿关系的远近相同的条件下,应以错误较少,印刷较精的本子作底本。确定底本以后,还要确定哪些版本用来通校,哪些版本用来参校。用以通校、参校的本子,是有一定价值的,在某些方面是有长处的。有些本子错误百出,毫无长处、毫无价值,就不必用来校勘了。

2. 熟悉文献

要校勘某一文献,应在校勘前通读该文献,了解该文献的基本内容、特点。比如文献是原始史料文献还是撰述史料文献?是哪个时期、哪个阶段的文献?是牵涉到哪个人物的文献?是关于哪件事件的文献?是正面文献还是反面文献?是哪个地区的文献?语言上、文体上

有何特点?……掌握了文献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有助于在某些方面作些准备。比如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献,那么可以就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再了解一下、熟悉一下,把握这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包括历史现象的基本状况,历史本质的基本状况。比如是毛泽东的文献,那可以找一些相关的毛泽东的文献及资料来看看。如果是江西地区的文献,那么对于江西的方言、地理、物产及涉及到的那段历史,要熟悉一下……这些都有助于在各方面把握住要校勘的文献,使校勘顺利进行。为了熟悉文献,还可以对该文献的研究情况进行调查,有没有人整理过该文献,有没有人研究过该文献,有没有人在某项研究中涉及到该文献。吸取他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熟悉该文献,也有助于文献校勘质量的提高。对文献越熟悉,了解文献的有关方面越多,校勘工作也就能做得越好。

3. 校勘

版本搜集了,文献熟悉了,就可以进入校勘了。进行校勘,首先订立体例。比如校勘用的各种本子定一个什么样的简称,或用什么样的符号表示。比如各种不同情况的校改用什么样的符号表示,错字校改如何表示、脱字校改如何表示、衍字校改如何表示,颠倒校改如何表示等等,都需要有明确的说明。这样校勘时有规可循,避免混乱,校勘完成以后,利用者亦可见体例而一目了然。

订立体例以后,就可以进行校勘。可先用文献校文献,进行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文献校文献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准备实地考察,准备查找实物。经过实地考察、查找实物以后,如果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就只得存疑。

校勘过程中发现讹误,发现残缺可补,可以直接校改于、补正于底本上,也可以不直接校改、补正于底本上,而在校勘记中列出要校改、补正的文字。一般来说,底本较珍贵,可不必直接校改于底本上。如果底本很普通,复本亦多,或者只是复印件、抄件,那直接校改于底本上也无妨。直接校改于底本上,须要按照体例上规定的做法、符号进行。

4. 写校勘记

校勘记简称校记。它是对校勘成果的总结性表述文字。校勘者可

以把自己的全部校勘心得写入校勘记中,以完成对校勘工作的总结。不写校勘记,就等于校勘的总结工作没完成,即校勘没完成。通过校勘记,人们可以了解校勘的质量,可以为以后进一步的校勘创造条件。一个校勘者即使很谨慎,下了很多功夫,但难免仍然有疏忽、不足之处,仍然有讹误存在,比如《毛选》第二版出版后,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讹误存在,但校勘者把校勘的心得写出来,把何处校改,为什么要校改的理由写出来,总反映出新的校勘水平,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些线索和研究成果。下面就如何写校勘记的几个问题作一说明。

①校勘记的内容

第一,记录文献的不同版本对校中发现的文字、内容异同。

第二,记录不同文献他校中发现的文字、内容异同。

第三,记录在文献本身前后的本校中发现的异同、问题。

第四,记录通过实地考察、实物校勘中发现的文字、内容异同。

第五,记录校勘者校改、补正的根据。

第六,记录校勘者校勘的结论、断语。

以上这些内容是写校勘记时应该写的。当然校勘某一字、某一内容时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每一条校勘记是否都能写出以上诸种内容,是不一定的。所以只能根据校勘的实际情况,校到什么程度、进行了什么样的校勘,就写什么样的校记。比如,在对校、他校中发现文字上的异同,各本文字虽异,但从文义上都讲得通,那么可以在校勘记中只列出异同,只说明某本作什么,他本作什么,而不下孰是孰非的结论,不加按断。这被称为“异同校”。再如发现异同,没有足够的把握加按断,但又有某种倾向性意见,认为似乎这本对,那本错,或怀疑这本对,那本错,那么可以在校记中列出异同之后再写上“疑某本误”。只说出怀疑,不下明确的按断。这被称为“疑似校”。再如发现异同,有足够的根据断定是非,那么可以在校记中列出异同之后再写上“某本是”、“某本误”,下一个结论。这被称为“按断校”。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校勘写具体的校记,不强求一律。如果只进行了对校,只能写出对校的校记。如果只进行了他校只能写出他校的校记。一切都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实事求是是校勘的根本原则,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提高校勘质量,增加校勘的科学性。

②出校原则

在校勘过程中发现的所有异同,进行的所有校改、补正,一般应全部写入校勘记中,全部出校。人们在长期的校勘实践中,为了避免出校的繁琐,逐渐定出了一些出校的原则,强调一般的校改均要出校,只是一些特别细小的异同、校改可以不出校。如中华书局编辑部1983年发表了《古籍点校通例(初稿)》(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12期),对何者该出校、何者可不出校,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主要的有:

甲、底本的一般笔画小误,字书所无,显系误刻者,可以径改,不出校记。

乙、凡底本不误,他本误者,不出校记。

丙、凡本书不误,他书误者,不出校记。

丁、凡两通而含义不同者,可出异文校记。只是个别虚字有出入,文义无殊者,不出校记。版本异文,出校可从宽;他书异文,出校应该从严。

戊、凡脱讹衍倒,确有实据,必须补改删乙者,均应出校,必要时说明校改理由。

己、凡疑有脱讹衍倒,而无坚实理据者,不能辄予补改删乙,必要时可出校存疑。

庚、凡作者避本朝名讳或家讳者,一律不作改动,缺笔字则补足笔画。个别影响理解文义的避讳字,可出校指出。

辛、后人传刻古书避当朝伟者,则应据古本回改,各于首见处出校指明,余皆径改,不一一出校。

壬、校勘只限于底本文字的脱讹衍倒。作者见解上的错误,不出校纠驳。

以上的一些意见,是可以供校勘中共党史文献参考的。其中的庚、辛两条,涉及避讳的问题,这在封建时代是普遍的。中共党史文献中也会涉及到一些古代文献及清末民初的一些文献,还有满洲国的一些文献,这些文献中避讳是普遍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个别人的个别文献中还会有避讳的现象。此外,台湾的一些1949年以后的文献也仍然存在着避讳的现象。所以,在整理中共党史文献时如果遇到避讳问题,

可以按照中华书局提出的意见办理。以上的壬条,所谓“作者见解上的错误”,主要指观点上的错误。如果是文献内容的史实有误,是应该校正,应该出校的。史实不误,观点不对,就不要校改,以保持文献原貌,既不校改,也就不出校。如果认为一定要指出文献观点的错误,可以加注说明之。以上是出校或不出校的一些基本原则,此外,还有一些,如异体字、通假字可以不出校等,但主要的,不外以上几条。

③校勘记的形式

文献的篇幅大小不一,校勘文献时撰写的校勘记放在文献的什么位置,可以不同。如果文献只有一页,那么无论出校几条,都应放在这一页文献的末尾。如果文献是多页,又是一件或一篇,那么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当页的校记放在当页的末尾。另一种是把所有的校记放在篇末。常用的方法是后一种。如果文献是多页、多篇(件),也可以把校记放在当页或把每一篇的校记放在该篇的末尾。以后一种方法较常用。如果文献是一本书,书中又分多篇或多章,那么有三种方式:一是把校记放在当页。二是把一篇或一章的校记放在该篇、该章后。三是把全书所有的校记放在全书末尾。通常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校勘一本书或一套书,校记的篇幅达十万言或数十万言,那么把校记独立成书出版也可以。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就有校勘记的专书多种。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勘,有必要也可以这样做。如《毛选》第二版编辑时,作了大量的校勘工作,但第二版问世后,只见校改,不见校记,是个遗憾。后来出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专书,其中收入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注释校订工作纪实》两篇,将《毛选》第一版校勘时校改补正的一些大概情况作了说明,即把正文、题解、注释的一部分校记汇集起来了。这是《毛选》第二版中没有校勘记的一个补充,也可以说是一本校勘记的专书。以后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这是《毛选》第一版注释校勘的专书。像《毛选》这样的重要又影响大的书,把第一版的所有校记汇编成《〈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校勘记》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学术研究极为需要的。这本书可以成为《毛选》研究的一种专著,

不仅有政治价值,也有学术价值。类似《毛选》的书,都可以出校勘记的专书。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版是内部发行,第二版公开发行,这么一套大书,把第一版的校勘记汇编成专书也是有必要、有价值的。

校勘记采用什么形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不必非用某一种形式。古代校勘历史文献,校记也有夹注于正文之间的。往往正文用大字单行,校记用小字双行,排在所校正文之处后。这种形式,现在一般不采用了。校勘记采用什么形式,还要与文献的注释形式结合起来通盘考虑。不能把校记与注释混同起来。如果注释放在页尾,那么校记不妨放在篇尾、书尾。如果注释放在篇尾、书尾,那么校记不妨放在页尾。这样就不会混淆了。

④校勘记的格式

每一处校勘,如果要出校,就必须编排序号。序号可用①、②、③……表示,也可用(一)、(二)、(三)……表示,用何种符号可自定,统一就行。序号一般置所校之处句末的标点之后。如果校记置于页尾,那么一页中的校记编一个序号,即以页为单位编序号,然后按序号顺序将校记排列于页尾。下一页就另编序号,另排校记。如果校记置于篇尾或书尾;那么一篇或一书编一个序号,然后按序号顺序将校记排列于篇尾或书尾。即以篇或书为单位编序号,下一篇或下一书,序号另起。

校记,一般先拈出所校之字词、内容,空一格以后,再写出校勘者的意见。如“某字,他处作某,他本作某”。“某字误,应为某”。“某句,他本作某句,此处似误”。“某字下他本有某,应补”等等。

在一条校记中,如果既有版本校,又有其他校,那么一般应先列版本校,再列他校。如果既引前人校勘成果,又有自己校勘心得,那么一般先列前人校勘成果,再列自己校勘心得。在引前人校勘成果时,一定要详细说明出处。

⑤校勘记的写作要求

应扼要明白。既要抓住要害,又要把自己的见解清晰地表述出来。让人一看就懂。不要含含糊糊,让人不得要领。

文字准确、精炼。准确,才能扼要、明白。扼要,也要文字精炼。就

是要画龙点睛,言简意赅。不能啰啰嗦嗦,无边无际。也无必要作一些繁琐考证。如为了一个字,写上千言、万言,校记文字多于整篇正文,这一般来说就没有必要了。为了使文字精炼,可以采用浅近的文言文。在古代历史文献的校勘中,校记的语言,就采用了不夹杂语气词、不带感情色彩的、浅近的文言文。这是可以借鉴的。如“某字我们认为应该是某字”,写成“某字当作某字”即可。“某字我们认为错误的”,写成“某字误”即可。“某字与某字颠倒了,应该是某某”,写成“某某二字互乙”即可。精炼的校勘记语言,应该作为一份校勘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

第二节 校勘原件

以上论述了校勘的一般理论问题,以下再就校勘的一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的论述。先论述校勘原件。

中共党史文献的版本形式,可以有原件、抄件,手稿、印刷本等。手稿可以是原件,印刷本也可以是原件。文献的搜集,一般以原件为目标。文献的整理一般以原件为根据。原件在文献的整理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原件中存在的讹误,未能得到校正,那么就要影响抄件,编资料集就要影响资料集。所以校勘原件,是校勘文献时首先要进行的,又是最重要、任务最重的一项校勘工作。校勘原件,应校哪些内容,下面就主要的方面略叙如下。

一、校勘文字

1. 校正错字

每个人写文章、写书难免有疏忽的时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出现笔误、错别字是难免的。文章、书在排版印刷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排误、印误。这就造成文献中存在错字。文献中的错字,有的不影响文义,有的会造成文献内容完全相反。如将“允许”误为“勿许”,意思就完全两样了。这类文字的错讹,阅读文献时未必可以发现。影响语句通顺的错讹字,容易被人发现,不影响语句通顺的错讹字,就不易被人

发现。如“允许”误为“勿许”，只要不影响语句通顺，也未必会被人发现。怎样才能发现错字，特别是发现不易被发现的错字，就需要校勘。发现、修正错字，是校勘中的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为了有助于在校勘过程中发现错字，分析错字的原因，熟悉容易出错的各种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错字产生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①形似而误。字形相似，容易写错、认错、印错。如：田—申—甲，问—向，仅—反，等—第，运——远……像己—巳—已，日—曰等就更容易出差错了。例如，毛泽东的书信中多次提到外祖父的居住地“唐家坵”，但写法不一，有时写作“唐家坨”或“唐家坨”。究竟“坵”、“坨”、“坨”，何者为是？编《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同志作了调查了解，知道当地都写作“坵”，清同治《湘乡县志》、清光绪《湘潭县志》均作“坵”，于是就将毛泽东书信中提到的外祖父居住地一律改成“唐家坵”。毛泽东1937年1月30日给徐特立的信中有“畏崽不前”一句，“崽”字显系“崽”字之误，在编《毛泽东书信选集》时便将“崽”校正为“崽”（详见《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3期《寻绎而辨严校细勘》）。

手写型文献中，文字的辨认，因形似而误的现象也不少。如行草“檀”和“檳”相似，胡汉民、黄季陆编的《总理全集》、台湾编的《国父全书》，都把孙中山1910年4月、5月几封致纽约同志信中的“往檀”、“檀埠”、“檀会”、“檀山”、“由檀”等的“檀”字，全改成“檳”字，并标题为《由檳榔屿致纽约同志书》。这不仅使书信中某些内容被歪曲了，也使孙中山1910年3月至6月住在檀香山的史实，被篡改成住在檳榔屿了。

有些印刷本，因为校勘不精，也常发生形似而误的现象。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63页“赈济贫民（恤穷）”一句，“赈”字是“赈”字之误。第75页“且设置关东总督府”一句，“且”字为“且”字之误。这当是编辑疏忽或校勘疏忽造成的。也有的印刷本，因为原稿中的字辨认失误，再加校勘不精，发生形似而误的现象。在编辑公开出版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时就校正了内部本的一些这方面的失误。再如1934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关于白区革命工会工作的决定》，内部版有两处将“工

反”误认为“工友”。“反”、“友”在原件上的写法和笔划都很相像。而“工反”即“工人群众反日会”的简称。公开版将两处“工友”，校正为“工反”（详见《党的文献》1990年4期第84页）。

②音似而误。读音相近，容易写错、印错。很多别字，多由音近而生。如敝—弊—斃—鄙，百—柏—伯，密—蜜—秘……有些文化程度低的人，识字不多，写的东西中就有用同音字替代的现象，即别字较多。文化程度高的人，也会因疏忽，因一时“卡壳”，没有写出正字，而写了同音的别字。也有的人写别字习以为常了，毫不为怪。也有的别字是方言的反映。如编《毛泽东书信选集》时，将毛泽东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等的信中的“柳湜的《阶头讲话》”，订正为“《街头讲话》”。将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的“味同嚼腊”，订正为“味同嚼蜡”。将毛泽东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钊信中的“要付货价”，订正为“要付代价”。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在收录孙中山的《拟创农学会书》时，因音近而发生很多讹误，如将“必俟”改为“必使”，将“其弊”改为“其斃”，将“以立”改为“以利”，将“窃师”改为“窃思”，将“古有”改为“故有”等等（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校勘文字》）。这不仅是疏于校勘，而且是误改、乱改了。

③改变字形而误。手稿中的草体字，改为楷体字；繁体字改为简体字；直排改为横排等，都会因为改变失误、分合不当、上下混淆等出现错字。如上所列举的“檀”、“檠”之误，就是草体改楷体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再如中共中央1922年9月出版的机关报《嚮导》，有人简写成《响导》，就不对了。“嚮”简体字是“向”。“响”的繁体字是“響”。这就是繁体字改简体字过程中出现的讹误。直排改横排，甚至会将“二二”，写成“一三”、“三一”。将上下结构的字，一分为二，将两字合为一字，这在直排改横排中是最容易发生的。如：警—敬、言，山风—岚……等。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11期发表《新发现的两封何叔衡书信》。何叔衡信的原件是手写，不怎么草，直排，繁体字，而发表稿是横排、简体字。字体一改变便产生不少错误。两封信总计一千字左右，而文字讹误竟达14处。如：

原件“園”，发表稿作“园”（園）

原件“直率之譽”，发表稿作“直率之侃言”。

原件“歉仄”，发表稿作“歉疚”。

原件“悲痛”，发表稿作“怨痛”。

原件“所提之五项请求”，发表稿“所提三五项请求”。

原件“空色相”，发表稿“空包相”。

原件“骨肉之亲”，发表稿“骨血之亲”。

原件“可知矣”，发表稿“可知矢”。

……（详见杨通才《对〈新发现的两封何叔衡书信〉一文的订正》，载《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④窜改致误。文献被窜改的事，是常有的。有的是因为无知、因为疏忽，窜改了文献原文。如上举何叔衡信发表稿的一些错误，就与无知、疏忽有关。何叔衡信手稿原件，一般人看不到，如果将发表稿作为原件加以引用，就会造成麻烦，以讹传讹。因为别有用心，窜改文献原文的事也是有的。例如，孙中山《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讲》中有“放胆而自行公理，不必更有一毫畏惧心”句。有人将其中的“公理”改为“其是”，歪曲孙中山的主张，以为我所用。黄季陆编《总理全集》，收入孙中山1917年7月19日《致段祺瑞电》，用1917年7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所载该电校勘，竟有31处窜改。如原文的“马厂偏师”、“足下迷复之机”，改为“马厂誓师”、“足下兴复之机”。这样就把否定段祺瑞的话，改成肯定段祺瑞的话了。（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校勘文字》）这种《总理全集》如果拿来引用，实在是误人子弟。必须先严格校勘一番，才能够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出版本也校正了一些窜改致误。如1934年1月28日《中央全总执行局致河北省委与全总办事处党团的一封信》谈到：“英领事与开滦英矿务司，亲赴省府面于，要求严办工潮首事人，强令工人复工。”有的版本将“面于”改为“面谈”。而实际上“于”，指当时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面于”即面见于学忠。“面谈”，是没有搞清文义的误改。公开出版本即将“面谈”校正为“面于”。并对“于”字作了注释。

⑤避讳改字、褒贬改字等。在封建社会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是礼制。于是为了避讳而改字的现象就很普遍。这种改字有缺笔、改字等不同情况。如帝王的名字要避讳,末代皇帝名溥仪,于是有的文献中“唐绍仪”就改为“唐绍怡”,“仪式”改为“形式”……孔子名丘,为了避讳,就把“丘”字写成“丘”或改成“邱”。有些官僚地主,还搞家讳,为祖先的名字避讳,甚至还要同族人、同村人避讳。这些因避讳改字的文献,是会遇到的。

还有一种忌讳改字。如讳“死”字,便改“去”字。如为了求吉利,讨口彩,将“菜”字改为“财”字等。这在民间是很流行的。

褒贬改字,贬者改个恶字,褒者改个美字,这在统治者中间,在民间都是流行的。如清末的文献中,“孙文”都被写成“孙汶”,甚至写成“孙汶”。反动统治者对于人民革命的领袖人物的名字往往加“豸”旁,以示污蔑。革命人民憎恨反动统治,有时也会用改字表示,如将“蒋介石”写成“蒋该死”等。

以上说的是一些错字、别字出现的种种情况,这些错字、别字都应该通过校勘,加以改正的。

在校勘中校正错别字,有些情况还要区别对待。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编辑公开出版过程中,在校勘文字方面坚持了以下的原则:

第一,同义、同素反序词不改动。如“议决”、“争斗”等,不改动。

第二,今昔用法不一样的词,不改动。如“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等。

第三,异形词、谐音字,不改动。如“征取”、“坚苦”、“倚靠”等。

第四,词性演变,当时可作动词,现在只作名词、形容词的,不改动。如“领袖人四百余名”。这里的“领袖”含“率领”之意。“范围他这种投机倾向”。“范围”含“限制”之意。这些词,均不改动。

第五,词意褒贬有变化,不改动。如“群众在蠢动”、“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等等,不改动。

第六,外来语不改动。一些音译的外来语,汉字不同,如“布尔什维克”、“布尔塞维克”、“波尔扎维克”、“波尔雪维克”等,都不改动。必要时加注说明(详见《党的文献》1990年1期第81页)

以上这些情况,不能算错字、别字,所以为了保持文献的原貌,应不

改动。

确实错了的字,一般在错字后加括号注出正字,然后出校,说明校改根据。

2. 校正脱字

文献中脱漏字的现象是常有的。有些脱字情况,不影响文义,有的就会改变文义。如《近代史资料》总24号334页第27行,将《上海罢市实录》中的“不得不行也”一句,脱一字成“不得行也”,文义就完全相反了。脱字,造成文句不通顺,容易发现。脱字,不影响文句通顺,就不易发现。所以脱字,也是校勘中要校正文字的内容。

脱字的原因和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原件残缺。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因为历史和环境的原因等,文献的残缺是常有的现象。中共党史文献,有一部分战争年代的,虽然保存下来了,但残缺了。如《纪念毛泽东》中有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号布告”照片,从照片上看,这张“布告”头尾均已残缺。末尾的署名只剩“主席”、“副主席”,所署时间也只剩“公历一九”。中间也还有一些残缺。原件残缺,其中文字能设法补全的就补全之,不能补全的,只得缺之。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号布告”中的文字,就可以根据文献资料来补全。署名中的“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这通过“布告”中文字就可以补出,因为“布告”中公布了选举的结果,有“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语。即用本校方法就可以补出姓名。

②原件模糊不清。有些文献虽然没有残缺,但文献上的字,有的已经模糊不清,这样也就造成脱字。比如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原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油印本,其中有些字看不清楚了,整理时只能用“□”表示。如“□□在西湖会议上解释小组织是偶然在表面上表现”一句,整理者加注说:“原件二字不清,似为‘这时’和‘我们’字样重复印到一起”(详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4页)。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原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手稿,其中有些字看不清了,整理时只能用“□”表示。如“编辑委员会——同党校□□□□□□

□□□□□□□□”，整理者加注说：“原件一行下半被裁掉，字迹无法辨认。”（详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82页）这一条既有字迹模糊的原因，也有裁掉残缺的原因，造成脱字。模糊不清，辨认不清的字，如果能设法搞清楚，补出，最好，搞不清楚，也只得缺之。再如《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6页有两处加括号注明：“以下一句，原稿不清”。这些“原稿不清”，大概连几个字不清楚都无法辨认了，所以没用“□”表示，而只是加括号注明一下。

③空字。文献制作者因为某种需要，隐去一些文字，而代之以“□”，这也是一种脱字。有些文献整理者出于某种需要，隐去一些文字，用“□”代之，也造成脱字。如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有“一九二二年六月到一九二三年□月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三年□月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标题（详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66、168页）。为什么月份空缺？大概因为一时忘却，需要查一下才能填上，所以先用“□”代之。这是文献制作者用的“□”，空的字。在这篇文献中的“和森之立刻停止北伐对陈□□”、“因为□□的国民革命”（同上第184页）、“共产党之□□”（同上第189页）等，则并非是瞿秋白空的字，而是文献整理者空的字了。再如蒋介石1925年6月3日对东征将士演讲，说过“北洋军阀段祺瑞”，1925年7月5日《向军事委员会提案》，说过“张作霖久为日本帝国主义之爪牙”。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1931年蒋介石亲自校阅《自反录》，就把“张作霖”改为“□□□”。同年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把“段祺瑞”改为“□□□”。这是整理文献时空的字。文献制作者空的字，文献整理者空的字，能根据其他文献资料、其他版本补出的，应设法补之，不能补出，只得缺之。

④天窗。在蒋介石政府统治大陆时期，有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书报检查官可以随意挖去书报上的一些文字，而代之以“□”、“×”、“……”，甚至干脆让书报有一大块空白，被人称为“开天窗”。其中有名的“开天窗”事件，是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被国民党书报检查官挖去，周恩来挥笔在“开天窗”处写上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

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些客观报道红军的消息,也有被挖去的。甚至“一二九”运动时期,一些客观报道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也有被挖去的。这些被开了天窗的文献,有不少是可以补全的。比如某一事件的报道被开了天窗,但各报开天窗的部位不一样,于是在多种报纸的互校中,还是可以得到消息的全部内容和文字。又如鲁迅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时,也常有被开天窗的事。《阿金》一文中“主子是外国人”,《脸谱臆侧》一文中“第三种人”“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等句,就被开了天窗。好在鲁迅自编的《且介亭杂文》中,《阿金》、《脸谱臆侧》都是全文,足资校补。

⑤脱漏。文献制作者的疏忽,会造成原稿、手稿的文字脱漏。文献编辑、印刷者的疏忽,会造成印刷件的文字脱漏。这类的脱漏,一般没有留下痕迹,没有“□”,要用不同的本子仔细校勘,才能发现。例如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有一句“难道共产国际没有讲过资本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整理者加注说:“此处应是非资本主义道路。”(详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92页)大概蔡和森在写作时因疏忽而脱一“非”字,所以俄文本中也脱“非”字,从俄文本再译回中文,也脱“非”字。这是文献制作者疏忽造成的脱漏,而且造成文义的变化。又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00页“孙中山先生向袁世凯提出五项保证和条件”,应为“五项保证议和条件”,脱一“议”字,查49年本亦无“议”字,这或者是作者的疏忽,或者是编辑的疏忽造成的。又第162页“《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应为“惨杀京汉路工人……”,脱一“人”字,查49年本亦脱此字。又第137页“又正为中国无产者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生长起来的”,应为“又正因为……”脱一“因”字,查49年本有“因”字,这当是87年版的编者疏忽造成的脱字。这里的三例,第一例脱字粗看看不出,而第二三例脱字明显造成了文句的不通顺。

⑥遗漏。这不仅仅是脱几个字,也牵涉到某些内容的遗漏。这是由于不清楚事实,或者忽略了某些事实造成的。如《毛选》第一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25条注释谈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说红军和游击队“在八个省份内坚持了十四个地区的游击战争”

接着列出十四个游击区的名称。但是,其中没有“闽中”地区。实际上,根据近年来的调查研究,证实“闽中”地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始终有党的组织,有武装力量,并独立地进行游击战争,开辟了两块根据地。所以《毛选》第二版对这条注释作了修改,作“在八个省份内十五个地区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接着列出十五个地区的名称,其中有“闽中地区”。此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版第9条注释,谈到1929年红军东征福建,在福建西部“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第二版的注释补充了“长汀”。《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第一版第3条注释谈到“强令东北军东调至河南和安徽”,第二版的注释补充了“苏北地区”。《关于重庆谈判》第一版第2条注释谈到阎锡山部队“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潞城等地”。第二版的注释补充了“长治”。这些补充,说明原来有遗漏,原来对某些事实忽略了。这是文献制作者的忽略。

⑦删节。文献制作者在原稿、发表稿上删去一些文字,是常有的,有的因为想法发生了变化,有的因为时过境迁,形势发生了变化。这种删节是正常的,应尊重文献制作者的意愿。但进行校勘,发现删节,指出删节仍是有必要的,并可以从中研究文献的变化、文献制作者思想的变化。此如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来是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批评林彪的悲观思想。后来林彪要求不公布他的姓名,所以《毛选》第一版收入这封信的时候,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版的题解只写:“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没有提林彪的名字。《毛选》第二版,题目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仍不提林彪的名字,但题解重新写了,作:“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 this 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这样一说明,虽然没有在题目和正文中恢复林彪的名字,而实际上已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再如张闻天的《中国

现代革命运动史》，1946年本与1938年本相校，就有不少删节，因为解放战争与抗日战争的形势不同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改变了，书中原来的一些过时的提法自然应该删去了。而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版，则以1938年本为底本，将1946年本删去的恢复了，并写了校记。如87年本第286页写：“一九四六年版从本页第十一行‘但是’起删掉了。”这类的校记很多。这说明，87年本将46年本的一些脱文补全了。但87年本删节38年本、46年本的情况也有。如38年本、46年本第二讲第一节的第一小节“中国藩篱的丧失”，87年本就全部删去了。这一小节提到安南（越南）、缅甸、外蒙原来都是中国的“属地”，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了。这样的说法，显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不适合了，删去，也是可以的。但这种删节应作详实的说明，而87年版的《再版说明》中只是说：“这次再版，我们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订，并删去了书中的一节。”至于删去哪一节，为什么要删，却没有详细说明，这是不应该的。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就应该详细说明。46年本删去38年本的一些文字、内容，是张闻天自己删去的。87年本据38年本补出46年本的脱文，是文献整理者进行的。87年本删去38年本、46年本的文字，也是文献整理者进行的。作为文献整理者，补全文献是应该的，而删节文献，造成文献原貌的丧失，就不应该了。又如毛泽东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原稿（手稿）为（一）、（二）、（三）、（四）、（五）五点，而这篇文章编入《毛选》第一版时，毛泽东删去了第（四）点，并将序号“（五）”改为“（四）”。《毛选》第二版编辑时，一方面尊重毛泽东删去第（四）点的意愿，另一方面加了一条注释指出“毛泽东起草的这个电报，原共五点，这一段文字是其中的第五点。一九六〇年出版本卷第一版时，删去了第四点，其原文为：“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将第（四）点220余字在注释中全文补出。这样不仅使人了解全篇文章原来共有五点，而且也了解了被删去的第（四）点的全部内容，并可以从中研究、体会为什么第（四）点要删去。《毛选》第一版这篇文章的第（五）点改成第（四）点后，还删去了“二月西兵团转移”七字。《毛选》第二版编辑时，也是一方面尊重毛泽东删去这七字

的意愿,同时加注指出删去了以上七个字。这种加注指出删节,并把删节的文字都列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一条校勘记。这样做,不但使文献的原貌得到恢复,也使人们了解文献的原貌,有助于人们研究文献变化的情况和原因。

删节,也有人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刊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删去了民生主义中关于“革命的军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一大段三百余字,又删去对内政策中有关农民的一大段一百六十字(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校勘文字》)。这样的删节,等于篡改文献,通过篡改孙中山的思想,来为自己的反革命行为服务。对这样删节造成的脱文,不仅要补正,而且要指出删节的政治目的。

校正脱字,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脱字,才进行补正。如没有确凿的证据,轻易补字,那就可能造成衍文,不仅没有恢复文献的原貌,反而失去了文献的原貌。发现确实脱字,需要补正者,一般也应把补正的字用一定的符号表示,然后出校说明。如果某些脱字,是文献制作者删去的,那么可以尊重文献制作者的意愿,不必在正文中补上被删之字,而作校记说明删节情况,并可以在校记中列出被删之字的全部。

3. 校正衍字

由于文献制作者的疏忽,重复写了一些字,或多写了一些字,就造成衍字。印刷型文献由于编辑疏忽、排印疏忽也会发生衍文。衍文会造成文义和内容的改变。如“经常去”——“经常不去”,“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文义就完全不一样。有些衍文很容易发现,如“我我”,“经常经常”。有些衍文并不易发现,如上所举的“政治经济学”等。衍文,也需要认真校勘,下功夫校勘。

衍文的情况和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①混淆。一般是由于疏忽造成的。如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是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写的报告,当时抄写了三份。其中一份由湖南省委转中央(湖南本),一份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江西本)。1941年编《六大以来》收入此文,是根据湖南本印的。文中有一句“西乡的小

江区”，湖南本为“西乡小江西一区”，江西本为“西乡小江西区”，《六大以来》作“西乡小西江一区”。建国后《毛选》第一版作“西乡的小西江区”。这几个本子均衍“西”字。编《毛选》第二版时，作了实地考察，才搞清楚永新县只有“小江区”。“小西江区”、“小江西区”均衍误。于是去掉衍字“西”，作“小江区”。这一例衍字是由于把“小江区”与“小江西区”、“小西江区”搞混淆了。又如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提到“重庆号重巡洋舰”。《毛选》第一版为此舰加了一条注释，也说“重巡洋舰……”《毛选》第一版出版后，有人就写信指出重庆号不是重巡洋舰，它的标准排水量只有五千八百多吨，加“重”字显然搞错了。《毛选》第二版中，在注释中已将“重”字去掉，然正文中的“重”字仍保留着。“重”字当因没有搞清事实而衍，注释中删“重”字，正文中也应删“重”字。

某些不相干的文字、内容掺杂到文献中，称为“混入”，这也是一种混淆。比如李立三1930年作党史报告，说“施存统、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都参加了中共一大”（详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12页）。这就是一种“混入”。李立三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自然对“中共一大”了解得少，李大钊、施存统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却说他们参加了，把参加“一大”的人搞混淆了。有些混入很离奇，如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从1923年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抄录1月9日孙中山《致聂其述等函》，竟连该报的一段新闻也抄上了，致使函前衍“由全国商联合会……”69字（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校勘文字》）。

混淆、混入的情况，一般只要认真校勘、查考，都是可以发现、校正的。

②重文。文字或内容发生重复。文献制作者的疏忽、笔误，会造成文献原稿的文字重复。文献整理者的疏忽，也会造成文献文字的重复、文献内容的重复。文献编辑者、印刷者的疏忽，也会造成文献文字的重复、文献内容的重复，甚至一行一行重复，一页一页重复。如出版文献资料集，重复收入同一篇文献，这是重文。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孙中山1912年《致黎元洪等电》，先以《致黎元洪电十九》为题收入，后又以《致各省都督电》为题收入。（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校勘文字》）同一篇文献用不同的题目重复收入，显然是因为校勘不精造

成的。

③误增。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将文献制作者已经删去的文字,忘记删除,仍保留了,这就造成衍文。也有的人故意增加些文字,以改变文义,为自己的某种目的服务,这不是一时失误而衍字,而是别有用心的妄增衍字。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编《总理遗教演讲》,就有多处妄增。孙中山1912年9月31日《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演讲》,谈到外国侵略时说:“我若举行练兵增防,彼必横行干涉,甚且彼亦愈增兵设防。”而《总理遗教演讲》中在此句下增“后患何堪设想”。这样一增,变成孙中山在替帝国主义吹嘘了(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校勘文字》)。这种妄增是别有用心的。

确有证据的衍字,可以删除,并用一定的符号表示,出校说明。无确凿的证据就不能妄删,以免造成脱漏,失去文献的原貌。

4. 校正颠倒

由于文献制作者的疏忽,遣词造句中某些文字颠倒了。或者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疏忽了,也会使文献产生文字、词句的颠倒。文字、词句的颠倒,有些不易识别,有些一眼就可看出;有些不影响文义,大多则要影响文义。如“部队”——“队部”,“国民”——“民国”,“大家”——“家大”……无论明显或不明显的文字颠倒,均要认真校勘,改正之。

颠倒的情况和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①文字与标点颠倒。这是由标点前移或后移造成的。这有时是文献制作者的疏忽,而大多是文献整理者、编辑者的疏忽造成的。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收入《毛选》第一版时,有一句作“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而《报告》在1927年3月至4月出版的《战士》周报上连载时,此句为“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报告》中相同类型的句子有很多,如“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说明《毛选》第一版是标点前移,造成文字与标点颠倒。因为四十年代的《毛选》是如此的,建国后《毛选》第一版沿袭了它们的错误。《毛选》第二版作了改正,作“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又如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七讲第二节的第三小节“北伐中的民众革

命”中有一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作:“在北伐军未到前五月中,汉口纱厂、烟草工人,已经开始斗争。”查此书四十年代的版本,亦如此。但此段文字是从张闻天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引来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此句作:“在北伐军未到前,五月中汉口纱厂烟草工人已经开始斗争。”(详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24页)这表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将标点后移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本的标点后移,可使文义理解成:“在北伐军未到前的五个月当中……”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本的标点,文义是:“在北伐军未到前,五月中旬……”两本标点不同,文义不同。而根据史实,正确的文义应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本的标点后移,是文字与标点的颠倒,应该纠正。

②词语颠倒。这有时是文献制作者的疏忽,也有很多是由文献整理者的疏忽造成的。如孙中山1917年3月8日《致北京参众两院电》有“诸公代表国民”句。而黄季陆编的《总理全集》中为“诸公代表民国”,把“国民”一词颠倒了。又孙中山1917年《致国会议员电》有“择其适当之地以开议会”句,而黄季陆编的《总理全集》作:“择其适当之地以开会议”。将“议会”一词颠倒了。又孙中山1923年《致北京国会议员函》有“函电奉达,公请南行”句,而黄季陆编的《总理全集》作:“函电奉达,请公南行”,将“公请”一语弄颠倒了。(详见荣孟源《史料与历史科学·校勘文字》)

有些成语也容易把其中的文字弄颠倒。如“脱颖而出”,应该是“颖脱而出”。又如孙中山1918年2月22日《主张护法通电》中有“语重心长”语,而黄季陆编的《总理全集》作“语长心重”,这也是把成语弄颠倒了。

词语的颠倒,只要仔细校勘,都可以发现,都可以纠正。而有些颠倒的校正,还需要有某方面的知识。如1925年第8期《革命军》杂志载《挽廖仲恺联》有:“薄海同悲惟我最,大仇未报多负公。”粗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对联的对仗去看,就可以发现下联“多负公”,应为“负公多”。显然是抄录、排印时发生了颠倒。

③人名、地名颠倒。因为文献制作者或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

者的失误,造成人名颠倒、地名颠倒。如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文件《各委员报告》有人名“梁浩如”。而《向导》第38期毛泽东《英国人与梁如浩》一文谈到:“办理威海卫交涉的人:一个是督办梁如浩。”其他一些文献也作“梁如浩”。说明《各委员报告》把人名搞颠倒了。在编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出版本)时,便把“梁浩如”校正为“梁如浩。”地名如山东的武城县、成武县,就经常混淆颠倒。

校正人名、地名的颠倒,一般需要用他校、实地查考等方法,要下些工夫的。

④误乙。即把本来不颠倒的文字搞颠倒。这一般是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的疏忽造成的。如1924年2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孙中山《祭列宁文》有“茫茫五洲,芸芸众生”,“敌则不乐,民乃大欢”句。后1924年3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转载,变成“芸芸五洲,茫茫众生”,“敌则不欢,民乃大乐”。这显然是抄录者失误、编辑者疏忽造成的误乙。

有的人别有用心,故意将文献的文字、词语弄颠倒,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这不是一时疏忽的误乙,而是别有用心之妄乙。这种妄乙,不仅要校正之,而且要分析、揭示他妄乙的目的。

对颠倒进行乙正,必须有确凿的根据,否则就会造成误乙,失去文献的原貌。在乙正颠倒时,一般用某种符号表示,并出校说明。

5. 校正数字

文献中数字的校勘,应有足够的重视。数字的讹、脱、衍、颠倒等,在文献中也是常有的事。这一般是由于文献制作者、整理者、编辑者的失误,也有印刷者的失误造成的。数字的差错,一般不校勘是发现不了的,除非有些数字的差错造成史事、史实的离奇。校勘文献,文字要校,数字也要校,决不能忽视。《任弼时选集》编辑组在编辑时订立的原则之一是“有数必核”,这对于校正数字的讹误,恢复文献原来面貌,起了很好的作用。如任弼时的《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一文中有7个表格,里面都是数字。编辑组采取以下的方法校勘这些数字:第一步核查绝对数,包括总数和分项数之和,重新计算百分比。第二步以绝对数检验百分比,以百分数复核绝对数。第三步分析引起数

字矛盾的可能性。这样一校勘,就发现不少数字上的讹误。如百分比计算错误,如数字位置颠倒,把 4.359 误作 4.395,把 7.314 误作 7.341。如数字的讹误,把 1.576 误作 1.676 等。还有些数字,如抗战前全国棉田亩数,华北棉田数,美棉进口数等等,就用大陆和台湾的一些出版物,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公报等一一校勘。再如各历史阶段的中共党员数,党员中青年、妇女、工人的比重,就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加以校勘。这样,就基本消除了文献中数字的各种讹误,恢复了文献的本来面貌。

《毛选》第二版编辑过程中,对第一版的一些数字也认真校勘,校正了不少讹误。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第一版中有一句“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四千五百块钱公债”。而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作“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于是第二版校正为“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又如《学习和时局》,第一版谈到:1937 年共产党的军队是“三万多人”。而这个讲演当时的记录稿中是“四万军队”。1937 年彭德怀、任弼时关于八路军三个师的编制方案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军有四万二千五百人,不包括总部直属机关和部队的人数在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说,1937 年 8 月八路军有四万六千人。这说明“四万多人”的说法较符合事实。于是第二版将“三万多人”校正为“四万多人”。这篇文章的第一版又说,陕甘宁边区 1942 年有工人“七千人”。而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工人是“三千九百九十一人”。毛泽东 1944 年 5 月 25 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也说 1942 年的工人数是“四千”。于是第二版将“七千人”校正为“四千人”。数字符合历史事实,自然就有助于整个文献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旧时中国的数字,除一、二、三、四、五……等以外,还有一种苏州字码,也称中国旧式数码,其一至九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种数码,一般在旧时手写型文献,如手写的账本等中较常见。现在已不常见了,现在的很多人也不识这些数码。在文献中遇到这些数码时,要认真查核,不要有失误、差错。文献中的这些字码,一般不必改动,可以加注说明之。

6. 校正译文

在中共党史文献中,有一部分是翻译的。比如中共一大的文件就是英译本和俄译本。其他译成中文的党史文献,还有很多。此外,在中文的党史文献中含有译文,也是屡见不鲜的。文献原件是译本,或文献原件中含有译文,这些译文都是要认真校勘的。译本和译文中的讹误是常有的,不校正这些讹误,一是不合外文原著的本来面貌,二是不合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如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初版本《毛泽东传》(原著者 R·特里尔),翻译的错误就很多,以后出修订本,就校正了一些错误。张注洪也谈到在中共党史的一些文献中有人将外文的“字林西报”译成“华北新闻”,将“总统府”译成“总统宫殿”,将“灯市口”译成“腾时阁”(详见《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述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0 页)。斯诺前夫人尼姆·韦尔斯当年写了《续西行漫记》,1952 年加以增订,出版了《红尘》。“红尘”典出班固《西都赋》“红尘四合,云烟相连”,形容当时长安繁华景象。韦尔斯即以“红尘”来称颂延安。而有人却译为“红色的土地”,这就不能表达作者的原意,而且表明译者的文学修养水平还不高(详见《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第 2 版,第 233 页)。又如《党史研究资料》1979 年 13 期发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情况资料摘编》,文中根据罗勃 C·诺斯《莫斯科与中共》(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 1956 年 7 月初版)第 50 页上的“Hollander Maring”就说 1921 年“第二国际派遣了霍兰德(Hollander)和马林(Maring)来华参加正式组织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后来有人即指出:中共“一大”并无“霍兰德”其人参加,“Hollander”并非人名而是“荷兰人”,马林正是荷兰人。误将“荷兰人马林”拆开成“霍兰德”和“马林”了(详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 2 期第 31-32 页)。这个失误是校勘的两方面失误。一是香港出版的中文版作“霍兰德”、“马林”两人,没有认真校勘英文,便以讹传讹。二是英文本没有仔细校勘,没有搞清楚“Hollander Maring”的原意。如果说将“红尘”译为“红色的土地”只是不确切、不贴切的话,那么将“Hollander Maring”译成“霍兰德”、“马林”两人,就是误译、妄译了。

又如 1938 年出版的中文本《西行漫记》及《毛泽东自传》(即《西行

漫记》中《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因为音译的不准确,将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误为“文其美”,将杨开慧误为“杨开辉”。这与当时很多人还不熟悉毛泽东经历有关。而萧三是熟悉毛泽东经历的,所以指出了其错误,并作了订正。

外文原本被删节、改动,致使中文本面目全非的情况也有。如孙中山1914年10月9日《致李源水函》引前日《复李源水电》为:“Inform all we have nonconfidence in Chu - Chungsiun Chung - San.”译文应为“请告众知,我们不能信任朱执信。中山。”这个英文本原件收入影印本《总理遗墨》。后来胡汉民重印《总理遗墨》,涂去了“Chu - Chungsiun”,于是中文变成:“请告众知,我们不能信任中山。”台湾编《国文全集》,不找初版本《总理遗墨》校勘,便据胡汉民本,译为:“松寿为人无信实,不足靠,请通知各人。”以讹传讹,把文献弄得面目全非。这是英文本妄删,造成脱漏,中文本又妄译的例子(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校勘文字》)。

《毛选》第二版的编辑,也注意了译文的校勘。如《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第一版在题解中说:“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做‘泥塑巨人’看做‘空架子’一样,毛泽东同志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做纸老虎。”列宁说的“泥塑巨人”、“空架子”,均见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一版和《列宁选集》中。而实际上列宁的俄文原文典出《新旧约全书·但以理篇》文义为“泥足巨人”。《列宁全集》第二版中文版中,“泥塑巨人”、“空架子”等均改译为“泥足巨人”。《毛选》第二版亦将“泥塑巨人”改为“泥足巨人”。“空架子”与“泥足巨人”同义,重复,即删去。

校勘译本、译文,一可以各种不同的中译本校。二可以外文原版与中译本校,这是最重要的一校。只有校外文原版,才能清楚译文是否正确,译本是否忠实于外文原版。翻译的水平人各有异,就是信达雅的标准,各人也有各自的理解、掌握。所以校勘时要仔细谨慎,不要轻易否定前人的译文。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译法,能做到“信”,译文就算基本正确了。

二、校勘内容

校勘内容一是和校勘文字相联系,因为校勘文字中也涉及到内容。二是校勘内容的类型与校勘文字的类型是差不多的,只是校勘内容涉及到的文字一般较多,或者是一行一行文字,或者是几行几行文字,甚至是一页一页文字等。

1. 校正讹误

校正文献内容的讹误,主要是指史实的讹误,观点方面的正确与否,不属校勘的范围,属于评论、批评的范围了。

如《毛选》第一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题解中说:遵义会议“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问题做了决议”。实际上,在遵义会议上,中革军委的主席、副主席并无变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这说明题解在史实上就有些出入。于是第二版改为:“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所谓“中央领导机构问题”的决议,指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等。这样就准确了些。又如《毛选》第一版《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题解说:“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这样说法显然不准确,因为抗战初期蒋介石还是作了些抗战努力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说到:“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里是说蒋介石政府在1938年10月以后开始将重点转到反共反人民,并非是从1937年抗战开始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这篇题解不仅与史实不合,也与毛泽东其他文章的说法不合。第二版将题解改为在“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前,加上了“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更”十五个字。以上这些内容的校改,都直接修订了原文。

《毛选》第一版《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在驳斥艾奇逊关于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所谓“极权政府”的诬蔑时,说:“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这里对铁托政府的指责,显然不符合事实。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参加八大的代表团时,曾谈到: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这是毛泽东向南斯拉夫道歉,实际上就是纠正《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的说法。《毛选》第二版没有删掉原文中批评南斯拉夫的话,但加了一条注释,引了毛泽东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说的话。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原文的一种修正。因为文献的制作者已去世,且文献是历史文献,自然不应该由后来者改动文献了。

文献内容、史实方面的讹误,有的是疏忽造成的,有的是缺乏深入研究造成的,也有的是别有用心故意窜改造成的。

2. 校正错“简”

古代著书、抄书都写在竹简、木简上,然后用牛皮带等编连起来。日久天长,牛皮带磨损折断,简散乱了,重新编连发生简错乱,失去原来秩序,称为错简。现在的印刷型文献中的错行、错页等也称为错简。手写型的文献,通常原来是有秩序排列的,但有些文献,因为没有编页码,一旦散乱,重新恢复原来的秩序,就不那么容易,而整理这些曾经散乱过的手写型文献出版,出现错简是难免的。错简不仅是文字上出差错,而且是内容上出现了混乱,文献变得面目全非。校正错简,以找到没有散乱过的原本来校勘为上,找不到原本,只有设法通过各种校勘的办法来恢复文献原貌。

错简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错行、窜行。前一行或几行文字窜到后一行或几行文字中;后一行或几行文字窜到前一行或几行文字中。这种差错,通常会在抄写和排印时发生。文献制作者,即使疏忽,一般不致发生错行、窜行的差错。

而抄写者、排印者一时疏忽,就容易造成错行、窜行。如《青岛潮》一书中的《芜湖学生联合会之宣言》就有三条错行、窜行,后《近代史资料》总24号收入时校正了二条,还有一条没发现(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校勘文字》)。

②错页、窜页。前后页错乱,后页窜到前半部分,前页窜到后半部分。页与页之间无法衔接,文献所叙时间,前后颠倒。这一般因为文献原件未编页码,散乱之后没有能照原貌恢复,整理者、编辑者,又未能仔细校勘、研究,于是就造成重新发表文献时错页、窜页。有些书本型的文献,因为装订的疏忽,发生错页也有。这类的错页,因为各页都编了页码,较易发现,也较易校正。而印刷型文献内容中的错页,一般不易发现,校正起来,也较需花工夫。

③单错。“单错者,本处有缺文,错简在他处是也”(陈垣《校勘学释例》)。本处缺一行或几行,缺一页,缺的部分在其他地方,一个地方缺,一个地方衍,为单错。如一封信原有两页,两页被分开放在两个地方,就成为一缺一衍。例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影印了1907年11月5日孙中山《致张永福函》。此信原为两页,却印在两处,造成单错。以致后来台湾编《国父全集》只用了一页(详见荣孟源《史料与历史科学·校勘文字》)。这类错简,一般是由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的疏忽造成的。

④互错。“互错者,本处有缺文,错简在他处;他处亦有缺文,错简在本处;所谓彼此互错也”(陈垣《校勘学释例》)。本处缺一行或几行,缺一页,所缺部分在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缺一行、几行或一页,所缺部分在本处,互为错简。这类错简一般也是由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的疏忽造成的。

⑤衍漏错。“衍漏错者,本处有缺文,而重出他处之文于此,又衍又漏也”(陈垣《校勘学释例》)。本处缺一行、几行,或缺页,所缺者不知在何处,而本处又多出一行、几行或一页,多出的部分,也不知属何处,本处又缺又衍,为衍漏错。例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收入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国民党之政纲》部分“一人或一派之利益”下脱漏近二千字,却拼凑上1924年8月29日国民党《对

于广州商团罢市之宣言》从“于主义之进行”起到末尾共八百字。这不仅是疏于校勘，而且搞乱了孙中山的论著，歪曲了孙中山的某些主张。

3. 校正脱简

缺一行、几行，缺一页、几页，缺一节、一章等，都是脱简。一般是由于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装订者的疏忽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文献整理者、编辑者的删节造成的。校正脱简一般需要找到原本、全本，找不到原本、全本，只得通过各种方法，设法恢复文献本来面目。

脱简和脱字有类似之处，都是脱漏，只是脱简的脱漏文字更多一些。脱字的几种情况，对于脱简来说，一般也是存在的，可以参见。以下说说脱简的主要几种情况。

①原件残缺。这对于经过战争年代的党史文献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例如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最初以中文发表在《顺直通讯》第2期上，以后又译成俄文，发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编辑的《中国问题》1929年第1期。因为经历战争年代，中文本《顺直通讯》已残缺了，连全本也找不到，缺了前半部分。所以《党的机会主义史》被收入很多中共党史资料书，都不是全本，都缺前半部分，即长期以来以残本流行。而俄文本由于在前苏联保存着，所以是全本。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收入《党的机会主义史》，便请人译出俄文本的前半部分，补全了此论著，结束了因中文本残缺而脱简的状况（详见拙著《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4年版）。

②脱简。例如《六大以来》（上）第796页1937年1月7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第二条说：“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这里的对张杨“未曾赞同过”，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中共中央在1936年12月19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肯定了张杨的行动。后来将此“指示”与中共中央1937年1月7日发给北方局胡服（刘少奇）的《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电报校勘，发现“指示”第二条中脱漏了三十余字。第二条应为：“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

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联合抗日表示同情;但另一方面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详见丁雍年《对〈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的校正》,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12期)。这一例校正,虽然没有找到原本、全本校,但通过他校,也校正了脱简。

③删节。有的是文献制作者自己作删节,这应该尊重。有的是文献整理者作的删节,是否补全或出校,可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是别有用心的妄删,这应该补全、出校并揭露其妄删的用意。前论“校正脱字”时例举的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原稿为五点,《毛选》第一版收入时删去第四点,变成四点,这是文献制作者的删节。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删去“中国藩篱的丧失”一小节,这是文献编辑者的删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删去两大段文字,这是文献整理者别有用心的妄删。这些删节均造成了脱简。其详细情况前已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4. 校正衍简

衍一行、几行,衍一页几页,衍一节、一章等,都是衍简。一般是由于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装订者等的疏忽造成的。衍简和衍字有相类似之处,其衍的类型及其校正方法与衍字也差不多,只是衍的文字更多一些。前《校正衍字》一节可以参见。

①重简。一行、几行重复了,一页、几页重复了,这在印刷型文献中会产生的,在手写型的抄件中也会产生。但发现较易,校正也较易。很多衍简可以通过本校、对校得到校正。有的文献资料集,发生一文两系,一文以两个题目重复收入(详前)的现象,也可以通过本校、对校得到校正。

②混入。不相干的内容混杂到文献中。如前例举的抄录报上刊载的孙中山信,把报上的新闻也抄上去了。又如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抄录1920年12月6日孙中山的《军政府责北方破坏和平宣言》,把邹鲁《国民党史稿》中的文字也抄上去了,致使《宣言》后衍出一大段文字。整理、编辑文献资料集,把不相干的

文献资料收入,也是一种混入。如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就把袁世凯发布的通令当作孙中山发布的通令收入了(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校勘文字》)。校正混入,一般用对校、他校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③误增、妄增。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没有将文献制作者删除的内容删除,造成衍简,这是误增。有些文献整理者、编辑者,故意增加些文字,以改变文献的内容,这是妄增。这类误增、妄增的衍简,一般通过对校、本校也可以解决。

5. 校正混淆

前面谈文字、内容的混入,造成衍字、衍简,这是一种混淆。此外,内容的混淆还有正文与注文混淆、文献分合混淆等。这些混淆,一般是由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装订者的疏忽造成的。这可以通过对校等方法来校正。

①正文与注文混淆。旧时文献,有的正文用大字,注文用小字,附于正文后,这就很容易造成注文混入正文。有的正文与注文字号大小一样,只是注文用括号括起,附于正文后,这也容易造成注文与正文混淆。现在文献的注文,一般附在文献的末尾(尾注),或在一页的下方(脚注),而且大多用标准线将正文与注文隔开。这样虽然可以防止注文与正文混淆,但如果文献整理者、编辑者、印刷者疏忽,仍会造成注文与正文混淆。不论旧时文献或现在的文献,正文与注文是否混淆,都是需要认真校勘的。

②文献分合混淆。一件文献被分割为二、为三,各加标题成为独立的文献;两件文献,或两件以上文献被合为一件文献,用一个标题,这些都是分合混淆。一般文献原件没有标题,或标题残缺,就容易造成这类混淆。有的文献原件没编页码,也容易造成这类混淆。例如有些篇幅较长的信、电报等就容易被分割。有些篇幅较短的新闻报道,容易被合并。这类混淆,只要认真校勘原件,都可以校正。

三、校勘标点

旧时文献没有标点,整理者如果加了标点,就需要校勘所加标点的正误。旧时用了标点符号的文献,因为旧时的标点符号形式、用法等与

现在略有不同,还有用得确当与否的问题,这都需要认真校勘。在党史文献中,标点符号用得不恰当,或位置放得不恰当,是常见的。如前面谈到的“标点与正文颠倒”,实际上就是标点的位置放错了。标点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文献的内容,校勘标点,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既要校勘标点,就要懂得如何使用标点。关于标点的使用问题,在“整理”一章中已详论,可以参见,这对于校勘标点,也是适用的。

四、校勘目录

篇幅较大的文献,有的是编了目录的,如撰述史料类文献。有些文献资料的书,也是编了目录的。有目录的文献,目录也应进行校勘。目录一般是把文献的大、小标题编排起来,把章、节标题编排起来,或把篇目编排起来。校勘目录,首先就是要将正文中的大、小标题,或篇名,与目录本校。要以正文中的标题、篇名来校正目录,而不是用目录去校正正文中的标题、篇名。在校勘过程中发现正文的标题、篇名本身有误,就要先校正正文的标题、篇名,然后再以校正了的正文标题、篇名去校正目录。目录准确与否,对文献的原貌、质量,都有影响,是需认真校勘的。像黄季陆编的《总理全集》,《函札》部分有154篇,而目录与篇名不同者,竟有14处。《讲演》部分,目录中有《和平统一化兵为工》一篇,正文中却没有这篇讲演,即有目无文。这表明黄季陆编《总理全集》,目录部分没有校勘过,造成质量低劣。这是校勘目录值得记取的一个教训。

五、校勘照片

中共党史文献中附有图片是常见的,有的是图表、图画,有的是地图,有的是照片等。图表、图画、地图都是要认真校勘的,否则容易出差错。特别是地图,要画得准确,很不容易,不仅画时要仔细、严谨,画完后仍需认真校勘。以下主要谈谈照片的校勘,作为图片校勘的代表。

照片,是一种原始史料类文献,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是很高的,其作用、功能是多方面的,应用性强。在中共党史文献中,照片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附在文字文献中,成为文字文献的插页;另一种是展

览会上展出;还有一种是照片专集;也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此外,印在明信片上,印在挂历上等也有。照片在流传过程中,发生残缺,差错,篡改的现象,也是不少的。有些照片的文字说明出现失误,把内容、人物、时间、地点等搞错,也常有。恢复照片的本来面貌,是校勘照片的重要任务,而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校勘照片,主要是对校,搜集各种不同的版本,互相比勘,往往可以发现问题,校正讹误。同时也可以依靠一些文字资料来校核照片,校勘照片的文字说明等。

校勘照片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 校正篡改

拍照片的时候,可以进行取舍,印照片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取舍,甚至可以除去、取消照片上的某些内容。对照片的内容作某些取消,或进行裁剪,这可视为篡改照片。篡改照片,一般都是出于某种需要,特别是某种政治需要。校正照片篡改,找到未篡改本进行校勘,就可以解决。

篡改照片的情况及原因主要是:

①剔除某些内容。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一些毛泽东画册,其中有一些照片,就被剔除了某些内容。1971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收入毛泽东1919年至1970年间的照片50幅,实际上是毛泽东的照片集子。其中第18幅照片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幅照片上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周围没有其他人,与其他版本的照片一校,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周围本来有很多人,都被剔除了。剔除其他人,在“文革”时期是不奇怪的,显然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缔造的。这种篡改是当时个人崇拜思潮的反映。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新华社随即编发了一组毛泽东的历史活动照片,计63幅,题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中一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照片,原来照片中毛泽东的右边是彭真(见1961年9月,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主席和各族人民在一起》收入的此幅照片),这里把彭真“剔除”了。因为1976年9月,“文革”还没有结束,而彭真在“文革”期间被打倒

了,按“文革”时的规矩,被打倒的人自然就没有资格与毛泽东在一起了。彭真所以被从照片上“剔除”原因就在此。其中还有一幅“一九六七年,毛主席观看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后接见全体演员”的照片,这幅照片在报上发表时,演员们都举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在呼口号,而这里“小红书”全被剔除,变成演员们举着手呼口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林彪自我爆炸后,已在政治上被打倒,而“小红书”是林彪搞个人崇拜,借以向上爬的工具。林彪既被打倒,“小红书”也被打倒,照片中再出现“小红书”,就是宣传林彪了,于是剔除之,所谓“因人废事”、“因人废言”。

在照片中“剔除”某些内容,一般是在照片的底片上作些技术性处理,把某些内容“剔除”,并不影响其他内容。校正这类“剔除”,要找到照片的原本或最初发表稿,重新翻拍就可。1989年3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毛泽东》,收入的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的照片,仍然“剔除”了彭真,沿袭“文革”时期照片的篡改,这实在是个遗憾,大概也是疏于校勘所致。

②裁剪。通过裁剪,删除照片的某些部分。裁剪,一般在照片的周边进行,不像“剔除”可以在照片的中央进行。“文革”时期照片被裁剪的现象是很多的。在“文革”结束的初期,因为受到“文革”的影响,照片被裁剪现象仍然存在。例如1979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就有数幅照片因被裁剪而失去原貌。如集中第21幅照片“毛主席在延安(一九四一年)”,实际上是毛泽东、陈云、林伯渠一起参观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是1943年11月的事,集中把陈云、林伯渠删除了,只用了毛泽东个人的局部照片,且把时间也搞错了。至《纪念毛泽东》出版,校正了裁剪,将原照片全部印出,文字说明也作了订正。又如集中第161幅照片“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热烈欢迎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和苏修叛徒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后回到北京(一九六四年)”。这幅照片原本是有刘少奇的,这里把刘少奇“裁”去了。“文革”时期刘少奇被打倒,至1979年还没有平反昭雪,所以在照片中被“裁”去,是不奇怪的。至《纪念毛泽东》出版,校正了剪裁,恢复了刘少奇,文字说明也改正为:“1964年11月1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到

首都机场欢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校正裁剪,找到原本全本的照片重新翻拍即可。

③篡改文字说明。照片的内容,是特定历史事实的写照,文字说明也是必须反映特定历史事实的,而不能随意改动。照片不改动,文字说明一改动,照片的内容就会被篡改,照片的本来面貌也就失去了。比如照片上的人是某甲,文字说明说是某乙,这样,照片的内容就完全被篡改了。例如一张反映国民党“一大”与孙中山同出会场的照片,孙中山旁边有个长大胡子的人,长期以来都指此人为李大钊,把这张照片视为“国共合作”的象征。1978年11月初,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参军处上校副官的张猛参观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预展,即指出照片中的大胡子人不是李大钊,而是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参军处上校副官邓彦华。这使文字说明的讹误得到纠正,照片恢复了本来的内容。(详见1989年12月12日《团结报》)

又例如,“文革”时期出版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第一幅照片是毛泽东年轻时的半身照,题为“一九一九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主编“五四”时期重要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实际上这幅照片是1919年毛泽东与母亲、两个弟弟合影的一个局部,根本不是主编《湘江评论》时拍的。此外,把《湘江评论》说成是“最重要的革命刊物”,意即比《新青年》等更重要、更有影响,这显然也篡改了历史事实。再如,《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有一幅照片是“毛主席接见空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代表和五好战士”。这个文字说明说的是事实。而《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收入这幅照片,文字说明改成:“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接见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指战员。”这么一改,就把照片的真实内容改掉了。这里把“学毛著”、“四好单位”、“五好战士”等删去,显然因为这些东西是林彪为首的人搞的。打倒了林彪,自然就想回避这些东西。但是,回避这些东西,就是回避历史事实,删改这些东西,就是删改历史事实。这种删改是不应该的,必须校正。

2. 校正伪造

有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伪造照片,这是常有的事,伪造照片

的主要手段是嫁接、拼装等。例如1984年3月10日《团结报》刊登孙中山“伦敦蒙难脱险后照片”，说是1896年或翌年与康德黎老师和乔义生合影。实际上这三个人根本没有合影过，只是将孙中山1913年的照片及乔义生与张复生合影中的乔义生部分，还有康德黎半身照片拼制而成。还有用“换头术”，即把照片中的人头换成另外一个人头。校正这类伪照，必须找到照片中人物的原本、全本照片，仔细校勘，同时可以查阅一些文字记载，进行鉴别。

1986年11月1日《团结报》刊载1925年孙中山临终前拍的照片，说是“由神户爱国华侨收藏，是首次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时也刊载了这张照片。实际上这张照片并非是孙中山临终前拍摄的，而是根据油画拍摄的。把油画说成照片，这也可以视为伪造照片。因为油画是文艺史料类文献，不能当成原始史料类文献来用的。校正这类伪造要用各种校勘手段，而且要对某方面的资料特别熟悉。以上两例伪造的揭示及分析，详见《民国档案》1988年1期第113页王耿雄《〈孙中山先生画册〉审定札记》。以下有关孙中山照片的分析均见此。

3. 校正倒印

照片的放印是依赖底片的，而底片的正面、反面，如果疏忽大意是会搞错的，一搞错，照片就印反了。有时翻拍照片，如果不仔细，照片也会印反。印反，即是照片的左、右颠倒了，如原来在右边的人，到左边去了，在左边的人到右边去了。这种颠倒，严格说也是失实，失去照片的本来面貌。例如1986年版《孙中山先生画册》第213幅照片“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主持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就印反了。这幅照片系据日文版《近百年史》画册复制，该画册的照片是正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的1958年版、1984年版《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等收入此幅照片也是正的。但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时，展览的图片及新华社的发稿，则印反了。于是各报刊、各种书籍均以讹传讹，直到86年版的《孙中山先生画册》。所以出现这样的讹误，显然是疏于校勘所致。校正这类倒印，可以设法找原本校勘，可以考查旧址，可以访问了解情况的人等。还可以根据当时的一些生活常识辨别之。如辛亥革命时期人物分头的发式，一般都是左边开路，如果照片中的人物分头右边开路，照

片就印反了。

4. 校正文字说明

一幅照片,如果没有文字说明,不能算一件完整的文献,有了文字说明就是一件完整的文献了。而文字说明只有准确,符合史实,文献才能现出本来面貌,如果不准确、不符合史实,文献就失去本来面貌。校勘照片,校勘照片的文字说明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校勘文字说明的内容是很多的,如校正文字说明的篡改,前已论述。此外,还有几项主要的内容如下:

①校正内容。文字说明如果篡改了照片内容,要校正;如果不符合照片内容,如果表述不准确、不确切,也都要校正。例如《孙中山选集》刊登的一幅孙中山在日本的照片,题为“1905年在日本与同盟会会员合影”。而日文版《孙文先生东游纪念写真帖》载:1913年3月22日孙中山出席长崎基督教青年会欢迎会,“晚再莅医学校……留学生招待会,对学生为训示演说”并合影。随同者有马君武、戴季陶二人。从照片看,可以看到医校大厅灯火辉煌。孙中山坐中,在旁为马君武、戴季陶,其他均系医校师生。这表明《孙中山选集》中的照片文字说明不符合史实。到1986年《孙中山先生画册》收入此幅照片,遂将文字说明校正为“1913年3月22日孙中山和在长崎医专的中国留学生合影”。

②校正时间。昨天拍的照片今天发表,一般不会把年、月、日搞错,而数年前,数十年前的照片在今天发表,有时就会把时间搞错,所以文字说明中的时间是要认真校勘的。例如,孙中山在东京与梅屋庄吉夫妇合影,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的《纪念孙中山先生》,注为“1914年”。而1915年《东方杂志》发表这幅照片时,说明是“民国四年(1915)三月摄”。并发表《总理铜像之建立》的报道及图片。报道了梅屋庄吉在日本耗费巨资,以四年时间铸造五尊孙中山铜像,分别树立在南京、广州、武昌等地。当第一尊铜像运抵中国时,梅屋提供了与孙中山的合影,在《东方杂志》发表。梅屋本人说摄于1915年3月,总不会错的。所以1986年版《孙中山先生画册》更正为“1915年孙中山在东京与梅屋庄吉夫妇合影”。又如“孙中山在杭州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欢迎会演讲后合影”照片,81年版《纪念孙中山先生》注为“1912年11月8日”。

而台湾1984年版《国父图像墨迹集珍》注为“1912年12月9日”。查1912年12月10日《申报》报道：“孙中山先生定期八日莅杭”，是日下午“四时至马坡巷法政学堂赴国民党欢迎会，先列坐摄影”。这说明此照片当摄于1912年12月8日，“11月8日”、“12月9日”的说法均误。86年版《孙中山先生画册》校正为“1912年12月8日”。

时间的准确与否要校正。时间的详尽与否也要校正。照片的时间交待得越详细，也就越接近历史事实，或越多地反映了历史事实。比如一幅照片，只交待拍摄年份，不交待月、日，就不知道具体时间，不知道春夏秋冬，离历史事实就远一些。如果交待了年、月、日，那显然就离历史事实近了。所以校勘照片的时间时，能把月份、日期、时辰都搞清楚，也是重要的工作之一。例如编辑《纪念毛泽东》画册时，就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中有的照片只注了年份，《纪念毛泽东》中把月份、日期甚至时辰也注出了。如“毛主席在北京和新闻工作者谈话”的照片，《选集》只标“1950年”，《纪念》标了“1950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的照片，《选集》只标“1954年”，《纪念》标了“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小演员谈话的照片，《选集》标“1958年”，《纪念》标“1958年2月4日”。又如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会议闭幕式上的照片，《纪念》注为“1949年9月30日晚”。毛泽东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纪念》指出是“1949年9月30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照片，《纪念》指出是“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开国大典照片，《纪念》注为“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这表明《纪念》在照片时间的校订工作中是下了功夫，并且取得不少成绩。

③校正地点。照片记录的是特定时间、空间的史实。时间搞错，照片就失实，地点搞错，照片也失实。照片文字说明中的地点也是要认真校勘的。例如，1926年良友社出的《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有一幅照片注为孙中山与其一部分之党员在南京摄影。实际上照片的背景是大门扎有彩花的迎宾馆，是1912年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抵北京，住石大人胡同迎宾馆，9月10日与随员、招待员的合影。其中随员有魏宸祖、胡秉柯等，招待员傅良左、施愚等均为袁世凯的密探，照片上都能辨认。

这里把地点搞错了。86年版《孙中山先生画册》校正为：“1912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北京同随员、招待员于迎宾馆合影。”这里不仅纠正了大地点（城市），也交待了具体地点“迎宾馆”。又如，81年版《纪念孙中山先生》有一幅注为“1918年摄于上海”的照片，其背景与“1917年7月27日广东海陆军警在广州东园欢迎孙中山合影”的背景相同。而台湾版的孙中山画册不注年代地点。查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8月4日的报道，谈到：“7月27日广东全省警卫军、海军、警察全体假座东园开会欢迎孙中山。”既然照片的背景是东园，地点当在广州。所以，86年版《孙中山先生画册》校正为：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后留影”。

地点，也有交待详尽与否的问题。比如上两幅照片，一幅交待“北京”“迎宾馆”，一幅只交待“广州”，显然前一幅详尽。后一幅交待广州“东园”，就详尽了。地点交待越详尽、越具体，照片就能越反映出本来面貌，反之，就离本来面貌远一些了。所以校勘照片的地点要把大地点搞准，也要把小地点、具体地点搞清楚。编辑《纪念毛泽东》画册时，就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例如《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中，中共“七大”开会的地点没交待。《纪念》指出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1947年看军事地图的照片，《选集》只说在陕北，《纪念》指出在陕北葭县朱官寨窑洞内。政协一届会议开会的地点，《选集》没有交待，《纪念》指出是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1950年毛泽东和新闻工作者谈话照片，《选集》只说在北京，《纪念》指出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有些毛泽东视察工厂、农村的照片，《选集》中往往只说“视察工厂”、“视察农村”，不说视察什么工厂、什么公社。《纪念》则一般都交待具体的厂名、社名，如“视察上海江南造船厂”，“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棉纺九厂”，“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视察南京市郊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等。

校勘照片本身需要查考一些文字文献资料，校勘照片的文字说明则更必须查考一些文字文献资料了，甚至还需要作些实地考察。

第三节 校勘抄件

在搜集和整理中共党史文献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原件,但不少原件是只供阅览,不能用来整理、加工的,于是就产生抄件。在搜集到的党史文献中,会有不少抄件,在整理党史文献的过程中,也会有不少抄件。抄件,无论是用于收藏,还是用于整理、研究、出版等,它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和原件在文字等方面完全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抄件进行校勘。抄件在形成后,就应该进行校勘,抄件在利用、使用前也应该进行校勘。校勘抄件的主要任务,是力求抄件与原件在文字、内容上完全相同。校勘抄件的特点是,只要求将抄件和原件对校,做到不讹、不脱、不衍。不需要参照其他材料,除非原件本身有需要校正、补正的地方。也不要求纠正原件上的一些内容讹误等,这是校勘原件的任务。如果抄件来源于没有校勘过的原件,那么先以原件校勘抄件,使抄件与原件一致,然后再利用抄件来校勘原件,即在抄件上进行校勘加工,利用抄件解决原件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抄件来源于已经校勘过的原件,那么只要使抄件和原件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因为原件中已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一般来说,校勘抄件主要是抄件与原件的对校,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校勘。

校勘抄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校勘文字

1. 校正字体

字体指繁体字、简体字,楷体字、草体字等。校勘字体,就是校一校抄件的字体是否与原件一致。一般来说,原件是繁体字,抄件最好也是繁体字,如果整理出版,最好也用繁体字排版印刷。这样就比较有助于保持文献的本来面貌。如果要用简体字排版印刷,出版文献资料集,需要将原件的繁体字在抄件上改成简体字,那么首先要校勘繁体字该不该简化,其次校勘简化得对不对。该不该简化,涉及到文义。因为有些繁体字如果简化了,文义会发生变化,就不要简化。如“乾”,可以简化

成“干”，但“乾隆”、“乾坤”的“乾”就不能简化成“干”。如“馀”，可以简化成“余”，但如果把“馀党”写成“余党”，一种文义就会变成多种文义。“余党”，可以理解为“其余的党徒”，也可以理解为“姓余的同党”，或者“我的一党”等。所以，文义是“其余的党徒”，那么“馀”字不妨不要简化。又如復、複、覆，都可以简化成“复”。那么“复国”是“復国”还是“覆国”？就要揣摩。如果是灭亡之意，写“覆国”较清楚；是恢复之意，写“復国”较清楚。再如“閒”，是“间”还是“闲”；“藝”，是“势”还是“艺”，都要仔细分辨。这就不仅牵涉到该不该简化，也牵涉到简化得对不对。抄件的字体不简化，只要与原件文字一样即可。抄件如果用简化字，那就必须严格校勘、把关，看看该不该简化，简化得对不对。当然，如果原件本身就用简化字，那么抄件只要与原件保持一致就可。抄件中如果有不规范的简化字，应该校正为规范的简化字。

原件为手写型文献，会有草体字、行书字等，这些字的辨认不一定很容易，抄件中误定、误写这些字是常见的（前已论述，可以参见）。对这类手写型文献抄件的校勘必须更仔细，必须准确辨认每一个手写字，这样才能保证抄件与原件完全一致。

有些文献，原件已找不到，只存抄件，那么抄件文字的校勘就需要像校勘原件一样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如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的有些书信只保存抄件了，例如毛泽东1936年9月18日致宋庆龄的信，就只有抄件。抄件中有“以作恭考”句。“恭”字，字典上无此字。后来比勘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其他抄件，发现有一份也有“恭”字，而此“恭”，应为“参”。当是抄写者抄误了。或许是毛泽东手写的“参”字没认清，便写成“恭”了。最后将“以作恭考”，校正为“以作参考”。这类抄件，无法对校，只能依靠他校、理校等。

2. 校正字型

字型指字的大小、黑体字等。有些文献中，有用大字写的、印的，也有用小字写的、印的，抄件能否像原件一样有大、小字的区分，也应校勘。校勘抄件的字型，就是要力求使抄件的大、小字与原件一样。有些印刷型文献，某些句子、某几个字用了黑体字，这也应该在抄件中反映出来。如果没有反映，就要通过校勘，设法反映之。比如将原件中的黑

体字部分,在抄件上描粗,并注一下,指出这些字原件为黑体字。只有抄件的字型与原件保持一致,那么原件的本来面貌才能较多地反映出来。如果原件为印刷型文献,通过抄件再整理出版,抄件与原件字型一致,那么再整理出版的文献也会与原件的字型一致。否则,抄件与原件的字型就不一致,那么据抄件整理出版的文献,也就与原件不一致,恢复不了原貌了。

3. 校正讹字

抄件中的讹字,无论是抄错、简化错、草体变楷体错、字不规范等等;无论是疏忽造成的错,还是故意造成的错,都要校正。校正讹字,前论原件“校正错字”可以参见。

4. 校正脱字

因为疏忽,抄件中也会出现脱漏,或者故意删节、省略一些文字。这类脱漏只要与原件对校,一般都可以校正。原件已无存,则要设法通过其他办法来校正。校正脱字,前论原件“校正脱字”可以参见。

5. 校正衍字

由于抄写者的疏忽,重复了字,多写了字,这是难免的。故意增字、衍字的情况,也会发生。这类衍字,通过对校,一般可以校正。原件没有了,则可通过其他校勘方法来校正。前论原件“校正衍字”可以参见。

6. 校正颠倒

由于抄写者疏忽,抄写中出现文字颠倒、词语颠倒、人名地名颠倒、误乙等,也是有的。这可以通过对校或其他校勘方法解决。前论原件“校正颠倒”可以参见。

7. 校正数字

校勘原件,应该“有数必核”,校勘抄件更应该有数必核。校勘抄件的数字,主要是将抄件的数字与原件的数字对校。在校勘过程中,百分比、小数点等都要仔细校勘。

8. 校正译文、外文

原件中有译文,抄件中也自然有译文。原件中有外文,抄件中自然也有外文。译文的校正,前论原件“校正译文”,可以参见。外文的校

勘,如英文、俄文、日文等文字的校勘,一是与原件对校,看看是否完全一样。二是要懂外文,校勘英文字,应懂一点英文;校勘俄文字,应懂一点俄文;校勘日文字,应懂一点日文。懂一点外文,懂得外文的书写规则,显然有助于准确校勘外文。

二、校勘行款

为了保持原件的本来面貌,抄件的行款,也应与原件一致。校勘抄件,应把校勘行款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行款的校勘,主要可以注意以下的内容:

1. 分段

抄件的分段是否与原件一致。原件分几段,抄件也应分几段。有些文献分段不明显,或者不分段,那么抄件一般应准确分段、明显分段。如果原件不分段,抄件不分段也可以。

2. 格式

抄件的格式是否与原件一致。比如原件都是顶格写的,抄写也可以都顶格写;原件抬头的地方,抄件也可以抬头;原件大字一行、小字双行,抄件也可以大字一行、小字双行;原件开头、结尾的格式,抄件也可以原样录下……抄件与原件的格式保持一致,就能反映原件的本来面貌。当然旧时的行款格式,现时已不通用了,现时整理文献出版,往往改变原件的行款格式,这样,原件的本来面貌就有所丧失。从校勘行款来说,应以抄件与原件保持一致为上。特别是有些行款格式,不只是格式的技术问题,而且反映一定的思想性。

3. 版式

抄件的版式与原件是否保持一致。版式一般是印刷型文献的问题。印刷型文献的版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每页几行,每行几字,每页几字,都会不同;比如有的文献每页通栏,有的文献每页双栏;有的文献首页,或每章、每篇的首页,版式与其他页不同,有较大变化;有的文献每章或每节的首字用大号字顶格,甚至加花边框……再如开本有32开、大32开、16开、12开、14开、8开、64开等。抄件,除了开本大小难以和原件一致外,其他版式都可以和原件保持一致的,原件开本的大

小,也可以在抄件末尾加注说明。抄件的版式能与原件一致,这显然有助于反映原件的本来面貌。所以抄件的版式是否与原件一样,也应校勘。版式能保持一致最好,没有能保持一致,应加注或出校说明之。

三、校勘标点

原件有标点,抄件一般应与原件的标点一致。不仅是逗号、句号、问号、引号等与原件一致,原件在文字下加的重点号、加圈号等,也应一致。原件没有标点符号,抄写时,可以不加标点符号,俟整理时再标点符号。原件没有标点符号,抄件加上标点符号以后,必须认真校勘,避免出现误点。原件有标点符号,抄件移录一致以后,如果发现标点错误,那么这不是抄件的错误,而是原件标点的错误,可以通过抄件标点的再校勘,校正原件标点的错误。关于标点校勘的问题,前已论述,可以参见。

四、校勘内容

将原件抄录一遍,一般只会发生文字的差错,内容方面的差错一般不会发生,只有抄写者特别疏忽大意,才会发生抄件中内容的差错。既然校勘抄件,那么不仅要校抄件的文字等,自然也要校抄件的内容。校勘抄件的内容,主要是用原件与抄件对校,原件无存,用其他办法校勘。校勘抄件的内容,与校勘原件的内容差不多,可以参见。以下将校勘抄件的几个主要问题再强调一下。

1. 校正错简

在抄件中,一般错行较少发生,除非特别粗心。错页则有可能发生。抄件如果篇幅很大,又不编页码,编排时就有可能发生错页,造成文献内容的错乱。这一般只要用原件对校,基本可以校正。原件无存,则可以用他校、理校或本校等方法解决。

2. 校正脱简

因为疏忽,抄件中脱行、脱页的事是可能发生的。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对原件进行删节,造成脱简。抄件的脱简,用原件对校,可以得到校正。原件无存,则需要用他校等方法来校正之。

3. 校正衍简

抄件中衍页的事,衍章、衍节的事,一般是较少发生的,因为将抄过的内容,再抄一遍,总会有所发觉,一发觉就会停止,会纠正。抄件中衍行的事,会在疏忽中发生。此外,最易发生的衍简是混入。比如抄报刊资料,一疏忽,将不该抄的内容抄上了;比如抄某些分合不明显的文献,抄某篇内容,将下一篇的内容也接着抄了……抄件的衍简,用原件对校,一般可以得到校正。原件无存,用本校、他校等方法也可以校正。

4. 校正混淆

抄件中发生混淆是有的。比如将正文与注文混淆了,一起抄下来;再如文献分合混淆了,将几篇文献当成一篇文献抄……这类混淆,用原件仔细对校,是可以得到校正的。也可以用他校等方法。

◆第六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考证

第一节 考证的一般理论问题

一、考证

考证,中国传统称为考据。考,考查、考校、考究,或者说追根寻源,查个水落石出。证,证实、证明、确证,或者说做出结论,做出鉴定。考证,就是运用各种考查的方法,来鉴别被考证对象的真伪、证明被考证对象的真伪。它是通过考核有关事实,搜集、比较、归纳有关证据,运用逻辑推理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它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文献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是鉴别、鉴定文献的一种重要方法。

二、文献考证的目的、任务

考证方法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考证的目的、任务,并非是完全相同的。中共党史文献考证的目的、任务,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搜集、采用各种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辨别、鉴定文献的真伪,辨别、鉴定文献中各方面内容或某些内容的真伪,奠定文献的科学基础。通过考证,使人们知道何者为“真”文献,何者为“伪”文献;文献中哪些内容是“真”的,哪些内容是“伪”的,从而使文献的积极功能可以被充分发挥,文献的消极功能可以得到抑制。可以使文献更好地为社会、为现实服务,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中共党史文献的考证,也可以为中共党史研究建立可靠的文献基础,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三、文献考证的基本内容

1. 考证文献的真伪

文献特别是历史文献,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但也有人出于某种目的,伪造文献,用今天伪造的文献托为历史文献,用今人所造的文献,托为前人文献。也有同时代的人伪造同时代的文献。所以,一件文献、多件文献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整理、研究文献时最重要的、最先应搞清楚的问题。这也是考证文献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当然,考证文献的真伪,牵涉到考证文献的很多内容,与以下一些考证内容是相联系的。

2. 考证文献的版本

如果版本面目不清,如果版本真伪难定,这就需要考证。手写型的文献,印刷型的文献,如果已署明版本的诸项目,就不必考证。如果没有署明版本,就要考证版本。有些文献署明了版本,但可能是伪造的;有些文献没有署明版本,也有可能是伪造的。版本的真伪,是文献真伪鉴别的一项重要内容。考证版本,不仅有助于考证文献的真伪,也有助于鉴别版本的优劣。

3. 考证文献的制作者

考证文献的制作者,与考证文献的版本、考证文献的真伪是有联系的。手写型文献、印刷型文献,如果署明制作者,这就不需要考证制作者,如果没有署明制作者,就需要考证制作者。有些文献署了笔名、化名,而笔名、化名是谁尚不清楚,这也需要考证制作者。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中共党史文献,有不少是制作者不明的,需要考证。还有些文献的制作者是托名的,或者是伪托的,那么文献的真正制作者是谁,也只有通过考证才能清楚。对于伪托文献制作者的文献,要特别注意考证,制作者伪托,文献也有可能是作伪的。

4. 考证文献的制作时间

手写型文献、印刷型文献,如果署明制作时间,那么就无需考证制作时间,如果没有署明制作时间,那就需要考证。有些文献是日期不明,可以考证日期;有些文献月份、年份不明,可以考证月份、年份。有

些文献在报刊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有了出版、发表的时间,但文献制作的时间尚不清楚,可以考证制作时间。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中共党史文献,日期不明,只有发表时间,没有制作时间,甚至假托时间等情况都有,很多文献都需要花功夫去考证才行。

5. 考证文献的史实

文献中史实错误,或伪造史实的事是有的,而且不少,这就需要考证史实,澄清是非。伪造史实不完全等于伪造文献,但伪造史实与伪造文献是有联系的。考证文献的史实,与校勘文献的史实是差不多的。校勘文献的史实,就包含着考证文献史实的意思。考证文献史实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如史事、人物、时间、地点等等都是考证的内容。

6. 考证文献的文字

文献中文字的错误是常见的,校勘文献,就要校正文字的错误。一般词语方面的错误,通过校勘可以校正,某些特定的、专用的名词,如某些人名、地名、物名、书名等,采用对校、他校等方法解决不了的,就需要通过考证来解决。校勘文字与考证文字有某些一致的地方,但不完全相同。考证文献,也离不开考证文献的文字。

四、文献考证的原则

考证与校勘在某些方面有一致的地方,校勘的原则,基本上也与考证的原则相通的。校勘的原则前已论述,可以参见。这里将考证的原则及有关的问题强调一下。

1.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为考证的根本原则。考证就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是考证文献真伪、考证史实、考证作者等等,都必须做到事实是怎样的,就怎样说,证据是怎样的,就得出怎样的结论。在考证过程中搜集证据、归纳证据、解释证据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随心所欲,不能实用主义。不能先作一假设,再去搜集与假设相关的证据,不能因与假设不相关的证据、与假设观点相反的证据就不搜集,不能歪曲地解释这些证据。

2. 注重证据,反对主观武断

考证文献真伪、史实真伪,都必须凭证据说话,而不能凭主观作判断。没有证据、证据不足,就不下结论。一条证据不行,找二条、三条;书证不足,找物证、人证,何时证据充分了,何时再分析、判断、下结论。重证据,就是要全面搜集证据,研究证据。不能合自己“胃口”的证据就收集之,不合自己“胃口”的证据不搜集或删除之。证据只有充分、全面,才能避免主观武断,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3. 多闻阙疑

在考证的过程中要多搜集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就不下结论;如果证据很多,但说法各异,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也不下结论,存疑俟考。在考证过程中要严谨,要谨慎。但有些问题证据充分、可以下结论,却不下结论,这也是不对的。或者有些问题经过考证,事实已经搞清楚了,仍然怀疑之,有些文献没有什么问题却怀疑之,这也是不对的。

五、文献考证的方法

考证的方法,中国古代有不少经验,西方也有一套实证的方法,基本上不外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概括的“理证”、“书证”、“物证”三种。陈垣总结考证方法,主要通过古代文献的考证来总结的,尚未有考证现代文献、中共党史文献的经验。考证现代文献、党史文献,除了理证、书证、物证外,还可以通过人证来考证,因为现代文献、党史文献的见证人,不少还活着,而古代文献的见证人,已经没有了。所以不可能采用人证的方法。以下将上述几种考证的方法作一分析。

1. 书证

以书本证书本,以文献证文献,为书证。考证文献的版本、时间、制作者,考证文献的史实等,可以通过文献记载来搜集证据。文献记载是真实的、可靠的,那么它就是一种有力的证据。反之,文献记载不真实、不可靠,就不能作为证据。例如,考证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主要依据的是日记、来往电报。日记是私人档案,电报是单位档案,都是较可信的书证。又如,《毛选》第一版收入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只署“一九三八年十月”,未署日,《毛选》第二版署了日,这个日期

也是根据文献记载,即书证,考证出来的。因为这篇文章是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分八个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其中的第七部分。这个报告是10月12日至10月14日分四次讲的,第七八部分是14日晚上作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日期,应定在10月14日。以上《论新阶段》分几部分,每一部分何时作报告,都有文献记载,有档案记载,都有书证,于是一查证就解决问题。《毛选》第二版署的时间正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书证也会有不可靠的、伪造的。例如“文革”时期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也有所谓“书证”材料,然这些书证都是不可靠的,甚至是伪造的。

2. 物证

在文献的考证中,以物证之,为物证。近代学者王国维提倡“两重证据法”,即以地下出土之物证文献,以文献证地下出土之物,被很多学者奉为考证信条,实际上就是强调了物证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才走过八十多年的历史,历史遗物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遗物、中国近代社会的遗物所不能比拟的,这为中共党史文献的物证创造了极好的先天条件。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生活条件是怎样的,在中南海的生活条件是怎样的,文献记载真实与否,只要实地考查一下延安的窑洞、中南海的寓所,就很清楚了。再如,毛泽东喜欢读哪些书,只要考查一下他的藏书、他案头的书、床上的书,就很清楚了。校勘方法中的物校法,与考证方法中的物证法有相似相通之处,可以参见。

当然,伪造物证的事,也是有的,“文革”中伪造“物证”就屡见不鲜。

3. 理证

“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陈垣)。考证文献,找不到书证,也找不到物证,根据合理与否来判断真伪,为理证。或者书证与书证各异,书证与物证各异,最后根据何者合理作出判断,这也是理证。所谓“合理”,主要是指合乎客观规律、合乎历史事实、合乎逻辑推理等。例如,荣孟源曾谈到,有人送来一份回忆录,自称参加过八·一南

昌起义。回忆录一开头就描绘 1927 年 8 月 1 日晚上月光如何美丽。而 8 月 1 日,为阴历七月初四日,晚上子时,不可能有月亮,于是断定这份回忆录是伪的(详见《史料和历史科学·鉴别史料》)。再如,中共“一大”闭幕日期,尚在考证中,没有定论。有一说是 7 月 31 日闭幕,有一说是 8 月 1 日,还有 8 月 2 日、5 日闭幕说。然查考当时嘉兴的天气情况,8 月 1 日为大风雨天,南湖上不可能行船,没靠岸的游船被吹翻四、五艘,溺死三人,8 月 2 日善后处理。所以断定闭会日期不是 8 月 1 日或 8 月 2 日(详见《党史研究资料》1986 年 10 期苏东海《中共“一大”闭幕日期外证一则》)。以上的推断,便是用的理证法。

又如毛泽东给钟学坤、孙艳、周世钊的三封信均署“十二月廿九日”,而未署年份。齐得平认为这三封信手迹相同,用的纸张相同,应是同年同日所写。都是 1959 年 12 月 29 日所写。这亦是一种理证(详见《党的文献》1998 年第 3 期《毛泽东三封书信写作年份考》)。

理证之合“理”、有“理”,根本的是要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党史工作者看来,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是合理的;合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是不合理的。

4. 人证

在文献考证中,以人证之,为人证。能充当人证者,应当是当事人,非当事人一般不能充当人证。例如《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长期以来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直到 1986 年当年参加过该书编写的莫文骅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才说清楚了此书是在张闻天主持下编写的,是在张闻天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这是该书为张闻天主持编写的有力人证。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再版此书,便署“张闻天编著”,并附录了莫文骅的文章。又如 1991 年济南出版社出版梅桑榆写的纪实文学类的书《侵华日俘大遣返》,书中说 1945 年 8、9 月份,日本侵略军驻宁波部队投入新四军,与新四军组成“混合部队”,进攻国民党的税警团。此事是真是假,关系极大。很多新四军浙东纵队的老战士纷纷写文章指出,这纯粹是捏造的,根本没有此事(1994 年 8 月 1 日《党史信息报》第 3 版发表了四篇批驳《侵华

日俘大遣返》的文章)。众多当事人异口同声说文献在作伪,这自然是文献作伪的有力证据。

社会是复杂的,人证也是复杂的。例如1994年7月26日上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董健吾家属诉张聂尔侵犯名誉权案,就是复杂的。张聂尔写的《中国第一人——毛泽东》,写到毛泽东之子毛岸青的脑子坏了,是被董健吾(牧师)打的。此书的公开出版,引起不同反响。董健吾子女认为此事纯属捏造,损害了董健吾的名誉,遂提起诉讼。而张聂尔称,此事系师哲所言。师哲并写下证言:“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检查身体时,发现岸青神志不清,岸英说是董牧师打的。”(详见《党史信息报》1994年8月16日一版报道)张聂尔听师哲说,师哲听毛岸英说,但师哲并非当事人,并非亲眼看见,而毛岸英虽是当事人,却又不在了。毛岸青虽在,却又是脑子有少许毛病。师哲不能成为人证,毛岸英、毛岸青是人证,却不能作证了,这样一来,人证问题就复杂了。除非,看到董健吾打毛岸青的人还在,出来作证,或者有物证、书证能证明董健吾确实打过毛岸青,否则董打岸青说就难以成立。这个例子说明,人证是不能用死人来作证的,也不能用脑子不健康的人来作证的,除非死人在死以前,脑子不健康的人在不健康以前,亲笔写下过文字材料。

人证有复杂性,人的记忆是会发生误差的。如果一个人仅凭模糊的映像作证,那么他的证言就不一定准确。再说,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出于某种目的,作伪证,或被逼作伪证的事,也是有的。比如“文革”时期,作伪证的事就不少,有的是想解脱自己作了伪证,有的是在逼供讯的情况下作了伪证。说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内奸”的所谓“人证”,就是被逼作伪证。说陶铸是“叛徒”,竟是陶铸之兄作的伪证,当然也是被逼的。这说明,对人证是要进行分析研究的。对人证互异的情况,还必须运用书证、理证等来判断之,作出正确的结论。

人证,是考证中不可缺少的,但对具体的人证,还必须具体分析、具体运用。

六、中国传统文献考证的经验

文献考证,或者说文献鉴别,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孔子说的“多闻阙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等等,都是文献考证的经验之谈,今天仍是可以参考的。中国第一部专论文献考证、文献鉴别的专著,是明朝人胡应麟写的《四部正讹》。在这部书中,胡应麟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鉴别伪书,即辨伪的八种方法:

(一)“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案:《七略》是汉朝人刘歆编的目录书。即通过考查最早的目录书,考查文献的来源)。

(二)“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案:“志”,指历代史书中的《经籍志》、《艺文志》。即通过考查历代的目录书,来考查文献流传的情况)。

(三)“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案:即通过考查同时代人的著述,来考查文献是否被称引过)。

(四)“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案:即通过考查后世人的著述,来考查文献是否被引申、发挥过)。

(五)“核之文,以观其体”(案:即通过考查文献的文字,来考查是否是当时通用的文字、文体)。

(六)“核之事,以观其时”(案:即通过考查文献的记事、内容,来考查记载是否合其时)。

(七)“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案:即通过考查文献制作者,来考查作者是否是假托)。

(八)“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案:即通过考查文献的传播者,来考查传播者是否确有其人)。

从以上八条中的任何一条去研究文献,都可以证明、鉴别文献的真伪。这八条对后世学者的考证、辨伪有很大的影响。

1918年出版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该书的《导言》谈到了文献史料的鉴别,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来鉴别:

(一)史事。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

(二)文字。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字,不致乱用。作伪书的人,多不懂这个道理。故往往露出作伪的形迹来。

(三)文体。不但文字可作证,文体也可作证,不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文体。

(四)思想。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大凡思想进化有一定的次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即有那个时代的思想。

(五)旁证。史事、文字、文体、思想,皆可叫做内证。因这四种都是从本书里寻出来的。还有一种证据,是从别书里寻出的,故名为旁证。旁证的重要,有时与内证等同。

胡适强调了通过研究文献反映的思想来研究文献的真伪,这是文献考证、鉴别方法的一个发展。

1922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前人考证、鉴别文献的经验作了总结,归纳出12条:

(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

(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某人后者,则其书全伪或一部分伪。

(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

(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面,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1927年梁启超在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并由学生周传儒等整理出版。在此书中,梁启超对考证、鉴别文献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归纳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和从文义内容上辨别两大系统。具体如下:

从传授统绪上辨别:一、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二、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三、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四、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五、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六、后人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可断定那书是伪。七、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此书是真的。八、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

从文义内容上辨别:一、从字句罅漏处辨别:(子)从人的称谓上辨别。(丑)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寅)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二、从抄袭旧文处辨别:(子)古代书聚敛而成的。(丑)专心作伪的书剽窃前文的。(寅)已见晚出的书而抄袭的。三、从佚文上辨别:(子)从前已说是佚文的,现在反有全部的书,可知书是假冒。(丑)在甲书未佚以前乙书引用了些,至今犹存,而甲书的今本却没有或不同于乙书所引的话,可知甲书今本是假的。四、从文章上辨别:(子)名词。(丑)文体。(寅)文法。(卯)音韵。五、从思想上辨别:(子)从思想系统传授家法辨别。(丑)从思想系统与时代的关系辨别。(寅)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卯)从袭用后代学说上辨别。

这里梁启超把文献辨别的方法说得更具体。如文句的辨别包括哪些内容,思想的辨别包括哪些内容,都具体说明了。

以上这些考证、鉴别文献的方法,主要是鉴别古代文献的方法,且

总结这些方法的人并非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考证、鉴别中共党史文献,显然是可以借鉴的。考证文献从考查源流、考查文句、文体、考查内容、考查思想、考查作者等入手,至今仍是需要的。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改造、充实前人的经验,把文献考证、鉴别的方法向前发展,科学化,总结出更切实可行、更丰富的经验。

第二节 文献考证的具体步骤、方法

关于文献考证的一般内容、原则、方法,上面作了论述,以下要再谈谈文献考证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将以上谈的一般理论作一具体的展开。

一、考源流

搜集到一份文献,要搞清楚它的真伪,首先要考查一下它的源流。每一份文献都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和特定的人物、时间、地点等相联系的。文献的源是特定的。一件文献,一般只能有一个特定的源,而不可能同时有几个源。文献的流,可以不同,但由不同的流寻源,其源必然相同,除非不是同一件文献。考查文献的源流,对于鉴别文献的真伪有重要作用。考查文献源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考制作者

一件文献的制作者总是特定的。某一文献的制作者是甲,而见到同一文献的署名是乙,这就须要仔细考查。可能署名乙的文献是伪造的;可能署名乙的文献是抄袭的;可能文献的制作者是假托的。某一文献的制作者并无其人,那么文献就可能是伪造的。某一文献的制作者是冒名顶替,那么文献就可能是伪造的。比如三十岁的年轻人冒充八、九十岁的老人写革命历史回忆文章,其人冒充,其文自然是伪造的。

文献的制作者考查清楚,文献的源头才真正考查清楚。某一文献的制作者清楚了,对于鉴别某一文献的真伪有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有很多文献没有署名,不知作者为谁,这样源头不清,文献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真是假,便难以断定。《中国

共产党史的发展》，为油印本，没有作者姓名，后来搞清楚作者是蔡和森，于是这件文献的价值大增。《（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手稿，只剩后半部分，没有署名作者，后来搞清楚作者是陈云，于是这件文献的价值大增。

伪造文献，只有考查清楚伪造者，即把作伪的源头搞清，文献之伪，才能真正定案。例如，1927年4月，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北京使馆之后，公布了很多苏联使馆文件，借口这些文件煽动叛乱，来驱逐苏联使者、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其中有一份所谓来自莫斯科的《致驻华武官训令》，说：“为引起外国干涉”，“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唤起群众反对外国人。不惜采取任何措施，直至抢掠和杀人。”煽动“抢掠和杀人”，不可能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然直到1987年第1期《民国春秋》发表《张作霖伪造共产国际文件的真像——访原张作霖外交特派员张国忱》，才真相大白，原来所谓《训令》的俄文本，是张作霖指使下属，请一个白俄记者伪造的。伪造者一清楚，文献之伪，自成定局。

考查文献的制作者，还包括考查某种观点、某种说法的创始者。比如前面提到的董健吾打毛岸青的说法，张聂尔听师哲说，师哲听毛岸英说，如果是这样，这一说的创始者是毛岸英。毛岸英是当事人，惜早逝。再如，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与“左”、右倾思想（有的甚至说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的说法，曾在很多书中出现，“文革”时期的书尤盛。这一说是怎么来的？查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修订本已有此说。此书有一节的标题就是《一次大会与毛泽东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其中说到：“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等提出了正确的主张……”这一说有何根据，胡华没有注出。再往前查，可以看到萧三1944年7月1、2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伟大的五十年〉的一章（初稿）》已有此说，谈到：“在一次大会上展开了反对李汉俊的合法主义（……）和反对另一种‘左’派的主张（……）的斗争。在反对书生空谈的、小资产者的‘左’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用事实和斗争成绩粉碎‘左’、右倾的机会主义。”萧三此说有何根据，什么地方来的，没有注

出。再往前查,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8年出版),谈到了中共“一大”上有斗争,有两种错误观点,但没有说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再往前查,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一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于1921年下半年),谈到了中共“一大”上的斗争、辩论,但没有加上“左”、右的“帽子”,也没有说毛泽东在“一大”上的态度如何。“一大”本来是有会议记录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是担任记录的,但“一大”的会议记录至今没有找到过,所以会上谁说了什么,已很难确切地考查。毛泽东在“一大”上究竟态度如何,只能查查出席“一大”的各位代表的回忆录。毛泽东1936年曾向斯诺谈起自己的经历,没有说到自己在“一大”上的态度。董必武回忆“一大”时也没有谈到过毛泽东在“一大”上的态度。李达回忆“一大”时也没有谈到过毛泽东在“一大”上的态度。陈潭秋回忆“一大”的材料也没有谈到毛泽东在“一大”上的态度。包惠僧回忆“一大”的材料,谈到了毛泽东在会上同意刘仁静的“产业组合”方式,其他毛泽东的主张没有说。刘仁静回忆“一大”说:“在‘一大’上,没有什么‘左’、右派,也没有什么‘斗争’。”“毛主席在‘一大’会上,很少发言”。此外,陈公博、张国焘、周佛海回忆“一大”,也没说毛泽东如何态度。从以上可以看到,“一大”代表的回忆,都没有说过毛泽东在“一大”上反对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可以认为毛泽东在“一大”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那么此说的创始者,大概就是萧三。萧三没有出席“一大”,怎么知道此事。毛泽东不会这么说,董必武不会这么说,那么很有可能是萧三加工发挥的了。以上的考查,也是一种对文献制作者的考查,是有助于考证文献真伪的。

2. 考收藏者

文献制作者是源,文献收藏者是文献的流。尽管谈到文献的来源有时会说从某某收藏者那儿得到,但收藏者只能是收藏文献而已,不是制作文献的。不过收藏者往往与制作者有联系,可由收藏者来考查制作者。如果收藏者与制作者毫无关系,却收藏着某人的文献,这就要仔细考其文献的来源了。一些可疑的收藏者提供的文献,有可能是假文献。例如《近代史资料》总第10号刊登的《共进会白话宣言》,是武汉

一老人提供的抄件。但编辑们没有去考查此人收藏这份抄件的经过,也不清楚抄件的来源,就发表了。结果是一篇伪造的宣言。只有把收藏者考查清楚,把收藏者收藏文献的经过考查清楚,文献的真伪才容易考查清楚。例如,刘少奇家属保存有一份刘少奇1950年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而中央档案馆和解放军档案馆都没有刘少奇这份讲话记录稿,也没有记载刘少奇有这样的讲话。那么刘少奇家里的这份讲话记录稿是怎么回事?后来访问当时刘少奇讲话的记录员邓汀,才知道,刘少奇讲话以后,由邓汀整理了讲话记录送刘少奇审阅,但后来刘少奇没有将整理稿退回。这样一来,稿子在刘少奇家,档案馆没有,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才放心地将这份讲话稿收入《刘少奇选集》(详见1985年12月16日《文汇报》载《尊重历史体现特色——〈刘少奇选集〉下卷编辑记事》)。

3. 考流传

考文献制作者是考文献之源,考文献收藏者是考文献之流,已属考流传的范围。此外,考流传,很重要的是考文献发表、出版等整个过程,考传抄的整个过程。中共党史文献,有的是制作者手稿,从未发表过,考其收藏的整个过程即可。有的是文献的抄件,就需要考其传抄的整个过程。一份文献有抄件,又有原稿在,考抄件的真伪很方便,如果只存抄件,原稿已佚,那么考传抄的过程,对于考抄件的真伪就有很重要的作用。已经发表、出版的文献,需要考发表、出版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要考查最初发表在什么报刊、最早的出版本。其次要考查发表过几次,有几个版本。然后再考查各种不同的版本是同一个系统,还是不同的系统。如果是不同的系统,要考查有几个不同的系统,及各系统形成的原因、特点。考查文献发表、出版的流传情况,对于考证文献的真伪及版本的优劣,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考著录

著录即记录。文献形成后,特别是重大的文献形成后,总有人知道,总会被人记录。比如中共中央的文件,会有档案记录,会存档。早期的文件,虽然散佚、损失很多,也会有所记录。有些人的文章、书籍、

日记、书信中会提到中央文件的产生及其他文献的产生,会提到这些文献的内容、形式、样式等。有些文献会被收入某种集子,如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集、个人文集等。有些发表、出版了的文献会被收入某种目录、索引等。发表、出版的文献还会被他人、被他书引用、引证等。以上这些都可视为“著录”。某一文献有过著录,说明此文献是确实存在过的。某一文献没有被著录过,那么它的出现,就必须仔细考查其源流。中国古代的文献,每个朝代都有著录,不仅著录同时代的文献,也著录前时代的文献。中国古代文献真伪的考证,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考查著录与否,未经著录,突然冒出的文献,一般是伪的。然中共党史文献,离现实近,整理、研究还跟不上文献的产生、流传,很多中共党史文献没有能够著录,所以除了考著录以外,还要考源流等。有的党史文献未经官方的、公开的著录,但有私家的著录,如刘少奇1950年在全军参谋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档案记录,而有与会者、记录者的私家著录。这些文献就需要考查私家著录,当然这并非易事。

例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到了中共“一大”上起草了纲领,研究了纲领,这就是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有了著录,所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发现了俄文本“一大”纲领,在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后附录了英文本“一大”纲领,且俄文本、英文本的内容大致相同,这样俄文本、英文本的“一大”纲领是可以相信的,尽管中文原本现在还未找到。又如出席“一大”的代表的回忆中,好几个人提到了由毛泽东等担任会议记录,这就是“一大”会议的记录有了著录,如果以后发现“一大”会议的记录,就值得予以重视、仔细研究。再如邓中夏曾提到自己曾在洪湖根据地写过一本中共党史,后来遗失了,这是邓中夏的《中共党史》有了著录,如果以后发现一本《中共党史》,说是邓中夏写的,那么就不妨拿来研究一下,如果字迹确是邓中夏的,就可以相信。有过著录的中共党史文献发现了,可信性稍大一些,没有著录过的中共党史文献发现了,虽然可信的条件少一个,但仍然可以通过考证来确定可信与否。如吴玉章的《八一革命》,未经著录过,后来彭明访苏时发现,是吴玉章的手稿,自然是可信的。

三、考制作

文献制作的材料,文献制作的方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单位,都会不一样。通过考证文献的制作材料、方法等,可以鉴别文献的制作时间、地点等,从而鉴别文献的真伪。比如,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军民用乌兰草造纸,称“乌兰纸”,所以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制作的文献都用乌兰纸。而当时国民党在四川大后方制作的文献多用四川乐山产的“嘉乐纸”。如果出现了用嘉乐纸制作的陕甘宁边区文献,那就值得怀疑了。又如,同时期陕甘宁边区一般是没有用圆珠笔书写文献的,如果出现用圆珠笔书写的40年代陕甘宁边区文献,也就值得怀疑了。

四、考形式

文献的形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是不一样的。比如印刷书籍的版式、用纸的规格、尺寸、装订的方式等,就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又如公文的格式,共产党公文与国民党公文是有区别的。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出版的书籍,一般是小32开、直排、平装本。一般没有大32开、横排、精装本的书出版。如果出现大开本、横排或精装的陕甘宁边区出版的书籍,那就值得怀疑了。

五、考印章

无论公、私文献,留有印章的不少。一些单位、机关的文献,会留有公章,一些私人的文献,会留有私印。查考印章的真伪,对于鉴别文献的真伪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公章,其样式、尺寸、花纹、字体,以至材质等,均有一定的定制。共产党的公章形制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内各级组织、各部门的公章,其形制也有区别。私人印章无定制,但某一历史人物一生用过几颗印章,拥有几颗印章,每一颗印章的形制如何,一般都有案可查,是可以查考清楚的。

了解某一单位、机关公章的形制，了解某一人物私印的形制，一旦看到相关的印章，就可以辨别真伪。伪造公章、私印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利用伪造了的公章、私印伪造文献也是常有的事。此外，真公章被盗用，制作假文献，这也是有的。人死后，生前所用的印章散出，于是真私印被用来制作假文献，也是有的。这就不只是查考印章的问题，更要查考文献的具体制作、形式、内容了。

六、考字迹

考察笔迹是考察文献真伪的一个方法。判断某人信札、日记及其他手稿是否为真迹，只要鉴定一下是否为此人的笔迹就可以了。有些伪造品，假冒某人的笔迹，仔细鉴别，总会发现破绽。有些文献上的文字有改动，也可以从字迹上去判别是原作者的亲笔改动还是他人的改动，是原始的改动还是后来的改动，以便鉴定文献的真伪及其他各种问题。如“文革”时期经常引用的毛泽东“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一语，最早见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社论，然而经过原稿笔迹的鉴定，“全面”二字是陈伯达加上去的。江青也经常模仿毛泽东的笔迹题写东西。“文革”中流传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三首毛泽东诗词手迹，经李树庭研究考证，认为是江青题写的（详见1990年8月28日《报刊文摘》3版《第一个对毛泽东手迹提出质疑的人》）。又如人民出版社影印再版了《红色中华报》，其中1936年1月16日第三版的内容显然与日期不符。第一，该版的《欢迎抗日领袖毛主席延安人民举行盛大欢迎》，报道毛泽东、朱德入延安受到欢迎，而毛、朱入延安是在1937年1月13日。第二，该版又提到了“西安张杨二将军抗日起义后……”指的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这都表明，这一版的日期不应该是1936年1月16日，而可能是1937年1月16日。再查该报1937年1月16日有一二版，而无三版。该报是手刻蜡纸油印的，1937年1月16日一二版的字体与1936年1月16日第三版的字体基本相同，而1936年

1月16日一二版的字体却与第三版不同。这更表明填了“1936年1月16日”的该报第三版,应是1937年1月16日该报第三版。究其产生倒填年月的原因,可能是跨入新年以后,一疏忽仍习惯地填写旧年了(详见《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6期韩钢《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红色中华〉报第三版的日期应予更正》)。

文献印刷字迹的考察有助于鉴别文献。同一份印刷文献,其字迹应是相同的,手写印刷、铅字印刷都是如此。如扁体铅字的使用始于1884年图书集成局排印《古今图书集成》。仿宋铅字使用始于1917年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楷体铅字始于1909年商务印书馆所制的二号字,而后有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的楷体印刷物,1926年后有东北三省出版的楷体印刷物,而后又有天津《大公报》出版的楷体印刷物(详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鉴别史料》)。这些铅字的变化,显然也可以帮助我们鉴别某些文献,解决某些文献的真伪问题或其他问题。

七、考文体

文献的文体,如体裁、语汇等,会因时、因人而异。考查文献的文体,也可以鉴别文献的真伪。比如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一般用白话文,国民党的文献文言文较多。共产党内的称呼一般用“首长”、“同志”等,国民党内称呼用“长官”、“卑职”等。伪满洲国的文献避讳、抬头很严格。留过洋的人,写的文章喜欢用一些外来语、音译语,以至夹些英文、法文词语……了解这些,自然有助于鉴别某些文献的真伪。

八、考内容

考证文献的内容,可以鉴别文献的真伪,也可以纠正文献中的一些讹误,还可以解决文献中的一些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考证文献内容的方法,不外乎书证、物证、理证、人证等。

1. 鉴别真伪

有些文献从形式、文体上看不出什么作伪的地方,但一考查其

内容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伪造。如自称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人写的回忆文章说8月1日晚上月光如何美丽,实际上当时没有月亮,显然是伪作(详前)。又如1932年2月18日、19日《新闻报》、2月20日、21日《申报》、《时事新报》都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个材料在“文革”中曾一度被“四人帮”利用来攻击、打击周恩来。而事实上,1932年2月27日上海《实报》(代党刊《斗争》)第四期上,就刊登了《伍豪启事》辟谣。1932年3月4日《申报》也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指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伪造的。以后国民党李昂在《红色舞台》中也承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顾顺章伪造的。再说,周恩来1931年12月就离开上海进入苏区,1932年2月在苏区主持中央局的工作。这一切都证明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伪造的,是伪文献。

2. 纠正讹误

有些文献是真的,但其中存在一些讹误,这可以通过考证来纠正。如毛泽东向斯诺自述经历时,谈到1919年底第二次到北京以后,曾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详见《西行漫记》或《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实际上毛泽东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北京的,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4月才在上海出版的。所以,毛泽东读陈译本《宣言》不是在北京,而应是4月离京后到上海住了三个月期间。此外,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从德文本译过《宣言》,有油印本,如果毛泽东在北京读《宣言》,也有可能是读北大的油印本,而不是陈望道的公开出版本。^①再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

^① 《西行漫记》中有不少回忆的材料存在误差,需要纠正,详见《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8期俞兴茂文《对〈西行漫记〉中若干史实的辨误》。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在北京读的《共产党宣言》是1919年12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所载的《共产党宣言》(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

训处编的《蒋介石先生传略》，说蒋介石留学日本时，“先识陶成章、秋瑾”。实际上秋瑾1906年初即离开日本回国，1907年夏在绍兴被捕就义。而蒋介石是1907年夏才到日本的，根本不可能在日本见到秋瑾。在日本见秋瑾的记载无疑是错误的。又如李大钊何时从日本留学归国，众说纷纭。1949年出版的《烈士传·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说：“民国成立前，大钊同志学成归国。”即1912年归国。李大钊1912年还没出国，怎么能说归国？显然有误。贾芝《李大钊诗文选集》序言说是1916年春归国。《李大钊选集》前言说是1916年夏归国。朱乔森《李大钊传》说是1916年4、5月间归国。1916年归国是肯定的，但究竟在哪个月？何说为是？这就需要考证。终于有学者在《白坚武日记》中发现了线索。白坚武日记1916年5月1日记：“到伯兰处与崔淑和谈，又同小酌，候寿昌（案：即李大钊），久不至，念极。”5月2日记：“李寿昌致泽民书，阅之，始悉不日来沪。”说明5月2日李大钊还未抵沪。后来白坚武到南京去了一次，回到上海已是5月19日。这天日记记：“夜车来沪，晤孙伯兰、汤济武报告宁状，与李守常叙谈。”说明5月19日李大钊已在沪。这样，李大钊的回国日期当在1916年5月2日以后，5月19日以前，即5月上、中旬。

3. 解决疑难

文献中某些问题一时搞不清，这是常有的，这可以通过考证来解决。如抗战时期，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取消了政治委员，并把政治部（处）改为政训处。后来感到党对军队的领导有所削弱，于是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但什么时候恢复的，众说纷纭。有一份朱德、彭德怀致毛泽东并洛甫的电报谈到政委恢复，署的日期是“冬日”，即“2日”，但没有月份。而档案整理者曾在电报上批了“十月”，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等，就把政委的恢复定在1937年10月。而实际上朱德、彭德怀等正式下达贯彻中央决定恢复政委制的命令是1937年10月24日，所以上述的“冬日”电报当是11月2日的电报，政委制的正式恢复是1937年11月的事（详见《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5-6期苏士甲

《对一份恢复八路军政委制电文时间的考辨》)。又如毛泽东 1936 年 11 月 2 日的一封信上款是“各位教授先生们”,无信封。这封信究竟是写给何人的,不清楚。信中提到“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那么是谁送了火腿等呢?最终查证清楚是当时的北京教授许德珩送的。所以这封信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时,题为《致许德珩等》(详见《文献与研究》1985 年 2 期《一信之考旬月踌躇》)。

九、存疑

在文献的考证中,有时候真伪问题、讹误问题、疑难问题会出现一时无法解决的情况。无法解决,不能下肯定、否定的结论,怎么办?就应该存疑。如果无法考清某个问题,就不下结论。如果一个问题有二三种说法,不能考定孰是孰非,可以二三说并存,待考。这就是多闻阙疑的原则。校勘文献时要贯彻这个原则,考证文献时也要贯彻这个原则。如毛泽东有一封给艾思奇的信未署年月日,随信附录的毛泽东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署了日期,是“一九三七,九月”。那么这封信是不是 1937 年 9 月写的呢?据学者查考,此信是毛泽东在艾思奇到达延安以后写的。而艾思奇到达延安的日期,据查考在 1937 年 10 月 10 日左右。这说明毛泽东的这封信是 1937 年 10 月 10 日以后写的。那么究竟何日写的呢?是在 10 月中旬、下旬写的,还是 11 月、12 月写的,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据。所以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辑者,只得把信系于 1937 年,而月、日缺之,存疑(详见《文献与研究》1985 年 2 期《一信之考旬月踌躇》)。这是考证文献时应有的态度。

◆第七章 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

第一节 编纂的一般理论问题

一、编纂

以一定的题目、一定的体系、体例,将文献资料汇编成书,是编纂,这是资料性的、辑录性的编纂,是初级的编纂。以一定的题目、一定的体系、体例、观点、方法,取舍文献资料,编写成书,也是编纂,这是研究性的、著作性的编纂,是高级的编纂。文献编纂的成果一般是提供出版,向社会公布。少数成果由于某种原因,一时没有出版,或一直未能出版。文献只有编纂、出版了,才能更好地被社会利用,才能让文献的各方面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文献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可以供人使用了,或者说已是“成品”,但这个“成品”,要到达需要者、使用者的手里,就需要向社会公开,即需要编纂、出版。只有编纂、出版了,这些“成品”,才能在社会上展示出来,提供给人们选择、使用。

文献编纂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文献搜集、整理、校勘、考证的过程,文献编纂是离不开搜集、整理、校勘、考证等工作的,而文献的搜集、整理、校勘、考证也为文献编纂创造了条件,作好了准备。文献编纂往往是文献诸方面工作的总汇、总结。

文献编纂是在文献搜集、整理、校勘、考证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方法、形式。中国历史文献的编纂已有悠久的历史,产生了很多好的方法、好的经验,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文献编纂学。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应该吸收中国历史文献编纂的好方法、好经验。中共党史文献编纂学将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编纂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

二、文献编纂的目的、任务

文献种类很多,各种文献的编纂,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其首要的目的、任务就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在当前,就是要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实现“三个代表”服务,为党的方针政策服务。党史文献浩如烟海,哪些该编纂,哪些该先编纂,轻重缓急的标准,1.就是要从这个目的、任务出发去衡量。党史文献编纂成果的得失、优劣评价,也要从这个目的、任务出发。2.党史文献的编纂,是为推动中共党史研究服务的。中共党史研究以文献资料为依据,没有文献资料寸步难行。党史文献的编纂,可以公开大量的党史文献资料,可以向社会提供一些最新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从推动党史研究出发,党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一些疑难问题,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的文献就应该先编纂。3.党史文献的编纂,是为了更好地保存、积累、传播党史文献,更好地让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党史文献在当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将来也能很好地发挥作用。4.党史文献的编纂,有助于推动党史文献的各项工作。中共党史文献各方面功能、价值的发挥,得益于党史文献的整理、校勘、考证等方面的工作,而党史文献的编纂出版,是对诸方面文献工作的最好检验,文献工作的优劣、成败,在文献编纂、出版以后就一目了然了,社会的评价也因之产生,这就会推动文献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概而言之,无产阶级的中共党史文献编纂,就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共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按照社会的需要,用科学的方法编纂中共党史文献,使中共党史文献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为将来社会服务,为中共党史研究及其他工作服务。

三、文献编纂的原则

文献编纂是文献工作的总汇,文献编纂的原则也是文献诸方面工作的原则的总汇。诸如文献搜集、整理、校勘、考证等的原则,都是文献编纂原则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文献编纂原则与文献搜集、整理、校勘、考

证等方面的原则是密切相联的。文献编纂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以下几条：

1. 实事求是的原则

文献编纂既要真实地反映文献的原貌，也要真实地反映文献工作的原貌；既要在质量上反映文献的原貌，也要在数量上反映文献的原貌。要做到这一点，既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好文献搜集、整理、校勘、考证等各项工作，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好文献编纂的各项具体工作，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到文献编纂的各个环节。比如在编纂过程中，选材、注释、写按语、序、跋等，都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样才能使文献的面貌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在文献编纂过程中坚持科学性、坚持历史观点、客观态度。这是决定文献编纂科学价值、学术价值的基本原则。

2. 为现实服务的原则

文献编纂的目的就是满足社会的各方面需要，也即是为现实服务。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就是要为中国现实的革命和建设服务。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坚持和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什么文献该编纂，什么文献该先编纂，都要从能否为现实服务出发去考虑，从是否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考虑。这是决定文献编纂社会效益的基本原则。

3. 内外有别的原则

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公布，要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即遵守保密原则、保密制度。内外有别，即国内、国外有别，党内、党外有别，党内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普通党员有别。文献的编纂、出版、公布，发行范围应根据文献的保密、解密程度有相应的规定、限制。有些文献的编纂、出版，限制在党内高级干部内发行，有些限制在国内发行，这种限制是从是否需要保密及其保密的级别出发的，也是从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出发的。文献的编纂出版如果不注意内外有别，不考虑发行的范围，有时是不能为现实服务的，甚至在现实中起消极作用。当然，从充分发挥党史文献各方面作用出发，能公开出版的文献，都应公开出版。

四、文献编纂的体裁

文献编纂,篇幅、规模可以大,也可以小,这视社会需要,视文献的内容而定。篇幅小的,可以是文章式的,篇幅大的,可以是书籍式的、丛书式的、类书式的等等。无论是文章式还是书籍式,又可以是资料汇编式的,可以是著述式的。资料汇编式的编纂,可以采用编年体,也可以采用分类体。比如人物或单位的文献资料汇编可以采用编年体,《毛泽东选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人物集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单位、机构集子就是采用编年体。而有些文献资料的汇编可以按问题分类、按地域分类、按行业、机构分类,可以采用记事本末体、典志体、章节体等等。著述性的编纂,可以采用的体裁更多、更广。以下将中国传统历史文献编纂中形成的一些主要体裁介绍一下。

1. 编年体

按年、月、日顺序编纂文献。可以用于记事,也可以用于记言。可以用于资料汇编式编纂,也可以用于著述性的编纂。这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编纂中最早形成的一种体裁,也是使用最普遍的一种体裁。直到现在,仍在广泛使用,在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中也常用,如各类大事记等。

2. 纪传体

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由本纪、列传、志、表等四种体裁结合而成。本纪是编年体,以帝王为纲,记载国家大事。列传,传记体,记叙国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表,表格体,记史事、人物。志,典志体,记叙国家各方面政务、事务。四体合一,可以将一个国家各方面的文献编纂在一起,巨细无遗。这种体裁,以帝王为纲,深得封建统治者青睐,被尊为“正史”体裁。这种体裁,封建色彩浓厚。但加以改造,仍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今天已产生了《中国近代史记》之类的书,即是改造《史记》纪传体而成。这种体裁亦可以加以改造后用于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

3. 记事本末体

以编纂史事文献资料为中心。以事立题,一事一题,详史事始末。

这种体裁可以用于编纂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史事,将一个历史时期的多件史事文献编为一册;也可以用于编纂多个历史时期的史事,将多个历史时期的众多史事文献编为一册、多册,甚至编为一套丛书。这种体裁,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献编纂中已有运用,在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中,也已有运用。

4. 典志体

亦即政书体。以编纂国家各方面政务、事务文献、典章制度文献为中心。可以将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文献编为一册、多册,也可以将众多朝代的典章制度文献编为一册、多册。这种体裁早于纪传体形成,以后又被纪传体吸收。这种体裁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献编纂中已有运用,在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也已有运用。

5. 传记体

以编纂人物文献资料为中心。可以编纂某一个人物的文献资料为一传,也可以编纂数人的文献资料为一传,即合传、类传。还可以将众多的一人一传、众多的合传、类传汇编成集,汇编成丛书。这种体裁早于纪传体形成,以后被采纳进纪传体。这种体裁在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已被广泛采用,不仅一人一传一书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有很多,就是丛书式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如《中共党史人物传》(将出100卷)、《革命烈士传》、《中国工人运动先驱》、《解放军将领传》等等,也不少。

6. 谱牒体

以编纂人物文献资料为中心。家谱、族谱、宗谱,以编纂家族史文献为主,将多代、多家、多人的文献资料编为一册或多册。年谱,以编纂某一个人物的文献资料为主。这种体裁,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也常用。中共党史人物的年谱是谱牒体,中共组织史资料等也与谱牒体相类似。

7. 方志体

即地方志。以编纂地方文献资料为主。常见的有省志、县志,还有山志、水志、庙志等。内容以一地的风土、人情、物产、人物、艺文等文献为主。方志体是典志体的发展。这种体裁现在也被广泛采用,各地都在编纂地方志,就是说明了这种体裁的运用之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地方志的编纂,正是地方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的一种形式。

8. 笔记体

亦称札记体。将所见所闻、读书心得等随时记录,日积月累,即可编为一册、多册。对于这种体裁,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也可以用。

9. 类书体

以分类编纂文献为特点。将不同类型的文献分别编为一册、多册,再将各类文献合为一编。类书体文献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专科性的。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是可以采用这种体裁的。

10. 章节体

是西方近代科学产生以后形成的一种体裁,19世纪末被介绍到中国,后被广泛采用。分章分节分别编纂某一类的文献资料,最后按一定的体系合为一编。章节体不仅可以分章分节分得很细,还可以在节下再分目,在目下再分子目。章、节、目的设立及其级制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运用,是一种容量大、适应面广的体裁。著述性文献编纂多用之,资料汇编性文献编纂亦用之。这种体裁是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常用的。

11. 注体

或称注释体、注解体、注经体。将有关的文献资料以注解的形式编纂起来。一般的情况下,注解文献附于被注解的文献之后,也有特殊的情况,即注解文献资料独立编纂成书。这种体裁,在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中也有运用,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本,就是注体。

12. 校体

或称校勘体。将有关的校勘文献资料编纂起来,或者附于被校勘的文献之后,或者独立成书。这种体裁,在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中也有运用,如《〈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编辑纪实》、《〈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等,就是校体。

13. 校注体

将校体、注体结合在一起,即将校勘文献资料与注释文献资料汇合在一起编纂,或者附于被校注的文献之后,或者独立编纂成书。这种体裁,在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中也有运用,如《〈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编辑纪实》中的某些部分,就是校体与注体的结合。

14. 文集体

以编纂人物的著述、言论文献为中心。可以将某一个人物的著述、言论,如文章、报告、讲话、题词、书信、日记、诗歌等编为一册或多册;也可以将众多人物的著述、言论编为一册或多册。这种体裁在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是常用的。很多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的文集都出版了,也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多种党的文集出版。

15. 表体

以表格的形式将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起来。表格中的文字一般比较简练。表体早于纪传体形成,以后被纳入纪传体。单独以表体编纂成的书也有。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也有运用,如《中国革命史表解》就是表体,将中国革命史的史事、人物用表格形式反映出来。表体可以和编年体结合,形成年表。年表有两种,以表格形式出现的,是表体,不以表格形式出现的则是编年体。

16. 图体

以图片形式将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起来。比如将照片、图画、图像、图表、地图等文献汇编成一册或多册。这种体裁在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是常见的,中共党史方面的图片集、地图集,中共党史人物的图片集等,已经出版了不少。图片资料的编纂,一般也适当附以文字说明,文字说明一般要说明图片所反映的内容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其他应该说明的内容。地图,则要说明标识符号、比例尺等。

17. 年鉴体

以编纂某一年的有关文献资料为中心。可以将多类多科的文献资料汇为一编成百科年鉴,也可以将某一类某一科的文献单独编为一编成专科年鉴。这种体裁在中国的运用是从近代开始的。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中也已常用这种体裁。近年来专科年鉴的出版,已达数百种。年鉴体,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的结合,其中对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表体、图体等都有采用。

18. 目录体

以编纂目录文献资料为中心。可以将多科文献目录汇为一编成综合性目录,也可以将某一科的文献目录汇为一编成专科性目录。目录

体的文献资料编纂一般按一定的分类体系进行。中国古代使用的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国现代使用的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目录体有标题式与解题式两种。标题式目录文献编纂,只注录文献的名称、作者、版本、出处等。解题式目录文献编纂,除了注录文献的名称、作者、版本、出处等,还可反映文献的主要内容、学术价值等。这种体裁在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是常见的。

19. 索引体

以索引的形式将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起来。索引又有多种形式,可以编纂多种类多学科的综合索引,也可以编纂某一学科的单科索引;可以编纂书目索引,也可以编纂论文等索引;可以编纂分类索引,也可以编纂主题索引;可以编纂文献索引,也可以编纂语词、句子索引;可以编纂人名、地名索引,也可以编纂物名索引等等。索引体文献的编排,可以分类编排,也可以按汉字笔画顺序或汉字音序等编排。这种体裁在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也是常用的。

20. 文摘体

以文摘的形式将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起来,或者将文摘型的文献资料编纂起来,编为一册或多册,或者编成一篇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摘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单科性的。它以信息、知识较为密集,而广受欢迎,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这种体裁,在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中也是常见的。

21. 辞书体

以辞书条目的形式将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起来,或者将辞书条目式的文献编纂起来,编为一册或多册。辞书的种类、名称有很多,与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相关的有词典、辞典、名录、手册、百科全书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词典》、《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件、人物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构名录》、《中共党史知识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学卷、政治学卷等等,都是辞书体的中共党史文献。

22. 长编体

以编纂原始史料文献为中心。按一定的体系将原始史料文献排比起来。原为编纂历史文献的一种基础工作,为编纂史书作准备,后成为

一种独立的体裁。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就先做长编工作。其中的唐代部分长编，最初编为六七百卷，最后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定稿为81卷。《资治通鉴》问世以后，其长编后来没有保存下来。而《续资治通鉴》以后则有长编保存下来，《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为专书流行。长编体可以与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等各种体裁结合。《资治通鉴》是长编体与编年体的结合。现在常见的“资料长编”、“年谱长编”，也是长编体与编年体的结合。而编纂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等史书，也总要先做长编工作，这样的长编便是长编体与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的结合。长编体，在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也是常用的。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长编》，基本上是章节体、纪事本末体、长编体的结合。

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体裁，这需要根据社会的需要以及文献的内容而定。中共党史文献无论采取何种体裁编纂，编纂完成后的成果形式不外乎以下几种：

1. 手稿

这是编纂完成后成果的最初形式。手稿完成后，可以提供发表、出版，也可以不发表、不出版。

2. 油印稿或打印稿

这是在手稿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电脑打印稿也可以没有手稿作基础）在小范围内流传，比如内部文件，比如内部征求意见稿，就可以用油印、打印的形式发表。油印稿、打印稿有可能以后公开发表、出版，也有可能以后并不公开发表、出版。

3. 公开发表、出版

一般以印刷的形式发表、出版。如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如由出版社出版。这是在手稿的基础上，或在油印稿、打印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4. 复印本

由复印机复印的本子。手稿、油印稿、铅印本等都可以复印。

5. 数据库，光盘等

即机读型文献。

无论何种体裁的中共党史文献编纂完成后,如果要产生社会效益、影响,都应该公开发表、出版,向公众公开。但是,是否公开要看社会需要,要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决定,会受到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制约。

第二节 编纂的具体步骤、方法

一、选题

选题,即选择、拟定文献编纂的题目。这是文献编纂的第一步工作,或者说文献编纂的起点。选题,是给编纂工作制定目标、确定方向,并且规定编纂工作的范围。题目一定,编纂工作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了。题目不定,编纂工作无法进行。选题对于编纂工作的决定意义还在于,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编纂工作的成败。题目定得好,有价值、有意义,编纂工作再下一定的功夫,编纂成果就会受到社会欢迎,发挥积极作用。题目定得不好,无价值、无意义,尽管编纂工作很努力,结果也不受欢迎,甚至被社会批评,白白耗费了人力、物力、时间。

如何才能定好题目呢?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选题原则

选题原则与编纂原则是一致的,服从于编纂原则。选题的第一原则是从社会需要出发,为现实服务。中共党史文献编纂选题时考虑的社会需要,首先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其次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即中共党史学术研究的需要。比如中共党史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空白,这些方面的文献编纂应该优先考虑。

选题的第二原则是价值原则。有没有社会价值,有没有学术价值。这与为现实服务的原则是密切相联的。同样题目或类似题目的文献已有人编纂或已经出版了,这个题目就不应该再选了,否则就会出现重复劳动、无效劳动的结果。选题要有新意,要创新。

选题的第三原则是必须考虑有无文献资料的基础。

选题的第四原则是要考虑编纂文献的范围、规模。

选题的第五原则是计划性。从社会需要来看,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的题目,无疑是很多的,而人力物力是有限的,这就必须对党史文献的

编纂工作进行统筹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编纂工作。既要从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程度来考虑选题的轻重缓急,也要从党史学科建设来考虑选题的轻重缓急;既要从当前的迫切的需要来考虑选题,也要从战略的、长远的、经常性的需要来考虑选题,要有预见性;既要考虑文献编纂工作的程序、步骤,也要考虑人力物力的安排;短、中、长计划兼顾,大、中、小题目兼顾……只有这样,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工作才能有条不紊、互相衔接、多快好省地开展起来。

总之,选题要充分论证,不断优化,切实可行。

2. 选题的种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党史,是一部执政党史,新中国的一草一木都与中共党史有关,所以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党史中的众多历史事件,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成功者反映了经验,失败者反映了教训,都是可以成为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的选题。党史中的人物众多,有杰出的领袖,有著名的将领,有英雄模范人物,有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有科学家,有思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党史人物中的成功者,可成为社会后人的楷模,党史人物中的败类,亦可成为社会、后人的反面教材,都可以成为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的选题。党史中的会议也不少,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些会议的文件、制定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有的是不正确的,都是可以成为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的选题的。党领导着全中国的工作,政治工作、外交工作、经济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科技工作、卫生工作……就是经济工作中,又有工业、农业、商业等各项。就是工业工作中,又有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通讯等多项。就是重工业中,又有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机械等多项……这一切工作的历史及成败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总结的,都可以成为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的选题。中国共产党有很多地方组织,它们领导了地方的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地方党史及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总结的,其中也包括民主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及其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的选题。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发展史,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及其经验

教训是值得总结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后如何坚持、继续发展,这也是值得总结、研究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发展,更需要研究。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的选题……中共党史文献编纂的选题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依据选题的原则进行选择,而不必拘泥于某一类某一种,思路应该开阔些,题目可以新颖些。

3. 选题的方法

如何依据选题的原则,确定一个适当的题目?基本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进行选题调研。调研工作是群众性的更好。调研工作的内容、解决的问题:一是社会需要什么,需要的程度如何。二是文献状况如何。三是什么题目已经有人选过,什么题目没有人选过。被人选过的题目,编纂工作的深度、广度如何,是否可以增补、修订。调研的目的就是对选题进行论证。

②开研讨会。可以是本单位的选题研讨会,也可以是有外单位人参加的研讨会。研讨会的内容、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调研的内容,及要解决的问题。开研讨会,就是开选题的论证会。开会研讨,可以起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的作用,也可以说是选题确定的必要的民主程序、决策程序。

③咨询专家。某一方面的选题,可以向这一方面的专家咨询。因为这一方面的专家,对这一方面研究的情况、文献编纂的情况会很熟悉,甚至了如指掌。当然研究方面的专家,较熟悉研究方面的情况,文献资料管理方面的专家,较熟悉文献资料的情况。专家的意见,应成为选题最终抉择的重要依据。当然向专家咨询,一定要专业对口、方向对口。所谓专家,就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不对口的专家,是不可能提供咨询所需要的满意答复的。

二、定体例

体例,亦称义例、凡例。体例,是编纂工作具体的实施细则、规范。

题目确定后,必须拟定体例,然后才可能开始编纂工作。如果只定题目,不定体例,编纂工作仍不知从何做起,仍无法做。如果没有严谨的体例,在文献编纂中还会产生前后矛盾、前后重复、前后不统一等混乱现象,致使编纂失败。体例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 格式、版式

文献编纂时要事先规定,文献是横排还是竖排(出版,还要规定一页是通栏还是双栏、三栏)。文献编纂成书,要事先规定此书采用几级标题,是两级标题还是三级、四级标题。文献中的注释,采用每页下的脚注,还是全书后的尾注。如果有校注文字,校注文字与正文怎么区别,校注符号是怎样的,如何标记。改正原文中的错别字采取什么样的格式、什么样的符号。以至一些较特殊的标点符号,怎么用,占几格,都要作明确、详细的规定。

2. 文献状况

说明文献的来源,说明选材的原则,说明文献、选材的缺漏,说明搜集文献、选材的截止日期。

3. 记时

记时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断限。即记事的上限、下限。如编纂抗日战争历史文献,上限定在1937年7月7日,还是1931年9月18日。基本的断限与局部的突破,关系如何处理。第二,纪年方法。这个问题,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文献的编纂问题不太大,因为新中国本身就是以公元、公历纪年的。而民主革命时期,当时的纪年是民国纪年。辛亥革命以前,当时是以清朝皇帝的年号纪年。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伪满洲国的皇帝年号纪年。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涉及到民国纪年、清帝年号纪年、伪满洲国皇帝纪年,应该怎么处理?体例中心须有规定。以公元纪年为主,附注民国纪年等,或者以民国纪年等为主,附注公元纪年,都是可以的,但在一本书中,在一套丛书中,只能确定一种纪年方法,以使整本书、整套书的纪年方法统一。

4. 记地

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的记地问题,主要是新旧地名、新旧地区的关系问题。如一个地的地名新旧不同;如一个省、一个县的辖区新旧不

同；如一个地方旧属江苏省，今属上海市；如同地异名、异地同名等，如何处理，要作明确规定。一般的情况下，通常以旧的地名为主，括注今地名，同地异名，同名异地，可加注说明。如果涉及到外国地名，是否附注外文，也应规定。

5. 记人

记人问题要解决的是：

①记什么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关系如何；普通人物与特殊人物的关系如何；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经济人物、文化人物等的关系如何；活人与死人的关系如何（旧传统，生人不立传）……要有明确规定。

②记人的什么。一个人物有他的政治思想、社会实践，也有家庭生活、业余爱好等，人物的什么可记，什么不可记，还是什么都记，必须作明确的规定。

③人的姓名记法。中国的历史人物，往往有正式姓名，又有字、有号，还有笔名、别名、化名等。记人的正式姓名，还是可以记字号、记笔名，要有规定。特殊人物、特殊情况，是否特殊处理，要作规定。涉及外国人物，是否注外文，中译名如何统一，也要作规定。

④编纂人物类的历史文献，如果众多人物合为一编，众多人物怎么排序？如可以按姓名、笔划排序，可以按姓名音序排序，可以按出生年月日先后排序，可以按卒年月日排序，究竟采用哪一种，必须明确规定。比如《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正文部分是按卒年先后排列的。有些书，则是按姓名笔划排列的，也有的按人物地位高低排列的。如按生卒年排序，生卒年不详者怎么办，也要有明确规定。

⑤如何标注人物的生卒。是详年月日，还是详年月，或只详年。

⑥如何标注人物的籍贯。是详省、县、乡、村，还是只详省、县，或只详省。

⑦先标注生卒，还是先标注籍贯。以上这些都要有明确的规定。

6. 记事

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的记事问题，主要解决的是：

①记什么事，如何处理事与事的关系。比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事是否都记；比如是否所有事件、运动、会议、

战役都记；比如在编纂党的政治文献中涉及到了军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献怎么办，编纂党的外交文献涉及到了经济文献怎么办；比如事有大、小之分，会议、战役等有重要、不重要之分，怎么区分之，标准是什么；比如正面的事，反面的事，是否都记，还是只记正面的事，如果记反面的事，记到什么程度，分寸怎么把握；比如有些史事有争议，记不记，怎么记……

②记事的具体方法。比如记事是否要按党中央的有关决定进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通过的关于建党至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决议，一个是80年代通过的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记中共党史中的事是否必须按两个决议的观点、提法去记，还是可以变通、突破；比如记事是原封不动搬用历史文献，还是可以自行叙述；比如记事时能不能加些议论；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文献都编纂在一本书中或一套书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如何排序；比如一事既涉及政治又涉及文化，是在政治、文化两处都记，还是记于一处，另一处互见，如果记于一处，记于何处，怎么确定记于某处的标准，互见方法怎么具体、灵活运用；记各地的事，怎么排序；记各单位的事，怎么排序；记各行业、各学科的事，怎么排序；记中国、外国的事，怎么排序；记大陆、港台地区的事怎么排序……以上这些都必须作出明确的规定。

7. 图片

图片的编纂有两种情况：一是图片集，二是附图、插图。图片集的编纂要规定图片选录的范围，什么图片录，什么图片不录；要规定图片怎么排序；规定图片说明文字的要求等等。附图、插图的编纂要说明附图、插图的原则、规格。如编纂众多人物文献资料，是否要登每一个人物的照片，还是分级别，高级别的人登照片，低级别的人不登照片。史事图片怎么附录；器物图片怎么附录；地图怎么附录……都要有明确的规定。图片的来源，图片是黑白还是彩色，也可作明确规定。

8. 文字、语言

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的文字、语言问题，主要解决的是：

①采用繁体字，还是简化字，异体字怎么处理。

②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还是采用中国字。

③中国人名、地名的译名,采用汉语拼音,还是采用外国人已经用的译名。

④采用白话文还是文言文,还是半文言文。

⑤方言怎么处理。

9. 引书、引文

中共党史文献编纂中遇有引书、引文,也要有些统一的规定。

①引书、引文的格式。

②引书、引文如何注出处。如引书,是否要注书的版本,是否注页数。如引文,文刊载于报纸,是否注某年某月某日第几版;文刊载于杂志,是否注某年第几期第几页。

③书、文的作者是否一定要注明。如《毛泽东选集》,是否要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如果注书、文的作者,作者为二人以上,是否全部一一注出,如作者有十人,是否十人一一注出。

④书、文名的全称、简称、别称关系如何处理,等等。

体例涉及的问题是很多的,以上只是主要的一些。不同种类、不同类型的文献编纂遇到的要解决的体例问题是不同的,定立的体例是可以不相同的。现代文献编纂,不定体例是不行的,而怎么定体例,则可从编纂的具体对象出发具体定立。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如何定体例,可参见张君炎等《档案文献编研学》中《档案文献汇编的体例和编排》一节。

三、编提纲

提纲,是编纂工作的具体框架设计。文献编纂的最终成果由哪几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是怎样组成的?这基本上在编写提纲时就定下来了。当然在具体编纂过程中,提纲可以修订,可增一些部分,也可减一些部分。

提纲,亦称大纲,一般来说越详细越好。详细,有利于编纂工作的具体实施。

提纲与题目的关系,是从属关系,提纲为题目服务,提纲又是题目

的展开。提纲编得好,可以提高选题的价值,反之,就会降低选题的价值。同样一个题目,不同的编纂者,会编出不同的提纲,这里有立场、观点、学术体系的问题,也有政治水平、学术水平高低的问题。要编好提纲,必须提高政治水平、学术水平,必须加强各方面的修养,必须对题目有深刻的理解,对文献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对文献内容有较全面的把握。

四、订计划

计划,是文献编纂工作、组织工作的具体安排与规定。计划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项:

1. 按照体例、提纲,制定具体工作步骤及完成的期限。先进行哪一部分的文献编纂,后进行哪一部分的文献编纂,各部分工作的期限,要作明确的规定。

2. 哪些人员参加编纂工作,具体分工。比如采用章节体,第一章由谁负责,或由哪几个人负责,第一章中的各节各由谁负责,要规定。如果采用编年体,哪一阶段什么人负责,哪一年,哪一月什么人负责要规定。

3. 如果是几个单位合作,各单位的分工,各单位的负责人,各单位的进度,要具体规定。

4. 集体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要具体安排。比如什么时候开样稿讨论会,什么时候开审稿会,会议什么人参加,要在计划中列出。甚至讨论选题、讨论体例、讨论提纲等等开会,都可在计划中作出安排。

5. 经费预算,分配方案。

6. 物资预算,分配方案。某些机器、仪器的使用,要有计划安排。

五、做准备

在题目、体例、提纲、计划都有了以后,在编纂工作实施以前,总要做些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主要是:

1. 思想上、认识上的准备。如熟悉题目、体例、提纲、计划,有疑问、疑义的地方可提出来进行讨论。只有思想上、认识上的问题全部解

决,编纂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进行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有些政策、原则,也要事先熟悉、把握,比如保密原则、内外有别原则,每个编纂人员都应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2. 业务上、技术上的准备。进行中共党史文献的编纂,应该对中共党史的有关理论和知识有所了解、掌握。特别是所从事的编纂工作的有关部分的理论和知识,必须完全掌握。没有有关方面的知识的人参加编纂工作,就必须事先进行培训。掌握了有关理论和知识的人,进行某个题目的文献编纂之前,也要熟悉一下该方面的文献,以便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在技术方面,如文献检索的方式、方法,电脑操作的方法、电脑软件的功能,也都要熟悉一下。

3. 物质上的准备。

六、选材

文献编纂工作,是在文献资料已经搜集的基础上进行的,搜集到的文献是否全部编纂起来,还是只有一部分能编纂起来,这要按照题目、体例、提纲等的要求,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有些符合要求的文献可以进入编纂,有些不符合要求的文献不能进入编纂。这就是说对已经搜集到的文献要进行挑选,这就是选材。文献资料汇编型的文献编纂要进行选材,著述型文献编纂的工作的第一步往往是编纂资料长编,也必须进行选材。如何选材,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选材原则

①切题。写文章的最基本要求是切题,文献编纂的最基本要求也如此。切题,是选材的最基本要求。即符合题目和体例要求的文献就选,不符合的不选。如果在搜集文献时的原则是多多益善、宁多勿漏,那么在选择文献时就不能这样了,应该精益求精、宁缺勿滥。如果不符合要求的文献也入选,那就要影响文献编纂工作的质量。一篇文献是否切题,不仅要从字面上、现象上去分析,而且要从本质上去分析,即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五四”运动期间,直系军阀吴佩孚曾发表很多抨击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支持学生运动的通电。这些通电是否表明吴佩孚站在学生运动的立场上了呢?这就要从本质上去分析。实际上

吴佩孚倒段,不过是想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支持学生运动是表象,而扩张自己的势力是实质。这样一分析,就应该把吴佩孚的通电归到军阀之间的矛盾的题目中去。再如编纂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文献,要不要把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献选入呢?要选,因为从本质上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它是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记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谈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不科学的。

②全面。首先是在理论体系上要全面。如编纂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文献,就要注意选录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等各方面的文献,也要选录共产国际帮助的文​​献。缺少其中的一方面,就是不全面。其次,某一方面的文献力求全面。比如工人运动的文献,应该反映全国各地、各行业。比如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的文献,从全国的面来说,要反映各地区,从每一个人物来说,要反映人物成长的各个方面。其三,从文献的性质来说,也应力求全面,比如正面文献、反面文献,都应该选,不要只选正面文献。比如不同观点的文献,可以都选,而不要偏重于选一种观点的文献。其四,从文献的时间上看,早期的文献,近期的文献,都应该选;旧文献、新文献都应该选。从文献的地域上看,各地的文献都应该选。中国大陆各地的文献要选,中国大陆以外各地的文献也要选,香港、台湾的文献,英国、美国的文献、苏联、越南、朝鲜的文献等等都要选。其五,从文献的种类上看,各种类型的文献都要选。比如档案文献、报刊文献、著述文献、日记、书信、回忆录等都要选。此外,反映“点”的文献,反映“面”的文献都要选,点面结合,可以避免片面。

③客观、实事求是。这个原则的贯彻好坏,最关键的就是对历史事实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历史事实是怎样的,那么有关的文献就应该选录。比如编纂毛泽东的文献,有关毛泽东正确方面的文献要选,而犯错误方面的文献也要选。编纂林彪的文献,林彪的错误的文献要选,林彪做的好事的文献也要选。也就是不要因人废事、因事废人、因人废言、因言废人。荣孟源曾谈到,20世纪50年代编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文献汇辑》,当时高岗被批判被开除出党了,但延安时期,高岗担

任过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编纂文献时,把议长高岗的讲话全删除不用,只用副议长的讲话。这样一来,这个文献汇编就既不全面也不客观,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荣孟源认为这是文献编纂的一个教训(详见《史料和历史科学》第223页)。

④有价值。搜集到很多文献,有的价值高,有的价值低,甚至没什么价值。选材就是要选出有价值的文献,价值高的文献。什么样的文献有价值呢?首先是能反映历史本质、事物本质的文献。其次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文献。有典型性的文献,说明的问题比没有典型性的多,自然价值就高。什么是典型性的文献呢?从反映史事来说,应该是较全面、较深刻的,切中要害的。其三是有新义的。有些文献初次发现、初次采用,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是有价值的。有些旧文献有了新的补充,有了新的解释、新的认识,这也有了新的价值。有新的价值,就是有新义。其四,从品相上、版本上来说,是优的、精的。一件完整的文献自然比一件残缺破损的文献有价值。一个好的版本的文献自然比一个劣的版本的文献有价值。比如编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出版本),在版本选用上,尽量采用文献原件,采用档案正本,采用最好的版本。如瞿秋白1925年8月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采用了瞿秋白亲笔修改的原稿,这个本子自然是最好的本子,它与《六大以前》本有22处不同。

2. 选材步骤、方法

选材,一般分初选、复选、定选三个步骤。

初选,按照体例、提纲、选材原则等,对文献进行初步的筛选,一些明显无用的文献,剔除之。一些可用可不用的文献,先选之,待复选时再决定取舍。初选,在标准、原则的掌握上可以从宽。同时可以将文献按价值高低排一下队,以便复选。

复选,在初选的基础上,对文献再筛选一遍。复选时,在标准、原则的掌握上要从严,要量中求质,要解决初选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可选可不选的文献在初选时不下定夺,在复选时必须决定取舍。复选时,不仅要从文献的选材原则等考虑,也要考虑各部分文献的平衡问题,考虑篇幅的限制问题。复选完成后,文献编纂的基本框架就形成了。

定选,在复选的基础上,对文献再审查、挑选一遍。定选时的标准、原则与复选一样,要从严掌握。定选,是从各方面进行最后的把关,对文献进行最后的取舍,最后的调整,这样文献编纂的框架就最终形成。

选材的初选、复选、定选的具体做法,可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复选时,一般不应由初选者担任,可免受先人为主的心理定势影响。一般应由部门负责人担任,以统筹一个部分的文献。复选,要写出复选意见,即复审意见。定选一般应由整个文献编纂的总负责人或其助手担任,如编纂委员会主任、如主编等。定选要写出定选意见,亦即三审意见。选材应注意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有些文献的编纂从头至尾由一个人做,即使一个人编纂也应在各个环节上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总会或多或少带来益处。集体编纂文献,自然应该经常开讨论会、交流会、碰头会等,互通“情报”、互助互利。不仅初选可以由集体分头进行,复选、定选也可以由集体进行。

七、整理、加工

文献的选材完成以后,要进行文献的整理、加工。整理加工的工作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文献的整理、加工,其内容是不同的。手写型、印刷型文献的整理、加工,要进行校勘、考证、标点、分段等工作,一般来说,这些工作都应该在文献编纂前已经做好了,如果没有做好,或没有完全做好,那只有在选材以后进行了。这些工作怎样进行,前面已经论述过,不再重复了。当然,整理加工工作不只是前面已论述过的一些,还有一些以下分别论述之。

八、标题

无论是资料汇编型文献编纂,还是著述型文献编纂,都要在某种程度上给文献标题。著述型文献编纂的章、节、目、细目等要有标题,资料汇编型文献编纂,采用章节体的,要有章、节、目、细目的标题,采用分类(类书)体的要有分类标题,甚至一组文献就要有一个标题,一件文献就要有一个标题。文献没有标题的,要加标题,文献已有标题的,也要

对旧有的标题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要求的标题,可以修改、重拟。文献标题的水平高低,对文献编纂的质量有直接影响。好的、水平高的标题,可以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如何做好标题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与大题目相呼应

文献的标题工作一般是对部分的、局部的文献标题,所以首先要注意与总题目、大题目相呼应。以符合“切题”的原则。如章的标题应与题目相呼应,反映出内在的联系。节的标题应与章的标题相呼应,反映出内在的联系。比如薄一波把回忆录定名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是文献编纂的题目。回忆录的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接管平津”。其中的四小节标题分别是:“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先期赴北平的任务”、“毛主席的谈话和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指导方针”、“平、津的做法和经验”、“进城以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题目是“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而“接管平津”自然是重大决策、事件之一,接管平津的任务、指导方针、做法和经验、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都与“决策”紧密联系,都是接管平津的重要环节。这些标题是层层呼应,体现出严谨的结构。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写很多,但题目定在“重大决策与事件”,非“重大”的决策、事件就不写了,与“重大决策与事件”无关的标题,也就没有了。

2. 正确、准确

标题的正确、准确是标题的最基本的要求。所谓正确、准确,首先是正确、准确反映文献的内容,即对一篇文献或多篇文献的内容进行正确、准确的提炼。为了标题的正确、准确,需要有各方面的修养,要有历史知识、文学等方面的修养,也要有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修养。比如1981年《党史研究》第1期封三刊登两幅照片。其中有一幅题为“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云南佤族互助组组员在田间插秧劳动”。结果刘玉金同志写信提出批评。指出“佤族”的“佤”字是傣语“奴隶”的意思,1963年3月29日国务院已批准将“佤族”改称“佤族”。《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刊登《重要更正》,改正这一标题的错误。

3. 突出主题

文献的标题可以从文献的形式上去定,也可以从文献的主题上去定。从主题上去定标题,可以将立场、观点鲜明地体现出来,政治性、思想性或学术性更强烈。比如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批评了他的悲观思想。如果定为“致林彪的信”也可以。而收入《毛选》第一卷时,题目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突出了主题,政治性、思想性强烈。又如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的开幕词”,收入《毛选》第五卷时改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也突出了主题,突出了文献的政治性、思想性。

4. 客观

正确、准确是客观的基本内容。此外,避免带感情色彩,也是客观的基本内容。比如国民党政府文献的标题中,有对共产党污蔑的称呼,“匪”、“盗”等等,应该修正之,或者在这些污蔑性的字眼上加引号。反过来,共产党的文献的标题涉及到国民党政府或蒋介石,也不必加“伪”、“罪恶累累”、“人民公敌”等。国民党军队可就称“国民党军队”或“蒋军”,而不必称“蒋匪军”。又如涉及到美国等国家,可直接称国名,而不必称“美帝国主义”或“美帝”。在标题中可以反映政治立场、观点,但感情色彩要少一些。

从客观的原则出发,对于文献的原有标题,除了必须改的以外,一般可以不改动,以便反映文献的原貌。如标题中有对共产党污蔑的字眼,加上引号就可以。如果国民党政府的文献专立一类,那么在这个分类标题下的一些文献标题中的污蔑性字眼不加引号也无妨,又如“供词”的名称,荣孟源认为就应该保留。荣孟源指出,“供词”是在法庭上的语言,不论是烈士或是叛徒,说话总有所顾忌,不可能全说真话。再加上师爷的笔录未必准确,甚至可能篡改,这样就离真话更远了。如果把“供词”都改为“自述”,就等于把不是本人的真话全当作本人的真话,这就不实事求是了。关于旧时代文献的一些名称,如“令”、“示”、“咨”、“批”等,都可以保留,不必改动(详见《史料和历史科学》第258页)。有些历史名称,如“北平”、“直隶”等,如旧官衔名称等,也不要改。

5. 文字精炼、简明

标题的文字精炼、简明,这虽然是文字修养的问题,是标题的技术

性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攸关编纂质量的。文字精炼、简明,就是高度概括、提炼,直到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一字。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一章的标题“接管平津”,就很精炼、简明,做到了不能增减一字。这个标题如果定为“关于接管北平和天津”,意思是一样的,但文字就臃肿、繁芜了,一看就知道没有提炼,缺少文学修养。

从精炼、简明出发,也应该避免有感情色彩的修饰词、形容词。如“接管平津”,写成“伟大的接管平津”、“平津接管的伟大成功”,就完全没必要。

为了精炼、简明,应该避免叙述事件式的、内容提要式的标题。这种叙述式、提要式的标题,在旧文献中是不少的。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陆征祥等,在全国人民压力下,在留法学生包围下,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后提出辞职给徐世昌大总统的电报》(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这个标题如果算上年月日,就近70字,像是写内容提要,不是定标题了。这个标题至少可以精炼成“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后陆征祥等致徐世昌的辞职电”。如果这个电报是收入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献集中,那么写成“《陆征祥等辞职电》(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即可。因为在“五四”时期,陆征祥的辞职电就是在拒签和约后发的,一看年月日就可以大概知道时代背景。辞职电自然是给总统徐世昌的,不说自明,没有必要在标题中点清楚。

以上是标题的基本注意事项。不同类型的文献编纂,有些具体要求可能不同,如档案文献中的单份文献往往要求在标题中反映作者、问题、受文者、文种、时间、地区等,而著述型文献的章节目标题等,一般就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以上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任何文献编纂都必须注意的。关于档案文献标题的原则、方法,可参见张君炎等《档案文献编研学》第七章第五节《档案文献标题的拟制》。

九、注释

文献编纂是为了为现实服务,为了提供给人们利用,而要被人们所利用,首先就要使人们看得懂。历史文献、中共党史文献,年代隔得久一点的,今天的人阅读起来,就会或多或少存在障碍。比如对文献中所

述之事的起因、后果不清楚,对涉及到的人物不了解,甚至有些字词也不理解。即使当代的、今天的中共党史文献,因为地域上的差异、行业、学科上的差异,也会在阅读时存在障碍。比如关于“市场经济”的党的文献,搞经济工作的人、研究经济的人,可能很好懂,其他行业、学科的人就不好懂。这说明无论昨天的还是今天的中共党史文献,对某些人来说,会有看不懂、难以理解的地方。怎样来扫除这些可能出现的阅读障碍呢?就需要对文献中的一些可能产生阅读障碍的地方,作一些注释。对历史文献作注释,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古代称“训诂”、“注”、“疏”等,现代也称注解、解释等。中国古代、近代的历史文献,现在整理出版的,大都是加了注释的,有的还出版了白话本和注释本。中国现代和党的历史文献,现在整理出版的,也大都加了注释,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以及《邓小平文选》等等,但有的还未加注释。中共党史文献注释工作的任务还是繁重的。

中共党史文献的注释工作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题解

题解,也称解题、题注。就是解释、注释题目、标题的文字。一般在资料汇编型的编纂中是常用的,在著述型编纂中用得较少,但也用。比如《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有题解。

题解的主要内容是:说明文献的写作年代。说明文献的写作背景。说明文献的写作目的、意义。说明文献的形成过程、发表过程、版本及修改过程。说明文献的来源、出处。说明文献的署名、作者的变化情况。说明题目、标题的变化情况。也可把文献整理的情况扼要说明,如分段情况、校勘情况等。

2. 字词注释

历史文献中有些字、词,今人已经看不懂,特别是隐语等,必须注释。有些专门名词、术语、成语、掌故等,为了便于理解文义,也可以作注释。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外语音译等,也可以注释。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及地方党组织曾用过很多隐语、化名。如“钟英”、“张万和”、“李承宣”、“承宣”、“陈宝森”、“宝森”、“其嘉”、“安中原”、

“中原”、“钟远”、“吴世荣”、“世荣”、“张寿昌”、“寿昌”、“沈保和”、“宝和”、“蔚和”、“李家声”、“家声”、“福清”、“云光”、“荣光”、“顺业”、“大全”、“钟羊”、“中”、“中兄”、“宗兄”等等,都是中共中央的代称。此外有:“常蔚”——中央常委。“毕挺”——中央秘书厅。“钟祖之”、“祖之”——中央组织部。“中福”、“淑英”、“傅伟”、“钟福部”——中共中央妇女部。“龙伟”、“龙沛然”、“宗容明”、“宗容民”、“农蔚”——中共中央农民部。“傅光”——中共中央宣传部。“龚华铺”——中华全国总工会。“钟钧甫”、“钧甫”、“钧兄”——中央军事部。“李幹生”——中共江西省委。“凌云”——中共河南省委。“杨澄”——中共广东省委。“白和”——京。“谢勃”——沪。“大学”、“西校”、“C校”、“P校”——共产党。以上这些隐语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文献中是常见的(详见《党的文献》1990年1期赵云云《一、二战时期中共中央的组织代称》)。

一些历史名词不注释,现在的年轻人就看不懂。如:“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政策。“边币”——陕甘宁边区政府银行所发行的流通券。又如《张闻天选集》中有:“上反、工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等,要使它们变为广大群众的组织……”“上反”何意?注:即上海反帝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劳金”——长工。“土劣”——土豪劣绅。社会主义时期也有很多历史名词必须注释。如:“三反”——1951年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四清”——1963年至1965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牛棚”——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一些干部、群众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黑帮分子,并把他们隔离审查、关押起来。关押这些人的地方,统称“牛棚”。“三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方独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3. 人名注释

历史文献中有很多人名是需要注释的,如:

①文献的制作者、保存者。如《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一书收入宋希濂、郑庭笈、沈醉、黄维等16人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回忆文章，这16人是何许人，要注释。

②文献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条件许可，还可以将文献中涉及到的所有人物扼要注明。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作了注释的人物有：薄一波、章蕴、聂荣臻、彭真、陈云、余秋里、刘伯承、周谷城、万里、李先念、华国锋、任弼时、陈锡联、陈赓、陈再道、宋任穷、苏振华、杨得志、彭涛、谢富治、王宏坤、张才千、秦基伟、王近山、杜义德、杨勇、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还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王明、李立三、向忠发、林彪、刘青山、张子善、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还有明成祖、郑和、李鸿章等；还有阎锡山、胡宗南、宋希濂、马法五等；还有外国人卡特、尼克松、杜勒斯、麦克阿瑟、基辛格、撒切尔夫人、大平正芳、宇都宫德马、铁托等。这些被注释的人物，有的是古代人，有的是近代人，有的是当代人，甚至有的还活着；有的人们可能不太熟悉，有的则是人们很熟悉的。足见人物注释的面是可以很广泛的。

人物的注释，一般应注出生卒年代、籍贯、字号、简历等。还可以说明与文献有关的情节。有些思想文化界的人物，还可以扼要介绍他们的思想、学术成就、艺术成就等。

4. 地名注释

历史文献中通常需要注解的地名是：

①新旧地名不同者。濠江县——靖宇县，保安县——赤安县——志丹县等等。

②文献中的重要地名。如孟良崮战役的“孟良崮”，应注出在山东蒙阴东南。直罗镇战役的“直罗镇”，应注出在陕西郿县（今富县）。

③地图上不标的地名，县以下的地名。如“西柏坡村”等。

④地名简称，应注出全称。如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等等。

⑤山脉、河流的所在地区。

地名的注释，一般以历史地名为主，附注今地名。如张闻天是南汇县施湾乡人，可注：“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施湾乡人。”

5. 年月日注释

历史文献中有些年、月、日的名称,不是现行的公元名称,就必须注释。

①年名。民国纪年要注明公元年份。民国元年——1912年。干支纪年要注明公元年份。如“辛亥革命”的辛亥年是1911年等等。

②月名。如腊月——阴历十二月。孟冬——阴历十月。夷则、否月——阴历七月。林钟、建未、遯月——阴历六月。壮月、桂月、柘月、竹小春——阴历八月等等。

③日名。朔——阴历初一日。望——阴历十五日。晦——阴历月末(三十日)。东——1日。江——3日等等。

④季名。青阳、芳节、软节——春季。炎序、火德、昊天、炎节——夏季。高商、九旻、阴中、白藏——秋季。元英、寒辰、严节、太阴、上天——冬季等等。

⑤时名。子时、人定、三更——23时至1时。寅时、平旦、五更——3时至5时。申时、晡时、下哺——15时至17时等等。

⑥节气名。立春——阴历正月,公历2月4日或5日。立秋——阴历七月,公历8月7日或8日。立冬——阴历十月,公历11月7日或8日等等。

⑦节日名。青年节——5月4日,亦是“五四”运动纪念日。国庆节——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双十节——10月10日。民国政府时期的国家节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日等等。

年月日的注释还有:

⑧阴、阳历、中、西历的换算。文献中的阴历、农历、中历、日期可以注出阳历、公历日期。

⑨文献中的日期有误或不清楚,要加注说明,并且可以把考证之语写出。如任弼时《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写作日期已无从查考。该文发表在《中国青年》1925年81期上,而该期的出版日期署的是“中华民国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即1925年5月23日。“五卅”惨案发生在1925年5月30日,在“五卅”惨案发生前,论“五卅”惨案的文章就发表了、刊物就出版了,显然有误。从文章的内容来看,提到了上海“三罢”,即罢工、罢课、罢市,这是6月1日到23日间的

事。但文中没有提到6月19日香港工人大罢工,也没提到6月28日“沙面惨案”。于是可以大致推定,此文的写作在6月20日或19日以前(报道罢工需一天时间)。但具体日期无从判断,所以把此文的写作时间定在1925年6月(详见《党的文献》1990年1期第83页)。以上这些考证写作时间的文字及结论就可以在注释中写出。

⑩文献的写作日期标出后,如果觉得有必要,可以将文献的发表日期、修改日期、再发表日期等加注说明。一些函电的发文日期、收文日期等,也可以加注说明。

6. 史事注释

史事内容是很广泛的事件、运动、战争、战役、会议问题、组织、团体等等,都是史事的组成部分。历史文献中涉及到的重要史事、人们不熟悉的史事,都应该作注释。如任弼时1925年写的《怎样布尔什维克化》,提到“近来南京同志反郭拥胡的投机倾向……”“反郭拥胡”是怎么回事?开始《任弼时选集》的编纂人员也不懂,后来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知道是1925年1月6日,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因后台齐燮元下台而被段祺瑞下令免职,3月9日段又聘胡敦复为东南大学校长,拥郭的职员、学生将胡打出校。4月20日段正式任命胡为校长,将部分拥郭排胡教授停职,酿成风潮。实际上拥郭、拥胡不过是军阀内部派系斗争而已。于是将此事的前后经过及应有的评价作了注释(详见《党的文献》1990年1期82页)。

又如张闻天1946年1月18日写的《关于处理满拓地、开拓地的意见》,一般人不懂“满拓地”、“开拓地”何意。《张闻天选集》中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时期,先后通过‘东亚劝业会社’和‘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后扩大为‘满洲拓殖公社’,名义上同伪满政府合办),以强行低价‘收买’和无偿没收等形式掠夺的土地,其中分配给日本移民和移民团(称为‘开拓民’和‘开拓团’)的称‘开拓地’,暂时租给中国农民以待分给日本移民的称‘满拓地’。‘满拓’,即‘满洲拓殖公社’的简称”(《张闻天选集》第655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史事的注释有:“鸦片战争”、“百色起义”、“平汉战役”、“淮海战役”、“农业合作化”、“风庆轮事件”、“四五

运动”、“两个凡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香港问题”、“双百方针”、“山、散、洞”、“《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还有“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六中全会”(十二届)、中共十三大、十三届四中全会、十三届五中全会、“十三届八中全会”等等。还有“八国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等等。还有“新经济政策”、“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与台湾关系法》”等等。还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书。可见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不只局限于事件、战役、会议等。

7. 照片注释

选用照片,配上说明文字,就是一种注释。照片的注释,应将时间、地点、人物、事尽可能详尽、准确进行说明。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有几幅照片的注释失误,受到了批评(详见王冰《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几幅照片的考证》,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8. 译名、外来语等注释

文献中的译名、外来语,特别是与当前的译法、表述有异的,要注释。

9. 引文注释

文献中的引文,要一一核对,如有误,要修改,并作说明。原本未注出处,要注出处。

注释应遵守的原则与编纂原则是一致的。主要是:

①实事求是。无论是史事或人物等的注释,都应事实是怎样,就说怎样,不能故意回避这或回避那。表述时要客观,不要使用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等,这与标题的原则是一样的(见前)。《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有很多修改,其中一部分就是改得客观一些。比如对一些人物的注释,评价都客观了。

②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要坚持无产

阶级的政治立场。比如解释“五四”运动,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肯定之,而不能站在日本或北洋军阀的立场上,否定之。解释“四五”运动,就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肯定之,而不能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用“两个凡是”的观点,否定之。

③文字精炼、简明。这与标题的原则是一样的,可以参见。不过注释的文字与标题的文字还是有所不同的。标题文字不可能出现考证性文字,不可能引用其他文献,而注释是会有此类情况的。只要注释需要,只要是说清问题,一些考证性的文字,以及其他文献的引用都是可以的。如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全文两千字。其中提到“共产党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毛选》中注释道:“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辞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原信的主要部分……”遂引用了原信的主要部分二千五百余字。这一条注释就比毛泽东的文章还长,但这是必要的。这样的注释,虽然文字很长,但仍然要贯彻精炼、简明的原则。比如信没有引用全文,而只是主要部分,正体现了精炼、简明的原则。

④要前后一致。首先是注释的体例要前后一致。其次是注释的内容不要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

⑤要避免重复。一个字词、一个人物、一个地名、一件史事的注释,只能出现一次。一般在该词语首次出现的地方注释,以后再出现就不注释了。此外,题解中注释过的内容,正文中相同的内容也就不要再注释了。当然这在体例中就应该规定,如果注释中出现重复,这首先就是体例的不严谨,没有制订好。

关于注释的方法、形式。单线型注释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脚注,放在每页的下方。篇后注,放在每篇史料之后。书后注,放在全书的末尾。脚注的特点,阅读方便,但如果注文篇幅大,在阅读方面也有弊端,甚至在版面上形成喧宾夺主。篇后注、书后注,不受注文篇幅大小的限制,只是阅读起来需要前后翻检。夹注,注文放在正文中间。如在被注

之处加括号,注文置于括号中。或如中国古代的文献注释,注文用双行小字置于正文之后。夹注,在版面上也会造成喧宾夺主,双行小字阅读起来也不方便。采取何种形式,可根据文献的特点、篇幅等决定。比如题解,一般采取脚注,当然也有采取篇后注的。注释处一般要加标记符号,一个以上的注释要编序号,以便注文排序,便于检索。比如在第一个需要注释之处标“①”,在第二个需要注释之处标“②”等等。中国古代的文献注释,很多采用注文双行小字直接置于正文需要注释处之后,这种形式现在已经不采用了,因为从各方面说都不方便。

复合型的注释,有校注、会注等。校注,是将校勘记与注释结合起来。会注,是将几家的注、各家的注汇集在一起。校注、会注等,一般不大采用脚注的形式,也不采用书后注的形式,大都采用篇后注,或者段后注,即一个段落后就排列注文。会注,在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编纂中还不多见,但完全可以采用,特别是整理年代较早的文献。

注释的资料性、学术性强,一定要有认真的态度,要舍得下工夫,要知难而上。几天写不出一条注释,几个月写不出一条注释的事是常有的,只有锲而不舍,才能圆满完成注释工作。如毛泽东 1943 年 12 月 24 日致刘少奇的信,向刘少奇推荐一本书,说:“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毛泽东究竟向刘少奇推荐了什么书?《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纂者先是访问延安时期的一些老同志、翻译家,均不知道。后请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宣部、中央编译局、北京图书馆、毛泽东藏书房等帮助找,仍找不到毛泽东推荐的书。一次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图书馆查其他资料,无意中发现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书后附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第一版书目》。于是找到此书的作者之一耿睿勤,她回忆有一本题为《从猿到人》的小册子,书中收有恩格斯和郭烈夫两人的文章。找到此小册子一看,果然其中两篇是恩格斯的,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类进化过程》(都是从《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节译的)。一篇是郭烈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这样,才把这条注释写成。前后访问单位十余个,人员近二十人,历时四个多月(详见郭思敏《锲而不舍多方搜求》,《文献与研究》1985 年 2

期)。足见注释工作做好不容易。注释如果不下工夫,就容易出现错误,如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有些注释就搞错了,受到了批评(详见胡为雄《〈毛泽东诗词集〉中几首诗的注释问题》,载《党的文献》1999年2期)。

十、按语

在编纂文献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对一篇文献、一组文献作一介绍,这就可以采用按语形式。给文献加按语,通常是用于资料汇编型的文献编纂中。这种资料介绍型的按语,有时也称“编者按”。著述型的文献编纂中,有时会采用注释性的按语。这类按语,有时也写作“案”、“案语”,一般文字较少。

资料介绍性的按语与题解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题解着重说明文献的形成过程,流传、版本以及文献的整理情况等。而编者按可以介绍文献的主要内容,介绍文献的特点、价值、思想性,介绍文献作者的政治情况等。题解较少采用评论性的文字,编者按则以评论性的文字为主。题解的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文献产生的前后过程。编者按的目的在于让读者能正确认识和运用文献。

例如,介绍文献的作者,编者按可以介绍作者的阶级属性、政治地位、立场、观点,介绍作者的一些特殊经历。而作者的字号、生卒年代,则可以介绍也可以不介绍。如介绍斯诺,要指出他是同情中国革命的,他在1936年到过延安,写了很多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么一介绍,再读他的《西行漫记》、《中国巨变》,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当然介绍作者要实事求是,要客观。不要随便说此人是“资产阶级立场、观点”,那人是“无产阶级立场、观点”。要下政治结论,最好有确凿的依据,有社会的公认,或者有组织上的结论。荣孟源曾谈到,在不知道组织上的结论时,就指名道姓说某人“后来叛变革命”,就很不应该。以至于造成反过来依据一篇文献的编者按来给一个人下政治定论的不严肃后果。这样的事有过,荣孟源认为应引为教训(详见《史料和历史科学·序跋按》)。

例如,介绍文献的内容、价值,编者按可以介绍文献的思想性、政治

作用,而不必介绍版本等。如介绍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要指出书中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为自己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辩护、翻案。这样一介绍,再读此书,总增加了些政治警觉。此外,文献的真伪,文献有无新义、新价值,此件文献与其他文献的比较等,也可以在编者按中说明。编者按介绍文献要严肃认真,要一语中的。这就需要对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就写不好编者按。如要给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写编者按,就要了解王明的经历,要了解在何时何地写的,写的背景怎样,要仔细通读全书,并将此书与一些科学的党史著作比较,也可以研究各方面对此书的评价,这样才能写好此书的编者按。

写编者按的原则,主要是实事求是,要客观、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同时,文字应该简明扼要。特别是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如文献的作者是熟人,评价就高一点,不熟,评价低一点。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这些与文献编纂原则等是一致的,以上已有论述,可以参见。

编者按可以由文献编纂者个人研究、撰写,也可以由集体讨论撰写。如果编纂者觉得不能胜任,可以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专家一般对某一方面的文献有研究,能胜任按语的撰写,而且质量、水平会高些。

例如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亲自给不少的文献写过编者按。现在看来有些编者按不太妥当,也有不少编者按今天读来仍可有所启迪,仍有现实意义,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高超的文章技巧。如毛泽东曾主持编纂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撰写了104篇按语,有上千字的,也有数十字的,都能切中文章要害,并提炼出一些经验教训及政治、思想上的启示。如《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的按语是: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

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罢,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①

这篇编者按,没有介绍文献的产生过程、版本,而着重把文献反映的思想意义提炼出来,说明了这篇文献的思想价值、社会价值。这种大手笔的按语,不仅在当时能给人以启迪,就是在今天仍然有启迪的价值。

十一、序

在文献前面写一篇文章说明编纂宗旨、过程、论述文献编纂涉及到的有关问题,通常谓之序。无论是资料汇编型文献编纂,还是著述型文献编纂,书的前面都有一篇介绍编纂的文字,题名有的称“序”,有的称“叙”,有的称“前言”、“引言”、“弁言”,有的称“题辞”,有的称“赞”等等,实际上都是序。从广义讲,文献前加上的“编辑说明”、“编者的话”以及“编者按”等等,也可以视为序,都起着序的某些作用。一本书编纂完成,可以写一篇序;一篇论文、文章写成,也可以在前面再加一篇序,比如写几句说明;一首诗歌写成了,也可以在前面加一篇序,即诗序。序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写一篇短文或长文是序,写几句赞语、题辞是序,写几句、几首诗,填一阙、二阙词也可以是序。

序和按语有相似之处,即都可以介绍文献、介绍作者等。序和按语又有不同之处:序有好几种体裁,按语只有文字说明一种体裁;序的位置都在文献的前面,按语有时可以在文献的中间;按语有注释性的按语,序没有注释的功能;序的内容较按语更广泛,序可以包含按语、题解、体例等各方面的内容,甚至还可以从文献引申开去,就文献外的某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7页。

些问题进行论述；文献原作者可以自己写序，即自序，而编者按一般是文献二次加工时由编纂者所写。一般来说，序的功能比按语多，作用也比按语大。序对于文献编纂来说是很重要的。在一般情况下，文献编纂完成后，总要写一篇序，或由编纂者自己写，或请专家写。不仅可以有一篇序，也可以有两篇以上的序。当然，文献编纂完成以后没有写序的情况也是有的。

序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一般可写清楚文献编纂的目的、意义、原则、方法、过程；说明文献的来源、文献的基本内容、价值；说明文献编纂的体系、加工的情况等等。可以把文献编纂的体例附在序后，也可以不附，独立成章。

如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卷首加了一篇《第二版出版说明》，其主要内容是：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在五十年代初和六十年代初先后出版，距今已有三四十年。现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对《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进行修订，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七十周年之际出版第二版。

……第二版仍保持原有的篇目，只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这篇著作，曾一度散失，六十年代初才重新得到，后经毛泽东同志审定，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次修订，对有些文章误署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对正文中的某些史实以及少量错字、漏字等，作了校正。对某些用字，包括少数生僻难认的地名用字，根据文字规范化的要求，作了更改。对有些题解，作了少量史实和提法方面的修正；同时，新写了几篇题解。对正文所作的校订，分别列表附在各卷书末。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主要是校订注释，改正注释中某些错讹的史实和不准确的提法，增补一些新的注释，删去少量注释。注释校订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从一九六二年起着手进行的，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

断。这次校订,在六十年代工作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来史料收集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注释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增补。^①

这一篇出版说明,将为什么要出第二版,及第二版修订的主要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说明。又如《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一版的“出版说明”,不仅谈了文献来源、加工情况,也指出:“这些论著不但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即指出了文献编纂出版的意义。

序也可以把编纂、研究文献的心得写出,既考证、综论文献,作为一种介绍,也是一篇有功力的学术论文。像顾颉刚编《古史辨》写的序长达数万言,论述自己研究古史的过程、心得,成为他学术观点的一篇代表作。

序也可以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训,阐述某种思想理论。如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也是一篇序,其中总结了建党以来十八年的经验教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②。又如毛泽东为《农村调查》写的序,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指出了调查的具体方法。这些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经典政治理论论文。这些序思想理论水平高,学术水平高,从而使文献编纂大为增色、锦上添花。序的水平高低,与撰序者的水平高低是密切相关的。

写序的原则与写编者按的原则是一致的。序文要有高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学术水平,首先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其次要对某些文献、某些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有自己的心得。最后还要有高超的文章技巧,文字既简明扼要又能引人入胜。如胡乔木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的《题记》,就被称为是一篇“美文”。

写序的方法与写编者按也是一致的。可以由文献编纂者自己写,也可以请有关专家写。可以由一个人写,也可以由集体讨论写。

① 《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二版第一卷卷首。

② 《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二版第二卷第606页。

十二、跋

置于文献前面的文字称“序”，置于文献末尾的说明文字称“跋”。“后序”、“后记”、“编后语”、“附记”等等文献末尾的文字，都是跋。跋与序，只是在文献前后的位置不同，其内容则是基本相同的。序中写的内容，如果挪到跋中写也可以。跋一般是写在文献编纂完成之后，甚至写在印刷清样出来之后，所以跋还可以写些出版过程方面的话，比如审稿及修改的情况，比如清样校阅的情况，还可以对新发现的文献未及补入文献编纂的情况作些说明，写些出现的新情况等。因为跋与序的内容是差不多的，所以要注意避免重复。如果已写了序，没有出现什么新问题，就不一定要写跋。如果既写序，又写跋，那么序中已有的东西，跋中就不要写。比如毛泽东 1941 年 3 月 17 日写了《农村调查》的序，1941 年 4 月 19 日又写了《农村调查》跋，序谈的是调查问题，跋就不再谈调查问题，而是谈政策和策略问题，强调：“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①

十三、编排

文献全部整理、加工完毕，就需要进行有序的编排。这可以说是“成品”装配的阶段。

著述型文献编纂的文献编排，可根据采用的体裁进行。采用编年体，按年月日的先后编排文献。采用纪事本末体，按事编排文献，然后再按事的时间先后编排。采用章节体，先按一定的理论体系订立章节，然后按照章节标题，将相关的文献分别编排。

资料汇编型文献编纂对文献编排的分类有两个层次，一是单层分类，二是多层分类。不分类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任何文献的编排总要受一定体系的指导，都要在一定指导思想下进行。什么文献排在前，什么文献排在后，都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有一定的编排理由，就是有一定的分类体系、原则。比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看起来似乎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91 年第二版第 793 页。

没有分类,而实际上书中的所有文章都是按年代前后顺序排列的,这就是说是按时间来分类的。

单层分类,就是分类只有一个层次,只按一个原则分类。如按时间先后分类,就是单层分类。一个人物的文集编纂,往往采用这种分类。又如按人物分类,编纂多人的文献集就可以采用这种单层分类。又如按行业或按单位分类,编纂多行业或多单位的文献集可以采用。

多层分类,即两个层次以上的分类。比如文献的编排有大类、小类、目、细目等多个层次。多层分类的各个层次、各个级别的分类可按一定的体系进行。采用何种体系则可根据文献的内容、特点等进行。多层分类,往往能反映编纂者的理论体系和研究心得。例如《黄埔军校史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纂)分为:一、创校与发展;二、军校机构;三、军事训练;四、政治教育;五、反帝、反封建战绩;六、两种思想和势力的斗争;七、分校概况;八、军校反共;九、黄埔师生讨蒋;十、军校人物共十部分,这是根据文献的内容进行大的分类。每一部分下又分若干部分,如二、“军校机构”分为(一)行政机构;(二)国民党组织;(三)共产党组织;(四)机构职能。五、“反帝、反封建战绩”分为(一)平定商团;(二)第一次东征;(三)平定杨刘;(四)参加“六二三”反帝斗争;(五)拥护省港罢工;(六)支援农民运动;(七)第二次东征;(八)出师北伐。这些就是小类。小类下再按一定分类原则编排文献。这样的多层分类是按文献的内容分类的,是按一个单位发展过程中涉及到各方面问题分类的。从此书的大类划分上,就可以看到编纂者对黄埔军校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对军校的文献史料编纂是客观的,正反各方面的史料都收入了。从中也清楚地反映了编纂者的立场、观点、理论体系和研究心得。

无论是单层分类,还是多层分类,尽管可以按不同的分类编排文献,但有些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守的。这些原则主要是:

1. 实事求是的原则。即分类必须从文献的客观存在出发,从历史事实出发。比如黄埔军校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是做出过贡献的,所以才把这方面的文献归为一类。没有做过的事,就不要硬凑出一个类别。

2. 逻辑原则。要按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历史逻辑等去分类,要体

现类与类之间的科学联系。比如《黄埔军校史料》分十大类,这十大类的划分和排列基本上符合逻辑。第一类是,“创校与发展”,这是正确的,如果把“创校与发展”放到后面去,就既不合历史逻辑,也不合形式逻辑,学校创建还没谈怎么能论其他呢?总是先有了学校,才能有学校的其他。第五类是“反帝、反封建战绩”,这也正确。如果这类放到第二类,不合历史和形式逻辑原则。放到第八类后面去,不合编者的理论体系,或者说不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辩证逻辑原则。因为所以先谈成绩再谈缺点,就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以肯定黄埔军校为主,而不是否定为主。再看第一部分“创校与发展”中分的小部分:(一)创校背景;(二)筹建经过;(三)军校发展。这也完全符合历史逻辑、形式逻辑、辩证逻辑。

从形式逻辑出发,还应注意同一层次类别的划分,标准必须同一,同一层次的类别不能互相交叉和从属。比如已按问题分大类,就不能同时再按时间分大类,或按单位分大类。比如“军校机构”、“军校人物”已分别设类,那么“机构”类中就不能再分出人物的类,“人物”类中也不能再分出机构类。“机构”类分出的小类,必须与“机构”有密切联系,“人物”类分出的小类必须与“人物”有密切联系,而不能有所超越。有人称之为“同层类间全异”、“上、下名实全同”^①。

从辩证逻辑出发,还要处理好一些分类两可的文献。如有的文献既可分在甲类,又可分在乙类,那么可以采取互见的方法。即根据文献内容反映的主要方面,归其人相应的类(如甲类),然后在有关的另一类中(如乙类)设一参见条,注明:参见甲类某条。这样就避免了重复累赘之弊。此外,有些文献不合题目要求,但对于研究此题目有重要参考价值,也不妨将这些文献作为附录。

3. 正面文献为主。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在分类过程中,在编排文献过程中,要把正面文献放在主要的、重要的地位,把反面文献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当然,什么是正面文献、什么是反面文献,必须要有科学的、客观的判断。

^① 《档案文献学》第228—22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文献的编排有一个过程。在文献编纂中,文献会有补充,会有删汰,文献的分类、类名,文献的编排也会有调整、修改。编纂逐步深入,编排就会逐步完善,编纂也就逐步完善了。

十四、编写附件

文献的编排完成以后,文献编纂基本完成。此外要做的是一些收尾工作,如编目录、编索引等,即编写文献的附件。附件的种类、内容很多,有的是必须做的,如目录;有的是可做可不做的,可视文献的内容、特点及文献编纂的需要而定,如索引等。以下将可以编写的附件种类、内容概述一下:

1. 目录

文献编纂成书后必须编制目录,以便于全书的阅读、检索。无论资料汇编性文献编纂或著述性文献编纂,都须编制目录。目录的形式有详目和简目两种。详目,可以将多层分类的各级类目全部录入,即将大类、小类、子目、细目等所有的标题全部录入;也可以将单层分类的所有标题全部录入,如资料汇编型的文献编纂,单层分类中的所有文献的篇名,甚至重要篇中的小节名,都可以录入。简目,只将多层分类中的大类、小类目录入,或只将大类目录入。比如有章、节、目等,只列出章、节或只列出章名。无论是多层分类还是单层分类的书,简目一般不列出所有的篇名、标题名。是采用详目还是简目,这要视文献的特点,视检索的方便与否而定。

编制目录要正确、准确。目录的名称必须与文献正文中标题和篇名完全一致,目录的名称不可以简写、缩写。目录的名称后要标注相应的页码,这些页码也必须与文献中的实际页码完全一致。

2. 参考书目

著述性文献编纂,可以将有关的参考书目甚至论文目列出。这会给读者就某一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方便。资料汇编型的文献编纂过程中,因为篇幅限制等原因,有些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没有收入,那么这些文献的目录可以列为参考书目、参考文献目。这有利于人们根据参考文献目录查阅更多的文献。参考文献目录,可以分类、分别设立。如

参考书目和参考论文目可以分开,资料性的书目和研究性的书目可以分开,未收入的文献目录和其他参考文献目录可以分开。还可以设立“待征集文献目录”等。

3. 索引

无论资料汇编型文献编纂,或者著述性文献编纂,都可以编制若干索引,以提供检索书内文献的方便。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书后附有索引,也有的书后没有附索引,用起来自然觉得还是有索引的书方便。做索引一方面要下些工夫,另一方面也增加篇幅,这大概是有些书没有附索引的原因。文献后附索引的,可以附多种索引,也可以只附一种索引,这可根据文献的内容、特点而定。自然,附的索引越多,对于检索来说就越方便。不过,不是任何文献都是附的索引越多越好,没有必要附的索引就不要附,如成语、典故之类的索引,就不是任何文献都要附的。编制索引,在第三章第一节中已有论述,可以参见。文献编纂完成后可做的索引主要是:人名索引、书(文)名索引、地名索引、主题索引、语词索引等。

4. 大事记、年表

大事记、年表等的编制,不是任何文献编纂完成后都要做的,如编年体的文献编纂,本身就有大事记的性质,自然不必再附大事记。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著述性的文献编纂完成后,可以编制大事记、年表等。如论述红军长征的著述,书后可以附“长征大事记”、“长征月表”、“长征日志”、“长征日表”等。如论述一个党史人物,书后可附该人物生平活动简表、著述年表等。资料汇编性的文献编纂完成后,可以编制大事记、年表等。如新四军资料集,可以附“新四军大事记”、“新四军年表”、“新四军月表”等。如“蔡和森文集”,书后可附“蔡和森生平活动大事记”、“年表”等。如“解放战争资料集”,书后可附“解放战争大事记”、“年表”、“月表”、“日表”等。编制大事记、年表等,对阅读、研究文献的一些具体内容是有帮助的。

编写大事记、年表等的要求主要是:

①时间概念要准确无误。每一件史事,每一项活动的年、月、日一定要搞准确。月、日不详者,附于年末。日不详者,附于月末。年表要

精确到年,月表要精确到月,日表要精确到日。

②史事准确无误。史事的真伪、有无要考证核实。不能被一些虚假的记载、报道所迷惑。

③标准统一,严格把关。如“大事记”的大事标准要统一,不能把大事、小事混同。“日表”,一定要精确到日,不详日的材料不能录入。

④文字精炼、简明。这与注释等的要求是一致的,可以参见。大事记、年表等作为附录,如果文字冗长,篇幅过大,便会造成喧宾夺主,是不妥当的。

5. 插图

图片性的文献编纂完成后,不必搞插图,文字性的文献编纂完成后可以搞插图。著述性的、资料汇编性的文献编纂,都可以搞一些插图。插图的作用是:一、形象化。如人物的照片,有助于了解一个人的形象;史事照片,有助于了解史事的形象等。二、征信。比如附上一幅日记手稿的照片,可以证明日记是真迹,是可信的。又如附上一幅某人在法国的照片,可以证明此人是到过法国的。所以文字文献编纂完成后,能附上一些照片等,文献编纂的质量会更高,价值也更高。是否图文并茂,也是衡量文献编纂质量高低的一个标准。

插图的种类和注意事项是:

①照片。照片可以反映人物、器物、史事、手迹等。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照片作为插图。照片的内容,要考证清楚,时间、地点等要有详细交待。

②图片。图画、图录、示意图等都是图片,可以反映人物、史事、器物等。图片是著述性的,有人工加工的痕迹,这就要求在编制图片时实事求是,客观、准确,不要夸张或掩饰。

③统计图表。大都是一些直观的、可资比较的图表,如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军队兵力、伤亡统计表、比较表等。这些图表也是著述性的,是人工加工的。编制这些图表,数字、比例等要精确、准确。

④地图。这也是著述性的,是人工编绘的。编绘地图,要求地理位置准确无误,各种示意线条、标记准确无误,比例等准确无误。

在图片选择时,还要注意择优择精,选择最能说明问题的、最精华

的图片作插图。强调择优择精,就要避免过滥、过杂,否则就会造成粗制滥造,影响整个文献编纂的质量。

6. 其他附件

① 修订表。一些重新编纂的文献,一些再版的文献,可以编制修订情况表,简要说明新版本的增删、修改情况。如《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每一卷后面都附录了“正文校订表”,并注明“表内第一版的页码和行数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出版的横排本”。有些已经印刷完成或出版了的文献,发现错讹之处,还可以编制勘误表,附于书后。

② 附录有关文献。如编纂《陈独秀集》,除了可以附录大事年表等外,还可以写一篇《陈独秀传略》附在后面。也可写一篇《陈独秀研究综述》附在后面。甚至可以挑选几篇有代表性的研究陈独秀的论文,或挑选一些著名人物评论陈独秀的语录附在后面。编制这些附件,显然有助于人们阅读陈独秀论著,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和研究陈独秀。

③ 附录组织机构等方面的资料。如《解放战争史》、《解放战争文集》,可以附录国共两党军队的序列表等。

十五、审稿、定稿、出版

文献编纂的初稿完成以后,还不是整个文献编纂过程的结束,还要审稿、定稿。经过审稿,可能还要进行一些修订工作。如果要提交出版部门出版,还要根据出版部门提出的一些出版要求、意见,再进行修订。

提交出版的文献,出版部门还要进行一审、复审、三审。出版部门,也要在政治、学术等方面把关,并且要从出版的要求、规范提出一些意见。编纂者们要依据出版部门的一些意见,再作些修订,直到三审通过,付印。

文献出版的版式、装帧等主要由出版部门决定,编纂者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但文献清样出来以后的校对,编纂者仍负有重大责任,当然出版部门也有责任。校对不精,疏忽,就会造成一些文字讹误。哪怕是几个文字的讹误,甚至是几个标点符号的讹误,也会影响书的质量,进而影响了文献编纂的质量。所以清样的校对,编纂者们仍应高度重视。清样的校对,从严格把关出发,编纂者们不仅可以校初校,也可

以校二校、三校。如果三校中仍发现问题,可以再校四校,直至无一点问题为止。

书印刷完成,公开出版后,编纂者并非万事大吉,相反要更严峻地接受读者的批评、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任何人的认识都要受时间、地点的局限。编纂者们在编纂文献的当时没有认识到的问题,没有发现的文献,在文献出版后,或者在文献出版十几年、几十年后,会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审稿者们的认识也受到局限,时过境迁,审稿的要求、眼光,也会变化、发展。读者、实践、时间的检验是无限的,会提出新问题、新观点、新理论。这就迫使文献编纂者们要不断修订所编纂的文献。《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出版,就是这样产生的。相信以后还会出第三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编纂工作是无止境的。

◆第八章 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 相关知识

从事中共党史文献工作,需要加强理论、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修养,还需要掌握一些文献工作的基本知识,如上面提到的校勘、考证、编纂等,此外还需要掌握一定的人名、地名、职官、年月日知识。这四方面知识的掌握,曾被称为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可以打开历史研究中的一把把“锁”,也可以打开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一把把“锁”。

第一节 人 名

一、把握中国人名的复杂性

中共党史文献是离不开人名的,但中国人名有复杂性,中共党史人物,因为经历了地下状态,也就更复杂。把文献中的人名搞准确,是做好党史文献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中共党史人名的复杂主要是:

1. 有同名同姓的人

中国历史上同姓同名的人不少,中共党史中也是如此。如:陈赓湖南湘乡人。解放军十大将之一。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未参加广州起义(当时在上海养伤)。

陈庚 广州起义时任红军指挥部副官。后不详^①。

又如,康生原名张宗可,曾改名张叔平。有人就把1926年上海杨浦区区委书记张叔平当作康生。实际上杨浦区区委书记张叔平是山西人,又名张依,1927年12月被蒋介石杀害^②。又如出席共产国际第六

^① 详见张钟等《关于陈庚的两则考订》,《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1期。

^② 详见《党史研究》1984年4期第78—79页。

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中有李光,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的编纂者认为李光就是藤代远,因藤代远用过“李光”的化名。藤代远用过“李光”化名是不错的,但藤没有出席过共产国际“六大”,因他当时正和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进军。藤以后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李光是苏兆征。

2. 一个人有几个名字

中国传统习惯,一个人除了名以外,还有字、号。名是出生后即取的。字、号,一般是成年后取的。《礼记·檀弓》:“幼名冠字。”此外,还有取室名、斋名的,室名、斋名往往又成为人的代名。如:

陈独秀 家谱名庆同、庆国。应科举名乾生。1914年前后改名独秀。初字重甫,后字仲甫。号仲山、仲子、由己、实庵。室名,看云楼。

中共人物还有笔名,并且因为从事地下工作,很多人有化名,在国外生活过,也有外国名。此外有些从艺之人,有艺名等。如陈独秀的笔名有:三爱、只眼、虬儿、顽石、撒翁等。化名有:张次南、王坦甫、陈铎生等。

因为一个人有很多名字,文献中出现的人名,就更要注意考证了。如1932年1月28日《红旗周报》第32期有一篇《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署名“仲”。这个“仲”是谁?用“仲”笔名发表文章的有刘少奇、陈独秀、张浩等。经过马济彬的考证,确定这个“仲”是刘少奇^①。又如《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二辑,刊登了1929年《烟台情形报告》。报告落款为“克明”,编纂者便题为“山东省委巡视员曹克明对烟台的巡视报告”。而实际上1929年曹克明并未去烟台检查工作,柳直荀则由中央军委委派到烟台视察工作。柳直荀又名柳克明,并且报告的手迹正是柳直荀的。编纂者们搞错了。^②又如毛泽东1937年11月27日致文运昌的信提到:“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这个“刘霖生”是谁?有的说是湖南湘潭的辛亥革命志士刘

^① 详见马济彬《对一篇署名“仲”的文章的考证》,《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4期。

^② 详见宋玉娥《关于〈烟台情形报告〉作者的考订》,《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9期。

揆一,他字霖生。有的说是湖南湘乡的刘浚源,号霖生,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纂者们亲赴湖南调查核实,最后确认毛泽东信上提到的“刘霖生”,是刘浚源。^①

二、把握人名的翻译

人名的翻译,无论是中国人名译成外文,或是外国人名译成中文,都应注意。

1. 中国人名

现在中国人名译成英文,一律采用汉语拼音拼写法,中文名译成英文名,再由英文名译回中文名,一般不致出差错。而以前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特别是民国年间,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对某一个人名的读音往往因地而异,所以中国人名译成外文,就会有多种译法,如果再将外文译回中文,就会发生错误。如:恽代英,《西行漫记》1937年英文版作 Wen Teh - ying。亦愚的《西行漫记》中译本译作“温德音”,有的作“温得音”,于是搞不清是什么人了。又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注83(为马克思原注),有一个中国人名 Wan Mao - in,是清朝财政方面的高级官员。20世纪30年代初翻译《资本论》的人把它译作“王猛殷”、“王孟尹”,有的译作“万卯寅”。后郭沫若著文认为应译为“王茂荫”。后吴晗又作补充,证实 Wan Mao - in 即王茂荫,咸丰三年为户部右侍郎,曾上折议钞法(详见吴晗《读史劄记》)。以上都说明,中国人名译成外文,要尽量规范化,而外文中的中国人名译回中文时,则要注意查核、考证,不能随意、想当然。

2. 外国人名

外国人名译成中文,^①要准确。如不能将 Hollander Maring 译成霍兰德和马林两人(详前)。^②要规范统一。如马克思一般不作马格斯、马克斯等。恩格斯一般不作安格儿斯、恩克斯等。列宁一般不作里宁、李宁等。已经约定俗成的,就不要再改动。外国人名译成中文时,一般应在中文名后加括号注上外文名字,以便查核。^③要注意外国人也有

^① 详见沈学明《毛泽东问候的是哪一位刘霖生?》,《文献与研究》1985年2期。

化名。如马林在华时曾化名西门、西蒙、菲力浦、安得烈森、希夫廖特、布罗维尔、孙铎、倪恭卿、东文松等。④要注意大陆和台湾、香港对同一外国人名中的译，文字会不一样。如美国前总统，大陆译作里根，台湾、香港地区作列根。以上说明，对于文献中出现的外国人名，都要认真查核、考证。

第二节 地名

一、把握中国地名的复杂性

中共党史文献是离不开地名的，但中国地名要准确把握住，就必须了解中国地名的复杂情况、变化情况。

1. 异地同名

沙田，作为县以下地名全国有不少。1922年3月4日“沙田惨案”的地点在香港九龙北面。湖南桂东县沙田是红军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地方。江西遂川县也有沙田。广西、广东也有“沙田”。

县名相同，现在已经基本消除，但历史上曾有过。1914年（民国三年）曾改定重复县名、地名百余处。如：

长宁 四川、广东、江西各一。定四川存，广东的改名新丰县，江西的改名寻乌县。

永宁 河南、山西、广西、贵州、江西各一。定河南存，山西的改名离石县，广西的改名古化县，贵州的改名关岭县，江西的改名宁冈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对残留的一些重复县名进行改定。如：
梁山 山东、四川各一，改四川的名梁平县。

桐庐 浙江、安徽各一。1951年改安徽桐庐县为湖东县，1955年再改名枞阳县。

县以下的地名至今仍有相同者，县名在历史上有相同者，这就提醒文献的整理、编纂者，见到文献中的一个地名，必须经过查核、考证再下判断。

2. 同地异名

有些地名有别称、简称，便出现一地数名、同地异名。如：

陕西——陕、秦。甘肃——甘、陇。贵州——贵、黔。上海——沪。太原——并。广州——穗。南京——宁。宁夏亦简称“宁”。以上为简称,电报、书信、新闻报道中多用之。

别称如:南京——白下。广州——羊城。南昌——豫章、洪都。汉口——汉皋。天津——津门,等等。

有些县以下地名的别称,是一种俗称、土称、概称。如长征途中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的地点,是在“鸡鸣三省”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川、滇、黔交界处的岔河一带,因为这里“一鸡长鸣,三省皆闻”。但岔河一带村庄很多,都为“鸡鸣三省”之地,究竟具体是在哪个村庄呢?经过查核、考证,大致确定为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①。

3. 地名改变

如前面提到的一些同名县,一部分县名就改变了。又如绥远省——1928年设,1954年撤消,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省——1928年设,1952年撤消,并入河北、山西。热河省——1928年设,1956年撤消,并入河北、辽宁及内蒙。松江省——1945年抗战胜利后设,1954年撤消,并入黑龙江省。归绥市——呼和浩特市(1954年改)。山西辽县——左权县(1942年改)。吉林濛江县——靖宇县(1946年改)等等。以上这些地名的改变,是大改动。也有一些地名的改动,是出于辨认、书写的方便。如:江西雩都县——于都县(1957年改),江西大庾县——大余县(1957年改),陕西盩厔县——周至县(1964年改),陕西郿县——富县(1964年改),广西鬱林县——玉林县(1955年改),青海豊源县——门源县(1959年改)。此外村名改变,城市的路名改变情况更多。

有些地名的改变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也包括地理位置、辖区、属区的变化。有的地名没有改变,也有地理位置、辖区、属区的变化。这些都是判断一个地名时要注意的。如《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中的注释[111],注王明的籍贯为“安徽金寨人”。后即有学者撰文指出,这样注不对。金寨,原名金家寨,原属六安县,1932年在此设立立煌县,1947年改设金寨县。后又分设金东、金西两县,1949年

^① 详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1期第10页。

又并为金寨县。王明生于1904年,当时的金家寨属六安县,因此籍贯应注“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①。1994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修订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出版,王明籍贯的注释即改如上。又如古田会议的会址,长期以来很多文献都说是“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后来学者指出,这个表述是不正确的。“古田”并不是一个村名,而是八个村子的总称。古田,在民国年间是个镇,包括八甲、溪背、荣屋、竹岭、下塘、赖坊、五龙、文元八个村。当时的古田镇没有固定的地点,哪个村子的人当了镇长,古田镇公所、圩场就设在那个村里。古田会议是在溪背村曙光小学(原为廖家宗祠,二十年代改为和声小学,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到后,改为曙光小学)开的。所以古田会议会址的正确表述是:福建上杭县古田镇溪背村^②。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献,国家改变地名了,文献中的地名也会改变。而香港、台湾地区,有时不了解大陆地名的改变,文献中的地名仍然是旧的,这在阅读、整理文献时,是应该注意和警觉的。

二、防止字近、音近、地近等产生的讹误

中国的地名客观上本来就很复杂,如果主观上再马虎、草率,就容易产生讹误。比如有些地名的字相近或音相近,就容易混淆。有的地名也会与相邻的地名搞混。

如郟城、郟师都是河南的县名。郟城,现属许昌地区,在京广铁路线上。郟师,现属洛阳市,在陇海铁路线上。毛泽东等1918年夏乘火车北上,在郟城被水阻,在附近停留了一两天后,步行到许昌再乘火车北上。而有一篇《回忆新民学会》的文章说:“二十几个人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南郟师(今郟城),因郟师以上铁路被大水冲断,在郟师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搭车到北京”。这里就把郟师和郟城混淆了。而这样的错误,经《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五四运动回忆录》(1979年出版)等不断转载,编辑们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1期第87页。

^② 详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2期第32页。

毫不察觉,直到何东在《中国现代史史科学》中指出,才得以改正。这是因地近、字近而产生的讹误。

又如云南沾益县,繁体字作“霑益”,为红军长征所经之地。有的文献把“霑益”误作“露益”,这就是字近而误。

不了解实际情况,想当然,也会造成讹误。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通南巴,是四川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的合称。而有的回忆录中则把通南巴当成一个地名,并写成“通南坝”^①。这当是想当然造成的错误。又如红军长征经过的“俄界”,很多文献都说是“四川俄界”、“川北俄界”。实际上,俄界在甘肃南部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与四川接壤而已^②。这是不了解情况所致。

如何才能防止因各种疏忽产生的讹误呢?首先要认真查核各种文献资料,其次要进行实地考察。如新四军在江苏丹徒县打了一仗的地点,长期以来的文献都写作“卫岗”。后学者到丹徒实地考察,发现汽车站名为“韦岗”。于是查对县志、地图等,最后确定正确的地名应作“韦岗”^③。又如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地点,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如姜茂生《红七军北上漫记》、袁任远、韦国清等《纪念百色起义》等,都说是在江西兴国县桥头镇。但实际上兴国县并无桥头镇的地名。后经实地考察才查清,于都县西北角与兴国县接壤处有个桥头圩,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就在这里。而红七军在会师前,先驻扎在兴国县城及兴国县枫边乡密石村。因为桥头圩紧靠兴国县城,所以很多人都误以为桥头圩是属于兴国县的,误以为会师是在兴国县境内,并把桥头圩误为桥头镇^④。以上说明,经过实地考察,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纠正地名的讹误,最终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完全解决。

① 详见何东《中国现代史史科学》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② 详见《党史研究》1983年6期第41页。

③ 详见王辅一《关于新四军历史的十点考证》,《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3、6期。

④ 详见北流县委党史办《红七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确切地点》,《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4期。

三、把握地名的翻译

地名的翻译,无论是中国地名译成外文,或是外国地名译成中文,都有些问题要注意。

1. 中国地名

1978年12月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中国的人名、地名一律按汉语拼音方案拼写。在这以后,中国出版的外文书刊,注意了这一点,外国出版的书籍中,也开始采用中国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但在这以前,中国地名译成外文,如英文,并非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所以有些地名的拼写与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相差很远。这方面的情况应有所了解,特别是一些重要地名的旧译法应有所了解。如:

Peking——北京。 Canton——广州。 Hankow——汉口。

HongKong——香港。 Amoy——厦门。

Macao——澳门。澳门有妈祖庙,因称“妈阁”,又讹读为“马交”。

外国人多称澳门为“马交”

Mukden——沈阳。为“奉天”的音译。

Chefoo——烟台。烟台的别名为“芝罘”。

这类的地名旧译法还有很多。如果能有所了解,那么在整理一些旧文献时,就能驾轻就熟,不致出差错。

2. 外国地名

中国地名委员会,1983年出版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以统一外国地名的中译名。而在此以前,外国地名的译名有不少是不统一的,有些文献中出现的中译外国地名,与现在约定俗成的相差很远,以致不知这个地名指什么地方,只有经过仔细的查核、考证才能清楚。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应有所了解。例如:

墨利加洲、亚墨利加——美洲

濠斯多拉利亚——澳洲

布路亚、博都尔噶——葡萄牙

大吕宋、斯扁、以西把尼亚——西班牙

波罗尼——波兰

布拉热尔——巴西

这类中译名还有不少。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到：“战后，那些帝国主义又企图恢复战前经济状况……他们先后在巴黎、华盛顿、柔鲁等处开分赃会议……”“华盛顿会议把日益冲突弄得更加明显，柔鲁会议，英法背道而驰，已是回复到比大战以前的形势更加危险……”其中提到的“柔鲁”、“柔鲁会议”，指何地？何东经过初步的考证，认为“柔鲁”指意大利热内亚，“柔鲁会议”指“热内亚会议”。热内亚会议是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开的，正好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会上英法有矛盾，与“英法背道而驰”合。^①又如《张闻天选集》中《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到：“意大利去年十月初开始了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阿比西尼亚”，即今译的埃塞俄比亚。这说明旧译的地名与今译的地名，相差实在很大，甚至会被误为是不同的地名。这也提醒文献的整理者、编纂者，见到旧文献上的一些外国地名，不要轻易、想当然下判断，而应仔细查核，甚至作一番深入的考证，再下判断。

第三节 年季月日

中共党史文献离不开时间概念，但文献中表述的时间概念，不一定与现在的公元纪年完全相同。比如中国传统用农历、阴历，与公历的月份、日期就不同，某种情况下年份也不同。中国传统也用于支纪年，文献中的干支年份，需要换算，才能成为公历年份。这些传统方法，以前用，现在也还在用。又如鲁迅《祭书神文》反映的时间概念是“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这是表示哪年哪月哪日呢？就需要查考、换算。用这种古雅的方法、文字表示年月日，以前流行，现在也仍然有。这说明，作为一个文献工作者，一定要有一点中国传统的纪年、纪月、纪日方面的知识，才能顺利进行一些年月日的查考、换算工作，才能避免因年月日的换算不当、年月日概念疏忽造成的差错。

^① 详见《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第76页。

一、年

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年号纪年

自汉武帝开始，中国封建帝王上台，都定年号，并用以纪年，有的帝王一生用好几个年号。历史上的一些农民政权也有年号。中国历史上的年号很多，可以通过《中国历史纪年表》及索引等查找。与中共党史文献关系较密切的年号有：

光绪：1875 - 1908 年，共 34 年。

宣统：1909 - 1911 年，共 3 年。

在党史文献中会遇到这些年号，如很多党史人物都是光绪年间出生的。在某些清朝遗老遗少的文献中还可以见到“宣统十五年”等的纪年。

与年号纪年相似的是民国纪年。民国元年 1912 年，一直到民国 38 年 1949 年。台湾目前仍在使用民国纪年，台湾出版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民国 83 年、90 年的纪法，这种纪法，大陆是不承认的。

日本的年号，也与中共党史文献有一定的关系，应了解。如：

明治：1868 - 1912 年，共 45 年。

大正：1913 - 1925 年，共 13 年。

昭和：1926 - 1988 年，共 63 年。

特别是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研究抗日战争，应了解日本的年号。

2. 干支纪年

干，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支，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天干、地支相配组合，自甲子至癸亥，共 60 组。古时即用来纪年，亦称甲子纪年。干支纪年，60 年后便重现相同的干支，所以干支名称具体相对应的公元年代是什么，要认真仔细查核、换算才行，一疏忽就至少相差 60 年。干支纪年的换算，可以借助《中国历史纪年表》及历表等。如郭沫若生于光绪壬辰年，通过《中国历史纪年表》及荣孟源《中国近代史历表》等，就可以查到是光绪十八年，即 1892 年。

干支纪年,现在仍在用。现在出版的《年历》、《月历》一般都标出该年的年份干支。有些人题字、写诗、作画,落款的年份也喜欢用干支名称,而不直书公元年份,显得古雅。

3. 生肖纪年

生肖纪年,特别是纪年龄,自古及今,一直流行。生肖共 12,与地支相配为:

表 1 生肖与地支对应表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犬	猪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生肖纪年,12年后便重复,有“本命年”之称。肖属的对应年份,要认真查核、换算,否则,一差就是 12 年。

4. 星岁纪年

岁星纪年与太岁纪年合称星岁纪年。中国的战国时代已经产生,秦汉间盛行,至王莽以后不再使用。虽政府不再用它来纪年,但文人墨客作文题诗,附庸古雅,仍每每用之,于是沿袭至今。现代的文献中时时可以看到。

岁星即木星。古人观察它绕天一周的时间是十二年,于是把它运行的轨道分为十二等分,称十二次(现称十二宫),并由西向东分别命名。其名称及与地支的对应如下:

表 2 岁星与地支对应表

星	玄	璣	降	大	实	鹑	鹑	鹑	寿	大	析
纪	枵	营	娄	梁	沈	首	火	尾	星	火	木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这十二次与地支的方向相反,纪年不方便,于是又假设了一个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星——太岁,亦称“太阴”、“岁阴”,将它的运行轨道由东向西分为十二个单位,其命名及与地支的对应如下:

表3 太岁与地支对应表

摄 提 格	单 阏	执 徐	大 荒 落	敦 样	协 洽	涓 滩	作 鄂	掩 茂	大 渊 献	困 敦	赤 奋 若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有了岁阴以后,西汉时的历学家们又设想了岁阳,并定为十个单位,以与天干相配,其名称及对应如下:

表4 岁阳与天干对应表

阏 逢	旃 蒙	柔 兆	强 圉	著 雍	屠 维	上 章	重 光	玄 默	昭 阳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岁阳的名称,《史记》与《尔雅》略有不同,以上为《尔雅·释天》中的名称。有了岁阳、岁阴的名称,于是又形成了与干支纪年相应的六十个岁阳、岁阴的组合。文献中用岁阳、岁阴表述的年份,一般可先换算成干支的表述,再换算成公历的年份。如鲁迅写的“上章困敦之岁”,就可换算成庚子年,而鲁迅生活时代的庚子年就是1900年。

5. 虚岁、实岁

中国有个纪人年龄的习惯,即以虚岁纪岁数。有些人逢十做寿,就以虚岁为计。虚岁一般比实岁多一年(岁)。谈人物的年龄,是虚岁还是实岁,一定要搞清楚。如李大钊的生年,是根据他在狱中的自述“现年三十九岁”来推算的。如果以虚岁计,当生于1889年,以实岁计,当生于1888年。现已考证清楚,李大钊所说的“三十九岁”,是虚岁,实足38岁,所以生于1889年。

湖南等一些地方,还有“六十添寿”的习惯,即过60岁以后便加寿一岁。如果60岁以虚岁计,再加寿一岁,这样的岁数就比实岁大二岁。有些人的岁数就是这样计算的。说明文献上出现的人物的岁数,并非就是该人的实数。

年龄也有多报或少报的情况。所以古代有“官年”、“实年”的差

异。近现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记载朱德的年龄、籍贯是：“年龄21 籍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 入堂年月己酉11月。”朱德是1909年11月考入讲武堂的，当时已实足23岁，但只报了21岁，且籍贯也是冒充的。这在当时只是为了报考有利于录取的权宜之计。这说明不能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的记载来确定朱德的实际年龄的。可见年龄多报、少报的事是常有的。

6. 阴历、阳历的年差

中国旧时用的历法是农历、夏历，习惯上亦称阴历。阴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平年12个月。一年354日或355日，比回归年短约10日21时，所以每三年有一闰年，19年有7个闰年。闰年13个月。既置闰，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阴阳历。公历则是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一年为365日5时48分46秒。一年12个月。每四年一闰，闰年366日。没有闰月。这样阴历与公历、阳历的日期不一致、月份不一致，某种情况下，年份也有差异。比如阴历的十二月，可能就是公历的一月，而阴历的十二月与公历的一月，在年代上就相差一年。如杨度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阴历十二月初三，为公历1875年1月10日。有些书把杨度的生卒标为“1874 - 1931”，就阴历来说，这是对的，但就阳历来说，就不对，应标为“1875 - 1931”。而现在一般以阳历来标人的生卒年代。又如《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页注（1）：“邵力子（1881 - 1967）。”出版后，编纂者即收到邵力子家乡浙江绍兴的读者来信，指出邵力子生年应为1882年。编纂者向邵力子夫人傅学文查询，知道邵力子生于辛巳年（1881年）阴历十二月初七日，公历应是1882年1月26日，应标为“1882 - 1967”。

7. 跨年

中国人的习惯，过了新年就长一岁，所以跨了年，也可以以一年计。比如毛泽东给高桂滋的一封信，只存抄件，未署年月日，曾经被定为写于1935年12月。可是信中有“阁下于四年前抗日之役”，指高桂滋84师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3年为“四年前”，信不可能是1935年写的。信中又有“卖国贼蒋介石”语，亦可知，信不可能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即不可能写于1937年。这样只能写于

1936年。那么1936年能不能说1933年是“四年前”呢？实际上这是可以的。因为跨了四个年头，或者说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于是《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纂者便将此信系于1936年^①。

8. 特定的年龄语汇

中国传统的一些特定的年龄语汇，能表示具体的年龄，并常见于文献中。如：

及笄、笄年——女子16岁。古代女子十六而加簪子，表示成年。

冠岁(年)——男子20岁。古代男子二十而加冠，表示成年。

而立之年——30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

不惑之年——40岁。《论语·为政》：“四十而不惑。”

古希(稀)之年——70岁。杜甫《曲江》诗：“人生七十古来稀。”

强仕之年——40岁。《礼记·曲礼》上：“四十曰强，而仕。”

舞勺之年——13岁。《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

米寿——88岁。“米”字可析为“八十八”。

周甲——60岁。六十甲子已一周。

诸如此类，还有不少，应该有所了解。

二、季

中国传统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一般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节气来划分，并且与阴历的月份相对应。如：孟春——阴历正月，仲春——阴历二月，季春——阴历三月。孟冬——阴历十月，仲冬——阴历十一月，季冬——阴历十二月。了解这些，对于文献中的一些季节的表述，就可以有正确的把握。此外，中国传统流行的一些季节别名，也应有所了解。现将拙著《岁时纪时辞典》中《四季别名表》，附录于下：

表5 四季别名表

春	青春	青阳	阳春	艳阳	三春	阳节	九春	淑节	春节	韵节
	苍灵	天端	发生	阳中	苍天	芳节	软节			

^① 详见《文献与研究》1985年2期《一信之考旬月踳躅》。

夏	炎夏 炎节	炎序 九暑	清夏 太阳	朱律 火德	朱夏	朱明	三夏	长夏	九夏	昊天
秋	商秋 萧长	高商 九旻	三秋 九和	商节 白商	九秋 收成	素节 阴中	金天 旻天	素商	白藏	凄辰
冬	元冬 严节	元英 上天	清冬 太阴	元序 玄冬	三冬	玄英	九冬	安宁	岁余	寒辰

三、月

中国传统的纪月方法及有关知识如下：

1. 月建

月建亦称斗建。古时以北斗星斗柄的运转计算月份。斗柄所指之辰谓之斗建。其与十二辰(支)相配为：

表6 月建与地支对应表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即寅月、建寅之月为阴历正月。子月、建子之月为阴历十一月。这种纪月的表述方法，在近现代的文献中仍可看到。

2. 月律

古时以乐律与月份相配称月律，其名称及对应的月份如下：

表7 月律与月份对应表

太簇	夹钟	姑洗	仲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黄钟	大吕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即太簇月为阴历正月，大吕月为阴历十二月。这种月份的表述方

法,在近现代的文献中仍可看到。

3. 阴历、阳历的月差

从以上所述的阴历、阳历的年差中,已可以看到阴、阳历的月差也是存在的。阴历十二月的三十日,可能是阳历一月的某日,也可能是阳历二月的某日,月份会相差一两个月。当然也有阴历十二月初一日是阳历12月30日的情况,即月份相同。此外,阴历有闰月,如十二月后又加一个闰十二月,这是阳历没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阴历与阳历的月份是有差异的。文献中表述的月份是阴历还是阳历,一定要搞清楚,否则会造成讹误。如关于夏明翰牺牲的日期,1953年谢觉哉写的《夏明翰同志传》中,说是1928年2月9日。而夏明翰夫人郑家均回忆是1928年阴历二月的某一天,即为公历3月。后查《申报》,1928年3月25日《申报》“国内要闻”栏里报道说以夏明翰为首的“共犯七名”,于“本日(二十日)晨”,在汉口“余记里空坪”被枪决。说明夏明翰牺牲的日期是1928年3月20日,阴历是二月二十九日。谢觉哉写的传,大概是因为凭记忆造成了误差。一是将阴历误为阳历,二是将“二十九”日误为“九”日。

4. 阴历月份的别名

除月建、月律等月份的名称以外,中国还流行很多阴历月份的别名。了解这些别名,对于文献的整理、理解都有益处。现将拙著《岁时纪时辞典》中《阴历十二月别名表》,附录于下:

表8 阴历十二月别名表

正月	孟春、首春、初春、上春、春王、孟阳、首阳、元阳、青阳、正阳、寅月、泰月、初月、端月、元月、陬月、孟陬、大簇、登明、开岁、开春、发岁、华岁、芳岁、肇岁、献岁
二月	仲春、酣春、大壮、夹钟、中和、仲阳、阳中、卯月、丽月、令月、花月、杏月、如月、天魁、小草生月、不斂月、华景、河魁、桃月、盛春
三月	季春、晚春、暮月、杪春、春杪、三春、姑洗、辰月、寤月、喜月、桐月、李月、央月、蚕月、从魁、末春、花见月、禊月、樱笋时。
四月	孟夏、早夏、初夏、新夏、中吕、仲吕、麦秋、桃月、巳月、余月、乾月、槐月、梅月、清和、槐序、传送、小吕、乏月、鸟待月、阴月

五月	仲夏、中夏、蒲节、菖节、艾节、浴兰节、蕤宾、榆月、午月、蒲月、姤月、皋月、榴月、雨月、景风、小吉、小刑、浴兰月、鶡月
六月	季夏、晚夏、三夏、天贶、林钟、精阳、未月、且月、暑月、伏月、荷月、梓月、胜光、长夏、末夏、鸣神月、焦月、蝉羽月
七月	孟秋、首秋、初秋、肇秋、兰秋、萧秋、夷则、凉月、榛月、申月、相月、否月、巧月、兰月、瓜月、商月、冷月、太乙、开秋、文月、巧秋、早秋、白露秋、道秋
八月	仲秋、正秋、中秋、桂秋、仲商、迎寒、观月、酉月、清月、壮月、桂月、获月、南莒、柘月、天罡、竹小春、清秋
九月	季秋、秀秋、暮秋、凉秋、秋杪、三秋、戌月、玄月、剥月、菊月、菊序、霜序、太冲、无射、长月、末秋、朽月、杪秋、暮商、季商、授衣
十月	孟冬、开冬、初冬、上冬、应钟、小春、小阳春、亥月、阳月、良月、玄英、阳春、坤月、檀月、功曹、方冬、岁阳、烝冬
十一月	仲冬、阳夏、霜天、龙潜、黄钟、霜月、葭月、子月、冬月、复月、辜月、鸭月、畅月、枣月、大吉、日冻、风寒、冬子月、盛冬
十二月	季冬、末冬、寒冬、严冬、苍冬、三冬、冬杪、杪冬、步杪、暮冬、暮节、暮岁、穷年、穷纪、嘉平、大吕、极月、除月、丑月、腊月、冰月、临月、余月、涂月、鴈月、栌月、神后、冬腊、汎月、严月、清祀、亲子、蜡月

四、日

中国传统的纪日方法及有关知识如下：

1. 干支纪日

中国的农历，除了以一、二、三……数字纪日外，也用干支纪日，60一循环。干支纪日，近现代的文献中是常见的。至今仍有“黄历”流行，“黄历”上标明了每月每日的干支。旧时，讲迷信的人，出门、动土都要看“黄历”，看其干支的凶吉。旧时嫁娶看“八字”，即出生的年、月、日、时八个干支。现在某些日期的推算仍离不开干支。如梅雨期的推算，有的地方是“芒种后逢丙入梅，小暑后逢未出梅”。福建等地则

立夏后逢庚入梅,芒种后逢壬出梅。这里的丙、未、庚、壬,就是日的干支,即丙日、未日、庚日、壬日。又如推算三伏天,一般以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头伏,第四个庚日为二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三伏。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节日、风俗节日,也是需要根据日的干支推算的。如侗族的斗牛节就是阴历二月或八月的亥日。查检日的干支,可以使用荣孟源《中国近代史历表》(1830-1949年),薛仲三、欧阳颐《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1年-2000年)等。

2. 特定的日名

古时根据月亮的变化纪日,产生一些特定的日名。如:

望:月圆之时。一般指阴历的每月十五日。

朔:新月出现。一般指阴历的每月一日。

晦:残月出现。一般指阴历的每月最后一天。

既朔:阴历每月二日。

既望:阴历每月十六日。

古时将天干与八卦相配合,称纳甲。产生一些特定的日名。详见下表:

表9 纳甲表

八卦	天干	农历日期	八卦	天干	农历日期
乾☰	甲 壬	十五日	坤☷	乙 癸	廿九日
震☳	庚	三日	巽☴	辛	十六日
坎☵	戊		离☲	己	
艮☶	丙	廿三日	兑☱	丁	八日

此外还有很多特定的日名。如:鸡日——阴历正月初一日。狗日——正月初二。猪日——正月初三。羊日——正月初四。牛日——正月初五。马日——正月初六。人日——正月初七。又如上八、一八——阴历正月八日。中八、二八——正月十八日。下八、三八——正月

廿八日。上九——阴历每月廿九日。中九——阴历每月九日。下九——阴历每月十九日等等。又如鲁迅写的“贾子祭诗之夕”，典出唐贾岛每年除夕祭一年所作诗，指阴历十二月三十日，即除夕。这也是特定的日名。

有些特定的日名，涉及到阴历、阳历的差异，需要注意查核。如“年关”一词，可指阴历过年，也可指阳历过年，文献中的年关指什么，就要具体查核。例如关于赣东北弋(阳)横(峰)起义的时间，就牵涉到“年关”指阴历还是指阳历的问题。此次起义的领导人方志敏1935年写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第二节标题是“一九二七年横峰的年关暴动”。如果“年关”指阴历，则1928年春节为1月23日，暴动当发生在1928年1月。但1928年2月13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17期《暴动新年》一文提到：“弋阳横峰两县已于去年底实行抗债暴动。”这是说阳历新年前已实行暴动。从方志敏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中可以了解到，方志敏是1927年11月中旬到达横峰的，“在二十五天极短期的准备下”，“来了一个六七万人的年关大暴动”。证实“年关暴动”是阳历新年前夕，而不是阴历新年前夕。这样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把弋横起义定为1928年1月就错了^①。

3. 各种节日名

中国地广人众，民族多，各类宗教也不少，风俗各异，从而产生了很多民族节日、风俗节日、宗教节日等。这些节日的名称也形成了特定的日名。如风俗节日有：

元宵(节)、上元(节)——阴历正月十五日。

寒食(节、日)——清明前一日。

端午(节)、端阳(节)、重五(节)——阴历五月五日。

重阳(节)、重九(节)——阴历九月九日。

中秋节——阴历八月十五日。

如宗教节日有：

^① 详见冯建辉《弋横起义时间考》，《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1期。

浴佛日(节)——阴历四月八日。

腊八日(节)、成道节——阴历十二月八日

中元(节)——阴历七月十五日

欢喜日、佛欢喜日——阴历七月十六日。

天腊(节)、天中节——阴历正月一日。

伊斯兰教的节日有开斋节、宰牲节、登霄节等,均以回历推算。

各地的风俗节日、各少数民族的风俗节日也很多。如:

刀竿节——云南傈僳族传统节日。阴历二月八日。

千灯节——蒙古族风俗节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

夕九节——广西瑶族年节。阴历五月二十九日。

插花节——云南彝传统节日。阴历二月八日。

火把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彝族、哈尼族、佤族、拉祜族等在阴历六月二十四日。白族、纳西族等在阴历六月二十五日。

达玛节——藏族传统节日。藏历六月十日开始。

雪顿节——藏族传统节日。藏历七月一日开始。

吃立节——广西某些壮族传统节日。阴历正月三十日。

吃虫节——仡佬族风俗节日。阴历六月二日。

西迁节、迁移节——锡伯族传统节日。阴历四月十八日。

诸如此类的风俗节日,拙著《岁时纪时辞典》(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收录很多,可以参见。

现代的节日名也不少,如儿童节(阳历 6 月 1 日)、青年节(5 月 4 日)、妇女节(3 月 8 日)、劳动节(5 月 1 日)、建军节(8 月 1 日)、国庆节(10 月 1 日)、植树节(3 月 12 日)、教师节(9 月 10 日)等等。民国时期也有“双十节”(10 月 10 日)等节日。

以上各种节日名,在文献中是常见的。了解这些节日名,了解这些节日的日期,也有助于整理文献。有些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等对中国也有影响,也在一些文献中出现,也要了解。

4. 节气名

节气名,是中国传统特定的日名,并有相对应的阴历、阳历日期,日历表上多标之。节气名在文献中常见。有些人写信、题词等,不直书年

月日,而书“立春日”、“清明前二日”等。对节气名及其对应的日期也应该有所了解。详下表:

表 10 二十四节气对照表

	节气	阳 历	阴历	
春 季	立春	2月4日或5日	正月	节气
	雨水	2月19日或20日	正月	中气
	惊蛰	3月5日或6日	二月	节气
	春分	3月20日或21日	二月	中气
	清明	4月4日或5日	三月	节气
	谷雨	4月20日或21日	三月	中气
	夏 季	立夏	5月5日或6日	四月
小满		5月21日或22日	四月	中气
芒种		6月5日或6日	五月	节气
夏至		6月21日或22日	五月	中气
小暑		7月7日或8日	六月	节气
大暑		7月23日或24日	六月	中气
秋 季		立秋	8月7日或8日	七月
	处暑	8月23日或24日	七月	中气
	白露	9月7日或8日	八月	节气
	秋分	9月23日或24日	八月	中气
	寒露	10月8日或9日	九月	节气
	霜降	10月23日或24日	九月	中气
	冬 季	立冬	11月7日或8日	十月
小雪		11月22日或23日	十月	中气
大雪		12月7日或8日	十一月	节气
冬至		12月21日或22日	十一月	中气
小寒		1月5日或6日	十二月	节气
大寒		1月20日或21日	十二月	中气

5. 韵目代日

韵目代日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简明表述日期的方法。古代韵书以同韵字归为一部，每韵以一字标目并确定次序，称韵目。韵目次序恒定，遂被用以代日。各韵目所代之日详见下表：

表 11 韵目代日表

1 日	东、先、董、送、屋	17 日	篠、霰、洽
2 日	冬、萧、肿、宋、沃	18 日	巧、嘯
3 日	江、肴、讲、绛、觉	19 日	皓、效
4 日	支、豪、纸、真、质	20 日	寄、号
5 日	微、歌、尾、未、物	21 日	马、箇
6 日	鱼、麻、语、御、月	22 日	养、禡
7 日	虞、阳、寔、遇、曷	23 日	梗、漾
8 日	齐、庚、荠、霁、黠	24 日	迥、敬
9 日	佳、青、蟹、泰、屑	25 日	有、径
10 日	灰、蒸、贿、卦、药	26 日	寝、宥
11 日	真、尤、臻、队、陌	27 日	感、沁
12 日	文、侵、吻、震、锡	28 日	俭、勘
13 日	元、覃、阮、问、职	29 日	赚、艳
14 日	寒、盐、旱、愿、緝	30 日	陷
15 日	删、咸、潜、翰、合	31 日	世、引
16 日	铎、谏、叶		

韵目代日在文献中可以常见，特别是电报、书信中常用。如“马日事变”，即 1927 年 5 月 21 日事变。又如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话说：“自鱼至文，血战七昼夜。”即从 6 日至 12 日血战七昼夜。又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第一版谈到“八月二十二日歼敌……”“八月二十六日又歼敌……”“八月二十七日又歼敌……”第二版将其中的“八月二十二日”改作“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纪念毛泽东》第 230 幅照片是毛泽东《关于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亲笔修改稿，这个“指示”即是《毛泽东选集》收入的《集中优势兵

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指示”的日期采用的是韵目代日,作“未养歼敌……”“未感又歼敌……”“未俭又歼敌……”“未”,地支第八位,代八月。“养”,韵目代日是二十二日。“感”,二十七日。“俭”,二十八日。这么一换算、对勘,就可发现《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八月二十二日”是对的,而一版、二版的“八月二十六日”、“八月二十七日”均误,应作“八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这个差错,大概是查核韵目时疏忽了,而修订时又没有将韵目代日的日期再核对一下。这说明,韵目所代之日,疏忽了也会搞错,一定要仔细、反复查核才行。

6. 阴历、阳历日差

阴历、阳历在年份、月份上会有差异,在日期上更会有差异。所以文献中的日期表述是阴历还是阳历,一定要搞清楚。如李大钊生日已搞清是光绪十五年阴历十月六日,公历1889年10月29日。阴、阳历,月份同,日期不同。1979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李大钊与吉野作造》文章,在标题下写道:“今年10月6日,是李大钊逝世九十周年。”这里一是把诞辰90周年误为逝世90周年,二是把阴历日期误为阳历日期,造成错误和笑话。查检阴、阳历的日期对照,可以用荣孟源《中国近代史历表》、薛仲三等《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紫金山天文台《二百年历表(1821-2020)》等等。

第四节 职官

文献中的人物离不开阶级、离不开职业,也大多离不开职务。担任什么职务、当什么干部,旧时也称当什么官,所以就有“职官”、“官制”的说法。俗语有“文武百官”语,足见官的众多和复杂。可以说职官比职业更复杂。比如“行走”、“侍从”、“祭酒”、“郎中”、“助教”、“博士”、“游击”等等,在清朝都是官名。如果没有一些职官方面的知识,就会把这些名词视为普通名词。从事文献工作不懂职官方面的知识是不行的。整理中共党史资料,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军队、政府的“职官”有所了解,如中共中央负责人,最初称“总书记”,后称“委员长”,后又称“总书记”,以后又改称“主席”,现又称“总书记”。也需要

对民国政府、北洋军阀政府,乃至清朝政府的职官有所了解。

清朝的职官,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职官,都是中共党史文献中会遇到的,以下扼要介绍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组织机构,也扼要介绍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党政军职官,大多已众所周知,就从略了。

一、清朝政府职官

清朝职官沿袭明朝制度,并有几次大的改革。中央行政机构为内阁和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内阁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等官。六部长官为尚书和左、右侍郎。雍正八年(1730年)设军机房,后改军机处,军机大臣成为辅政官员。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实行立宪,成立责任内阁,旧内阁、军机处废。内阁的具体工作人员有典籍厅典籍、侍读学士、侍读、中书、中书科舍人等。各部的具体工作人员,各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下设主事、司务、笔帖式等。宣统三年成立责任内阁时,中央六部已发展成十部: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各部长官称大臣、副大臣。十部大臣加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二人,组成十三人内阁。

地方官制,各省长官称巡抚。另有承宣布政使司,长官布政使,掌一省行政;提刑按察使司,长官按察使(1911年更名提法使),掌一省司法;提督学政(1906年更名提学使),掌一省学校、科举考试。合二省或三省设总督一人。另设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总督衙门设:中军副将(总督卫兵司令)、武巡捕(掌衙门秩序)、文巡捕(掌衙门时务)、戈什哈(掌侍俸)、监印委员、收呈委员。巡抚衙门设:中军参将、武巡捕(掌武官事务)、文巡捕(掌文官事务)、监印委员、收呈委员。

省以下行政单位为府,辖数州县,长官为知府。府以下行政单位为县(州、厅),长官为知县(知州、抚民同知)。直隶州、直隶厅的地位与府相同,并有辖县。奉天府为直属府,长官为府尹、府丞(兼学政)。府设:同知、通判、儒学教授、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宣课

大使、仓大使、库大使等。县设：县丞、主簿、教谕、典史、驿丞、巡检、税课大使、闸官。州设：州同、州判、巡检、驿丞、库大使、闸官。

省与府州之间有道。道辖三四个府州。道的长官为道员，初非实官，清末已成实官。道的名目还有：督粮道、盐法道、河工道、驿传道、海关道、屯田道、茶马道、兵备道等。

州县以下关隘要地设巡检司，长官为巡检，掌治安。各省巡检少者数人，多者数十人、百人不等。

清朝兵制，八旗都设都统衙门，长官为都统、副都统。下设参领、副参领、佐领、副佐领等。驻京各营长官为统领（护军营等）、总统（火器营等），下设参领、副参领（护军营等）、左右翼长（火器营等）等。

地方军事长官，省级为驻防将军、提督、总兵。下设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绿营兵，营长官为参将。营以上协，协长官为副将。协以上标，标长官为总兵等。

清代的职官有别称、敬称。其中有些是历代流传的。如：

中堂——宰相。清大学士、军机大臣亦用此称。

堂老、阁老——宰相、大学士。

首辅、首揆——领班军机大臣。

堂官——中央各部长官，尚书、侍郎。

部臣、部堂——各部堂官。

部曹——郎中、员外郎等。

制台、制军、制宪——总督。总督称总制。

中丞、抚台、抚军、抚院——巡抚。

护院——巡抚离职，由布政使、按察使护理，称护院。

署院——巡抚离职，由布政使、按察使署理，称署院。

节帅——总督、巡抚。

方伯——布政使。

藩司、藩台——布政使。

臬司、臬台——按察使。

廉访、廉宪、廉使——按察使。

军门、提台、提军——提督。

总镇、镇台——总兵。

二、北洋军阀政府职官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政府统治开始。从袁世凯到张作霖,政体有内阁制、总统制、执政制、大元帅制等变化,袁世凯还复辟君主制,但大致的情況如下:

国会为立法机关。设众议院、参议院。两院各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两院还设三个委员会:全院委员会、常任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各设委员长一人(正、副议长不得兼任)。

总统为国家元首。国务院和各部为行政中枢,设国务总理一人,各部设总长一人,次长一二人。由国务总理与各部总长组成内阁。1912年第一届内阁设十个部: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1913年合农林、工商为农商部,成九部。以后又略有变化。

国务院设秘书厅,长官为秘书长。下设秘书、金事。还辖法制局、铨叙局、印铸局、侨务局、经济调查局等,长官为局长。各部下设参事、司长、秘书、金事、技正等。陆军、海军部还设有副官、科长等。

大理院(法院)、总检察厅为司法机关。大理院设院长(曾名正卿)一人。总检察厅设检察长一人。还设平政院掌行政诉讼。平政院设院长1人,评事15人。平政院又有肃政厅,掌监察,长官为都肃政史,下设16个肃政史。

地方行政机关主要为省、县机关。在省之上,有时有辖两三个省的军政长官,常见的是巡阅使,及边防督办、经略使等。

省行政长官,先后称民政长、巡按使(1913年5月23日设)、省长(1916年7月6日设)。省军政长官,先后称都督、将军(1914年6月30日设)、督军(1916年7月6日设)、督理、督办(1922年后)。省设各司处理行政事务,长官为司长或使。亦有设处、厅的,长官称处长、厅长。

省与县之间仍设道,长官为观察使,1914年5月后改称道尹。府废除。州、厅一律改为县。县长官称县知事,也有的称县长。

市为自治组织。特别市设市长、佐理员等。普通市设市长、市董等。市下为区,区设区董。

特别行政区,相当于省级区域。京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等为特别行政区。京兆,设京兆尹为长官。热河、察哈尔、绥远等设都统为长官。

三、国民党政府职官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直到1949年被推翻。其政府体制主要是:

国民政府主席(后改为总统)为国家元首。中央机关主要为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五院的长官为院长、副院长。行政院为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设11部[内政、外交、财政、实业(抗战时改称经济部)、教育、交通、铁道(1938年并入交通)、军政、海军(抗战时期撤销)、卫生、司法行政]、四委员会(侨务、蒙藏、禁烟、劳工)等。各部设部长一人,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一人。各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行政院正、副院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组成行政院会议,议决各项大政方针。

地方行政为省、县两级,并有直辖市、省辖市。省政府长官为省主席,另设省政府委员七至九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议决省内大政方针。省政府机关一般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长官为厅长。又设秘书、保安两处,长官为处长,或秘书长、保安司令。

直辖市、省辖市,设市长一人。由市长、秘书长或秘书主任、各局长等组成市政会议,议决市政方针大事。直辖市一般设财政、土地、社会、工务、公安、卫生、教育七局,必要时还可设港务局、公用局等。省辖市设财政、土地、社会、工务、公安五局,必要时可增设卫生、教育、港务等局。各局长官为局长。

省与县之间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长官为行政督察专员,并兼该地区保安司令部司令,掌管数县的民政、军政。公署一般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科,长官为科长。

县行政长官为县长。一般设公安、财政、教育、建设等局,后改局为

科,各科长官为科长。

县以下为乡、镇,长官为乡长、镇长。县与乡、镇之间,如果需要,还可以设区。区署设区长一人,指导员二至五人。

军事体制,初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军事机关,委员长为最高军事首长。1928年8月撤销军事委员会,设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等。1932年3月恢复军事委员会,军委会下辖军政、军令、军训。总政治部等,各部长官为部长、参谋长等。又设军事参议院,设上将、中将、少将参议和上校谘议。1946年5月再次撤销军事委员会,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长官为部长。国防部下辖各厅、局,长官为厅长、局长。国防部长外还设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下辖陆军、海军、空军、后勤四个总司令部,各司令部长官为司令、参谋长。

军队编制,师、团、营、连较为稳定,曾设旅,后废。师以上有军。军以上有路军、集团军、方面军、兵团等。军以上机构变化较多,往往在战时临时设立。军、师、团、营、连的长官,一般为军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军以上的长官一般称司令。军官军衔分将、校、尉三级,每级又分上、中、少三级。

四、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及政府职官概况

1. 党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央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设组织部、宣传部,首长为主任。地方党组织称“区执行委员会”、“区委”(开始曾称“支部”)。首长为书记。

中共“二大”后,中央领导人称“委员长”。设组织、宣传、妇女三部,首长为部长。地方区委首长称“委员长”,有的称书记。

中共“四大”后,中央领导人称“总书记”。各部首长,有的称部长(军事等部),有的称“主任”(组织等部)。地方区委首长称“书记”。

中共“五大”设中央政治局(由中央局改称)、中央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称)。领导人称“总书记”。各部首长为部长。地方组织改称省委、县委等,首长为书记。又设中共中央北方局。“八七”会议

后,又设长江、南方中央局。1931年1月15日设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中央局首长称书记。

1934年1月15—18日,六届五中全会后,仍设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为总书记。又设中央书记处,成员均为书记。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后取消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为毛泽东等五人,由毛泽东主持日常工作。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并设主席,由毛泽东担任。

中共“七大”,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均由毛泽东担任。各级地方党委首长均称书记。

2. 政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是在1927年以后各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成立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宣告成立,标志着统一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央政府成立。

工农民主政府的权力机关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至四人。主席为毛泽东。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最高政权机关。主席团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至四人。

工农民主政府的行政机关,亦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是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设主席一人,人民委员若干。主席为毛泽东。“毛主席”的称呼由此而起。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各人民委员部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各人民委员部由人民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担任领导,另设副人民委员一至二人。各部首长亦称部长、副部长。

工农民主政府的司法机关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专管审判工作,而司法人民委员部专管司法行政工作。最高法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二人。最高法院下设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军事法庭,各设庭长一人。地方政府只设裁判部,未设法院。当时没有专门的检察机关,采取“审检合一”制,将检察机关附设在审判机关内。最高法院设检察长一人,

副检察长一人,检察员若干人。

工农民主政府的审计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的审计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委员若干人。

地方政府分为省、县、区、乡四级。乡为基层组织。省、县、区机关的设置大致相同。省、县、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设主席团。主席团设主席、副主席。各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既是权力机关,又是行政机关。执委会及主席团下设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裁判等部及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工农检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至二人。各部下设科,设科长、副科长。分局设局长、副局长各一人。分局下设部、部下设科,各设部长、科长。此外,各级执行委员会下还设总务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处下设科,设科长、副科长。各级裁判部为地方司法机关。除设部长、副部长外,还设裁判员、巡视员、秘书、文书若干人。省、县裁判部设有检察员若干人,区裁判部不设检察员。省执委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

乡最高权力机关为乡苏维埃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下设主席团(不设执委会),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主席团成员若干。乡主席团下不设部、局等机构,只设各种经常性的或临时性的委员会。各种委员会除了乡的代表参加以外,还吸收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均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一人及委员若干组成。乡代表分片,每片指定一名代表为“代表主任”,负责主席团与各代表的上下联络。代表则直接联络、领导居民。村,不设行政机关,但可设与乡相应的委员会,由村里的代表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府,在体制上略有变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1937年9月20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转变成抗日民主政府。以后其他地区的工农民主政府也相继转变成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府是民国政府的特区政府,其基本体制如下:

边区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边区各级参议会。参议会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参加组成,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一至二人,主持全会。参议会选举边区各级政府委员会,选举各级政府的主席、县长、乡长。参议会设常驻委员会(乡除外),但参议会闭幕期间,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不再行使最高权力,而由各级政府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

边区政府分为边区、县(市)、乡(镇)三级。边区政府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为边区最高行政长官。边区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厅,秘书、审计、保安等处,及保安司令部。各厅设厅长一人。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保安处等设处长一人。保安司令部设保安司令一人。必要时,可增设副厅长、副司令、副处长等。

边区政府与县政府之间,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边区政府的代表机关,管辖两个以上的县。专员公署设专员一人,必要时设副专员一人。专员公署设秘书室,设主任秘书一人,秘书、文书、庶务、收发各一人及干事若干人。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粮食等处,各设处长一人,干事若干人,设保安科,设科长一人,干事若干人。

边区政府的司法机关为边区高等法院和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高等法院设院长一人。法院设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各设庭长和推事。审判委员会设正、副委员长,由政府正、副主席兼任,委员共五人,为三审,即终审机关。

县,有县政府委员会。县长为行政长官。必要时可选举副县长一人。县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等科,各设科长一人。又设司法处,为司法机关。司法处设处长一人,审判员一人,书记员一人。司法处为一审,即初审法院。设保安大队部,设保安大队长一人。

县与乡之间设区公署,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关。设区长一人。管辖三至五个乡。

乡(镇)参议会,不设议长、副议长,也不设常驻委员。开会时选举主席团三人主持会务。乡设乡政府委员会。乡长为行政长官。乡长及文书一人,为脱产,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乡政府可视需要设优待救济委员会、文化促进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除奸委员会、卫生保育委员会、人民仲裁委员会及其他临时性的委员会。各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

人,委员若干,均不脱产。

乡政府下设行政村,设主任一人。行政村下设自然村,有村长一人。行政村和自然村都不是一级行政机关。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逐渐向人民政府发展。在一些新解放的地区、城市,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过渡政权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军管会下设市政府,设市长、副市长等。市府下设各局,设局长等。军管会下还设物资接管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各委员会设主任等。还设警备司令部,设司令等。条件成熟的地区,成立人民政府。人民政府设主席、副主席等。下设各部,设部长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逐渐过渡到各省(市)、县人民政府。

3. 军队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机构,1925年底成立了中央军事部,设部长一人,1925年又成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设书记一人。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后建立的。

军队的名称,1927年8月至11月,不统一。南昌起义军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理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下辖十一军、二十军、九军三个军,各军设军长、党代表。军下辖师、团,设师长、团长。秋收起义部队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设总指挥、师长、副师长。下辖三个团,各设团长、党代表。赣东北起义部队称农民革命团,后改称“土地革命军”。有的地方还有称工农讨逆军、共产军、农民自卫军等。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新军队的名称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4月以后,改称“红军”。1931年1月前后,改称“工农红军”。红军,初期以军为单位,各军设军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等。军下辖若干纵队(支队)。纵队设司令员或纵队长、党代表。支队设支队长、党代表。纵队、支队下视情况设团、营、连等。红军日益发展,军以上开始建立军团,辖若干军。军团设军团长、或总指挥、政治委员等。军团以上设方面军,辖若干军团。方面军设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等。军的党代表亦改称政治委员。军下辖师,设师长、政委等。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36年2月红军对外使用“人民红军”、“抗日红军”称号。对内仍用“工农红军”称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亦称“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八路军设总指挥部,设总指挥(总司令)、副总指挥(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等。下辖115、120、129三个师。师设师长、副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初曾设政训处主任,后改政委)。师下辖旅、团、营、连,设旅长、团长、营长、连长。以后八路军在师以外,又设纵队,设司令员、政委等。纵队下辖旅、支队等。支队设支队长、政委等。新四军设军长、副军长、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各支队设司令员、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等。1939年军下增设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指挥部设指挥(司令员)、副指挥(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等。支队发展到六个,另有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挺进支队)、挺进纵队、江北游击纵队。支队除司令员外,增设政委。1941年重建新四军军部,军下辖七个师并一个军部独立旅。师下辖旅、团、营、连。设师长、旅长、团长等,亦设各级政委。

抗战时期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副总司令等。联军下辖11个军,各设军长、政委等。以后11个军又组建为三路军即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各路军设总指挥、副总指挥、政委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基本上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总部设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等。各地部队基本上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区。野战军开始以东北、华北、华东等为称,后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野战军设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等。下辖若干兵团。兵团设司令员、政委等。兵团下辖若干军,军设军长、政委等。军下辖师、团、营、连。地方军区,分大军区、小军区。大军区下辖若干小军区。大、小军区均设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最高领导是中央军委。20世纪30年代初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抗战时期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军委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等。又设军委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总卫生部等,各设部长、主任。解放战争初期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后期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又设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卫生部等。

中共党史文献工作者需要具备的知识是广博的,这里介绍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内容,可以参见黄宗忠主编《文献信息学》第十五章《文献信息学人才培养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求》。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 | | | |
|----------------------|--------------------|---------------------|
| 《文献学概论》 | 倪波主编 |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
| 《档案文献学》 | 黄存勋等著 |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 《档案文献编纂学》 | 曹喜琛等著 | 档案出版社 1987 年版 |
| 《档案文献编研学》 | 张君炎等著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 《中国历史文献学》 | 王余光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 《中国历史文献学》 | 张家璠等主编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 《中国历史文献学》 | 杨燕起等主编 |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
| 《史料和历史科学》 | 荣孟源著 |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 《中国现代革命史史科学》 | 张注洪著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第二版 |
| 《中国现代史史科学》 | 何东著 | 求实出版社 1987 年版 |
| 《中国现代史科学概论》 | 陈明显著 |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1987 年印 |
| 《中国现代史史科学》 | 张显文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 《社会科学文献学》 | 郭星寿编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 《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检索概论》 | 马文峰编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 《文献信息学》 | 黄宗忠主编 |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
| 《中文文献编目》 | 刘苏雅编著 |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
| 《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 | 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课题组等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
|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

◆ 后 记

199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郭军丽《党史文献学刍议》，并注明原为硕士学位论文。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中共党史文献学的论文。文中谈到了党史文献的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等问题。但关于党史文献的概念、性质、特点、类型、价值、功能等党史文献的理论问题，并未涉及。关于党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目的、任务、方法等，没有专门深入论述。文中提出：“组织党史文献学的专家学者编写切合实际的《中共党史文献学》的教科书、工具书、参考资料丛书，使这门学科不仅在实践中行之有效，而且在理论上也逐步完善起来。”还提出在高校的中共党史、革命史、现代史专业，开设“中共党史文献学”课程（《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32页）。但“中共党史文献学”的体系是怎样的，怎么建设这门学科，文中没有涉及。文中提到导师沙福志的《中共党史文献学讲义》（未刊稿），遗憾的是这个讲义迄今为止没有出版，无法知道这本讲义的理论体系是怎样的。

我是1988年转向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教学的，同时也开始中共党史学理论（概论）、中共党史史料学的研究、教学。给研究生讲“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史料学”等课。“中共党史史料学”，已涉及到中共党史文献。在讲“中共党史学概论”的“中共党史学科组成体系”时，分别介绍了中共党史学批评、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中共党史目录学、中共党史校勘学、中共党史版本学以及中共党史文献学的大概内容。在1990年定稿的《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中介绍中共党史的分支学科时，专门介绍了“中共党史文献学”。（此辞典原拟1991年出版，向中共建党70周年献礼，后因出版方面的原因搁置，直到1993年才出版。）不过，这些

“中共党史文献学”的介绍,仅仅是涉及而已,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只是对“中共党史文献学”有兴趣、很关注,但无暇研究之。当《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原名《毛泽东生平研究史稿》)、《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等党史史学史的著作相继完成之后,1994年初湖南出版社邀约研究、写作“中共党史文献学”,以纳入该出版社的《中共党史研究丛书》。觉得亦是一件党史学界的大事,遂欣然应命。然1994年底书稿完成后,湖南的丛书却下马了。此书稿的出版搁置下来。

中共党史文献学的体系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曾思考、研究了很长时间。在开始写作这本书以后,仍在思考、研究,并时时调整写作提纲。现在奉献给学术界的体系,只是个人的一些探索性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党史文献学分成:理论问题、文献搜集、文献整理、文献编纂四大部分。理论问题包括中共党史文献的理论问题和中共党史文献学的理论问题。文献整理的内容最多,文献的校勘、文献的考证都是文献整理的内容。因为校勘、考证要谈的内容多,所以都独立成章了。文献的编纂,是否应包括资料汇编型和著述型两部分,经过反复斟酌,认为应包括这两部分,而不能只论某一部分。关于文献的出版,是否应纳入党史文献学,思研再三,认为可不纳入。一方面因为“出版”的内容很多,可另写专书。另一方面因为个人认为党史文献工作最重要的是搜集、整理、编纂三个环节。所以最终把“中共党史文献的出版”删去了。只是在“编纂”的最后提了一下“出版”。“党史文献工作者的素养”,应纳入党史文献学。但如果设章论述,当涉及到很多方面,特别是理论方面的修养应重点论述。而谈文献搜集、整理、编纂时,都已经强调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所以不想再重复。鉴于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应该谈一谈,于是就设了“党史文献工作的相关知识”一章。这一章实际上是谈了党史文献工作者素养的一个部分。以上的一些思路,正确、妥当与否,敬请学术界各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写作本书,只是想为“中共党史文献学”这个新兴学科,添一砖、加一瓦,为

这个新兴学科的大厦早日建成,出一把力。希望能有更好的中共党史文献学著作早日出版。

本书稿在数年的搁置中,陆续作了一些修改。在获准资助出版后,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只是学殖粗疏,不当之处一定不少。乞盼内行专家多多指教。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跨世纪”出版基金的资助,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及宁镇疆、夏玮诸位编辑的指导、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周一平

2001年6月15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文献学/周一平编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ISBN 7-5617-2544-2

I. 中… II. 周…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学 IV. 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660 号

中共党史文献学

编 著 周一平
责任编辑 宁镇疆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326千字
版 次 2002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年9月第一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7-5617-2544-2/D·092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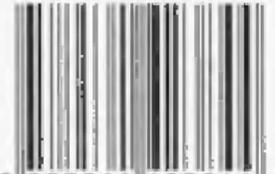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中共党史 文献学

ISBN 7-5614-2384-5



9 787561 423844 >

ISBN 7-5614-2384-5/G·402

定价：30.00 元